


A hand holding a CD in front of a bookshelf. The CD is held in the foreground, and the background shows a bookshelf with several books. The text "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核心课教材" is overlaid on the image.

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核心课教材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

王子舟 著

A red decorative element, possibly a logo or a stylized character, located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cover.

武汉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版式设计
封面设计

严红
程小宜
支笕
汪卉

ISBN 7-307-03813-7



定价：14.00元

9 787307 038134 >

ISBN 7-307-03813-7 / G · 628



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核心课教材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

王子舟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8
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核心课教材
ISBN 7-307-03813-7

I. 图… II. 王… III. 图书馆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G2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1215 号

责任编辑:严红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支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湖北省通山县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125 字数:273千字 插页:2

版次: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7-03813-7/G·628 定价:14.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所购我社教材,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供应部门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发展简史、内容体系、学科性质、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等基本原理和内容。以知识论为立场，对图书馆学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梳理与研究，提出了“知识集合”等重要命题，认为应根据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之间关系来建立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体系。书中内容在大量吸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资源的同时，还参考、借鉴了图书馆学近年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对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作出了分析与预测。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教科书或参考书，亦可供图书馆及其他知识信息管理部门的人员学习使用。

前 言

1999年，我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承担图书馆学基础的教学任务。图书馆学基础是图书馆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担负着阐释图书馆学原理和目标的重要任务。虽然20世纪80年代国内出版过数种较高质量的教科书，但20年来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也有了許多新的进展，原有的教科书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教学需求。为了尽量胜任教学工作，我在学习、参考大量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的教科书、研究论文的同时，广泛涉猎了国内外有关信息科学、传播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管理、哲学、语言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不断查阅文献、消化文献和深入地思索过程中，我萌发了编写新的图书馆学基础教材的愿望，并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

本书的写作初期，我常常遇到一些困惑。面对一个问题、一个观点，我总是力图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悉心加以梳理。换言之，我在写作中，总是力图做一个“知识考古者”，而非一个“知识建筑师”。因为，好的理论应该是解释性的。而要做一个“知识考古者”，就要求作者必须直面那些逐步清晰起来的大量事实，进而作出新的解释与论证。这是一种艰难而又冒险的尝试，但也是一项富于挑战性的工作，正是

在这种尝试过程中，一些新的观点和思路产生了。这些观点或许还欠成熟，或许仍有错谬之处，但毕竟是作者认真探求、潜心思索的结果。例如我认为，不同历史时期，图书馆学概念中的核心概念（研究主题）也不同：在图书整理时代是“图书”，在经营管理时代是“图书馆”，在信息技术时代是“信息”，在未来的知识社会则将是“知识”。这种演变其实就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移。未来的图书馆学研究重心转向知识领域，既是其自身学科逻辑理性的发展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作用造成的，是图书馆学对其自身学科逻辑起点（文献）的更高层次的回归。我还认为，以往的图书馆学是一种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的“机构图书馆学”，它在学科发展中存在着很大局限性：其一，它将图书馆学等同于图书馆工作，举凡图书馆内部的一切命题都成为了图书馆学，致使许多低层次的事物与活动也成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其二，它使图书馆学成为图书馆员的独享学问，与社会人群几乎没有关系，图书馆学未能成为一种“获取知识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这些局限性无疑会阻碍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

在就读图书馆学博士之前，我曾有十余年的图书馆实际工作经验，从事过图书馆许多部门的具体业务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我也深深体会到：图书馆是一个能力层次十分丰富的空间，有最低级的简单劳动，也有最高级的研究活动。它既需要工人，也需要学者。早在1928年，胡适先生在上海东方图书馆暑期讲习班的一次讲演中就强调过：“图书馆的中心问题，是要懂得书。图书馆学中的检字方法、分类方法、管理方法，比较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懂得方法而不懂书，是没有用的。你们的地位，只能做馆员，而不能做馆长的。”^①胡适所谓“懂得书”，就是要懂得书的内容及形式等各方面的知识。这个见解我想对今天仍有某些价值。我认为，一个图书馆员是否优秀，不取决于他能否依照某种方法快捷地找到读者所要的一本书，而是取决于他能否以渊博的学识和熟练的技能为读者解

^① 胡适. 中国书的收集法.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4 (5): 1~8

疑释难。优秀的图书馆员不仅能使读者通过阅读变得更聪明，具有洞察周围事物的能力，同时也要帮助读者成为光明和理性的创建者。这样的图书馆员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未来知识社会的“知识工作者”。这也是我们图书馆学专业培养人才的目标。图书馆学基础以及图书馆学其他课程无疑都应达到这个目标而担负重任。

读者在阅读此书时不难发现，本书在篇章结构上一反以往教材的安排，没有将“图书馆的性质”、“图书馆的职能”、“图书馆的类型”、“图书馆事业建设”、“图书馆管理”、“图书馆现代化”等传统的基础理论教材中的主要内容纳入本书。这是因为，本书论述的是图书馆学这门学科所涉及的基本原理，而非“图书馆管理学”或“图书馆工作概论”。图书馆学固然与图书馆工作有联系，但图书馆学与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工作是不能等同的概念范畴。在本书中，我将图书馆的本质抽象为“知识集合”，并以“知识集合”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立意就是要在图书馆的最本质的层面上来建设图书馆学。因此，我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是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这样就超越了“机构图书馆学”以图书馆为研究重心的范式规定。总之，我试图站在“知识论者”的立场，希望图书馆学研究能在知识领域里前行，并使图书馆学成为对社会人群有益的一门科学。

本书最后附有“阅读推荐目录”，是为那些想对图书馆学基础有深入了解的学生开列的。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得到了武汉大学教务部的大力支持，并被选列为“十五”规划教材之一。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也给予本书的写作以许多支持和关注。我的研究生姚学斌在资料统计、名词术语的翻译等方面付出了大量劳动。而我的妻子王碧滢，更是在润饰文字、打印文稿方面付出了许多时间与心力；她的“苛刻”和不经意间流露的敏锐见解，加深了我的思考和灵感，并已经融入到了本书的许多观点与陈述之中。本书承蒙牡丹江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蒋永福先生提供了许多建议与修

改意见，作者已采纳若干。作为本书责任编辑的武汉大学出版社严红副编审，对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给作者提出了极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在此，我对以上帮助和支持本书出版的所有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我期待来自读者、专家对本书的批评，期待与大家进一步探讨本书未能尽涉或未能廓清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

王子舟

2003年4月于武汉大学湖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图书馆学宗旨	1
第一节 两个基本假设	1
一、每个人都是知识欠缺者	2
二、每个人都想获取有用的知识	3
第二节 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	5
一、被动获取知识	5
二、主动获取知识	6
第三节 图书馆学宗旨	9
关键词·小 结·思考题	12
第二章 图书馆学简史	14
第一节 德国、英国、美国的图书馆学	15
一、德国图书馆学	15
二、英国图书馆学	18
三、美国图书馆学	21
第二节 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图书馆学	27
一、俄罗斯图书馆学	27
二、日本图书馆学	32
三、印度图书馆学	37
第三节 中国的图书馆学	40

一、古代的图书馆知识体系	40
二、现代图书馆学的产生	41
三、图书馆学发展的三次高潮	43
四、图书馆学代表人物	47
五、台湾图书馆学研究	49
关键词·小 结·思考题	51
第三章 图书馆学基本概念	54
第一节 图书馆学基本概念的演变	55
一、图书整理时代	55
二、经营管理时代	56
三、信息技术时代	58
第二节 知识是当代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	59
一、知识成为核心概念的原因	60
二、知识的涵义	61
三、知识的类型	62
四、客观知识的特征	64
第三节 知识与其他基本概念的区别	65
一、知识与信息的区别	66
二、知识与情报的区别	67
三、知识与文献的区别	68
关键词·小 结·思考题	70
第四章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72
第一节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	72
一、整理总和说	72
二、图书馆管理说	75
三、图书馆事业说	76
四、知识交流说	79
五、信息资源说	81

六、知识组织说	82
第二节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	84
一、以往研究对象认识的范式特征	85
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	87
三、“知识集合说”对图书馆学将会产生的影响	91
关键词·小 结·思考题	93
第五章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	95
第一节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形成	95
第二节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演变	97
一、20 世纪上半叶的内容体系	97
二、20 世纪下半叶的内容体系	102
第三节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构建原则	106
一、合理继承原则	106
二、科学分类原则	107
三、成熟发展原则	107
第四节 当代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	108
一、理论图书馆学	109
二、应用图书馆学	110
关键词·小 结·思考题	111
第六章 图书馆学核心内容 (一): 客观知识	113
第一节 客观知识的性质	113
一、客观知识的创新性	113
二、客观知识的中介性	114
三、客观知识的可编码性	115
四、客观知识的可传递性	116
五、客观知识的无损耗性	117
六、客观知识的可共享性	117
七、客观知识的可加工性	118

八、客观知识的不确定性·····	119
第二节 知识的基本组分·····	120
一、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的涵义·····	120
二、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的关系·····	124
第三节 基于知识组分的知识组织·····	129
一、知识组织的涵义·····	129
二、知识组织的原理·····	130
三、知识组织的方法·····	132
关键词·小 结·思考题·····	135
第七章 图书馆学核心内容 (二): 知识集合 ·····	137
第一节 知识集合的范畴·····	137
一、知识集合的概念·····	137
二、知识集合的类型·····	138
三、知识集合的边界·····	139
第二节 知识集合的结构·····	140
一、知识集合的元素·····	140
二、知识集合的结构·····	141
三、集合的组织过程·····	144
第三节 知识集合的功能·····	146
一、集合功能的特性·····	146
二、知识集合的三大功能·····	147
第四节 知识集合的环境·····	149
一、环境与集合之关系·····	149
二、环境与集合共构的空间·····	150
三、环境发展对知识集合的需求·····	151
关键词·小 结·思考题·····	152
第八章 图书馆学核心内容 (三): 知识受众 ·····	154
第一节 知识受众及其本位观·····	154

一、读者概念的演变·····	154
二、知识受众的概念·····	157
三、知识受众本位观·····	159
第二节 知识受众的合法权益·····	162
一、知识受众的具体权利·····	163
二、知识受众的义务·····	168
第三节 知识受众的需求与服务·····	170
一、知识受众的成分与结构·····	170
二、知识受众的需求与服务·····	175
关键词·小 结·思考题·····	186
第九章 图书馆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188
第一节 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188
一、理论基础的涵义及作用·····	188
二、理论基础及其相关概念·····	189
三、理论基础的几种重要思想·····	192
四、理论基础的开拓建设·····	199
第二节 图书馆学的实践基础·····	201
一、实践基础的涵义及其相关概念·····	201
二、实践基础对图书馆学所起的作用·····	203
三、当代社会实践基础的主要特征·····	205
关键词·小 结·思考题·····	208
第十章 图书馆学学科性质与地位·····	210
第一节 图书馆学学科性质·····	210
一、以往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认识·····	210
二、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216
第二节 图书馆学学科地位·····	222
一、从学科规范程度看图书馆学地位·····	223
二、从文献频率统计看图书馆学地位·····	227

关键词·小结·思考题·····	238
第十一章 图书馆学相关学科·····	240
第一节 图书馆学同族学科·····	240
一、图书馆学与文献学·····	240
二、图书馆学与档案学·····	243
三、图书馆学与情报学·····	244
第二节 图书馆学相邻学科·····	246
一、图书馆学与教育学·····	246
二、图书馆学与知识社会学·····	248
第三节 图书馆学远缘学科·····	250
一、图书馆学与心理学·····	251
二、图书馆学与语言学·····	251
三、图书馆学与历史学·····	252
四、图书馆学与传播学·····	253
五、图书馆学与法学·····	254
六、图书馆学与知识管理·····	255
七、图书馆学与计算机科学·····	256
关键词·小结·思考题·····	257
第十二章 图书馆学方法论·····	259
第一节 图书馆学专门科学方法·····	260
一、单元知识研究法·····	260
二、知识集合研究法·····	264
三、知识受众研究法·····	271
第二节 一般科学及哲学的方法·····	274
一、一般科学方法·····	275
二、哲学方法·····	285
关键词·小结·思考题·····	286

第十三章 图书馆学未来发展	289
第一节 影响图书馆学的社会发展因素	289
一、社会发展的全球化	289
二、社会发展的网络化	291
三、社会发展的知识化	292
第二节 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趋向	293
一、研究重心向知识领域转移	293
二、学科发展从细化走向整合	294
三、学术理性由技术倾向人文	296
四、研究特点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	299
五、学科建设更加注重本土化	301
关键词·小 结·思考题	303
附录：阅读推荐目录	305

第一章

图书馆学宗旨

人们最初接触“图书馆学”这个名词时，基于某些感性的了解，一般将其视为“驭书术”，即把图书馆学看做是管理图书的一套方法与技术。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图书馆学虽与书籍有关，甚至可以说是有关图书的学问，但是决非如此简单浅显。以往，图书馆员们经常会听到读者的认真询问：“图书馆学是研究什么的？”“图书馆学的目的是什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图书馆学有什么用处？”这不仅是人们经常向图书馆员提问，也是图书馆学研究者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图书馆学中的一个元问题，它的解答有助于图书馆学为自己建树一个目标。

第一节 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是指根据有限的事实材料，对所研究事物的本质或规律提出的一种初步设想。假设往往是一门科学的出发点。比如数学当中的公理方法就包含了假设。用恩格斯的话说：“数学上的所谓公理，是数学需要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很少几个的思维规定。”^① 不仅纯抽象思

^① 恩格斯著；于光远等译，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维的科学使用假设，那些研究复杂社会现象的科学也常使用假设。经济学就是使用假设非常成熟、成功的科学之一。经济学家们为了避免纷杂的事物和人带来的混乱，抓住主要因素来揭示当代社会经济现象，因而常常进行假设。如经济学家为搞清个体如何影响整体，假设人是理性的人，其经济行为是理性或合乎理性的；理性的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有了假设，经济学家就可以推导出若干推论，然后与观察到的事实再相验证。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也崇尚实证思维，但他们经常先建立起若干假设，然后展开一系列逻辑推理来解决问题。恰如美国经济学教授曼昆（N. Gregory Mankiw）所言：“假设可以使解释这个世界更为容易。”^①

我们图书馆学是一门缺乏假设的学问，这可能与图书馆学是在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事实有关。图书馆学研究者似乎忽略了假设作为一种逻辑思维的有效方法，可以为图书馆学提供逻辑推理的大前提，可以使大量复杂问题简单化。当我们要回答“图书馆学宗旨是什么”这样一个实证性思维的问题时，假设或许会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当然，假设的提出是理性的，它应该有现实根据或背景知识的支持，而且它必须是可检验的，即可用经验事实来确证或否证。

一、每个人都是知识欠缺者

“每个人都是知识欠缺者”，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假设。这一判断对于有知识的人来说，应该是不证自明的。它的依据至少有两个方面：

首先，人类到目前为止创造的知识内容虽然庞大得难以估计，但它基本上是有限的。至今人类知识对人类已意识到的众多问题还无法说明，如在“极大”领域中，有关宇宙的许多问题还处于难以解释的状况；在“极小”范畴中，关于物质最小元素的结构乃至人

^① [美] N. 格里高利·曼昆著；梁小民译. 经济学原理（上）. 北京：三联书店，1999：21

体自身的诸多问题现在也未能加以充分说明。与其相对，就个人知识来说，每个人现有的知识含量更是有限。他的未知领域与人类整体知识的未知领域相比较，显然要更大、更多。尽管现在人们受专业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掌握的专门知识越来越多，然而每个人一旦跨出自己的专业领域，便往往会感到自己有着相当程度的无知。正如波普尔所说：“在我们对各事物所知程度的微小细节上，我们之间也许有巨大的差异，但在我们无限的无知上，我们都是相同的。”^①

其次，人类已有的整体知识基本以客观知识（即显知识）的形态存在着，客观知识世界是动态的、不断增长的。这种增长虽然依靠个体知识的增长来推动，但人类客观知识的增长是无限的，而社会个体的知识增长却是有限的。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史相对于人类知识积累史来说太短暂了。而且，每个人知识的不断增长，他的未知空间也在不断扩大延伸。这种扩延表现在知识的量的方面，也表现在知识的质的方面。如果用正数代表知识增长，那么未知的扩延就是负数，正是这种正数与负数的对立统一方构成人类知识发展的绚丽画卷。人类的认识能力、知识含量只有在这种扩延中才能得到提高与增长。因此，“每个人都是知识欠缺者”只是对人的认识现象、知识状态的客观阐述。

二、每个人都想获取有用的知识

“每个人都想获取有用的知识”，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二个假设。

亚里士多德曾有名言：“求知是人类的本性。”^②人与动物不同，人有超越现实、追求理想，实现超越生物学意义自我的本性。而实现这样的目的，必须依靠知识的力量。因此，追求知识、获取

^① [英] 卡尔·波普尔著；范景中等译.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46

^②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 形而上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

知识也必然是人的本性之一。求知的本性来自于人的内心世界，也就是好奇心。人的知识欠缺甚至无知所带来的不安或渴望求知的心理表现为好奇心。人的知识欠缺甚至无知是人的好奇心产生的内驱力，它驱动人去不断求知解惑。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类将进入知识社会。人类求知欲望不但有好奇心作动力，同时也已将求知与生存这两个概念凝结一处，在它们之间画出了等号，变成深入人心的一种理性意识支配着每一个人。在农业社会中，知识的作用还比不上劳动的作用，即使在工业社会，劳动与资本还是认识社会的基本根据。然而到了知识社会，劳动与资本的重要性开始衰退，科学知识正向一切生活领域迅速渗透。社会大厦是建立在专业化知识及具有专业知识人才的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比过去任何时期依赖于知识，并为知识所调节^①。失业的危险主要发生在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教育不足的人群身上。大多数人十分清楚这一点：没有充足的知识含量，是难以胜任社会角色所承担的责任。而保证这一点，我们必须不断地吸取有用的知识。

如果说“每个人都是知识欠缺者”这一假设是对人的知识状态的客观阐释，那么“每个人都想获取有用的知识”这个假设则是对人求知欲望的内在揭示。正如黑格尔所说：“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他还没有把这个陌生的世界变成为他自己使用的，他住在这世界里面不是像居在自己家里那样。好奇心的推动，知识的吸引，从最低级的一直到最高级的哲学见识，都只是发源于一种希求，就是要把上述不自由的情形消除掉，使世界成为人可以用观念和思考来掌握的东西。”^②

① [加] 尼科·斯特尔著；殷晓蓉译. 知识社会.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7-13

② [德]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 美学（第1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5

第二节 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

人们获取知识有两种主要途径，被动获取知识与主动获取知识。

一、被动获取知识

被动获取知识，主要是指人接受教育的过程。人类的进步已积累出庞大的客观知识体系，每个人来到现实社会之中，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通过受教育以对人类以往知识有所继承，并成为一个人有知识素养的人。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大学，现代学校教育过程几乎占据了人一生三分之一的的时间，这还不包括家庭教育、技能培训等其他过程。哲学家洛克尝言：“知识不是天赋的。”^①而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如何把人类已获得的知识传授给新的一代。因此，教育是人类一切事业之本，它可以提高人的知识能力，丰富人的头脑，成为人不断全面发展的强大推力。

然而，人接受教育的过程本身是一个被动吸收知识的过程。荀子《劝学篇》说：“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以木、金比喻受教育者，表明受教育者是处于被动塑造的位置。早期的社会教育，许多专门技能与知识采取秘传方式，如神职人员、医师巫术、精神领袖的知识传授，大多有专门、秘密的仪式。“在原始神秘社会，学院中最重要的知识要严格保密，其成员只能在入门过程中渐渐地获取；没有哪一个专家能与院外人士共享这种知识，除非按规定方法把获准的候选人介绍进群体。”^②这种秘传的知识随岁月流逝，“可能变得卷帙浩繁、深奥难解、精致入微，以至于如果不花几年时间，几经名家指点，就无法理解。”^③可见，早期受教育者所处地位

① [英] 洛克著；关文运译. 人类理解论（上）.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6

②③ [波兰] 弗·兹纳涅茨基著；郑斌祥译.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68~69

的被动性是非常明确的。

近代科学昌明以后，科学精神得到了光大。科学精神的特质要求科学知识应该变得使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知识常被看成体现集体利益的公共商品。个人专业技能与知识的提升依赖于原则上任何人都可获得的知识。随着现代教育的完善与普及，知识秘传方式正在逐渐消失。不过，现代教育中受教育者获取知识的被动地位仍未彻底改变。在学校当中，一方面是受教育者，另一方面是教育目标，二者之间的平衡是靠大量人为的规范来保持的。在这些规范的保护下，教育者传授知识采取反复灌输的方式；而受教育者对规范必须服从，且服从程度的权威标准就是考试。考试（如我国现行的高考）本身意味着规范比知识更重要。所以受教育者仍然处于被动地位。灌输方式与服从规范虽然能使受教育者得到大量知识，增长智力，但它们扼杀了受教育者的自由思想与创造意识。创造意识与智力并非完全等同，它还包括个性等方面的非智力因素。智力是可以教出来的，而创造意识则只能潜移默化地培养。

二、主动获取知识

主动获取知识显然与被动获取知识不同，主动获取知识是人们在知识传授者“缺席”的情况下完全自主地寻找知识的一种行为过程，如选择阅读、查找资料、上网搜索知识数据库等。古人称：“玉隐石间，珠匿鱼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①主动获取知识的行为一般大量发生在每个人受教育阶段结束之后，因为教育阶段给予人们的是知识基础，真正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进行知识创新的重要阶段还在后面。当然，在受教育阶段主动获取知识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无非被一些人所忽视而已。

主动获取知识与被动获取知识相比较，它对人们更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如下三个理由：

第一，人们在主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能够认识自我，发现自

^① [东汉]王充.论衡·自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450

我，激发求知的进取心。柏拉图《申辩篇》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可说颇具典型性。在古希腊科林斯湾北岸有一小镇德尔菲（Delphi），苏格拉底的一个友人到德尔菲神庙去问神：是否还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神回答说：没有人比他更聪明。这消息使苏格拉底惊讶和惶恐，他不知神谕是什么意思。他为探讨其义，便寻找那些自认或公认为有知识的人，向他们讨教。他先后拜访过一位雅典政治家、一位诗人和一位工匠，他发现他们对自称有知识的事，实际上并无知识。苏格拉底认为，既然神决不说谎，那么这条神谕的惟一正确解释就是：神并不想对苏格拉底说什么话，神只是利用其名来断言，最聪明的人是像苏格拉底那样承认自己并不聪明的人^①。看来，苏格拉底正是通过主动求知才得到了自己“无知”的见识。用德国中世纪哲人库萨的尼古拉的话来说，苏格拉底获得的是“有学识的无知”，因为“谁对他本人的无知认识得越深，他的学识就会越多”^②。

第二，只有通过主动获取知识，人们才能发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更好地领悟知识真谛。中国古代哲人经常使用的“自得”概念，就包含了主动获取知识的意思。如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③自得，就是自主地、主动地去学习、积累知识，达到默识心通的境界。北宋程颐说：“学莫贵于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④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谈读书时说：一个读者所能拥有的最重要的品质是独立性，即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去获得你自己的结论，

① [古希腊] 柏拉图著；严群译. 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5~57

② [德] 库萨的尼古拉著；尹大贻译. 论有学识的无知.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4~5

③ 杨伯峻. 孟子译注（上）. 北京：中华书局，1960：189

④ [清] 黄宗羲. 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北京：中华书局，1986：607

“我们可以肯定滑铁卢之役发生在哪一天，但却没有人能肯定《哈姆雷特》是否比《李尔王》写得更出色？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决定他自己的答案。如果把权威引进我们的书房，并且让他来告诉我们如何念书，念些什么，让他来评断我们所读的作品价值，那么即使这位权威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却无异扼杀了读书王国中最可贵的自由精神。”^①在这里，自主性、主动性是联结一体的，只有主动去获取知识，你才能实现自己思想的自主性、独立性，从而保证把握住知识的本真与朴质。

第三，主动获取知识可以磨砺思维与判断，培养自己的创造力。任何一门科学知识，它都对人有某种思想、品性上的锻造力。16世纪英国学者培根在其《随笔》(Essays)一书中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如智力不集中，可令读数学，盖演题须全神贯注，稍有分散即须重演；如不能辩异，可令读经院哲学，盖是辈皆吹毛求疵之人；如不善求同，不善以一物阐证另一物，可令读律师之案卷。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皆有特药可医。”^②《随笔》是培根写给英国贵族青年阅读的小册子，此段话是在谆告当时年轻人：不同的社会知识对人有不同的益处，人们应据自身情况与条件去主动获取方显效果。当然，在普通人之外，那些科学工作者的主动获取知识不会像选择阅读这样简单与轻松。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他们有时会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去搜寻资料，有时会长年累月进行观察与实验，有时会不分昼夜统计、分析数据，有时也会对已得到的吉光片羽的文字苦思冥想不已。然而只有经历了这样的艰辛过程，他们的思想才更加锐利，才能创造出科学上的种种成就。

① [英] 培根等著；林衡哲等译。读书的情趣与艺术。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102

② 王佐良主编。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北京：三联书店，1994：10~11

第三节 图书馆学宗旨

当我们从横向角度考察了人们获取知识的两种基本方式之后，我们还应从纵向角度来探索一下人类知识是如何传播与积累的。在文字发明以前，人的知识的传递方式是口耳相传，它是线性的，用公式表达为：“隐知识→隐知识”。人的知识的积累方式是大脑记忆。然而，文字的发明使得人的知识传递方式发生了改变，个体主观知识通过文字记载可以转化成社会客观知识，社会客观知识经过阅读接受又能够重新变成个体主观知识，用公式表达可为：“隐知识→显知识→隐知识”。多了“显知识”这个中间环节，这就从过去的线性方式变成了散射方式，打破了人类知识传递上的时空局限。同时，人类的知识积累也在大脑记忆这种单一形式之外出现了脑外储存的重要形式——图书记录。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说，“所谓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Social mechanism）”^①。可以说，图书资料的产生不但扩大与延伸了人脑的记忆功能，使人类的知识积累出现加速度，而且它也促成了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有了图书，就会有存放图书的场所。

提及人的知识记忆，从心理学角度看，它是通过识记、保持、再现（再认或回忆）等方式在人的大脑中积累与保存知识的心理过程；从信息加工的角度看，它是人的大脑对从外界输入的客观知识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记忆包括“记”与“忆”两个方面，“记”体现在识记和保持上，“忆”体现在再认和回忆上。记忆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空间的想象，把一些毫不相关的论题（topic）串在一起，构成一个首尾一贯的、可以提取的知识库^②。既然人们知识记忆功能通过图书实现了物化、外化，那么人类客观知识在人脑

① 袁咏秋，李家乔主编.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48

② 赵旭东. 人类学的时间与他者建构. 读书，2001（7）：127~133

之外也存在着如何实现“记忆”的问题。图书是客观知识的载体，图书馆收集图书、整理图书实际上就是客观知识的识记；图书馆把群书组织成一个有序的系统并长久地给予保存，这就是客观知识的保持；而人们通过检索途径在图书馆获取到有用的图书资料，这就是知识的再现。图书馆对客观知识具有的识记、保持、再现功能，而历经千百年图书馆实践活动逐步演化出来的图书馆学，正是一门不断努力提高客观知识社会记忆能力的实用性社会科学。

什么是图书馆学的宗旨，其实已有图书馆学者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早在1923年我国学者杨昭愬就说过：“要使中国图书馆发达，非得先研究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的作用，简单说有两种：（一）可以增进办理图书馆的人能力；（二）可以增进利用图书馆的人知识。”^①1957年刘国钧先生说：“图书馆学有其实践的目的——改变现实使它更合于人们的理想。它企图改造的现实乃是人们的文化生活、人们的思想、知识、技能，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重要现象。这种实践的目的也是一切科学所同有的。”^②1980年台湾学者王振鹤也曾指出：“图书馆学的效用，对国家社会而言，它是管理国家文化资源，推展社会教育的一项手段；对图书管理机构而言，它是一项资料处理的应用技术；对个人而言，它是一项治学的门径与研究的方法。”^③

上述观点虽然出于不同时期，但无论是谈图书馆学的作用，还是图书馆学的目的，图书馆学的效用，都涉及了图书馆学宗旨问题。因为一门学科的宗旨，就是指它本身具有的主要目的与意图。总结前贤诸说，我们可以概括出这样一句话：图书馆学的宗旨就是为人们主动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与方法。

首先，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增进人类客观知识社会记忆能力的学

① 杨昭愬. 图书馆学(上).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3: 6

② 刘国钧. 什么是图书馆学.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 1957(1): 1~5

③ 台湾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编. 图书馆学. 台北: 学生书局, 1980: 1~2

问，它是为满足人们获取知识的愿望及主动获取知识的需求而存在的。如前所述，每个人都是知识欠缺者，每个人都渴望获得对自己有用的知识，而主动获取知识对每个人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人们在主动获取知识的活动中，社会必须为他提供一定的可能性条件。图书馆学研究的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不但具有“知识仓库”的作用，同时还起着知识记忆、知识导航的作用，它可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现实条件与保障。因此，图书馆学是把可能性条件转变成现实的一门科学，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知识集合如何满足人们主动获取知识的需求”这个核心命题而不断产生的。

其次，图书馆学能为人们提供一种特殊的知识，即寻找知识的知识。18世纪英国文豪塞·约翰逊（S. Johnson）曾有这样一个格言：“知识有两种，一种是我们自己知道的某主题的知识，而另一种则是我们知道什么地方能够找到知识的知识。”美国一所大学图书馆大门上方也镌刻着类似的一句话：“知识的一半就是知道在哪里去寻求它。”^①关于某主题的知识是一种可编码的知识，而寻找知识的知识属于一种获取知识的能力知识。在知识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竞争愈演愈烈，学习和积累知识的能力越强，获得持续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获取知识的能力正在成为个人、集体乃至国家、民族的新的核心竞争力。图书馆学中包含着大量知识搜集、知识存储与知识检索方面的内容，它不但能给人们提供一些关于某主题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能为人提供寻找知识的知识。这对于人们获取知识的能力的提高会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因为获取知识的能力知识是人们难以具备的。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如果我问他人，‘你应该如何进行学习？’大多数人都知道答案。但是，如果我再问，‘你是否以你擅长的方式进行学习？’很少有人作出肯定的答复。然而，以自己擅长的方式进行学习正是

^① 张帆，安民编译. 图书馆咨询.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8

有所成就的关键。”^①古人强调“学贵自得”，也强调“读书得间”，“间”指的是间隙、窍门。比如，人们获取知识后如何储存就是一个问题，用大脑记忆是内储，笔记摘录、电脑录存等这是外储。哪些知识要内储？哪些知识要外储？外储的方法有哪些？怎样使外储的知识深化、精化、活化？这些都能从图书馆学中得到工具与方法的帮助。

总之，困难的不在于思想，而在于摆脱旧思想。把图书馆学视为仅是有关图书馆的学问，或仅是从事图书馆工作所需要的学问，这种传统观念显然早已过时。图书馆学在未来知识社会中，应该是知识工作者们求知、解惑、治学、科研之利器。图书馆学是一门专业，它在努力提高人类客观知识的社会记忆能力。一个人或许在图书馆学中找不到他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但图书馆学可帮助他确立信念，感悟人生，增长学养，丰富知识，实现人生的美好追求。

关 键 词

假设 求知 知识传递与积累方式 被动获取知识 知识秘传
主动获取知识 自得 知识 图书馆学宗旨 寻找知识的知识

小 结

1. “每个人都是知识欠缺者”，“每个人都想获取有用的知识”，这是图书馆学提出的两个基本假设。前者从外部客观地阐释了人的知识状态，后者从内部揭示了人的求知欲望。

2. 有了求知欲望，就会有获取知识的行为。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主要有两种：被动获取知识与主动获取知识。被动获取知识的主要形式是接受教育，主动获取知识的形式则是在知识传授者“缺

^① [美] 彼得·德鲁克著；顾信文译. 自我管理（上）.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9）：28~32，13

席”的情况下，自主阅读、检索。主动获取知识较被动获取知识更具有重要意义。

3. 文字的发明，图书的出现，使人类知识的传播从以往的线形方式变为散射方式，知识的积累从以往的大脑记忆变为脑外储存，扩大与延伸了人脑的记忆功能。图书馆对知识具有识记、保存、再现的功能。图书馆学是一门努力提高客观知识社会记忆能力的社会科学。图书馆学的宗旨就是为人们主动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与方法。

思 考 题

1. 假设在科学研究中有何作用？
2. 为什么说每个人都是知识欠缺者？
3. 人类求知的内在动因是什么？
4. 为什么说主动获取知识较被动获取知识更有意义？
5. 知识的传播与积累方式在文字发明前后有何不同？
6. 图书馆学的宗旨是什么？

第二章

图书馆学简史

研究图书并逐渐形成知识体系，这在东西方各国均有悠久的历史。如我国西汉末年刘向等人整理皇家藏书而创立的校讎学，就是我国古代早期研究图书的一种知识形态；西方的目录学（bibliography 或 bibliology，又译为“书志学”^①）也是过去研究图书的一种知识体系。它们都是现代图书馆学的前身。现代图书馆学的建立与西方现代图书馆的涌现和发展有密切关联。工业革命以前的图书馆，大多是教会、修道院、家族的一个附属机构，而现代图书馆则摆脱了这种附属地位成为独立发展的社会学术文化事业。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诺德（G.Naudé, 1600～1653）正是这种历史转折期的一个杰出人物。他多次效力于私人图书馆，他写的《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1627年）被公认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馆学著作。因为此书全面阐述了图书馆的目的、图书采编和流通的方法、馆员的职责与馆员的研究范畴等。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现代图书馆制度逐步建立。图书馆工作开始形成一种专业，图书馆学也被逐渐明确

^① 马导源著. 书志学.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1. 马导源称: “书志学为图书之学, 在英语上称为 (Science of) Bibliography 或 Bibliology, 有些学者, 以此两用语, 认为有区别的, 但我的意见, 这两个名词, 都是以研究图书为对象的学问 (The Science of Books), 毕竟可解为同物异名。”

为一门科学知识。

第一节 德国、英国、美国的图书馆学

一、德国图书馆学

德国是现代图书馆学形成的摇篮。1807年，德国图书馆学家施雷廷格（M. W. Schrettinger, 1772~1851）最早使用了“图书馆学”（bibliothekswissenschaft）这一名称，表示图书馆学是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1808年至1829年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1835年又出版了该书的缩写本《图书馆学手册》。施氏凭借自己45年的图书馆实践经验，在书中强调了图书馆职业的独立性。认为一位具有相当学识的学者不一定能成为出色的图书馆员；没有受过图书馆学专门训练的人，难以完成图书馆的使命。因此，他建议设专门训练机构传授有关图书馆学的知识与技能。

1880年，德国开始建立图书馆员资格考试制度，凡图书馆从业人员须经专业学习与考试方能录用。这对图书馆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培训工作，以及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1886年，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专业培训机构——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讲座由齐亚茨科（K. Dziatzko, 1842~1903）成功开办。当时经过改革了的德国大学正在迅速成长为世界上声望最好的大学，格丁根大学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它所拥有的图书馆也因其富有成效的工作成为新旧大学图书馆的典范^①。格丁根大学图书馆馆长齐亚茨科所开授的图书馆学课程有目录学（bibliography）、书写及印刷史、古文书学、图书馆经营法等科目。如果说目录学、书写及印刷史、古文书学等是研究图书的传统知识体系的话，那么图书馆经营法则是现代图书馆的发展催生出来的新的图书

^① 孙光成主编、世界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百科全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495~497

馆学内容。因此，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讲座讲授的图书馆学，基本上还是以“古典图书馆学”为主体，它表明当时的图书馆学还是传统专业知识与新专业知识结合的一种产物。

就在格丁根大学设立图书馆讲座的第二年，齐亚茨科编辑了《图书馆学著作论文集》丛刊。不过，德国学者虽然最早使用了“图书馆学”这一词汇，但在19世纪末，德国学术界曾一度尽量避免这一词汇的使用，而更多地用“图书馆事业”（bibliothekswesen）以及“图书馆管理学”（bibliothekslehre）。因为当时德国人对“科学”存有一种仅限于纯粹科学的强烈观念，而wissenschaft则有科学、科学研究之义，他们对于图书馆学是否属于科学范畴心怀疑虑。因此，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讲座是以“图书馆辅助学”（bibliotheks-shülffswissenschaften）名义设立的^①。普鲁士文化部授予齐亚茨科的是“图书馆辅助学”教授职称，而不是直截了当称“图书馆学”教授^②。20世纪之后，德国人渐渐将有系统的知识体系大都称为科学时，“图书馆学”一词才流行开来。曾经在1921年担任过普鲁士国家图书馆馆长、1928年担任过图书馆学院院长¹的著名德国图书馆学家米尔考（Fritz Milkau, 1859~1934），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了他的宏著《图书馆学手册》，全书分三册：《论手稿与图书》（1931年）、《论图书馆管理》（1933年）、《论图书馆史》（1940年）。他的著作以“史”为核心，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对图书馆学作出了清晰的阐述，是当时德国图书馆学的集大成著作，至今仍为德国图书馆学教育中重要的基础教材之一。

由于德国图书馆学教育具有培训人员参加考试的功能，因此非正规的地方图书馆学校的培训和继续教育活动非常发达，而在正规大学里，直到20世纪后期图书馆学才被承认是一门具备学位资历

① 台湾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 图书馆学.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56~57，70~71

② 杨子竞. 近代德国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 国外图书情报工作，1990（3）：16~19

的大学本科学科。因为德国大学教育理念认为：大学的基本作用是非职业性的，它追求的是纯研究和纯学术。所以，德国图书馆学内容早期主要以目录学与图书史为中心，其研究活动侧重于图书整理与图书馆管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面向图书馆工作的研究之外，才出现了另一种倾向：面向社会方面的研究，即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图书馆学的问题^①。这方面研究的杰出代表就是卡尔施泰特的“图书馆社会学”（soziologie der bibliothek）。

彼得·卡尔施泰特（Peter Karstedt, 1909~?）早年在大学中攻读法学和国家学，1932年以论文《现行刑法及其修正中的渎职罪概念》在莱布尼兹大学获博士学位。1933年10月他通过了德国图书馆员资格考试，后供职于卢伯克市立图书馆，前后长达2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任该馆馆长。卡尔施泰特在1954年出版了《图书馆社会学之研究》一书，引起学术界极大重视，该书很快销售一空。1965年，他又重新修订出版了第2版。卡氏在书中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图书馆社会学”，他从“历史社会学”、“体系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三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历史社会学”研究图书馆发生、发展的社会原因，“体系社会学”研究图书馆对其所归属的社会形象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知识社会学”则研究知识与图书馆所属社会形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卡氏的历史社会学认为，图书馆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学原因在于“社会形象”（图书馆创建者）是否永久。家族、君主的私人图书馆与建立者本人紧密相联，这些图书馆往往随着所有者的死亡而逐渐消失，只有那些由抽象社会形象建立起来的图书馆，才具有生命上的连续性。即社会形象越抽象，图书馆的生命力就越强，其公开性也越大（利用公开、所有权属公共、经费来源于全社会）。在体系社会学中，卡氏认为社会形象内部及背后隐含着某种“社会精神”，

^① [德] 汉斯·阿尔贝赫斯·科赫.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图书馆研究. 见：第47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大会论文译文集. 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82：34~44

这种社会精神是动态的，每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定的社会精神。社会精神担负着稳定和发展该社会形象的任务，而图书馆就是维持和传播社会精神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机构，它通过传播社会精神而使社会形象世代相传，并通过对敌对的社会形象中的社会精神的排斥与限制流通等，对其所属的社会形象起到维护作用。卡氏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观点是：人类集体产生的理念共同体反映了人类的客观精神。图书是客观精神的容器。图书一旦被收集到图书馆中，就不再是一个个单纯的个体了，而是表现“客观精神连续体”的“有意义的集合”。图书馆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发生联系（客观精神移植于个人）的场所。人类社会的文化就是在这种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相互作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①。卡氏的思想，理论色彩十分浓厚，这对于图书馆学在德国能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科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著作在英语世界也有广泛的影响。

二、英国图书馆学

英国的图书馆学与德国的图书馆学有所不同。德国图书馆学主要是以学术图书馆为实践基础逐步生长出来的，而英国图书馆学则是以公共图书馆为主要实践基础而逐步生长出来的。前者注重理论体系及其学术性，后者则更重视管理方法的完善及其应用性。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虽然世界各国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几乎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但18世纪英、美等国出现的“会员图书馆”却是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河。尤其是英国议会在1850年通过了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公共图书馆法》（*Public Libraries Act*）之后，英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到1900年已有公共图书馆360所）。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公共图书馆是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不列颠图书馆的前身），在该馆供职35年并担任过馆长的著名学者帕尼齐（Anthony Panizzi, 1797~

^① 李广建. 卡尔施泰特和他的图书馆学思想. 湖北高校图书馆, 1987 (1): 66~69

1879), 不仅设计出可容书 6 万册的圆形阅览大厅, 而且出版过文献编目方面的杰作《91 条著录规则》(1841 年)。这一著录规则确定了以著者为著录核心的编目原则, 广为欧美各国图书馆所认同, 我们现行的编目方法便由此产生。同时, 它也成为了英国图书馆学早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在帕尼齐的卓越领导下, 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藏书总数在 1866 年已达 120 万册, 成为当时世界上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人们称誉帕尼齐为“图书馆员的拿破仑”。帕尼齐关于图书馆应向所有人开放的思想、实现呈缴本制度以及图书馆人文管理的一套方法都为其后英国图书馆学界所珍视与继承。

与帕尼齐齐名的另一位英国图书馆学家爱德华兹 (Edward Edwards, 1812~1886), 出身低微, 是靠自学面成才。自学场所就是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 后来一度在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工作, 与帕尼齐是同事。他对 1850 年英国颁布的“图书馆法”贡献良多。1851 年, 爱德华兹成为了依据图书馆法而建立的第一所市立图书馆——曼彻斯特市图书馆的馆长。这期间他写成了他的代表作《图书馆纪要》(*Memoirs of Libraries*, 1859 年)。该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为《图书馆史》, 下册为《图书馆经营》。书中阐述了爱德华兹公共图书馆理论的两个原则(图书馆不应受政党影响, 图书馆是公益事业)以及图书馆采购、藏书、寄赠、分类、索引、管理制度等诸多内容广泛的专题知识。爱德华兹后被誉为英国图书馆学和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先驱。原不列颠博物院院长邦德(1815~1898)说:“他的伟大才能和工作能力是显著的”, “在公共图书馆管理方面, 我不知道其他具有如此广泛丰富见解的人。”^①

英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往往与那些著名的图书馆馆长有密切关联, 他们就像一块块可数的里程碑, 在帕尼齐、爱德华兹之后, 布朗、萨维奇、塞耶斯等人均对英国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的发展作出了

^① 爱德华^②及其《图书馆纪要》。见: 袁咏秋, 李家乔主编.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315~321

^② 原书中爱德华兹的中译名无“兹”字。

重要贡献。布朗 (James Duff Brown, 1862~1914) 的《主题分类法》(1906年) 曾在英国图书馆界盛行一时; 其《图书馆管理手册》(1903年) 也曾作为基础教材在英国广泛流行, 先后数次重印。萨维奇 (Ernest Albert Savage, 1877~1966) 这位爱丁堡市图书馆馆长最有名的论著是《综合性图书馆中的专业图书馆工作及其他论文》(1939年), 该文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最有创见、对实践促进作用最大的图书馆学文献, 它批评了英国公共图书馆传统的组织模式和结构, 提出应采用专业分部(室) 阅览制。而塞耶斯 (W.C. Berwick Sayers, 1881~1960) 在担任克罗伊登图书馆馆长期间写的《儿童图书馆》(1912年), 则被视为英国该主题第一本著作^①。

在英国人看来, 图书馆学是包括图书馆工作各个方面的一门学科, 因此, 图书馆学最初在英国使用的名称是“图书馆管理学” (library conomy), 而且一直使用到 20 世纪。相对而言, 美国却从 19 世纪中叶流行“图书馆学” (library science)^②。所以英国的图书馆学缺乏纯理论的学术著作, 一些图书馆学入门教材也多以管理工作为主要内容。如当代图书馆学家 K.C. 哈里森的《图书馆学基础》 (*First Steps in Librianship*, 1950年) 一书, 至 1980 年已出至第五修订版, 读者相当广泛。然而该书十章中无一章阐述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 而是直接介绍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专业研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情况, 并对业务活动、工作方法、人员管理、馆藏组织等一一分专门章节进行论述, 其体系结构承袭的是爱德华兹的《图书馆纪要》, 实质上是一部图书馆实用手册, 而非一部理论学术著作。因此, 随着图书馆实务的不断更新, 该书也不得不重新修订改写, 正如哈里森自己所说: “我尽量使本书能够反映图书

^① 孙光成主编. 世界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百科全书.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1: 431, 484

^② 《不列颠大百科全书》(1974年第15版) 中的“图书馆学”条目, 见: 袁咏秋, 李家乔主编.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34~35

馆学的最新面貌。但是这一行业的发展变化是惊人的，恐怕等本书出版，又很难囊括新的变化情况。”^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图书馆学具有“管理学派”的特征。

由于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支持，加上公共图书馆制度的十分完善以及科学管理方法的运用，如今英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十分发达。据1999年度不列颠官方统计年鉴的数据，英国现有公共图书馆已超过5 000所（全国人口有5 880万），国内58%的人口是公共图书馆的注册读者，其中1 000万人至少每两周去一次图书馆。英国公民的第五大业余消遣是到图书馆借阅文献（前四项依次是上酒吧、去餐馆、开车兜风、进快餐店）。1997年7月，英国图书馆与信息委员会（LIC）公布了题为《新的图书馆：人民的网络》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宣言，并得到了工党政府的批准。政府承诺到2002年要使全国公共图书馆（含乡村图书馆）联网，促进信息技术的普及。公共图书馆正在成为公民惟一可以持续使用的社会资源，并被人们誉为21世纪知识社会的“心脏和大脑”^②。

三、美国图书馆学

美国的图书馆事业相对欧洲来说没有那么悠久的历史，早期的图书馆有私人、团体创办的，如纽约州的机械工会的机械图书馆，主要是用来教育工人的。1850年以后，在英国图书馆法的影响下，美国各城镇才相继立法，开始建立公共图书馆。美国的大学图书馆最初藏书少，发展慢，1900年以前很少有大学图书馆藏书在10万册以上的^③。因此，美国图书馆界有关图书馆经营的一切成法皆取

① [英] K.C. 哈里森著；佟富译. 图书馆学基础.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

② 许建业. 英国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现状和趋势. 江苏图书馆学报，2000（1）：56~57

③ [美] 华伦·哈斯. 美国图书馆概况. 见：美国图书馆学专家讲演集. 上海：上海市图书馆学会，1980：2~10

自于德国、英国等，初期的图书馆学也移植自欧洲。但美国图书馆学与英国图书馆学不同，虽然在早期偏重于管理与技术的研究，可是后来却一度努力在“实用”与“理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卡特与杜威是美国早期图书馆学界最著名的两个人物。卡特(Charles Ammi Cutter, 1837~1903)曾任波士顿图书馆馆长，他最大的成就是在1887年编制出了供分类排架用的《卡特著者号码表》(*C. A. Cutter's Alphabetic-order*)和在1891~1893年完成了《展开式分类法》(*Expansive Classification*)。这部分类法在世界上广有影响。杜威(Melvil Dewey, 1851~1931)与卡特一样，也发明了一种图书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及相关索引》(*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ive Index*, 1876年)。这部分类法与卡特的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并称为美国图书馆的三大分类法，同时也是在世界上影响最大、使用年限最久的一部分类法。除此之外，杜威还在1887年于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图书馆学校“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经营学校”(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 at Columbia College)，用以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由于杜威将图书馆事业视为一种职业，因此该校所开课程多以实用技术为主(包括图书馆经营、目录学、专题讲演、业务指导、学术讲演等)，并改变了以往知识与技能的“师徒相传”的方式，把图书馆学变成一种职业教育。这与德国格丁根大学将图书馆学作为科学的辅助之学已经相去甚远。正如杜威在其分类法第1版导言中宣称的：他不是追求什么理论上完整的体系，而只是从实用的观点来设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①。显然，这是一种“实用主义图书馆学”，或称为“实用学派图书馆学”。

1918年，以巨款赞助图书馆事业的卡内基基金会委托图书馆学专家威廉森(Charles C. Williamson, 1877~1965)调查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现状，三年以后，威廉森提交并公布了名噪一时的调查报

^① 杜威及其《十进制图书分类法》。见：袁咏秋，李家乔主编.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26~332

告《图书馆服务之训练》(1923年)。这份报告批评了当时作为职业技能培训的图书馆学校的通行做法,指出图书馆学校应致力于专业性之训练而非事务性之训练,专业性训练应在四年大学教育基础上实施,而且大学一年级的专业研究应属一般性及基本性的,二年级开始专门化课程之研究^①。1928年,在卡内基基金会、美国图书馆协会、芝加哥大学三方的合作下,世界上首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院——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以下简称GLS)正式成立。受日后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实证研究风气的影响,GLS的图书馆学教授韦普尔斯(Douglas Waples, 1893~1978)为使图书馆学具有科学研究的规范性,曾专门开设了一门研究方法的专题课,讲授对学术用语如何精密定义,如何发现问题和确定研究范围,如何应用假说,如何收集分析数据等。他本人也运用社会学的客观、实证方法研究成人阅读问题,并与他人合作出版了《人们想读什么书》(1931年)、《给人们读什么》(1940年)等具有相当水平的理论专著。韦普尔斯的高足伯埃尔森(B. Berelson)称其导师将图书馆学从“静止的世界”发展为“动态的世界”,运用社会科学手法开一代研究新风。而伯埃尔森也继承乃师衣钵,借助内容分析法研究图书传播与图书馆利用^②。从此,美国图书馆学的“芝加哥学派”开始形成。

“芝加哥学派”是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图书馆学新研究范式的代表。它强调图书馆学研究科学化,坚持从各种社会科学中获取学术资源,注重图书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弘扬理念图书馆学大旗。这一学派的研究者是一个前后默契的学术集体,除韦普尔斯、伯埃尔森以外,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要属巴特勒和谢拉二人。巴特勒

^① 美国的图书馆教育制度。见: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科教处. 世界图书馆事业资料汇编.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290~309

^② 黄纯元. 论芝加哥学派(上、中、下). 图书馆,1997(6):1~3,14;1998(1):7~10;1998(2):6~9

(Pierce Butler, 1886~1953) 早年攻读神学, 后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是 GLS 初期教授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图书馆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1933 年)。该书共有 4 章, 分别探讨了图书馆学科学化、知识的社会化、知识吸收的心理、知识的历史变迁等重要命题, 从科学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实务等诸多角度论及图书馆活动的各主要领域。巴特勒在该书序言中说: “与社会活动的其他领域的人们不同, 图书馆人在自己的职业的理论方面的忽视是不可思议的。在其他领域, 只要是当代人, 都抱有一种好奇心, 多方设法使自己的工作与人类社会的主流合拍, 但图书馆人似乎对这种做法抱超然态度。图书馆人明显束缚在自己朴素的实用主义的框框里。就是说, 使直接的技术过程合理化, 仅以此满足对知识的关心。其实, 企图使这种合理化普及以形成专业的理论的尝试本身大概是结不出果实来的, 我想甚至是危险的。”^① 巴特勒的书是“很不及物”的, 没有直接涉及图书馆实际工作, 但这本小薄册子却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

巴特勒的学生谢拉 (Jesse Hawk Shera, 1903~1982) 于 1944 年获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学博士学位, 1947 年被聘为 GLS 的专职教授。他有着丰富的图书馆、情报工作的实践经验。他在晚年写就的《图书馆学引论》(*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1976 年) 曾引起图书馆学界的广泛重视, 成为世界各国图书馆学基础课程的主要教学参考书之一。这本著作共分 8 章, 对图书馆发展史、图书馆与社会、读者与图书、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学新方法、图书馆事业结构、教育与研究、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等专题, 分别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并努力宣传自己的“社会认识论”思想。谢拉的“社会认识论” (social epistemology) 既不是传播学的 (如研究图书的社会作用), 也不是哲学的 (如研究知识是如何发展扩大的), 而是图书馆学自己的 (即研究怎样把知识组织协调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加以

^① 巴特勒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见: 袁咏秋, 李家乔主编.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345~351

利用)。“社会认识论”关注的是知识的交流和消耗、知识与社会的互动、知识中介(图书馆)作用的发挥等。

谢拉晚年所处的时代,正是情报学兴起的时代。虽然“芝加哥学派”弘扬理念图书馆学的主张逐渐被人们接受,成为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图书馆学主要理论范式,但70年代以后信息科学与计算机技术的飞快发展,使得“实用主义图书馆学”重又抬头。因为信息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使图书馆发生了巨大变化。图书馆工作的自动化、联机检索、电子资源的大量产生,这一切使人们感觉到图书馆事业出现了新旧之间的明显边界。于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力量开始向技术应用领域转移,图书馆中也出现了以往没有的业务人员——技术人员。新技术的运用又导致了新型业务培训的产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一些图书馆学院开始逐步改名为“图书馆和情报学院”(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课程体系中也开始加大计算机技术等情报科学的教学内容。80年代,图书馆学课程体系被人称为“3C+1”,即收集、编目、传播之上再加计算机,计算机是为前三者服务的手段^①。此时期,一些图书馆学的论著也表现出对技术的崇拜倾向。如著名图书馆学家兰卡斯特(F.W.Lancaster)在《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an age of electronics*, 1982年)一书中预言,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未来20年人类将进入无纸社会。在电子时代,图书馆将完全消失,蜕变为保存印刷资料的档案机构^②。

然而,也有一些图书馆学家对技术的发展及作用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并且要求图书馆学在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中应保持必要的张力。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和情报研究院教授巴

① [美] 罗伯特·斯图亚特. 情报检索和它对图书馆学校课程带来的影响: 北美调查. 见: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51届至53届大会论文选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111~115

② [美] F.W. 兰卡斯特著; 郑登理等译. 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5: 136~150

克兰德 (M.K. Buckland) 在其《图书馆信息科学的理论与实践》(1988年)一书中指出:“为了发展理论,我们有必要超越技术层次,真正理解到,一个社会在取得文本记载知识的过程中,并非只有印刷技术在起作用。主题索引法的原理就先于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技术发展使原先只在理论上行得通的事物变为在实际中切实可行。而正确的理论允许我们能更有效地使用技术。另一方面,在应用技术时所产生的问题能激发我们深思,促进理论发展。”^①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数字图书馆得以诞生。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是在分布式计算机网络中能够存取海量数字化信息知识的社会资源组织。它有三个基本要素:数字化资源、网络化存取、分布式管理^②。目前,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本国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力图使之成为本国数字资源中心、教育平台、网络文化中心等。数字图书馆也成了图书馆学界从1990年以来最前沿、最热门的研究焦点。虽然数字图书馆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大量的数字图书馆研究成果扑面而来,但美国图书馆学界仍有一种理性的声音不时地提醒着人们。1995年,图书馆学家克劳弗德(Walt Crawford)与戈尔曼(Michael Gorman)在其《未来的图书馆:梦想、狂热和现实》(*Future libraries: dreams, madness, and reality*)一书中指出:印刷文本不会消失,它将与电子文本互补共存;图书馆既是一座大楼,又是一个界面;图书馆员对新技术的兴趣与及时赶上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向技术狂热投降^③。

由此看来,对于图书馆学来说,理论与应用是图书馆学的两翼,理论研究的目标是认识,应用研究的目标是实践。二者虽然可

① [美] M.K. 巴克兰德著; 严吉森译. 图书馆信息科学的理论与实践.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4: 25~26

② 刘炜等. 数字图书馆引论. 上海: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2001: 21~24

③ Walt Crawford and Michael Gorman. *Future libraries: dreams, madness, and reality*.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5: 180~182

以疏离，但它们又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

第二节 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图书馆学

一、俄罗斯图书馆学

俄罗斯图书馆学是世界图书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714年，俄国科学院图书馆正式成立。它既是沙皇的图书馆，也是人人可享用的大众图书馆，因此，被称为俄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18世纪中叶，塔吉谢夫（В.Н.Татищев）编纂《辞典》（*Лексиконе*，1793年）时，已对“图书馆”（библиотека）、“图书馆员”（библиотекари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概括性的定义。到了19世纪，一些大型的图书馆纷纷建立，研究图书馆藏书与编目的论著也开始出版，如奥列宁（А.Н.Оленина）的《圣彼得堡皇家图书馆编目新经验》（1809年）与莱斯（Ф.Ф.Рейса）的《皇家莫斯科大学图书馆的设置》（1826年）^①。这时俄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尚局限于图书馆内部组织的应用问题上。至19世纪末，一位名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鲁巴金的著名图书馆学家，才给俄罗斯的图书馆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气象。

鲁巴金（Н.А.Рубакий，1862~1946）早年生活在一个藏书丰富的商人家庭中，在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受“民粹主义”思想洗礼，认识到通过图书能启发民智，并以此作为终生奋斗目标。他将的家庭藏书发展到13万册，并向市民开放，成为彼得堡乃至俄国最著名的私人图书馆——鲁巴金文库。鲁巴金对图书学、目录学深有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图书馆学思想。他著述宏富，主要著作为《俄国读者公众初探：事实，数字，观察》（*Этюды о русской читающей публике. Факты, цифры, наблю-*

^① О.С.Чубарьян. *Общее библиотечноев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нига), 1976: 19~20

дения, 1895年)、《自修实践》(Практика сам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1914年)、《书林概述》(Среди книг, 第2版1~3卷出版于1911~1915年, 对约2万册的各科俄文书籍作了系统的概述)、《图书心理学入门》(1922年用俄语写成, 后经其长子译为法语当年在巴黎出版)等。在这些著作中, 鲁巴金注意到图书馆对自修的重要性, 提出了图书馆民主化、馆藏不应有“单方面的党性”、图书馆应成为宣传优秀图书的中心、研究读者兴趣是指导阅读的必要条件等重要观点^①。他在俄国首创了图书心理学, 力求详细研究读者心理、读者阅读、作家与读者关系、图书对人的影响等, 他还强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②。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与鲁巴金相识, 曾为其辅导自修的推荐书目《书林概述》写过条目, 并发表过书评文章。鲁巴金后来在移居瑞士期间, 又重新建立起第二个鲁巴金文库, 藏书一度达10万册。这些书在他逝世后运送回列宁图书馆^③。

如果说鲁巴金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话, 那么另一个代表时代的人物就是列宁。列宁(В.И. Ленин, 1870~1924)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更加关注图书馆事业。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始终与他的名字联结在一起。列宁不仅在俄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过(1891~1894), 而且不论在怎样的困难条件下, 他平时都十分注意利用图书馆馆藏。现在保留下来的列宁的论文、演讲稿、书信、各类文件稿、手令等, 至少有200余件都涉及了图书馆问题, 表现出了列宁的图书馆思想。列宁的图书馆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①图书馆要坚持党性原则, 图书馆应成为党的机构; ②衡量图书馆工作的水平要看有多少书被读

① О.С. Чубарьян. *Общее библиотечноев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нига), 1976: 19~20

② [苏] В. Ф. 萨哈罗夫等著; 赵世良译. 图书馆读者工作.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120, 160

③ [日] 藤野幸雄著; 李崇安译. 尼古拉·鲁巴金. 见: 图书馆学情报学参考资料(第2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88~90

者借走以及向大多数居民提供了哪些方便；③图书馆是政治、文化的教育机关，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④建立图书馆用来帮助人民利用每一本书；⑤国家集中管理图书馆事业；⑥制定呈缴本制度，图书馆应优先及时地得到书籍；⑦开展国际图书交换；⑧强调内行领导图书馆；⑨要使苏维埃公民了解图书馆在做什么事情，吸引居民参与图书馆工作^①。可以说，列宁的图书馆思想既是苏联图书馆事业的指导，也是苏联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石。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就是依据这些思想有步骤地发展图书馆及其系统与网络，还有管理的集中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宁去世后，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Н. К. Крупская，1869～1939）继续宣传列宁的图书馆思想。她在十月革命后担任全国的教育领导工作，并主管图书馆事业，亲笔写过大量有关图书馆的论著，其关于图书馆事业特点、组织原则，关于阅读指导，关于儿童图书馆工作的发展等论述，对苏联图书馆学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20世纪的苏联图书馆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官方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二是特别重视读者的阅读研究。前者是政治力量从外部介入图书馆学造成的，后者则是图书馆内部“知识基因”的滋长形成的。受政治磁场的强大影响，党的政策成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图书馆学研究也必然要强调阶级性。当“图书馆学”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定语时，苏联的图书馆学研究就会与一切被其视为异质的学术资源进行决裂。因此，早期以鲁巴金为代表的俄国图书馆学思想、当时西方的图书馆学思想，都要遭到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的批判。而社会主义的图书馆学要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探索无产阶级自身的发展道路，如拟制与意识形态一致的文献分类表，形成特殊的导读体系以宣传思想意识较好的文献，借助巨大的馆藏体系将与意识形态相抵触的文献隔离出来，为执政党

^① 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编. 列宁论图书馆事业.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的政策提供图书保障等^①。这方面图书馆学的代表作就是丘巴梁(О.С. Чубарьян, 1908 ~ 1976)的《普通图书馆学》(Общее библиотечноеведение, 1960年)以及后来由阿布拉莫夫(К.И. Абрамов)、卡尔塔绍夫(Н.С. Карташов)等人集体编写的《普通图书馆学教程》(1988年)。这些教材流行范围甚广,流行时间甚长,是苏联图书馆学的权威之作,它们代表的图书馆学被当代的俄罗斯学者称为是一种“功能科学”^②。

但苏联时期的图书馆学与俄国时期的图书馆学的“决裂”并未彻底。苏联图书馆学所具有的读者阅读研究传统吸收了早期俄国图书馆学的某些营养。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1885年,彼得堡大学的一个小组就提出过一项研究农民阅读的纲要。1887年,普鲁加文(А.С. Пругавин)发表了《关于“民众阅读什么”的调查资料提纲》(1887年),尔后鲁巴金的《俄国读者公众初探》(1895年)、《书林概述》(1862~1915年)更是社会各阶层阅读问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因此,鲁巴金曾称:“我们俄国对读者的实验性研究,要比其他国家早得多”^③。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时期,读者的阅读研究成了全国性的重要工作。列宁就民众识字、阅读和印刷品传播问题作出了许多指示之后,大规模的读者阅读研究活动纷纷开展,如20世纪20年代各大图书馆对读者兴趣、选书动机、阅读目的开展的大规模调查分析;50年代克鲁普斯卡娅文化学院对列宁格勒市基本读者群需求的集中研究;60年代列宁图书馆开展的“中小城市生活中的图书与阅读”研究(1969~1972)和“苏联农村生活中的图书与阅读”研究(1972~

① [俄] В. П. 列昂诺夫著; 文华译. 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 国外社会科学, 2000 (5): 21~24

② [俄] В. П. 列昂诺夫著; 文华译. 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 国外社会科学, 2000 (5): 21~24

③ О. С. Чубарьян. Общее библиотечноев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нига), 1976: 19~20

1977) 等^①。苏联图书馆学家 H. C. 卡尔塔绍夫在 1984 年说过：“对阅读与读者兴趣进行研究一直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传统。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国立列宁图书馆和各加盟共和国国家图书馆已经制度化。”^②

这一学术传统的发扬及制度化的结果，一是促使苏联图书馆事业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色，如读者工作（包括宣传图书、指导阅读）水平极高，甚至边远地区的牧民也能通过汽车图书馆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书籍。二是较早催生出读者心理学、阅读心理学、读者工作等图书馆分支学科。1917 年十月革命初，全苏人口约有 70% 为文盲，但到 20 世纪 30 年代，文盲就基本扫除了，这其中就包含着图书馆读者工作的巨大贡献。

以 1991 年“8·19”政治事件为分水岭，世界冷战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俄罗斯的图书馆学研究随着社会经济的困难以及图书馆事业的滑坡也一度进入混乱状态。图书馆学期刊纷纷改名，如《苏联图书馆学》、《苏联图书馆员》、《苏联科技图书馆》等先后去掉了“苏联”一词。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瓦解，俄罗斯的图书馆学的指导思想出现了“真空”，一些专业杂志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名词、新术语，如“图书馆事业哲学”、“图书馆学范式”、“图书馆意识形态”、“图书馆社会使命”、“图书馆记忆功能”、“图书馆营销”等。功能学派、营销学派、情报学派以及过程学派的思想观点逐步在争鸣中显现出来。

功能学派的思想是对原苏联图书馆学范式的继承，认为图书馆在意识形态功能、文化教育功能和情报功能之外，还应具有记忆功能、休闲功能、社会系统功能和信息功能等，图书馆功能是很大

^① [苏] B. Ф. 萨哈罗夫著；赵世良译. 图书馆读者工作.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21~127

^② [苏] H. C. 卡尔塔绍夫. 苏联国家图书馆在促进读书活动中的作用. 见：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 48 届至 50 届大会论文选译.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362~367

的。如波罗申 (С. А. Борошин) 说: “在俄国, 有两个殿堂, 一个是教堂, 另一个就是图书馆。”^① 营销学派则试图将市场经济中的营销方法引入图书馆管理与服务中, 以为营销学中有关顾客、内容、成本、沟通、渠道、竞争和时间等概念范畴同样适于图书馆工作, 如宾捷尔斯基 (И. Л. Бендерский) 就把营销学作为图书馆学的“新思维”加以论证^②。情报学派则认为最大限度地提供情报保障是图书馆应追求的目标, 如德奥尔金娜 (М. Я. Дворкина) 说图书馆事业哲学应该是“研究情报提供的有序性、通畅性的哲学”^③。过程学派强调运用传播学原理对图书馆过程加以重视, 如列昂诺夫 (В. П. Леонов) 指出: “图书馆学紧紧地依赖于外在因素 (首先是政治、经济和财政因素) 和相邻学科 (教育学、心理学、图书学、信息学) 的发展水平, 而对图书馆内在的过程注意不够。”“图书馆学的主要客体并不是图书馆事业, 也不是作为社会设制的图书馆, 而是文献传播系统中的图书馆工作过程。图书馆工作过程是指各个阶段 (如馆藏、编目、服务、检索等) 的连续不断的更替。”^④ 总之, 俄罗斯图书馆学研究正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趋势。纷呈于世的各种新思想、新观点将会在今后一定时间里得到整合变得有序起来, 而且, 重视读者阅读研究的学术传统依然会在新的历史发展形态下, 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扬。

二、日本图书馆学

现代日本的图书馆事业是在明治维新 (1853~1890) 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斯时日本不仅从欧美进口产品, 而且还引进科学、技术及其他方面的知识, 以求实现国家现代化, 赶超西方文明。1868年,

①②③ 林曦. 俄罗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热点评析.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7 (6): 26~31

④ [俄] В. П. 列昂诺夫著; 文华译. 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 国外社会科学, 2000 (5): 21~24

福泽谕吉在东京建立庆应义塾（后为庆应大学）时，亲创图书馆并制定《书籍出纳规则九条》，从而使日本有了第一所大学图书馆。1872年，文部省管辖的官立书籍馆在东京建立并对公众开放，这是日本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即今国会图书馆前身）。而且此时期日本图书印刷技术也刚刚由雕版刻印被机器铅印取代，书刊报纸发行量大增，成为促进日本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积极动力^①。

日本开始图书馆学研究的年代也较早，明治十六年（1883年）三月，《文部省教育杂志》第173号上刊载的近藤镇三翻译的《图书馆学》一文，被日本图书馆学史研究者认为是日本最早的图书馆学文献，该译文内容是介绍德国图书馆学。由于早期图书馆学内容来源于欧洲，故日本图书馆学最初以图书馆管理为主要内容。西村竹间的《图书馆管理法》（1892年）、文部省编的《图书馆管理法》（1900年），既明确论述了图书馆作为教育机关可与学校相提并论，又详细讲述了图书馆管理业务的各方面要求^②。此后，图书馆管理业务方面的著述层出不穷，主要有佐野友三郎的《通俗图书馆经营》（1914年），和田万吉等人的《图书馆小识》（1915年），植松安的《教育与图书馆》（1917年），卫藤利夫的《图书分类的理论原则》（1926年），图书馆事业研究会的《图书馆学讲座》（1928年）等^③。相对于图书馆学的研究来说，日本的图书馆学教育则开展得较晚。1922年，上野县开设了日本第一所图书馆学校，称文部省图书馆员教习所。它并非附属于大学，因毗邻帝国图书馆，好似处于附属帝国图书馆之地位。1925年，这所学校改名为文部省图书馆讲习所^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图书馆学教育尚属技术培

① 杨子竞. 近代日本的图书和图书馆. 国外图书情报工作, 1992 (4): 23~26

② [日] 岩狼敏生著; 石惠侠译. 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员. 国外图书情报工作, 1985 (1): 9~17

③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合编. 图书馆学基础. 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31

④ [日] 津田良成编; 楚日辉等译.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6: 38

训活动。当时的学术界还未将图书馆知识看成一门学问，只是因图书馆纷纷创设而急需人才，于是有条件的大馆开展了在职培训工作而已^①。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的图书馆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仅仅是欧美图书馆学（重管理，轻理论）的一个翻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状况才逐步开始转变。战争时期，日本各地“中央图书馆”的藏书有 59% 毁于战火，市立图书馆的藏书有 80% 毁于战火，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仅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几十分之一的程度^②。战后，美国教育代表团向日本提出教育改革及民主化建议，要求改进图书馆及图书馆服务。1951 年，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帮助下，庆应大学在文学系设立了日本第一个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尽管专业课采用了美式的面向公共图书馆实践的课程体系，并由美国教师授课，但从 50 年代起，日本图书馆学研究已具有了反省的能力，且在反省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两种不同观点：“一种理论是站在传统的图书馆经营管理的立场上，以客观地追求图书馆的业务管理为目标（library economy）；另一种理论则是属于藏书技术（library science），并发表了大量论文。这些理论不仅关系到图书馆的管理，同时也丰富了图书馆的学术研究成果。”^③ 特别是在 50 年代后期，因为战后馆藏重建及科学技术研究的迫切需求，“文献资料工作”成了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关注的重要命题，日本图书馆学界对“文献资料工作是什么”以及“图书馆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958 年 10 月，日本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杂志》刊发了专门

①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编. 日本图书馆研究文集.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170

② 李国新. 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8, 45

③ [日] 岩猿敏生著; 石惠侠译. 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员. 国外图书情报工作, 1985 (1): 9~17

探讨文献资料工作究竟是什么的专集，1960年，图书馆协会又出版了《文献资料入门》一书。而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的论著则出现得还要早些。如藤林忠的《图书馆学的基础问题》（1951年）一文，就是战后日本最早的有关图书馆学理论的论文。作者提出，图书和读者是图书馆学的两个普遍与永恒的要素，图书馆学不是对个别图书馆的研究，而是对图书与读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1953年，黑田正典发表了论文《关于图书馆学原理的考察》，该文认为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工作所必要的知识与技术的集合，是一门应用科学，其研究内容由对象（图书馆与图书馆工作）和方法（科学方法）两部分组成。1954年，大佐三四五的《图书馆学的展开》一书出版，该书把图书馆学视为以图书馆为对象的知识体系，并将图书馆学的结构分为五大部分：理论、史论、实践论、文献学、辅助科学^①。1965年，加藤一英发表了论文《图书馆学能够作为学科成立吗》，试图立足于传播理论来阐释图书馆学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情报学的出现，日本的图书馆学教育及时地调整课程体系，以期快速地跟上美国图书馆情报学的发展步伐。1967年4月，庆应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改称图书馆情报学专业，并在研究生课程中加入了情报学研究课题。1977年，大学标准协会将1954年制定的《图书馆学教育标准》修订为《图书馆情报学教育标准》，要求“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消弥界线，融为一体，成为“图书馆情报学”，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随着图书情报一体化观念的生成，从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大学图书馆界实施了一项“学术情报系统”的全国计划。该计划根据大学是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以及学术情报资料主要收藏在大学图书馆的实际状况，提出以大学图书馆为中心，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情报流通体制，组成单位除图书馆外，还有计算中心、研究机关等。其职能是充实一次学术情报的收集、提供，建立学术情报的检索体系，促

^①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合编. 图书馆学基础. 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1

进数据库的形成, 培训处理学术情报的专门人才等, 以便在全国形成一个可以资源共享的学术情报网^①。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 椎名六郎的《新图书馆学概论》(1981年第9版)和加藤一英的《图书馆学序说》(1982年)也开始从情报交流的角度来阐述图书馆现象, 如椎名六郎认为图书馆是情报交流的媒介, 加藤一英则从科学本质、科学交流和系统三个方面对图书馆事业进行了分析。而津田良成在80年代初编的图书馆学教科书, 就直接名为《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全书共分8章: ①图书馆情报学定义; ②情报交流; ③情报的需求与使用; ④情报载体; ⑤情报的存储与检索; ⑥情报管理组织的管理与经营; ⑦图书馆服务工作原理; ⑧研究入门。至此, 日本图书馆学形成了“情报学派图书馆学”的基本特色。当然, 一些专门探讨图书馆业务的图书馆学著作此时也在流行, 如石塚正成的《图书馆通论》(1970年)、武田虎之助的《图书馆学概论》(1976年), 和田万吉的《图书馆学大纲》(1984年)等, 它们对图书馆实践工作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日本的“情报学派图书馆学”受信息技术的影响得到了更快的发展。1996年底, 日本学术审议会经过讨论, 决定在“特定研究领域推进分科会”中设置“情报学部会”, 推进情报学(信息学)及其相关政策的研究。1998年, 京都大学大学院成立了情报学研究科, 增设智能情报学、社会情报学、复杂性科学、数理工学、系统科学6个专业, 强调从心理学、认知科学的角度探讨人类个体信息处理结构, 强调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探索人类集体活动中的信息处理结构。2000年4月, 该研究科又更名为“国立情报学研究所”。这些迹象表明, 情报学(信息学)的研究在日本图书馆学乃至社会科学界已被视为21世纪的重点研究学科^②。

①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编. 日本图书馆研究文集.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29

② 何培忠. 日本信息学的发展. 国外社会科学, 2001(3): 66~69

三、印度图书馆学

印度一位图书馆学研究者曾说：“印度《奥义书》中把人称为‘思想的机器’。用于擦洗这部机器（即思想）并使其始终保持闪闪发光的工具就是图书。”^①在古代印度，书籍主要收藏在寺庙与宫廷之中，加之学术界有口述传统，这就降低了民众对文字的依赖性。19世纪西学传入，印度开始有了公共图书馆。尤其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各邦州才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公共图书馆，并制定了免费开放政策。1948~1979年间，22个邦中有5个先后颁布了图书馆条例。相比之下，印度的图书馆学教育则开展得较早。1891年，博登（W.A.Borden）在巴罗达的马哈拉贾建立了第一所图书馆学校。1916年，迪金森（A.D.Dickinson）在拉合尔建立了同样的一所学校。他们二人皆为美国人，是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麦维尔·杜威的学生。不过，最初的全日制证书课程的图书馆学校，是1929年在马德拉斯图书馆协会的赞助下，由印度人阮冈纳赞（S.R.Ranganathan, 1892~1972）在马德拉斯创立的。后来该校并入马德拉斯大学，并于1960年设立了完善的研究生学位课程^②。

印度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她对图书馆学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而这个贡献与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阮冈纳赞在大学时攻读数学，于1917年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24年任马德拉斯大学图书馆首任馆长。他曾经赴英国学习过图书馆学，师从图书馆学专家贝里克·塞耶斯，回国后倾其毕生精力从事图书馆工作。阮冈纳赞一生撰写论文1500余篇，出版专著62部。其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图书馆理论研究领域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图书馆学五

^① [印度] 科·斯·迪斯潘德. 图书馆教育的结构：几个值得一试的想法. 见：戈松雪编译. 图书馆与情报科学纵横谈.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91~100

^② [印度] S. 库马尔著；倪明译. 印度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 国外图书情报工作，1993（3）：17~22. 26

定律”。阮冈纳赞的这一思想是在其 1931 年出版的《图书馆学五定律》(*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中全面阐述出来的。这五个定律是：①“书是为了用的”(Books are for use)，这一观念宣布了现代图书馆是开放的，它与古代图书馆重藏轻用不同；②“每个读者有其书”(Books are for all)，表明书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图书馆应为所有人服务，而不论其地位、性别、民族、肤色等因素的差异；③“每本书有其读者”(Every book its reader)，说明图书馆的采访、编目、排架、参考、推广等一切业务工作不是为了图书馆本身，而是为了读者；④“节省读者的时间”(Save the time of reader)，要求图书馆工作要讲究效率以及采用更加合理的工作程序；⑤“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A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zation)，即指明图书馆是一个活的系统、组织，与之相关的图书、读者、工作人员、管理方法等都在不断发展。“图书馆学五定律”表现出了阮冈纳赞读者第一的人文思想，在世界各国图书馆界广为流传。不过应注意的是，该五定律严格说来是图书馆工作的法则，而非图书馆学上的法则。

第二，在文献分类研究领域发明了独具特色的“冒号分类法”。阮冈纳赞认为，文献分类法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确定图书在书架上的位置，而西方分类法，如《杜威十进分类法》、《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等虽然也预设了空类号，但却难于不断增设新类目，不易反映人类知识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此外，西方分类法详尽无遗地列举文献可能论及的主题概念，形成了数以万计等级化类目集合，这在阮冈纳赞看来也是奢侈的、没有必要的。有一次，他在伦敦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看到一种叫做“梅卡洛”(Meccano)的拆装玩具，仅用槽条、齿轮、螺栓等 12 个小零件就可变换组合成不同样式的玩具，于是受到启发，经潜心研究，写出著名的《冒号分类法》(*Colon Classification*, 1933 年)一书。该书提出了一个“分析-综合原理”，认为不必详尽列举所有主题，只需列出类分文献的各基本主题的概念因素，然后通过组配方式，把构造一个完整分类号的任务留给标引员。“冒号分类法”尽管由于学习复杂而在印度以外的图

书馆中较少使用，但它的原理却对以后不断修订再版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以及新编分类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外，阮冈纳赞在文献编目、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学教育等领域里也有突出的贡献。鉴于他的杰出成就，1965年12月印度总统吉里（V.V.Giri）曾在一次讲话中称其为“印度图书馆学之父”，而国际图联（IFLA）总部的伟人陈列馆里陈列的图书馆名人的画像或塑像之中，也有阮冈纳赞。

不过，阮氏之后的印度图书馆学发展一度较为缓慢，一方面这是印度图书馆事业发展缓慢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学术研究力量较弱所导致的。印度是个发展中大国，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6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大多数公共图书馆，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非常贫困。”“人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图书馆的用户和潜在用户、专业图书馆员、主管部门等心目中，阅读、信息和图书馆的价值并不高。图书馆部门中有的人甚至确信政府对图书馆及读书识字的兴趣仅仅处于边际水平。”^①而图书馆学教育虽然早在1957年德里大学就开始授予博士（哲学博士）学位，图书馆从业人员也有了稳定的就业机会，但教学人员少、缺乏研究资金与课题以及图书馆员缺乏研究水平等，都限制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快速发展。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当情报服务在西方国家图书馆学研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时，印度图书馆学研究却仍呈现保守状态。如截至1985年，印度约有图书馆学博士毕业论文53篇，其研究课题最为集中的还是一些传统领域：分类（8篇），图书馆史（6篇），公共图书馆/立法（6篇），图书馆组织（5篇），参考/情报资源（5篇）^②。当然，这种状况在90年代有了好转。

1995年，格斯瓦米（I.M.Goswami）和考沙尔（M.Kaushal）

① [美]小唐纳德·G.戴维斯，[印度]穆罕默德·塔赫著；邵文杰译。印度图书馆史：编史评价及当前趋向。见：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58、59届大会论文选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30~33

② 周铭德。印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文献情报服务。世界图书，1992（9）：28~31

合作推出《现代图书馆学系列丛书》(*Modern Library Science Series*),所列9种著作几乎涉及了当代图书馆学研究的全部主题,它们分别是:《图书馆和情报学的发展》、《图书馆学研究的方法论》、《图书馆学的分类理论》、《图书馆编目手册》、《图书馆行政管理》、《图书馆发展中的国际经验》、《图书馆学与信息技术》、《情报和图书馆学的动力学》、《国家图书馆和情报系统》。其中格斯瓦米主编的《图书馆和情报学的发展》一书共分8章:导论、信息技术与艺术、信息技术与管理(administration,主要强调人事管理)、信息与普通人、结果与问题、印度的图书馆运动、公共图书馆与普通人、公共图书馆与国家发展,中心内容是人与信息技术(IT)。而考沙尔的《图书馆和情报学的动力学》一书共分11章: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目的、物理结构——图书馆建筑规划、图书馆事业的哲学、调动图书馆发展的财政资源、用户需求、图书馆收藏动力学、处理技术、学院(college)图书馆的发展、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和图书馆员、印度英语出版物的书目控制^①。从这些著作的研究内容看,印度图书馆学研究正在继承阮冈纳赞的人文精神,积极赶超西方图书馆学的发展水平,走的仍是一条切合本国实际的、关注读者与图书馆实践的发展道路。

第三节 中国的图书馆学

一、古代的图书馆知识体系

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源远流长。中国的图书馆学者们通常将公元前14~11世纪商朝后期保存刻辞甲骨的窖穴,看做是至今仍能见到的图书馆的雏形。这些保存刻辞甲骨的窖穴在20世纪初年被人们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至今仍源源不断地有刻辞甲骨被发

^① 徐引篔,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93~98

现。而在历史文献方面，有记载表明，商周时期已有管理图书的官员出现。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老庄列传》记载老子曾为周朝掌管图书的“守藏室之史”。此时的图书主要以简、帛制成。西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广开献书之路，进一步完善了官府藏书。汉成帝时（前32～前7）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等人在未央宫中天禄阁、石渠阁校理皇室藏书，他们的图书整理活动在刘向写的许多《书录》以及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已有详细记载，这些文献至今流传能见。而当时整理藏书形成的著作《别录》、《七略》，是中国图书馆知识内容的最早记录，可惜今已亡佚。

中国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有个专有名词——校雠学。它主要由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组成，均以图书为研究对象。从西汉至隋唐五代（前1世纪至10世纪），由于图书主要靠抄写生成，加之流传不畅，屡有散亡，因此这一时期校雠学对图书的研究，主要内容是撮旨意、叙作者、定是非、考存亡、分类例、明源流等。代表作有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主要是依刘向之子刘歆的《七略》撰成）、唐代魏徵的《隋书·经籍志》等。宋代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技术的普及，图书易得，错误减少。中国的藏书事业发展更快，在以往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三大系列基础上，又发展出书院藏书系列一支。此时期校雠之学的研究范畴较之以往也更广，其内容又增加了访图书、详著录、辨真伪、辑佚失、纂类书、职掌管等。代表作有南宋郑樵（1104～1162）的《通志·校雠略》，明代祁承燾（1563～1628）的《澹生堂藏书记》，清代孙从添（1692～1767）的《藏书纪要》以及章学诚（1738～1801）的《校雠通义》等。

二、现代图书馆学的产生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在中国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西方公共图书馆制度的传入，二是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普及。清末“甲午海战”（1894～1895）之后，中国始知西方新式图书馆有异于古代藏书楼，新式图书馆乃为启迪民智的工具。于是

在变法维新的运动中，各地纷纷仿国外之制设立图书馆（“图书馆”一词亦由日语译来）。此时期，因国门的打开，西方科学思想也进入了国内学术界。知识阶层认识到科学与人权是欧洲强国进步的两大支柱，犹若车之两轮。科学，乃重塑国民性的锐利武器，它讲求的是用实证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的研究，形成分别部居、以类相从的知识体系。于是，有了新式图书馆，便有了研究新式图书馆的科学知识。

20世纪初年，中国关于图书馆的著述大多为宣传、介绍之作，而且多译自日本。如孙毓修的《图书馆》（1909～1910年连载于《教育杂志》第1卷、第2卷）、谢荫昌翻译的日人户野周二郎的《图书馆教育》（奉天图书馆发行所，1910年）、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翻译的日本图书馆协会所编《图书馆小识》（1917年）、顾实编写的《图书馆指南》（上海医学书局，1918年）等。这些著述，有的是直接翻译日人著作，有的则取日本、欧美之成法而编撰。其中顾实《图书馆指南》最为详赡。该书共分24章，第1～8章分别讨论了图书馆之由来、必要、效果、种类、创立及经费、职员及其职务、建筑、器具等主题，第9～16章讨论了普通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图书选择、图书购置、图书目录及其种类、书牌目录记人法（即卡片目录著录）、分类法等主题，第17～24章分别讨论了图书整顿及排列法、阅览及出纳法、分馆、巡回文库、家庭文库、图书检点及曝书、图书消毒及废弃、今后图书馆之希望等主题，可以说涉及了新式图书馆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该书对当时欧美、日本的图书馆新方法有准确、明晰的介绍，如言目录则叙及“书名”、“著者”、“分类”、“件名”（主题）四种，并辨其功能及编制方法；言分类则比较“古典”与“近世”之不同，对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卡特展开分类法进行详细介绍。尤为重要的是，顾实屡次言及“图书馆学”，云图书馆学有助于图书馆之经营，故撰是书“以为斯业入门之一助”^①。顾实虽曾

^① 顾实编纂. 图书馆指南. 上海: 医学书局, 1918 (民国七年): 110

留学日本，然编纂此书时材料不单取资日本、欧美，亦屡屡结合中国国情而述己见，表现出诸多新意。此时期，可以说中国的图书馆学已开始萌芽。

一门学科的成立，应有某些明显标志以示之，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准确地说应该在 1920~1923 年之间。其主要标志有三^①：① 1920 年，美国人韦棣华女士（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1861~1931）与其学生沈祖荣（字绍期，1884~1977）仿照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模式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从此中国有了专门的图书馆学教育学校。② 1921 年前后，沈祖荣、胡庆生、戴志骞、徐燮元、杜定友、洪有丰等一批接受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留学生毕业后纷纷回国，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兴起图书馆学宣传、研究、教育活动。③ 1923 年，杨昭愬的《图书馆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下册正式出版。该书是中国第一部以“图书馆学”为书名的著作，内容虽多取日、美两国之成法糅合贯通而成，然而却努力使理论与技术相结合、中国与外国相结合、供馆员参考与供一般民众了解图书馆学相结合，用科学方法阐述了图书馆的定义、范围以及研究方法等，实开中国图书馆学通论之先河。

三、图书馆学发展的三次高潮

中国的图书馆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以后，近百年来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②。

第一次高潮形成于 1920~1936 年。首先，此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得到了飞速发展，上海、南京、广州、北京等地先后均有图书馆学教育的开展。1929 年，文华图书科改为独立的学校，更名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英文名未变）。至 1938

① 王子舟.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走向. 图书情报知识, 2000 (1): 2~7

② 王子舟.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三次高潮. 图书情报工作, 1998 (2): 1~5, 33

年，文华图专共培养本、专科及讲习班毕业人才近 250 名，他们中许多人成为图书馆学专家。其次，图书馆研究组织及专业期刊也于此时期纷纷创立。1925 年 4 月 25 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广肇公学正式成立。至抗战前，学会共召开过三次年会，讨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协会的推动下，各地方协会也先后成立。协会的刊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双月刊）、《图书馆学季刊》也分别在 1925 年和 1926 年创刊，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双月刊）、《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等一批有影响的刊物均在 1930 年以前创刊发行。再次，图书馆学的研究论著在这段时间里也迅猛增长。据统计，20 世纪前 50 年，报刊上刊出的图书馆学论文约有 5 300 篇，其中有 4 000 余篇是 1928~1937 年间发表的，而图书馆学著作在 1925~1938 年之间出版了 170 多种，可谓鼎盛一时。在第一次图书馆学研究高潮中，图书馆学研究较好地解决了“新知”（西方图书馆学）与“旧学”（古代校雠学）对接的问题，如借鉴西方分类法改造中国古代四部分类法，编制出了一批初步适应本国国情的图书分类法等。同时，中国图书馆学也建立起理论与实用并重研究的范式。图书馆学原理、图书馆管理学以及采访、分类、编目、流通、参考、索引、工具书等诸多分支专业均发展成熟起来。

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中国文化事业遭到破坏，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研究也一度受阻。抗战结束后，又开始了国共两党的内战，直至 1949 年，全国才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战争的结束，社会秩序的恢复，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次良机，也催动了图书馆学研究第二次高潮的到来。

第二次高潮形成于 1955~1965 年十年间。首先，图书馆事业突飞猛进，促使图书馆学研究繁荣起来。由于战争的破坏，截至 1949 年 10 月，全国各类型图书馆只有 392 所（公共 55 所，高校 132 所，科研系统 17 所，工会系统 44 所，私立 44 所）。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复苏，仅用了七八年时间，至 1957 年，公共图书馆已有 400 所，高校图书馆已有 229 所，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已有 101

所，工会系统图书馆增加到 3.5 万所。而且中央人民政府还下设文化部，领导全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图书馆的迅猛发展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丰富的素材。其次，新意识形态的确立导致图书馆学必须进行全面理论更新。新政权的建立与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确立几乎是同步的。1949 年以后，各图书馆都以大力补充马列著作与革命书刊为己任，并选择思想进步的分类法进行图书组织，而被当时政务院和文化部指定的反动、淫秽书刊遭到了清除。尤其是当时政府采取了全面向苏联学习的“一边倒”政策，图书馆学亦不能免。再次，为响应政府“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基层图书馆掀起了业务学习的热潮，推动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兴起。如 1949~1965 年，各地编写的有关基层图书馆业务工作的书籍就有 50 余种。第二次图书馆学研究高潮由此而形成。在此次高潮中，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追随苏联、模仿苏联的倾向。一方面俄文图书馆学译著大量出版，如 1953~1956 年间出版了《苏联大众图书馆工作》、《列宁论图书馆工作》等 30 余种翻译图书，凡苏联之学莫不被视为圭臬。另一方面，却是对欧美图书馆学大加挞伐，斥之为资产阶级图书馆学。当然，此时期图书馆学研究也是有所成就的，如对图书分类法、藏书建设、联合目录的重点研究（包括复本问题、藏书补充、图书交换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仅 1957~1966 年，全国性、地区性的联合目录就出版了 300 余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大多属于一种图书馆工作的“分析”与“微观”的研究。

1966~1976 年，中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这场运动是一场抵制西方文化及割断传统文化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因此，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研究再度陷入了凋敝期。大批图书馆藏书被视为毒草，或被查禁，或被焚毁，许多图书馆被迫关闭。全国县以上的公共图书馆从 1965 年的 573 所减少到 1970 年的 323 所，高校图书馆也从 434 所减少为 328 所。此时期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停止了招生，全国未正式出版一部图书馆学专著，没有一种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图书馆学研究形成了十年空白。直

至“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始，图书馆学研究才重获新生，迎来第三次发展高潮。

第三次高潮形成于1980年以来，延续至今，时间已长达20余年。首先，随着社会生活拨乱反正的开始，图书馆学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以往的学术研究进行清理与总结，并为适应图书馆学教育的恢复编制新的教材。吉林图书馆学会编辑的一套《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以及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目录学概论》等系列教材的出版，对新时期图书馆学的研究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国外先进的图书馆学成果的引进，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高水平的参照系。如苏联丘巴梁的《普通图书馆学》、美国谢拉的《图书馆学引论》、兰卡斯特的《情报检索系统》、印度阮冈纳赞的《冒号分类表解说及类表》、《图书馆学五定律》等。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版的外国图书馆学译著有130余种，约占本专业出版物总量的23%。再次，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学会的成立、期刊的繁荣，逐步培养出一大批专心从事图书馆学研究的学者。80年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迅速，现已形成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低层教育（大专、本科）与高层培养（硕、博研究生）相结合的教育体系。中国图书馆学会自1979年成立以来也开展了新技术应用、战略发展、文献资源建设等方面的推动性工作。截至80年代末期，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已有百余种，为图书馆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由此进入了第三次发展高潮。在第三次发展高潮中，图书馆学研究几乎涉及了本学科各个领域，但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或称“理论图书馆学”）的兴起。仅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就达10余种，这在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理论图书馆学的发展已形成了中国图书馆学的一大特色。此外，情报学研究虽然从70年代末期就已开始，但中国的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呈并行发展趋势，二者互相借鉴，但又有各自明显不同的发展空间。这也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又一特点。

四、图书馆学代表人物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三次发展高潮与三代图书馆学学者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代学者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他们的主要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都是在第一次高潮时期奠定的。他们中大多数有留学经历，如沈祖荣（第一位图书馆学留美生）、胡庆生、戴志骞、徐燮元、杜定友、洪有丰、袁同礼、李小缘、刘国钧、蒋复璁、查修、桂质柏（第一位获美国图书馆学博士学位）、徐家麟等。其中除杜定友先生留学菲律宾、蒋复璁先生留学德国之外，其余皆清一色留学美国接受图书馆学教育学成回国者。此外还有些长期在国内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如皮高品、钱亚新、吕绍虞等。他们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开创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代学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杜定友和刘国钧先生，他们二人被今天的图书馆学研究者简称为“南杜北刘”。

杜定友先生（1898~1967）是广东南海人，出生于上海。少年时期就读于南洋大学附属中学。1918年受学校派遣到菲律宾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留学，攻读图书馆学专业，1921年5月回国。在菲期间获文学、教育学、图书馆学三个学士学位及一个高师毕业证（即中学教师资格证），并提前一年获准毕业。回国后历任广东省立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洋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务，从事图书馆事业50年，一生著述达600余万字，专著就有55种。主要著作有《图书馆通论》（1925年）、《图书分类法》（1925年）、《学校图书馆学》（1928年）、《校讎新义》（1930年）、《图书管理学》（1932年）、《汉字形位排检法》（1932年）等。他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学、图书目录学、汉字排检法、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建筑、地方文献等领域皆有突出理论建树。如杜定友关于图书馆“三位一体”（书、人、法）及其不同时代重心不同的观点，图书馆学应由原理与应用两个层面组成的认识，中外书籍要统一分类的思想，字根学说的发明与创立，以及给地方文献所下定义、所划范围（包括史料、人物、出版）等，都

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杜定友先生图书馆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将理论与实践熔为一炉，创新意识非常强^①。

刘国钧先生（字衡如，1899～1980），出生于江苏南京。1920年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毕业后，留本校图书馆工作。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图书馆学课程，并于1923年6月取得硕士学位。后又攻读哲学课程，1925年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返回国内。他先后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任职或担任馆长。1951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并担任过系主任。刘国钧先生的代表作有《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年）、《中国图书编目条例》（1930年）、《图书馆学要旨》（1934年）、《什么是图书馆学》（论文，1957年）、《中国书史简编》（1958年）等，他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图书编目、中国图书史、图书馆工作自动化等领域有着突出的建树。如认为图书馆学研究要细化成五个要素（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才能深入地认识，好的分类法应具备四个部分（系统表、理论的基础、索引、分类条例）的论述，分类目录应是宣传图书、指导阅读的工具等，这些观点都具有深刻的洞见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因意识形态的影响，刘国钧先生的学术研究转入了图书史领域，并写了系列的中国书史著作。他还在“文革”后期（1975年）率先介绍西方机读目录（MARK），表现出开放的视野与伟大的预见。刘国钧先生图书馆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逻辑性极强，善于说明事理并提升理论层次，给人以条分缕析的深刻印象^②。

可以说，杜定友、刘国钧二人的学术成就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术活动跨两次学术发展高潮，他们的学术思想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们多领域、大面积的学术

① 王子舟.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②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编. 一代宗师: 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创获国内至今也无人能企及。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主要出生于30年代前后，接受过第一代学者的培养教育，其学术活动是在第二次高潮中开始的）已经转入某些具体领域的研究，他们更多地是在图书馆学某分支学科（领域）中有着更加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大成绩，如周文骏、黄宗忠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彭斐章、朱天俊在目录学领域，谢灼华、杨威理在图书馆史领域，白国应、刘湘生在图书分类领域，张琪玉、陈光祚在情报检索领域，吴慰慈、肖自力在文献资源建设领域，张树华、沈继武在读者工作领域等。武汉大学俞君立曾主编过《中国当代图书馆界名人成功之路》（1996年）一书，内收32位当代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与图书馆事业管理专家的自述，他们中大多数可以被视为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他们在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第三代学者主要出生于40年代至60年代期间，他们接受的是第二代学者的培养教育，学术活动及学术成果是在第三次高潮中展开与取得的，现在大多已经成长为各分支学科领域中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在当今图书馆学研究中最为活跃。

五、台湾图书馆学研究

台湾的图书馆学是中国图书馆学的组成部分，1949年以后，一度与祖国内地图书馆学研究隔绝30年。20世纪50年代初（1950~1953年），台湾刊出的图书馆学论著仅20种左右，图书馆学研究一时未能兴起。1953年台湾“图书馆学会”在台北成立，1954年“中央图书馆”在台北复馆，1955年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创设教育学系，系中设图书馆组，这一连串的事件，振兴了台湾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研究^①。继而台湾大学设图书馆学系（1961年），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设图书资料科（1964年），辅仁大学设图书馆学系（1970年），淡江大学设教育资料科学系（1971年）等，

^① 台湾“中央图书馆”编. 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 台北：“中央图书馆”，1981：283~285

图书馆学教育开始蓬勃发展。斯时师资大多为留美回国之学者，或具有图书馆实践经验者，而各系科学生学成之后赴美留学继续攻读图书馆学也一时蔚然成风。1980年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增设研究所，1996年政治大学成立图书资讯学研究所，1998年玄奘人文社会学院成立图书资讯学系，1999年中兴大学成立图书资讯研究所等，截至2000年6月，台湾共有8个图书馆学系所能够培养本科、硕士与博士^①。这些教育单位成为台湾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坚。

1963年前，台湾图书馆学论著每年不足百种，1963~1978年的15年间，台湾每年刊出的图书馆学论著都超过了100种，而且从1972年起超过200种，1977年更达1318种之多，研究内容遍涉图书馆学各领域。不过15年间论著体裁与主题最为突出的依次为书评（1467种）、索引（806种）、序跋（406种）、学校图书馆（372种）、图书馆学（358种）、出版（308种）、公共图书馆（268种）、目录学（238种）、相关资料（230种）、参考（205种）、分编（203种），余皆不足200种^②。这表明台湾图书馆学研究还较为散乱，缺乏整体感。不过，这种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了改变。

自1982~1994年的12年间，据“中央图书馆”的《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资料库系统》统计，在近千种刊物中，发表的图书馆学论文共有2944篇，所涉类别依次如下：图书馆管理与自动化（含采编、典藏与服务等）有972篇，公共图书馆（功能、管理与服务）有467篇，学校图书馆（功能、管理与服务）有450篇，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综论（包括法规、标准、教育与历史等）有424篇，资料检索（资讯储存、检索、网络系统）有328篇，余皆不足

① 胡述兆. 台湾地区图书馆学教育之回顾与现况. 见: 世代相传的智慧与服务精神: 文华图专八十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27~56

② 台湾“中央图书馆”编. 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 台北: “中央图书馆”, 1981: 283~285

200篇。另据“中央图书馆”光盘书目资料分析,1981~1994年间,台湾共出版图书馆学专著704种,其中总论者273种,图书馆管理162种,资料中心98种,学校图书馆63种,公共图书馆47种,其他不同主题均在20种以下^①。这些数据表明,台湾图书馆学研究在学科整体布局上逐步趋于合理,而且随着信息技术在图书馆中的运用,自动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大大增加。尤其是信息技术与以往索引研究传统相结合,更使各种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加快了,如各种专题书目、文史哲论文索引、善本古籍联合目录、国家书目数据库等计算机数据库纷纷建立,使图书馆学对科学研究的辅助功能更为突显。目前,台湾图书馆学研究已形成诸多特点:一是受美国图书馆学影响,素以实际问题的解决为取向,研究成果大多呈现出实用性、工具性的特征,而原理方面研究较弱。二是创造了“资讯”一词以对应英语的“information”,建立了“资讯科学”并将其融入图书馆学之中,以图书馆学为基础,以资讯科学为先导,努力将二者结合为一体。三是逐步开始反思图书馆学研究的“美国化”倾向,努力进行本土化建设,并积极与祖国内地图书馆学界进行交流。四是积极借鉴信息科学、传播学、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的学术资源并将其引入图书馆学研究之中,促使图书馆学研究走向更加开放的领域。其中一些经验很值得我们台湾省之外的图书馆学界学习与参考。

关 键 词

诺德 施雷廷格 齐亚茨科 图书馆社会学 帕尼齐 爱德华兹 杜威 芝加哥学派 巴特勒 谢拉 知识社会论 数字图书馆 鲁巴金 列宁的图书馆思想 《图书馆情报学教育标准》 学术情报系统 阮冈纳赞 图书馆学五定律 校雠学 文华图专 杜定

^① 王振鹤. 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学研究. 见: 图书馆与资讯研究论集: 庆祝胡述兆教授七秩荣庆论文集. 台北: 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1996: 15~36

友 刘国钧

小 结

1. 现代图书馆学的建立与西方现代图书馆的大量涌现有密切关联。德国是现代图书馆学形成的摇篮。最早使用“图书馆学”这一概念的是德国的施雷廷格，第一个图书馆专业培训机构——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讲座是由德国的齐亚茨科创办的。德国图书馆学是以学术图书馆为实践基础生长出来的，故讲究学术性，注重理论体系的构造，卡尔施泰特的“图书馆社会学”最具代表性。

2. 英国图书馆学是以公共图书馆为主要实践基础逐步生长出来的，它更重视图书馆管理方法的完善与应用。英国图书馆学的代表人物有帕尼齐、爱德华兹、布朗、萨维奇、塞耶斯等人，他们大多是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其著述缺乏理论分析而长于管理实务。

3. 美国图书馆学初期是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杜威。后来芝加哥学派的兴起，使图书馆学研究在实用与理论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力求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其代表人物是巴特勒、谢拉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对图书馆事业产生的巨大影响，实用主义的图书馆学重又抬头。

4. 俄罗斯图书馆学有着注重读者阅读的优良传统。虽然受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至深，但这一传统并未发生断裂。俄罗斯图书馆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鲁巴金和列宁，前者是图书馆学的奠基人，后者是苏联时期图书馆学的导向者。当代俄罗斯图书馆学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但仍重视传统学术资源的作用。

5. 日本图书馆学最早沿袭自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仅是欧美图书馆学的模仿者。之后，随着反省能力的增强，开始对文献资料工作以及图书馆学作整体思考与探讨，并意识到应使图书馆学走上科学化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为适应情报学的发展，日本图书馆学开始与情报学融合，出现“图书馆情报学”，形成了“情报学派图书馆学”的特色。

6. 印度图书馆学具有浓郁的人文关怀色彩, 其代表人物是阮冈纳赞。阮氏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强调的是人(即读者), 深刻揭示了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的最终目标。尽管印度图书馆学发展缓慢, 但正在找寻一条切合本土实际的发展道路。

7. 中国古代图书馆知识主要是对书的研究, 侧重文化传承。20世纪20年代建立起来的图书馆学受日、美两国影响较深, 因此, 研究对象转向了图书馆工作, 并颇倾向于实用主义。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经历了三次高潮与三代学人的曲折发展经历。在第三次发展高潮中, 理论图书馆学取得长足进展, 并形成了中国图书馆学自身的特色。代表人物主要是杜定友、刘国钧。

思 考 题

1. 卡尔施泰特“图书馆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德国与英国的图书馆学各有什么发展特点?
3. “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思想是什么?
4. 俄罗斯图书馆学的优良学术传统是什么?
5. 日本与印度的图书馆学各有什么发展特点?
6. 中国古代图书馆知识的研究重心为什么是图书?
7. 为什么说中国图书馆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
8. 杜定友与刘国钧学术研究的风格与特点是什么?

第三章

图书馆学基本概念

科学概念是科学研究者探索科学世界的思维工具，也是人们用来理解科学的认识工具。每一门科学都包含着大量的概念，即众多事实、思想和专业词语。这些概念构成了科学知识的基本单元，它们是人们一定阶段认识的总结，它们的组合使之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在概念体系之中，有些概念一方面处于体系赖以建构的基础地位，另一方面被研究者使用的频率也较高，因此就形成了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如化学中的元素、氧、原子、分子、化合、分解、有机物、化合价、电解、光谱分析、元素周期律、高分子化合物等，生物学中的生命、细胞、神经、胚胎、细菌、传染病、微生物、病毒、进化论、遗传、染色体、DNA、生态系统等。在图书馆学中，图书、期刊、图书馆、文献、文献信息、知识、情报、目录、图书分类法、文献编目、文献检索、图书馆藏书、读者、读者服务、参考咨询等也都是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概念是一个概念群，在概念群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两个概念有着与众不同的重要性，它们反映出某一时代科学研究者关切点，凝聚着某一时代学者们在思想探索上的创新成就，以及代表学科发展所出现的重大话语转换趋势。这极个别的概念，就好似一个圆的圆心，它成为了基本概念群中的中轴，我们称之为基本概念中的核心概念。

第一节 图书馆学基本概念的演变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图书馆学基本概念有着不同的变化，其核心概念也有所不同。概念就好比是一种图式，不同历史时期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及核心概念的变化，可以组成不同历史时期一个学科的真实图景。它们实质上就是某种思想变迁的认识地图。

一、图书整理时代

图书馆学是从图书馆实践活动中逐步产生的一门科学知识。早期图书馆工作的对象是图书。图书是人类客观知识的记载物。由于年代的隔绝而带来的历史背景和文字上的陌生，古代典籍在阅读理解上常会发生困难，再加上古代典籍在流传中会出现抄写错误或页残书佚，因而图书的注释、校勘、版本、辨伪、辑佚之学就形成图书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随着纸张与印刷术的发明，图书数量大增，图书从少数人手中的“专利”变为普及社会、充斥生活的知识产品，人们获得图书越来越容易，社会书籍的无序化状态也越来越严重。人们常常难以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一册，因此，如何把群书汇集起来，形成一个有序的组织，方便人们检索阅读，也成为图书馆工作的又一主题。图书分类、图书排架、图书编目等组织方法就是在群书组织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图书整理与群书组织在社会需要的推动下逐步复杂化、精细化，最终就形成了一套图书馆特有的经验、知识和技术。不过，直到18世纪，建立在图书整理与群书组织活动之上的图书馆知识，尚未能成为一门科学，当时还处于“图书整理时代”发展过程之中。

在图书整理时代，图书馆知识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名词术语。图书馆知识的基本概念有图书、校讎、注释、目录、版本、辨伪、分类、索引、书目、藏书、图书馆、藏书家、图书出纳等众多名词。此时期图书馆知识的基本概念有一特点，即它们在概念语词的表达上还很不规范，带有很强的“自发形成”特色。如“图书”这一概

念，中外各国均有各种繁杂的称谓。在中国传统文献中，以载体特征为依据的称谓有简册、竹帛、方策、缥帙、梵夹、黄卷、印本等，以内容特征为依据的称谓有书、文翰、典籍、经籍、文献、簿册、籍账等。在西方国家，图书的称谓也是多种多样，希腊语把写了字的莎草纸叫做 *byblion* 或 *biblion*，把莎草纸卷本称 *kylindros*，罗马人称 *volumen*，英语中 *volume* 现仍是卷册的意思^①。此外，英语“图书”的概念还有 *book*、*codex*（希腊、罗马时的经典手稿）、*leaflet*（小册子、散页印刷品）、*literature*（作品、著作）、*document*（公文、资料、文献）、*record*（文件、档案）等众多称谓。意大利、西班牙两国的 *libro*，荷兰语之 *boek*，瑞典语之 *bok*，丹麦语之 *bog*，俄语之 *книга*，都是“图书”的意思。这些国家有关书的称谓也很多^②。在图书整理时代，图书是图书馆知识中最重要的概念，它与目录（如古希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卡利马科斯编的“皮纳克”，即 *pinaks*，为书表的意思）等少数概念构成了图书馆知识中基本概念的核心。

二、经营管理时代

1807年德国图书馆学者施雷廷格提出“图书馆学”概念后，当时的图书馆学仍未能走出图书整理时代。19世纪中叶开始，社会工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促使公共图书馆率先在英国发展起来。图书馆提高民众知识素养的教育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利用政府公费（纳税人资金）办理图书馆的观念得到人们的认可。在大西洋另一边，美国也掀起了一场公共图书馆运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斥巨资捐办公共图书馆，先后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创办及资助过2500余所公共图书馆。他的壮举为美国图书馆运动增添了光彩的一笔。图书馆规模的

① [日] 小野泰博著；阙法箴等译. 图书和图书馆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7

② 马导源. 书志学.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64

扩大,带来了图书馆如何筹建、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图书的采购、分类、编目以及馆际互借、读者、读者服务的规范或标准是什么,也逐渐上升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欧美国家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校在19世纪70~80年代先后成立,对图书馆员职业化、图书馆学专业化的成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此时图书馆知识也已变成了图书馆学,图书馆与图书馆学从过去的“图书整理时代”步入了“经营管理时代”。这一时代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前后历经约100年。

在经营管理时代,图书馆学不但出现了大量新词汇、新概念,其学科中的基本概念也发生了改变,即在以往基本概念范围外,一些新的概念纷入基本概念之中。如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经营(即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推广、馆藏、读者、阅读、图书馆教育、馆际互借、图书馆法等。过去基本概念群中的某些词汇,如校雠、注释、辨伪等正开始缓慢退出基本概念范畴而成为一般概念。而此时的图书馆、图书馆管理上升为基本概念中的核心概念。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从以往对图书、目录的关注,已转移到图书馆与管理图书馆的各种规范上来。19世纪末,英国的图书馆学就叫做“图书馆管理学”(library conomy),直至20世纪初年这个名词还在英国继续使用。而美国1887年杜威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校,最初开设的几门课程之中就有“图书馆经营”(library economy,相当于今日的图书馆管理与行政)^①。我国20年代以来仿欧美体系编写的图书馆学专著,书名中也多有“图书馆经营”或“图书馆管理”之类名称。

由于图书馆工作对规范化要求越来越高,图书馆学也迫切需要对本学科概念进行梳理,进行科学定义。比如,“图书”这一概念此时就有了被规范、被定义的要求。如何科学定义“图书”,减少其内涵与外延上的混乱,以便于统计和管理已成为当时的重要问题

^① 胡述兆,吴祖善合著. 图书馆学导论. 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1989: 15

之一。以往人们一般认为，图书是用文字记载知识的装订成册者。然而这样的概念十分模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64 年要求各国采纳一条统计学意义上的定义，即图书是“非定期的、49 页以上的出版物”，这才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图书概念规范的问题。不过，加拿大、芬兰、挪威的法规采纳了 49 页，丹麦要求是 60 页，爱尔兰、意大利、摩纳哥是 100 页。相反，比利时满足于 40 页，捷克斯洛伐克为 32 页，冰岛为 17 页。而英国的定义则从财源上考虑：凡价格在 6 便士以上的出版物均可称为书^①。把书籍看成物质的东西而非文化交流的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过，正是有了这样的定义，图书才能与报纸、杂志乃至一些散页文献（传单、广告等）区别开来，便于分类管理与统计。这些规定的出现，可谓顺应了图书馆规范化管理及图书馆学专业化、科学化发展的要求与趋势。

三、信息技术时代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使得大量科学文献涌现，给图书馆带来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因新技术（如计算机、先进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图书馆工作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50 年代，情报学为克服“知识爆炸”而从图书馆学中分化突起，即给图书馆学带来极大震动。进入 80 年代以后，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光电通信技术不但催生出大量电子出版物，也催生出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这一新的形式。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虽然仍对图书馆管理十分重视，但如何采用新的信息技术改变图书馆生存状态，已越来越成为人们更为关心的主题。信息技术组成了图书馆、图书馆学变革的物质基础，同时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等横断学科的思想也形成了推动图书馆、图书馆学变革的理论基础。于是，图书馆学从过去的“经营管理时代”进入了一个“信息技术

^① [法] 罗贝尔·埃斯卡皮著；于沛等译. 文学社会学.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5

时代”。

在信息技术时代，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一些新的概念词汇开始出现并进入基本概念群，如信息、情报、数据、知识、文献信息、联机检索、终端用户、图书馆网络、资源共享等。有些概念在某一年代里甚至成为图书馆学研究者十分热衷谈论的词汇。例如“网络”（network）一词，它在16世纪已进入了英语词汇之中；17世纪时它还用以表示“结构”，当时也只用于植物与动物；19世纪（如1839年）才用来表示运河、河流这样有分支系统的联合事物；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网络”已变成欧美图书馆学中的一个时髦名词而出现在大量论著之中。“网络”在图书馆学论著的上下文里，或表示图书情报协作组织，或表示文献情报交流系统，或表示计算机联机检索^①。80年代以来，信息、情报、知识、文献等是图书馆学者们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当然情报学界使用“情报”一词最多）。在图书馆学基本概念群中，“信息”因其内涵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显著，进而逐步成为核心概念。而且“信息”一词也曾衍生出文献信息、信息资源、信息交流、信息检索、信息服务、网络信息、信息管理等为研究者们使用的主题词。它一度成为统摄图书馆学概念体系的轴心。而图书馆学中曾经十分重要的概念“图书”也被“文献”一词取代，“图书”只表示书籍的含义，“文献”则成了囊括印刷书籍、声像资料、电子出版物的十分宽泛的概念，并且得到图书馆学共同体的一致认可。

第二节 知识是当代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

图书馆学的发展，在图书整理时代、经营管理时代与信息技术时代，其基本概念群有异，核心概念也不同。这说明图书馆学在自身学科史的不同阶段的进程中，学科的主题有着区别。新时代的社

^① [美] 杰西·H. 谢拉著；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271~279

会需求总会在科学理论和思想之中反映出来并留下深深的印迹。

一、知识成为核心概念的原因

20世纪末期，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活及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是数字化技术与网络技术。人们可在互联网上相互通讯、交流思想、购买物品、查询资料、休闲娱乐、浏览新闻，这无疑是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尤其是个人电脑的普及，促使社会权力走向分散化，社会行为走向个体化，人们的工作单位也开始变小。劳动报酬的多少以往是由完成定额多少来决定，现在却注重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来衡量。

信息技术浪潮在世界上推涌出无数信息企业、信息系统、信息专家、软件设计师、信息主管等，成功与财富迅速向之汇聚，导致人们对信息技术产生了某种崇拜。因而，无论任何人都会感到这场突来的信息革命是汹涌澎湃的。不过，这场信息革命虽然深刻，但目前基本上还停留在以“数据”为中心（数据的收集、存储、传输、检索、分析和提取）的技术阶段。而下一场即将到来的信息革命则是以“内容”为中心，它将解决信息的涵义、信息的目的这些问题。“人们和公司的注意力不再放在信息技术的‘技术’上，而是放在信息技术的‘信息’上。”^①这一切恰与美国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指出的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贝尔称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进程相吻合。

在知识社会中，社会大厦是建立在专业化知识及专业知识人才的基础之上的。此时知识正在日益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成为社会关键性资源。那些知识工作者将取代蓝领工人（产业劳动大军），他们数量在迅增，他们不是以经验为基础而是以学习为基础，“知识工作者通过正规的教育来获得工作、职业和社会地位”，“知识社会意味着个人、组织机构、产业、国家获得和应用知识的绩效将越

^① [美] 彼得·德鲁克著；戴明译. 下一次信息革命.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0 (4): 27~31

来越成为关键的竞争因素”^①。知识由于是可以共享的，它与资本、财富不同，可以为弱者或穷人所掌握，因而知识形成了民主的源泉，它对社会政治的进步也将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在知识社会中，与知识关联的命题将成为社会科学关心的主题。对于图书馆学来说也将如此，知识这一概念将成为图书馆学基本概念中的核心概念。

二、知识的涵义

人类对知识的认识经历了漫长年代，产生过数不清的各种定义。波普尔说：“人类知识现象无疑是我们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自从笛卡儿、霍布斯、洛克及其学派（不仅包括大卫·休谟，而且也包括汤姆士·里德）以来，关于人类知识的理论基本上是主观主义的：知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特殊可靠的人类信仰，科学知识则被看做是一种特殊可靠的人类知识。”^②换言之，西方社会把可靠信仰与科学知识都看成知识。因此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说过：“拉丁文称知识为 *scientia*，从而 *science*（科学）一词便成为最受敬重的那一部分知识的名称。”^③在中国传统知识观中，知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智慧，一种对自然、社会所具有的某些学问。如先秦典籍中“学”、“知”的概念作名词来说，它指的就是智慧和学问。《墨子·修身》言“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论语·子罕》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即为此义。直至今日，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也依然在普通意义上与古代知识观无大差别。

那么，在知识社会中，知识的概念应是怎样的呢？美国学者丹

① [美] 彼得·德鲁克著；赵干城译. 大变革时代的管理.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81~183

② [英] 卡尔·波普尔著；舒炜光等译. 客观知识（前言）.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③ [英] 伊·拉卡托斯著；兰征译.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

尼尔·贝尔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给知识下定义说：“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它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①其义是说，知识首先是关于事实与思想的陈述；这些陈述能提出合理判断或实证结果；它们可通过传媒传递给他人。贝尔在其知识概念中强调了科学知识及理论知识（知识主张）的重要性，强调了知识传播的功能。显然他认为系统性、正确性、公开性、交流性、共享性是知识的主要特征。

三、知识的类型

对知识进行分类，这是认识知识、把握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我们可得出不同的知识类别。如以知识涉入的社会活动领域为依据，1925 年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曾把知识分为三类：统治知识、教育知识和宗教救世知识。而 1962 年美国学者弗里茨·马克卢普则把知识分为实用知识（专业知识、商业知识、劳动知识、政治知识、家庭知识、其他实用知识）、学术知识、消闲知识、精神知识（宗教知识）、不需要的知识（即无意无目的得到的）等五类^②。当然，在西方社会不同形式的知识分类中，最普遍使用的是两分：科学知识和非科学知识。而专业知识与日常知识的两分法在社会科学论述中也使用较广泛^③。1996 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依据知识的表现层次对知识进行了新的分类：①know-what，即关于简单数据与事实的“知道什么”型知识；②know-how，即关于技能方面的“知道怎么做”型知识；③know-why，即抽象的、解释层次的“知道为什么”型知识；④know-who，即“知道谁有知识”

①② [美] 丹尼尔·贝尔著；高铨等译.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95～196

③ [加] 尼科·斯特尔著；殷晓蓉译. 知识社会.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38

型知识。在这一分类表述中，知识的层次不断提升。

对于图书馆学来说，知识的分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图书馆收藏的是文献，而文献的本质是知识。文献的整理、组织也就是知识的整理与组织。文献组织过程中所使用的文献分类法，实际上也是一种知识分类法。早在初期的图书馆实践中人们就意识到，图书如果不按其内容的知识属性或其他特征分门别类地组织起来，要快捷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一册”是十分困难的。6世纪时期，中国古代官府藏书机构已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类分架陈列。15世纪末，西方大学图书馆也已开始把馆藏图书分为哲学、医学、法学和神学几大类分别度藏。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把人类的全部知识按心理活动，从低级到高级分为记忆的知识（历史）、想象的知识（诗）、理性的知识（哲学），并将当时各门学科分别隶属于这三大类之下。这一按学科内容区分知识的分类体系，在17、18世纪中曾为许多藏书家和图书馆用来编制自己的图书分类目录。现代西方著名的图书分类法，诸如《杜威十进分类法》等无不受过培根知识分类思想的影响。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图书馆使用的文献分类法已发育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以科学知识分类为基础的文献分类学也已成为图书馆学中最具学术含量、学术特点的专业知识。

当然，还有一种知识分类正在对当代图书馆学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那就是波普尔把知识划分为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的分类。西方知识经济学者所谓的内隐知识（tacit knowledge）和外明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也可简称为隐知识、显知识的概念，与波普尔的主观知识、客观知识涵义基本类同。波普尔认为，主观知识是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客观知识则是写、印于载体之上的由陈述构成的知识。谈及客观知识时，波普尔说：“科学知识就属于这种知识。储存在我们的图书馆而不是我们的头脑中的正是这种知识。”^①他

^① [英] 卡尔·波普尔著；范景中等译.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419

还说，储存在图书馆的知识要比我们头脑中的知识重要得多，因为科学工作者借助客观知识的获取、研究才能作出知识上的创新，才能为人类知识的增长作出贡献。波普尔将客观知识提升到与物质世界（世界1）、精神世界（世界2）相区别，并且具有相对独立的另一个世界存在（世界3），这就给图书馆学所研究的文献、知识等现象提供了一个范畴归属，首次从哲学的角度为图书馆学明确了它所研究的客体范围（即知识类型——客观知识）。

四、客观知识的特征

当代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是知识，而知识中的客观知识又是图书馆学研究面对的基本客体，那么对客观知识的深入了解，把握其基本特征，无疑对图书馆学的深入开掘具有重要意义。客观知识有哪些特征呢？我们通过客观知识（显知识）与主观知识（隐知识）的比较可以对之进行以下揭示：①从载体上看，主观知识储存在大脑之中，而客观知识储存在客观物质（竹帛、纸张、磁盘）之上；②从存储方式上看，主观知识通过记忆，而客观知识通过记录；③从寿命上看，主观知识随人体生命结束而消亡，而客观知识可因物质载体的耐久性而长期保存；④从传播时空上看，主观知识因口耳相传有时空局限性，而客观知识可以跨越更广的时空，基本上不受限制；⑤从形式外观上看，主观知识是流动的、易变的，而客观知识是稳定的、不变的；⑥从陈述结构上看，主观知识往往欠缺系统性，而客观知识更注重系统性、逻辑性；⑦从享有权上看，主观知识是自我的、私人的，而客观知识是社会的、公共的；⑧从检验上看，主观知识评价、检验较为困难，而客观知识评价、检验相对容易。当然，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尽管有许多差别，但二者的联系也十分紧密。首先，二者互相依存，即客观知识只有依靠主观知识的存在而生成，主观知识依赖客观知识的获取而成长；其次，二者互相转化，即主观知识外现成为客观知识，客观知识被人阅读、学习又转化为主观知识。而且有时我们也可把主、客观知识看成一个连续体，在连续体的一极是内隐的、存在于大脑中的无意识、有意识的知识，而在另一极则是外明的、可编码的知识，人类所有知识都

尽含于这两极之中。

知识管理理论对隐知识、显知识的相互转化十分重视。日本管理学者野中郁次郎认为,知识转化有四种模式:①潜移默化(socialization),即个体间共享隐知识的过程,如工厂中师徒之间隐知识的传授,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获得宝贵的交感型知识;②外部明示(externalization),即隐知识转化为显知识,将个人的经验、认识与判断变为能理解的、被重复利用的概念型知识;③汇总组合(combination),即将一种显知识转化为更加复杂的显知识,它包括收集综合显知识、交流传播显知识、编辑加工显知识,以使已有的显知识转变成一种运作型知识;④内部升华(internalization),即将显知识内化为个人的隐知识,这种内化过程是通过学习、实践和感悟来实现的。把上述四种模式的英文单词首字母组合起来,就形成了所谓的知识转化SECI模型^①。

知识管理属于管理科学,它不仅重视显知识,同时也重视隐知识;不仅重视知识创造,也重视知识利用。它观照知识是如何在一个社会组织与机构中运作并发挥作用的。而图书馆学尽管也对隐知识感兴趣,但它主要关注显知识是如何采集、整序、储存、加工、交流、接受的。在这一点上,图书馆学与知识管理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二者之间不宜画等号。

第三节 知识与其他基本概念的区别

知识,尤其是客观知识应成为当今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不过,在图书馆学基本概念中,除了知识以外,信息、情报、文献等也都是人们使用频率很高的重要概念。这些概念尽管各有其义,然而知识与它们之间在概念涵义上或有关联,或有交叉,有时会导致一些理解与使用上的麻烦。为了避免这些麻烦,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新的探讨与界说。

^① [美]鲁迪·拉各斯,丹·霍尔特休斯编;吕巍等译.知识优势:新经济时代市场制胜之道.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66~98

一、知识与信息的区别

信息的科学定义通常可溯及信息论奠基人申农与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对信息所作的解释。维纳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①。此后，信息的定义引起世界各国学者们的广泛探讨。20世纪80年代前期，美国学者马克卢普等人曾仔细评价了关于信息的各种不同定义，指出信息一词在广泛应用中有以下六种通行的看法：信息是事实，信息是数据，信息是沟通，信息作为一种能量形式，信息可作为一种商品，信息也可以是知识^②。我国图书馆学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信息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由事物发出的消息、情报、指令、数据、信号等当中所包含的内容。”^③这种认识与人们一般所称的信息概念基本吻合，即把信息看成是具有普遍性的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它不但存在于自然，也存在于社会。在知识与信息的概念关系上，通常人们认为信息包括知识，知识属于信息。如我国有学者指出：“任何知识都必然是信息，因为任何知识都必然表述了某类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规律）；但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知识，知识只是信息中具备普遍和抽象品格的那部分，因此是信息的一个子集。”^④例如，天气预报说“今天最低气温是0℃”，这是信息却不是知识；而物理学告诉我们“水在0℃时结冰”，这既是知识又是信息。正如英国学者恩普森所称：“信息是具有意义和目的的数据。在信息被用于进行比较、评估后果、说明关系和进行对话时，它就发展为知识。因而知识可被视为载有经验、评价、敏锐洞察力的信息。”^⑤

① [美] N. 维纳著；郝季仁译. 控制论.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133

② 卢泰宏. 信息分析.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4~5

③ 国家教委高教司编. 图书馆学基础教学大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1~7

④ 钟义信. 信息与信息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13~14

⑤ [英] 恩普森著；谷平译. 知识管理的挑战.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5）：44~47

二、知识与情报的区别

情报的概念在情报学界一般指称“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或者说，“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①。也有人说，“情报是关于某种情况的报道。‘情况’的外在形式是信息，但其内在的本质是知识。‘报道’就是传递。”^②从形式上看，情报与信息两者都是动态的，都有发出者与接受者，区别在于信息的接受者可以是不定的、众多的，而情报的接受者却是指定的、单一的；从内容上看，情报与信息虽然都有所要传达的东西，但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它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之中，其范围要比情报大得多，而情报仅是对特定主体提供的具有针对性的有用信息，故情报只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在知识与情报的关系之中，情报学界无论对情报怎样界定，表达方式都为“情报是……知识”，即认为情报属于知识的一种。因此，目前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对信息、知识、情报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一流行的看法：信息包含知识，知识又包含情报。系统化了的信息成为知识，知识中的特定需要部分就是情报。用图表示则为（见图 3-1）^③：

其实，这种表达存在着问题。因为情报就其实质来说属于信息范畴，却不一定完全属于知识范畴。有些情报可以属于知识，是知识的一种，有些情报则未必是知识。例如，以色列情报部门为了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健康状况，利用其参加约旦国王侯赛因葬礼下榻约旦国宾馆之机，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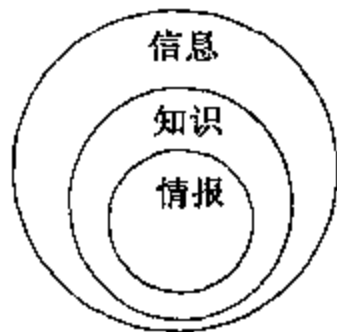


图 3-1 信息·知识·情报关系 (一)

取了他的尿样，并迅速用专机送回国内进行专家检测分析。此时“尿样”就是一份珍贵的情报。从“尿样”中分析出来的各种数据

- ① 钱学森. 科技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 科技情报工作, 1983 (10): 1~9
 ② 王知津. 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 情报学报, 1998 (3): 230~234
 ③ 肖自力. 信息、知识、情报. 情报科学, 1981 (3): 2~10

属于情报，但不属于知识。再如，我国羽毛球队在备战 2000 年奥运会时，专门从悉尼收集到奥运场馆比赛场地内外地面颜色的信息，然后在国内建立模拟场地进行适应化训练。此时有关奥运场馆比赛场地颜色的信息就转变成了情报，而不再是简单的信息，当然也不是知识。因此，信息、知识、情报三者的关系不是逐层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用图表示应该如图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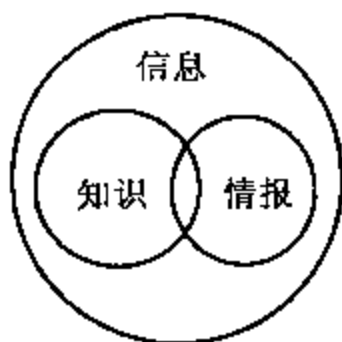


图 3-2 信息·知识·情报关系 (二)

三、知识与文献的区别

在图书整理时代，图书馆工作的对象主要是书籍。到经营管理时代，报纸的增多，期刊的迅涨，图书这一概念已难包容馆藏内容。在信息技术时代，声像资料的出现、电子出版物的面世，传统图书的概念更无力对其进行涵盖。早在 20 多年前，我国学者就试图用“文献”来总括各类型出版物。现在人们已基本接受“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一涵义，我们现在使用的“文献”，已经变成了一个既囊括图书报刊，又可涵盖一切声像资料、电子出版物的超级词汇。凡是具有内容知识性和载体实在性，有记录方式，能够传播，便于积累和继承基本特征的事物，都可以叫做文献。然而，在知识与文献的关系中，知识与文献之间不能画等号。因为知识包括隐知识与显知识两部分，文献记录的知识仅仅是显知识（客观知识）。如果忽略文献物理载体而不计的话，文献也只是知识的一个子集，属于知识的一部分。另外，受信息科学的影响，我国图书馆学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广泛使用“文献信息”这一概念。文献信息就是排除文献物理载体而对文献内容的指称。故有人说“文献信息是以文献符号系统记录在文献载体上的信息”^①。可以说，文献信息与客观知识的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大致

^① 国家教委高教司编. 图书馆学基础教学大纲.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1~7

等同，文献信息一般是人们有目的创作、整理出的信息，它将动态的主观知识转变为相对静止的客观知识，它已不是简单的信息而是客观知识，是知识的一个子集。我们可以用图来表示信息、知识、情报、文献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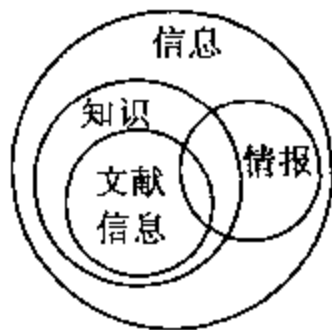


图 3-3 信息·知识·情报·
文献信息关系

苏联图书馆学者克列伊坚科曾说：“科学工作者和图书馆实践工作者解决所研究的任何问题，通常是从明确术语及其所表示的概念开始的。逐步建立概念的相互联系和从属关系，不断稳定其在概念理论资料中的地位，这就是研究工作的基础。”^①图书馆学概念的理论资料就像一张坐标网，从这张网上我们能看见使人感兴趣的事实，这些事实能够以某种概念形式表现出来。如果用术语起源学的方法对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核心概念进行历史分析，研究它们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揭示其实质和涵义的演变，发现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深刻地认识到图书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轨迹。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除了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客观需求对它产生拉力作用外，还要依靠其内在逻辑理性的推力来起作用。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常出现跳跃性发展，即从一个话语主题不断向新的话语主题转换。透过每个时期话语主题的理论资料，我们常能感受到社会需求的拉力作用往往要大于学科内在逻辑理性的推动作用。图书馆学理论的这种跳跃发展令人担忧。因为，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能否迎合时代变化固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其自身中的理性种子能否得到适度的滋养与成长。

^① [苏] B. C. 克列伊坚科著；何士彬译. 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29

关 键 词

科学概念 基本概念 核心概念 图书馆学发展阶段 图书网络 知识定义 客观知识 主观知识 知识类型 信息 情报 文献 文献信息

小 结

1. 每门科学都包含着大量的概念,即众多事实、思想和专业词语。在一门科学的概念体系中,有些概念一方面处于体系赖以建构的基础地位,另一方面被研究者使用的频率也较高,因此就形成了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在基本概念群中,有个别概念处于圆心与中轴地位,它形成了基本概念中的核心概念。

2. 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变化,其核心概念也不同。在图书整理时代,图书馆知识的基本概念群是自发形成的,图书、目录是这一时期的核心概念;在经营管理时代,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有了被规范定义的要求,核心概念转移到图书馆、图书馆管理方面;在信息技术时代,受信息技术与信息科学等横断学科的影响,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信息成为新的核心概念。

3. 知识社会中,知识成为社会进步所依赖的主要资源,知识将逐步演变成图书馆学研究的新的核心概念。知识是关于事实与思想的陈述,它能提出客观的判断与实证结果,并通过传媒传递给他人。知识的分类对图书馆学有重要的意义,以科学知识分类为基础的图书分类,现已成为最具学术含量的图书馆学专业知 识。另外,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的分类也对图书馆学的分类具有重要意义。客观知识(显知识)概念的提出使图书馆学明确了研究范畴的归属。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相比较具有许多不同之处。

4. 知识与信息、情报、文献、文献信息等图书馆学基本概念

有着密切的关联，信息概念的范畴最大，知识、情报、文献信息均属于信息的子集，但知识与情报是交集关系。文献信息是知识的子集。

思 考 题

1. 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核心概念是什么？
2. 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核心概念是怎样演变的？
3. 知识为什么会成为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
4. 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的关系如何？
5. 信息、知识、情报、文献信息之间的关系如何？

第四章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在图书馆学中，研究对象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元问题，它规定着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规定着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质。科学地确定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既给图书馆学提供了赖以建立的基石，也为图书馆学提供了与其他科学知识相区别的理论根据。

第一节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

在图书馆学发展的两百年历史之中，中外各国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有数百种。虽然这些认识受不同时代的文化影响，有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但它们都含有科学探索精神，就像不同时间里撒下的理性种子，每一粒都蕴含着宝贵的思想价值。从历史发展过程看，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整理总和说

图书馆职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藏书事业及其藏书活动史。图书馆学正是在以往人们丰富的藏书实践活动中逐步发展成熟的。1922年蔡元培曾说：“一种事业发达到一定的

程度，便有产生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有了系统的理论，那种事业的发达，才有迅速的进步。这是各种事业的通例，图书馆也就不在例外。”^①1931年，英国克罗伊登公共图书馆馆长、伦敦大学图书馆学院讲师贝里克·塞耶斯（W. C. Berwick Sayers）也认为：“只有从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中，才能渐渐地推演出一种理论，并加以表述。”^②

图书馆学（bibliothekswissenschaft）这一名称由德国图书馆学家施雷廷格在1807年最早提出。此后，施雷廷格在慕尼黑皇家图书馆任职期间，又出版了两卷本的《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1808~1829）。在该书中，施氏将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确定为“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③。施氏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目录的编制，他不仅编制出12个大类、200个小类的分类表，而且编制过字顺目录、主题目录。他在此书中第一次全面叙述了图书馆目录的编制原理，并将其视为图书馆学的重要知识体系。施氏尝言：“图书馆应当尽快地找到必要的书籍，以满足任何文献工作的需要。”^④与施氏同时代的另一名德国图书馆学者艾伯特（Friedrich Adolf Ebert, 1791~1834），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德累斯顿王立图书馆等处工作20多年，他在《关于公开图书馆》（1810年）的一个小册子中认为，把图书馆学局限于图书整理范畴太窄，指出“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⑤。1820年，艾伯特又出版了《图书馆员的教育》。在该书中艾氏强调图书馆员所需要的是综合性的知识，即除了目录学、古籍、百科词典等知识外，还一定要掌握

① 蔡元培.《图书馆学》序.见:杨昭愬.图书馆学(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

② [英]贝里克·塞耶斯.《图书馆学五定律》引言.见:[印度]阮冈纳赞著;夏云等译.图书馆学五定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12

③⑤ 董小英主编.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源.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43~44

④ 杨威理.西方图书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83

外语、历史、文学史等众多知识^①，艾氏的观点得到丹麦学者莫尔贝希（C. Molbech, 1783~1857）的支持，莫氏在其 1829 年出版的《论公共图书馆》一书中，对艾氏观点又有阐发和系统化，后人称为“艾伯特-莫尔贝希体系”。

历史表明，早期一些图书馆学家都是在图书整理活动中取得巨大成就而闻名于世的。如德国的莱布尼兹（G. W. Leibniz, 1646~1716）在 1666 年写过一篇论文《组合技术论——使全部知识转换为具有可计算性的方法》，他计划将所有知识纳入一个具有逻辑概括性的人类知识一览表，借以向读者提供检索与自学的方便。而担任过大英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帕尼齐于 1841 年编制出版了以著者为主要款目的《91 条著录规则》，后被世界许多国家图书馆所接受。他们正是因其非凡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而享誉图书馆学界的。因此，将图书馆学研究内容视为整理文献所需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如 20 世纪前期，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在给图书馆学下定义时说：“图书馆学就是发现、搜集、组织及运用印刷的与书写的记录之知识与技能。”^② 日本图书馆学家椎名六郎早年也认为：“图书馆学是将图书馆的一切知识与技术，作有组织的研究的学问。”^③

“整理总和说”的提出，反映出西方近代图书馆内部工作已趋向于复杂化、精细化、系统化，图书整理中的知识、技术含量愈来愈高，不设专门学问便无从下手。“整理总和说”最早为图书馆学设定了明确的研究对象，这一论点为图书馆学的建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它强调图书馆学既有知识，又有技巧，将图书馆学内容表述

① 袁咏秋，李家乔主编.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68

② 见：台湾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编. 图书馆学.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50

③ [日] 椎名六郎. 图书馆学概论. 第 5 版. 东京：学艺图书株式会社，1967（昭和四十二年）：4

成“知识、技巧的总和”，形成了后世图书馆学研究理论与应用并重范式的先声。“整理总和说”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界说，源于图书整理实践活动，尚属经验的总结，还处于现象描述的认识阶段。

二、图书馆管理说

19世纪中叶以前的各国图书馆，或为王侯贵族所建，或为修道院所设，或为大学附属，或为新兴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私立，几乎不向社会公众开放。当时有一种能面向读者的“会员图书馆”一度流行于英美，但其服务对象仍以学者、有产阶级中层人物为主，并且还要事先入会。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工业革命加速了城市的成长、产业大军的扩增，同时工业生产又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素质有不断提高的要求，因此，各国公共图书馆应运而生。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该法要求人口在1万人以上的各英格兰城市，都应建立公共图书馆。从此，英美各国掀起了一场公共图书馆运动。这些新建公共图书馆有三个特征：（1）向所有居民免费开放；（2）经费来源于地方政府税收；（3）图书馆的设立与经营有法可依^①。

公共图书馆的蓬勃发展，使图书馆学研究开始发生转变。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从以往侧重于图书资料，逐步转向侧重图书馆，研究内容也从以图书整理为中心渐渐转向以图书馆经营管理为中心。1821年，德国图书馆学者F. A. 艾伯特首次提出“图书馆管理学”一词。1839年，法国学者L. A. C. 海塞出版了《图书馆管理学》，他认为图书馆学的宗旨是解决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图书馆。1859年，英国的爱德华兹出版了《图书馆纪要》二册，其第二册即为《图书馆管理》，对17~19世纪以来的图书馆管理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1887年，美国图书馆学家M. 杜威创办的图书馆学校，全称即为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经营学校（School of Library Econo-

^①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192

my at Columbia College)。杜威的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如何提高图书馆管理的时间和成本效益，他办学的目的就是培养专业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因此，学校的课程亦偏重于图书馆经营之实际。同年，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馆长 F. M. 克伦登著文提出应运用企业管理方法管理图书馆。此后有关图书馆管理的论著不断增多^①。

受美欧图书馆学影响，我国早期图书馆论著言及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时，也多将研究客体指向“图书馆”。如李小缘在其《图书馆学》（1927年讲义初稿）中论及，就图书馆的“各方面研究之，是为图书馆学”^②。1934年，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一书出版，该书在讲到图书馆学的意义时说：“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③1935年，李景新在其一篇论文中也明确地表示：“图书馆学就是以科学方法研究关于图书馆的一切事项的学问。”^④

“图书馆管理说”扩大了以往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它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不仅要关注图书整理也要关注图书馆的经营与管理，这无疑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图书馆管理说”将研究重心从图书整理转向图书馆管理，实现了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第一次转变。这种转变对于世界各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发展以及对于图书馆工作的职业化都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三、图书馆事业说

20世纪前期，世界各国的图书馆事业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一方面各类型、各级别的图书馆纷纷涌现，另一方面图书馆员的职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26

② 马先阵，倪波. 李小缘纪念文集.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247

③ 刘国钧. 图书馆学要旨. 第2版. 上海：中华书局，1949：2

④ 李景新. 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5（2）：263~302

业化又促进了图书馆协会的繁荣发展。一个国家、地区的图书馆事业已成为该国家、地区的重要文化设施和事业。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学也遇到了一些新的研究命题,如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图书馆法规的制定、图书馆员队伍的培养、图书馆藏书的协调、图书馆网的布局等。因此,众多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逐渐将研究视野提升到宏观层面上来。在他们看来,不仅微观图书馆的研究很有价值,宏观的图书馆事业也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

1957年,我国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发表了论文《什么是图书馆学》,文章指出:“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图书馆是客观存在着的一种事业,是人类社会生活现象之一。这种现象,这种事业,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学习生活、文化生活、科学研究生活。既然如此,难道不应该弄明白它的性质、它的发展规律、它的各个组成要素及其规律吗?”^①刘国钧说,图书馆事业有五项组成要素: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欲掌握图书馆事业的规律,分别就这五项要素进行深入研究是必须的。后来,人们在言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时,一般将刘国钧的观点概括成“要素说”。其实,刘国钧所言研究对象明确指称的是“图书馆事业”,而非什么图书馆要素,是典型的“图书馆事业说”。

1963年,武汉大学黄宗忠先生根据毛泽东《矛盾论》的论述,提出了图书馆事业中藏与用这对特有的矛盾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②。这一观点亦曾被人称之为“矛盾说”。1981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教材《图书馆学基础》出版,该书称:“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

① 刘国钧. 什么是图书馆学.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 1957 (1): 1~5

② 黄宗忠等. 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63 (1): 104~120

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①此说被人简称为“规律说”。1984年底，黄宗忠先生又对自己提出的“矛盾说”进行了修正，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这里的图书馆不是具体的，而是经过抽象的“一种科学概念的图书馆”^②。1985年初，沈继武先生又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活动”^③，人们简称之为“活动说”。这些研究对象的新解各有独到之处，在我国图书馆学界广泛传播。不过，它们的出发点均已不再局限于微观的图书馆，而是扩延到了宏观的图书馆，不再只以图书馆的内部因素为根据。因此，这些观点可以看做是“图书馆事业说”的发展与延伸。当然，“图书馆事业说”不仅在中国流行一时，国外图书馆学界亦有持此说者，如苏联图书馆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讨论图书馆学研究客体与研究对象的区别时，有一种主导观点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是图书馆事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的规律、组织、发展、职能等。图书馆学不仅要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内部关系，也要研究其外部关系，包括图书馆事业外在的广泛社会系统的联系^④。

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阐释，“图书馆事业说”20世纪后半叶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至今仍为一种主流意识。“图书馆事业说”不但拓展出图书馆学研究的宏观领域，而且也因其开始关注图书馆事业与社会的各种复杂联系，为图书馆学研究增加了深度与广度。“图书馆事业说”包容了“矛盾说”、“规律说”、“活动说”等诸多观点，这些观点都具有“本土”特色，它们表现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

①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 图书馆学基础.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

② 黄宗忠.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再探讨. 图书与情报，1985（1）：32-37

③ 沈继武. 关于图书馆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图书情报知识，1985（1）：21-26

④ 李仁年编译. 图书馆科学的中心问题. 国外图书馆学研究资料，1984. 7（1）：31-40

四、知识交流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技术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越来越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纷纷问世；文献数量也急剧增长，呈现出数量膨胀、内容交叉、文种多样、类型复杂、分布分散、失效加快等特征。人们曾用“知识爆炸”来形容文献的迅速扩张。由于电子计算机、缩微复制等技术的应用，图书馆工作也出现了从手工方式向自动化方式转移的趋向。此外，情报学此时已从图书馆学母体中剥离出来，成为一门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一些图书馆学者意识到，图书馆学、情报学自身的任务就是促进社会知识信息的有效交流，以满足人们快速、准确获取有用知识信息的需求。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亦应向此方向转移。

20世纪40~70年代，国外一些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的知识、信息、情报的交流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如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在《图书馆学教育基础》（1972年）一书中提出，“交流是社会结构的胶粘剂”，“图书馆是社会交流链中的一环”，“图书馆具有教育作用和传递情报的作用。它是人们与文字记录知识之间的中介，是促使记录知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利用的交流系统”^①。日本图书馆学家椎名六郎称：“情报理论和图书馆学都是以人类社会的情报交流为对象的科学。两者都立足于情报交流现象的同一基础上。”^②苏联图书馆学家丘巴梁谈及苏联图书馆学时说，它是“一门把图书馆过程作为群众性地交流社会思想的一种形式的社会科学”^③。

① 董小英主编. 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源.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49~50

② [日] 椎名六郎. 情报理论与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会年报, 1996(1): 21~25

③ [苏] 丘巴梁著; 徐克敏等译. 普通图书馆学.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1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图书馆学者也开始提出了自己的知识、情报交流的理论观点,如北京大学周文骏先生在《概论图书馆学》(1983年)一文中阐述了他的“情报交流”观点,认为文献是情报交流的工具,图书馆是情报交流工作的机构,图书馆学理论是一种用文献进行情报交流工作的经验结晶^①。1984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的宓浩先生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讨论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文章对以往图书馆学仅停留于对图书馆工作表象研究的状况提出了批评,认为应当发掘隐藏在表象下面的内在机制,从表象描述上升到本质揭示。宓浩指出,图书馆收集、存储、整理、组织、传递和利用知识信息的活动本质是人类知识交流。图书馆实质上是社会知识交流的工具。图书馆学应划分三个层次研究知识交流:(1)知识交流的基本原理(研究知识、知识载体、知识交流三者的关系);(2)知识交流与交流实体(如图书馆)之间的关系;(3)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内在机制^②。该文发表后在图书馆学界影响甚广。

“知识交流说”在理论形态上自称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它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新解。“知识交流说”摆脱了从图书馆实体出发确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方式,致力于抽象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这对打破传统图书馆学研究封闭的思维模式,推动本学科科学化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知识交流说”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层次较高,它能涵盖图书、情报、档案等多门学科,但最后如何返回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中,用于揭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机理,却显得较为乏力。

① 周文骏. 概论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研究, 1983 (3): 10~18

② 宓浩, 黄纯元. 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 关于图书馆基础理论的建设. 见: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论文集. 杭州: 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研究组, 1985: 23~39

五、信息资源说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依劳动工具的演变划分为手工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脑时代。第一个时代的经济形态是以土地和人力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第二个时代的经济形态是以机器和资本为基础的工业经济，从20世纪晚期开始，人类经济形态正在向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过渡与转变。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导致社会信息的激增、信息技术的普及与知识经济的崛起。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从80年代起，欧美国家兴起了一个新的专业概念“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简称IRM），IRM理论认为信息是可共享的资源、财富，任何组织机构都应对它进行高效管理（与设备、资金、技术、人员及信息系统形成整体化管理），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提高组织机构的效率和竞争力。

IRM理论形成后不久就渗入了图书馆情报学领域。如美国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情报学教育陷入困境之后，众多图书情报学院倒闭，但也有一些学校成功地引入IRM理论改进教学从而获得了生机。80年代末，IRM理论传入中国。进入90年代，国内一些高校图书情报学系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系或相关系名，并在教学中加大了信息资源管理的课程比重。1996年9月，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主办了“'96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来自2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论文约500篇，使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对信息资源理论的研究达到了高潮。

美国图书馆学家切尼克（Barbara E. Chernik）在其《图书馆服务导论》（1982年）一书中曾说，图书馆“是为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①，他几乎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谈图书馆资源（library resources）问题。1999年2月，徐引篋、霍国庆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出版，该书明确表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

^① 见：徐引篋，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1～12

息资源体系”。其基本观点是：(1) 图书馆的实质是一种动态信息资源体系。无论是文献信息资源、口语信息资源、实物信息资源或多媒体信息资源，根据用户的需要图书馆都可以收集起来，使之形成一个信息资源体系为用户使用；(2) 信息资源体系是一个发展的有机体，它是动态的，有形成、维护、发展、开发四个主要阶段；(3)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而图书馆的实质是信息资源体系，故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①。

“信息资源说”将图书馆视为动态的、有机的信息资源体系，合理地继承了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体”的观点。“信息资源说”力图揭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这对我们认识图书馆以及发展图书馆学都有重要意义。“信息资源说”融合了系统论的思想，将图书馆学内容拓展到一个开放的社会信息资源领域，反映出了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但是，“信息资源说”挟西风而传布，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不可能经过“本土化”过程。

六、知识组织说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光纤与卫星通信技术不仅将人们带入了网络时代，使社会知识信息的总量得以飞速增长，同时也使传播速度加快。随着高新技术、软件开发、管理策划、咨询服务、教育培训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知识社会与网络时代，如何有效地组织、控制与传递知识信息，克服知识的无序状态，提高知识信息的利用率，增强组织与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已成为人们极为关注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知识组织 (knowledge organization) 的概念产生得较早，1929年英国分类学家布利斯 (H. E. Bliss, 1870~1955) 曾出版过《知

^① 徐引篪，霍国庆.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4~21

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两部著作。1989年，国际知识组织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nowledge Organization, 简称 ISKO）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学会将创刊于1974年的《国际分类法》杂志作为自己的会刊，并在1993年将其更名为《知识组织》。该学会的宗旨是，联合国际力量，促进知识组织方法的研究、应用与发展，为献身于知识组织工具的开发、创新的学者提供交流与合作机会。除了文献分类领域，情报学界也对知识组织十分关注。如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 C. Brookes）指出，图书馆中的文献分类是文献组织而非知识组织，知识组织是对文献中所包含的知识内容进行分析，找到相互影响及联系的结点，像地图一样把它们标出来，展示知识的有机结构及内在联系，为人们直接提供所需的知识服务。知识组织可通过建立“认知地图”得以实现。而印度情报学家塞恩（S. K. Sen）根据英国学者道金斯（R. Dawkins）“思想基因”的观点，提出知识组织可依“思想基因进化图谱”进行，即从文献中找出“思想基因串”编制出新的概念索引供人利用^①。1996年，美国情报学家德本斯（A. Debons）说：“知识组织将是下一世纪人们面临着的主要挑战。我们这里所谈及的知识组织概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分类技术，而是指更高水平上的知识组织。”^②

我国有关知识组织的学术讨论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如1989~1990年马费成、胡昌平、刘植惠等撰文探讨了知识组织、知识揭示与知识基因的方法，丰成君则称知识组织是图书情报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③。90年代初，青年学者刘洪波针对“知识交流说”的不足指出，知识交流理论对图书馆活动的外部关系给予了

① 马费成. 知识组织系统的演进与评价. 知识工程, 1989 (2): 39~43

② [美] A. 德本斯. 情报学的主要发展趋势: 在'96 ISIRSD上所作的学术报告. 图书情报知识, 1996 (4): 22~23, 26

③ 马费成、胡昌平、刘植惠、丰成君诸先生文章刊载于《知识工程》杂志1989 (2)、1990 (3)、1990 (4)、1989 (3) 四期。

有力说明,但未能揭示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和机理,图书馆内部活动的实质是知识组织。知识组织理论是知识交流理论的补充^①。90年代末期,有关知识组织的文章再度多了起来,如王知津撰文说,如何将无序的知识组织起来供人们使用,这是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②。知识组织不仅是对文献的组织,也包括对文献中“知识”的组织,即将客观知识世界中的最小知识单元、知识因子组织成一个有序的体系。知识组织的任务不仅包括应付大量的知识,还包括控制知识的增长^③。而蒋永福则撰文称,图书馆是对客观知识进行专门组织和控制的社会组织,我们应从知识组织的角度理解图书馆学^④。

“知识组织说”的提出,顺应了网络时代知识管理的需求。它成长于以往图书情报理论之中,文献分类理论、情报组织理论、知识交流理论是其三大来源。“知识组织说”从宏观上揭示出了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准确说明了图书馆的社会作用,成为转移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重要推力。“知识组织说”在肯定了传统图书馆学以文献单元为基础的知识组织方法的同时,还探讨了以知识内容为基础进行逻辑分析的知识组织方法(如“认知地图”的建立),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纵深发展的广阔空间。当然,“知识组织说”目前在研究上还缺乏系统性,尚待进一步的整合与深化。

第二节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

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从其研究客体的活动中概括、抽象出来

① 刘洪波. 知识组织论: 关于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一种说明. 图书馆, 1991 (2): 13~18, 48

② 王知津. 知识组织的研究范围及发展策略.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8 (4): 3~8

③ 王知津. 知识组织的目标与任务. 情报理论与实践, 1999 (2): 65~68

④ 蒋永福. 图书馆与知识组织: 从知识组织角度理解图书馆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9 (5): 19~23

的。虽然对人们生活有影响的一切客观实在，哪怕轻微的影响、细微的事物，如一条蚯蚓、一片树叶都可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但科学却不能只停留在客体的表象活动之上。图书馆学也是如此，它应从一堆事实、现象、技术、方法中，抽象、概括出研究客体的本质和规律，以此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活动就是科学工作者与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了科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就会准确地规范出本学科的研究内容，提炼出本学科的科学定义。

一、以往研究对象认识的范式特征

恩格斯说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①从总的发展历程看，以往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从经验直觉到理论抽象、从封闭研究到开放考察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整理总和说”流行于19世纪上半叶，它是以图书为研究客体而建立起来的学问 (the science of books)，虽然“整理总和说”首次提出了“图书馆学”的概念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但它与当时西方的著述史 (literary history, 英语)、目录学 (bibliographi, 拉丁语)、书志学 (bücherkunde, 德语) 等研究内容并无多大差别。“整理总和说”试图对著述史、目录学、书志学等进行整合，形成“图书馆学” (bibliothekswissenschaft, 德语)，不过从其研究范式上看，它依然是有关“图书整理”的，我们可以简称之为“书皮图书馆学”。因为在“整理总和说”的影响下，图书馆工作对图书形式特征的重视往往高于对图书内容特征的重视，许多图书馆员对自己有丰富的图书知识而引以为豪。1914年，美国图书馆学家毕晓普 (W. W. Bishop, 1871~1955) 在一所图书馆学校发表过一次讲话，他以生动的实例阐明图书馆员熟记图书的重要性，他对约翰·

^①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37~338

克里纳图书馆助理馆员霍普金斯能记住馆藏首批 60 万册书的每个书名而赞不绝口。后来毕晓普出版他的短论集时，就名之为《书皮学》(The Backs of Books)^①。

“图书馆管理说”将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从图书整理转移到了图书馆管理，这是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一次重要转换，顺应了各国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趋势。但在这种新的学术范式影响下，图书馆学充斥进来了大量低层次的内容，如打字法、书写法、印刷术、装订术、修补法、登记法、陈列法、出纳法、统计法、参观法等。许多图书馆学管理类、通论类教材或著作，甚至将书袋卡的制作、书目卡片与目录柜的大小、书架的高低、阅览桌椅的尺寸和布置等，一一叙及，配图说明，它们力图使学习者在最短的时间里全面掌握图书馆管理的一般方法，规范从事。因此，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我们可简称之为“尺寸图书馆学”。当然，图书馆学中原有知识含量较为专深的分支，如目录学、分类学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也越来越精密、复杂，但它们亦厕身于上述方法之中，使图书馆学内容一时良莠混杂。人们对图书馆学是否为一门科学的质疑与此种范式的存在与扩张有着直接的联系。

“图书馆事业说”将图书馆置身于社会环境中，更多观照的是图书馆事业的宏观发展、图书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它阐明了社会需求是图书馆发展动力这一命题，但它却把图书馆学限定在“图书馆”这一客体之上，如图书馆的性质、图书馆的职能、图书馆类型、图书馆网络、图书馆藏书、图书馆目录、图书馆读者服务、图书馆管理、图书馆现代技术、图书馆的未来等，举凡有关“图书馆的……”才能构成图书馆学的内容。甚至隶属于图书馆学的众多分支学科也必须是“图书馆的……”，如图书馆管理学、图书馆统计学、图书馆建筑学、图书馆美学等。此种思维范式，不但没能解决本学科学术层次过低的问题，而且忽视了文献、知识、信

^① 袁咏秋，李家乔主编.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85

息、情报、阅读等涉及图书馆命脉的一些基本命题。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我们可简称之为“机构图书馆学”。

从“整理总和说”到“图书馆事业说”，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未能揭示出图书馆的实质。就像各种各样的灯，虽然可找到一个抽象词汇“灯”涵盖一切个体的灯，但它并未揭示出灯的本质。灯的本质是“照明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知识交流说”、“信息资源说”、“知识组织说”，克服了以往研究对象的认识局限，从不同角度努力探究图书馆的本质，因此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我们可简称之为“本质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正是经过这些观念的突进与洗礼，才进入了与世界图书馆学同步发展的水平。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从“知识交流说”到“知识组织说”，它们同样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如“信息资源说”将图书馆看成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并以之为研究对象，其不足之处是“信息资源”的概念太泛，且有以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取代图书馆学或消解其个性的倾向。“知识交流说”虽然揭示出了图书馆与社会的本质联系，但却未能很好地解释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根本机制。“知识组织说”作为“知识交流说”的补充，无疑克服了这一缺陷，但其刻画的是图书馆内部活动过程的本质，忽略了知识受众，其哲学特征是“方法”而非“本体”上的，不是以某种“社会现象”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而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往往是由一种有“本体”意义的“社会现象”来充任的^{①~②}。

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

知识集合是指用科学方法把客观知识元素有序组织起来，形成

① 王子舟. 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艰难重建：纪念《图书馆学基础》出版20周年. 图书馆, 2001 (3): 1~6, 20

② 王子舟. 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艰难重建(续)：纪念《图书馆学基础》出版20周年. 图书馆, 2001 (4): 1~7

提供知识服务的人工集合。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层涵义：知识集合是由客观知识元素汇聚而成的，这些知识元素的汇聚组织依据了一定的科学方法；知识集合一经形成便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它在客观知识世界中有独立存在形态；知识集合的目的是保存、传播知识，为人提供知识服务。根据知识集合的定义，我们可以说图书馆就是知识集合。不过，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具有知识集合性质的却不仅仅是图书馆，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知识集合，如百科全书、字典词典、书目索引、知识库、数字图书馆等，它们也都具有知识集合这一实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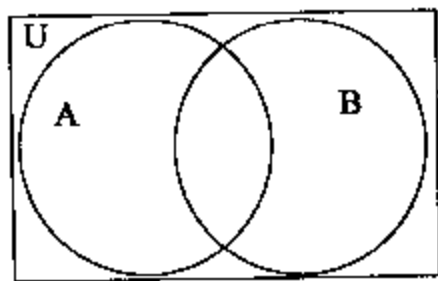
以传统图书馆这种知识集合为例，我们会看到它的知识元素是文献。而文献只是知识的一种载体。客观知识的载体有多种多样，陶器、建筑、机器等都凝聚了一定的客观知识内容，但这些载体的主要用途并非储存、传播知识，只有文献是专用于储存、传播知识的人工载体。当我们把每一个单元文献视为一个知识元素时，根据集合论原理，如果用 U 代表社会全部文献（即整个客观知识世界），用每个自然数代表单元文献（即知识元素），那么社会全部文献的集合可表达为：

$$U = \{1, 2, 3, 4, \dots, n, \dots\}$$

如果把社会全部文献视为全集，仍用 U 来表示，那么贮存在图书馆中的所有文献就是这个全集的一个子集（用 A 表示），分布在图书馆以外的零散文献也是这个全集的一个子集（用 B 表示）。以文氏（Venn）图表达则为（图 4-1）：

$U = A \cup B$ ， $A \cup B$ 表示集合 A 与集合 B 是一个并集。

如果用 X 表示一个单元文献，那



么：

$$X \in A \cup B \Leftrightarrow X \in A \text{ or } X \in B$$

两圆交合部分表明图书馆馆藏文献与社会零散文献存在重复等同，如图书馆馆藏有《飘》这部小说，社会零散文献中也有《飘》。两图不交合部分，表明

图 4-1 社会文献分布文氏图

有些文献仅属图书馆藏书，而有些文献只存在于社会之中。

为什么说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我们可以找出以下理由：

其一，人类获取知识主要来自客观知识世界。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进行知识积累，即每一代人能学习、吸收前辈的知识、技能，并且发展这些知识、技能。而动物则不然，每一代都必须从头开始。因此，人类随知识呈几何级的发展，最终进入了文明社会，走出并远离了动物家庭。这表明，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尤其是文字发明以后，人的主观知识通过文字记载可以实现脑外储存，用图书来延展自身的大脑功能，这样就加速了客观知识的增长。人类的知识积累也主要通过主观知识的客观化来实现，这时，人类学习、吸收知识的方式已发生了变化。知识来自于实践，这是过去人们熟知的观念。其实，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的知识更多的是来自客观知识世界。因为从客观知识世界中获取知识，主体可以脱离具体客体的束缚，能在较短单位时间里，从客观知识世界获得别人历经数十年艰辛劳动所取得的知识成果，提高认识效率。此外，主体一旦脱离具体客体的束缚，在认识范围上可超越时空，得知古往今来、天下四方的大事。正因为有了客观知识，人才无须事必躬亲。

其二，知识集合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主要媒介。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知识增长的一生。前面已经讲过，在通常情况下，人获取知识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种方式：被动接受知识（为了继承前人的知识成就）与主动寻求知识（为了在前人基础上创新）。在被动接受知识方式中，长辈教导、学校教育是主要形式，客观知识主要通过教育形式使受教育者得到吮吸。而在主动寻求知识方式中，人是自主的，对某类或某种客观知识的搜集、研究，完全出于主体自主的选择，采集、阅读成了获取知识的主要形式。但是，人们主动寻求知识时，面对无序的多如恒河沙砾的客观知识的世界，往往手足无措，惟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知识集合寻找自己迫切需要的知识内容。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极欲知道一个概念的准确涵义，而这个世界上

又无一本可供查考的辞典，那么沮丧会油然而生。因此，知识集合是我们获取专指性知识必不可少的工具。另外，人类至今累积起来的客观知识，目前也主要存在于图书馆这样专门保存与传播知识的社会机构之中。因为，人类懂得，只有将累积起来的庞大知识堆积有序化，形成一个良好的集合，它们才能供自己有效地使用。那些知识集合的创造人，如图书馆馆员、工具书编纂家、数据库建库者等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此时起了知识向导的作用，历史选择他们成为社会舞台上崇高角色的扮演者。

需要指出的是，图书馆学以知识集合为研究对象，并不是说图书馆学仅仅研究知识集合，它还要研究客观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和知识受众。因为我们要研究知识集合，那么首先要对形成知识集合的知识元素进行研究与分析。知识元素存于客观知识世界之中，客观知识具有怎样的性质？客观知识如何形成单元知识？单元知识如何选择与组织？这些问题都要经过深入研究。在当代图书馆学认识中，客观知识应该成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集合是由客观知识组成的供人获取知识的“中介”；知识受众是知识集合发生作用的终极归宿。没有知识受众，知识集合便毫无意义。传统图书馆学将“读者”仅视为图书馆中的一个组成要素，而非独立其外的一个终极服务实体的存在，这是十分错误的。因此，图书馆学应以其本质命题（知识集合）为中心展开自己的研究，建立“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这样一个研究范畴体系。其中知识集合起着连接客观知识与知识受众的“力”的支点作用。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图书馆学定义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如何将知识组成知识集合并为人们所使用的一门社会科学”。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是“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与研究客体是有区别的。研究对象是一门科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而研究客体则是与这种现象发生本质联系的一个现象系统。就一门学科来说，其研究客体包含了研究对象，并以其为客体系统的核心。

三、“知识集合说”对图书馆学将会产生的影响

1. 有助于厘清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

知识集合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图书馆学确定了知识集合为其研究对象，有助于与其他学科有所区别。许多学科都涉及知识的问题，如个体知识是如何发展扩大的，这是哲学、心理学研究的主题。而知识是怎样作为一个总体，怎样被安排、协调，使之成为一个集合并加以利用的，这是未被其他学科认识的研究领域。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的产生以及社会后果等，而图书馆学研究知识集合（知识的组织与有效提供），显然二者也是有区别的。教育学与图书馆学虽然都研究如何向人们传递客观知识，但教育学是通过“传道授业”，而图书馆学却是通过“知识集合”。至于图书馆学的一些同族学科，文献学研究单元文献知识或宏观文献知识状态，也不研究知识集合。情报学、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知识，还涉及了情报、档案等众多特殊信息问题，它们与图书馆学也是有差别的。如果图书馆学将研究对象确定为“知识交流”，或“信息资源体系”，或“知识组织”，那么有时就会发生学科间难以互相区分的问题。如大众传播也是知识交流，企业信息系统也是信息资源体系，教学人员编写教材也是知识组织，图书馆学因此会难以定位。

2. 有助于拓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

以往图书馆学范式的僵化之处在于把研究思维囿于“图书馆”这个圈子之中，以为只有“图书馆的……”才具有图书馆学意义，至于什么百科全书、丛书、类书、书目、索引、辞典、知识库等，只不过是图书馆的下位的、低位的事物。而知识集合理论认为，图书馆作为知识集合，只不过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即原生态知识集合），那些大量的再生态知识集合，也都对人们索取知识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将它们提升到与图书馆同一学术层面来研究，这样就可以改变图书馆学以往过于简单、狭小的“平而结构”，无形中拓展了图书馆学的研究空间。此外，任何一种知识集合都与知识受众是有界而关系的，如何使界面友好，如何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开发知识受众的潜能，也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另一巨大空间。

3. 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学术地位

以往图书馆学因为仅研究“图书馆”，画地为牢，也就成为了图书馆学专业教师及图书馆员的“独享学问”，与社会人群没太大关系。这样的学问对不进图书馆的人来说毫无用处。就是与图书馆打交道的读者，也大可不必知晓图书馆的性质、职能、类型，等等，才可以得到图书馆的服务。远离人们切身生活的学问，当然会受到社会的冷落。但是知识集合理论认为，不管人们是否有所意识，其实他都在经常与知识集合打交道。一个人有可能不去图书馆，但他在家庭或工作单位也会常常使用辞典、书目、数据库等各类知识集合。图书馆学应该借鉴医学为社会服务的模式，医学是通过药物等手段医治人的生理疾病的，图书馆学则是通过提供知识医治人的知识疾病的。图书馆学朝这样的思路发展，必然会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4. 有助于纯化图书馆学内容

以往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中，存在大量低层次、非科学的内容，仿佛与图书馆有关的事项都属于图书馆学。有人甚至以为其他学科或方法在图书馆中的运用，就可构成图书馆学内容，如图书馆建筑学、图书馆美学、图书馆环境学、图书馆统计学等。其实这些皆非图书馆学。图书馆的本质是知识集合，尽管支持这个集合成为现实，还需各种条件，诸如人、财、物、馆舍等，但这些条件与知识集合有一定的疏离，是可以划界的。如果不是研究知识集合的问题，单纯以“条件”为研究内容，那将是毫无意义的。仍以医学为例，医院与医学可谓联系相当紧密，但研究医院，医院的建筑、环境、美感、工作统计、财务会计、人事管理等，这些皆非医学，它们属于各自原有的学科。同理，图书馆的建筑、统计也各属于其原有的建筑学、统计学，它们并不属于图书馆学。

总之，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对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认识，每一次认识的深化都对图书馆学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因此，选择出比较合

理的研究对象，将有助于克服当代图书馆学发展中的种种弊端，有助于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

关 键 词

研究对象 整理总和说 图书馆管理说 图书馆事业说 《什么是图书馆学》 知识交流说 信息资源说 知识组织说 知识集合 图书馆学定义

小 结

1. 研究对象问题是图书馆学最根本的元问题。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经历了近两百年，主要观点有“整理总和说”、“图书馆管理说”、“图书馆事业说”、“知识交流说”、“信息资源说”、“知识组织说”等。

2. 有关研究对象的各种认识，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前期认识尚停留在经验、表层的描述阶段，后期认识则提高到了本质抽象阶段。其总过程的范式特征是：书皮图书馆学→尺寸图书馆学→机构图书馆学→本质图书馆学。

3.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应转向知识集合。知识集合是指用科学方法把客观知识元素有序组织起来，形成提供知识服务的人工集合。研究对象转向知识集合的理由在于：人类获取知识主要来自客观知识世界，知识集合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主要媒介。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如何将知识组成知识集合并为人们所使用的一门社会科学。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是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4. “知识集合说”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是：有助于厘清图书馆学研究范畴，有助于拓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学术地位，有助于纯化图书馆学内容。

思 考 题

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经历了哪些阶段?
2. 不同时期研究对象的认识具有怎样的范式特征?
3. 知识集合的定义包括哪几层涵义?
4. 为什么说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应转向知识集合?
5. “知识集合说”对图书馆学研究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第五章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不仅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还应有严密、科学的内容体系。通常，一门科学的内容体系是由其所属的各门类及各分支学科构成的，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整体。图书馆学内容体系，指的是在图书馆学这个一级学科名称下，由其所属门类及各个分支学科构成的一个整体。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确定，不仅使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得以进一步细化，更加明确了本学科的研究范畴，同时也预设出了自身的未来研究方向。有了科学的内容体系，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才能加快自己的发展速度。

第一节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形成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形成最早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实施图书馆学教育时对课程的安排，二是人们开展图书馆学研究时对图书馆工作内容的解析。

早期图书馆学教育中，教学课程的安排是依图书馆工作需要程度而拟设的。这些课程的排列，实质上就是最初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萌芽。1886年齐亚茨科在德国格丁根大学开设图书馆学讲座，1887年杜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图书馆学校，当时它们都有自己的课程安排计划。如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校的课程设置编

目 (cataloging)、分类 (classification)、目录学 (bibliography)、图书馆经营 (library economy) 等几门基本科目, 此外还有专题讲演 (advice from leading librarians), 即资深馆员为学生举行的专题讲解。1919 年, 美国有 15 所图书馆学校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经过调查, 其中 11 所学校有 5 门课程平均授课时间在 30 小时以上: 编目 (60 小时)、图书选择 (50 小时)、参考工作 (48 小时)、分类 (34 小时)、图书馆行政 (32 小时)。其余不到 20 小时的课程有: 儿童服务工作、时事、官书、主题标目、专科书目、图书馆史、小说、借阅系统、商业书目、装订与修补等^①。这些图书馆学课程安排虽然没有严密的体系, 但学时多的课程显然具有核心课程的性质, 而其余可称为选修课, 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程度。如果将这些课程依其重要性给予排列, 就构成了当时图书馆学的一个内容体系表。

除了图书馆学课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以外, 有些图书馆学专著对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也进行了探讨。这些学术专著追求学科的科学性、实用性, 在建构本学科内容体系时, 一方面注重体系的合理、完整, 另一方面直接从图书馆工作中抽取某些知识、技能纳入体系之中。如 1923 年, 我国图书馆学者杨昭愬在其《图书馆学》一书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内容体系 (见下页图 5-1)^②。

此内容体系 (杨氏当时称“研究范围”) 的划分虽然参考了国外图书馆学课程体系的设置, 但与课程体系有所不同, 它不仅考虑到了图书馆学的系统性、科学性, 如将图书馆学分为原理原则部分 (即“纯正的”) 和图书馆实施的方法部分 (即“应用的”), 而且还考虑到了当时图书馆的实际工作, 如含有大量图书馆工作的细节。显然, 杨氏的内容体系要比图书馆学课程体系更为周密。

① 胡述兆, 吴祖善. 图书馆学导论. 台北: 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1989: 15~19

② 杨昭愬. 图书馆学.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3: 1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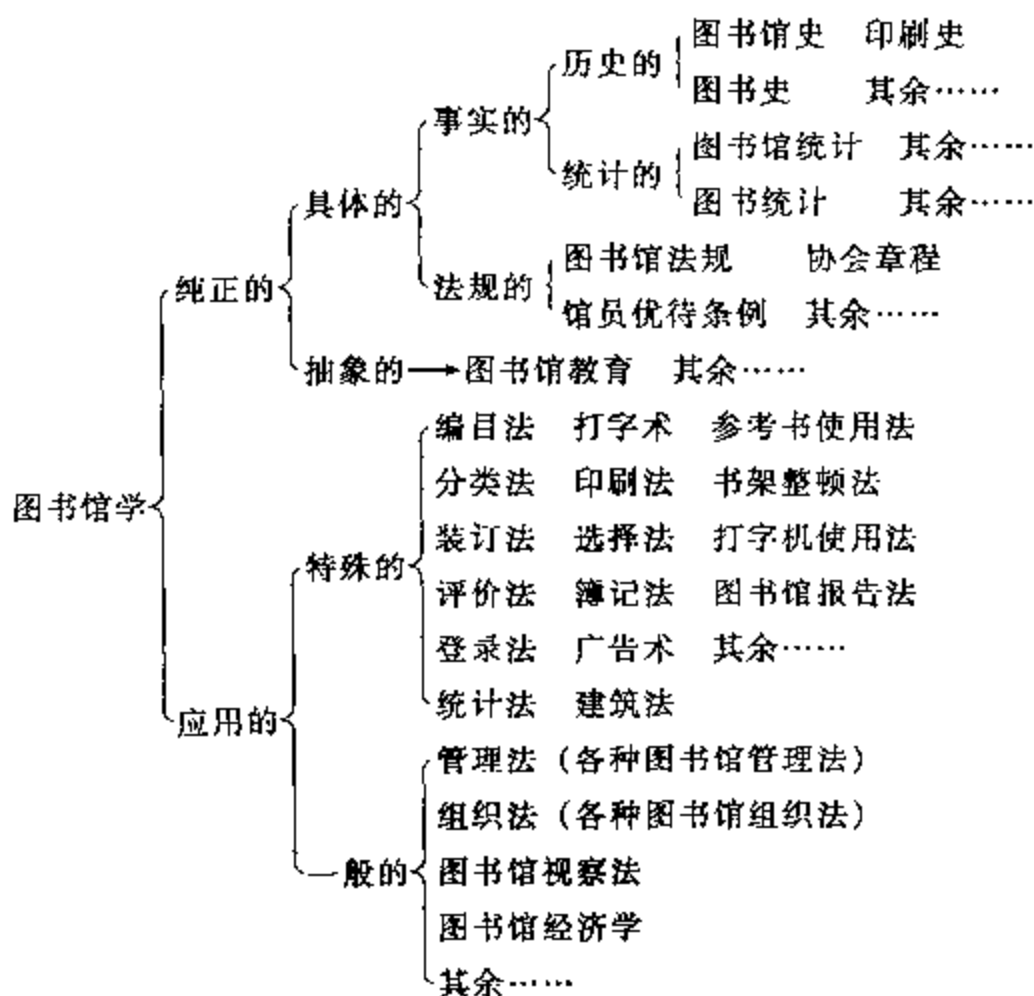


图 5-1 杨昭愬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

第二节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演变

一、20 世纪上半叶的内容体系

20 世纪上半叶，众多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作出了有益的探讨。除杨昭愬先生以外，我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在其《图书馆通论》（1925 年）一书中也对图书馆学之范围作了如下划分（见下页图 5-2）^①。

^① 杜定友. 图书馆通论.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5: 4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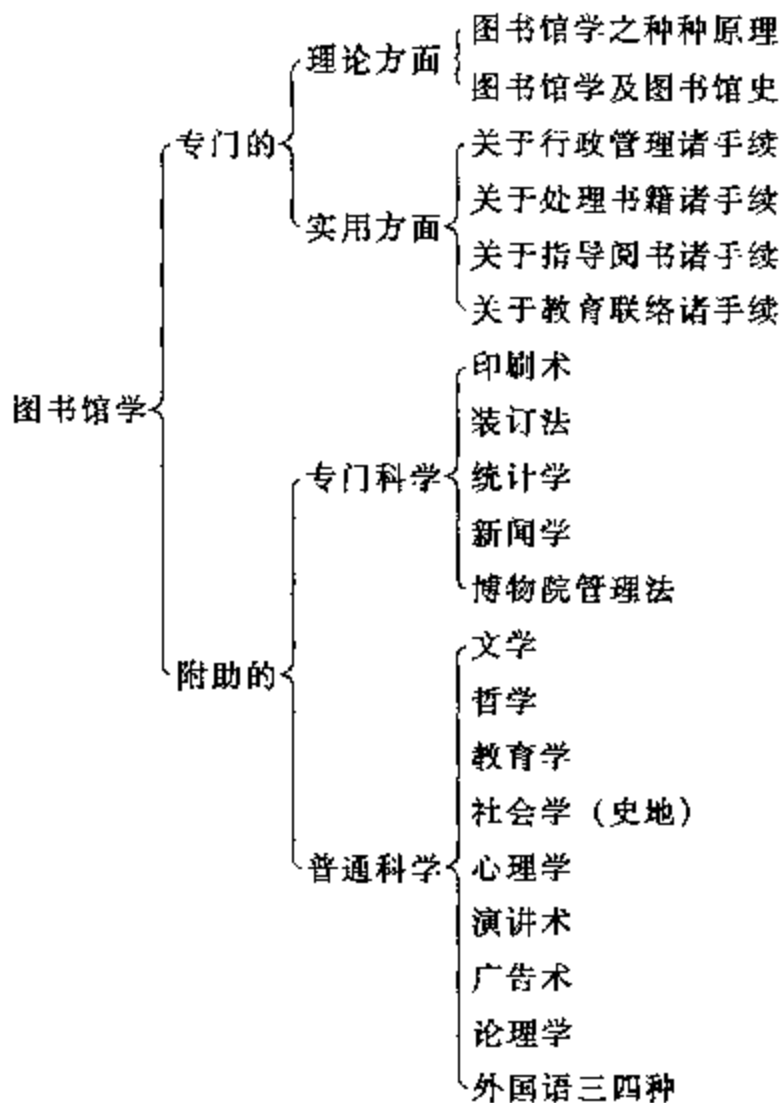


图 5-2 杜定友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

杜氏体系有两大特点：其一，吸收了国内外图书馆学的合理观点，明确提出“理论”与“实用”两部分是“图书馆学之专门学识”。杜定友说过：“凡是成为专门的学科，至少要有两个根本的条件：第一是原理，第二是应用；而应用是根据于原理而来的。”^①其二，将“与图书馆学有连带关系之学识”作为图书馆学的附助学科予以提示，表明图书馆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与其他科学知识有着能量交换关系。该体系尽管有移植西方理论的痕迹，但已突显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

^① 杜定友. 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 教育杂志, 1926 (9): 1~15

1931年，德国图书馆学家柯其纳（Joachim Kirchner）曾将图书馆学也分为理论与实用的两大块。其内容体系的划分如下（见图5-3）^①：



图 5-3 柯其纳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

可以看出，柯氏的体系也采用了图书馆学理论与实用两分法，但其“理论”部分主要以历史的内容为主，忽略了图书馆学原理的内容。整个体系中各科目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也颇散乱。

20世纪30年代，我国还有两位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划分较有影响，一是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一是文华图专的李景新先生。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出于其所著《图书馆

^① 台湾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 图书馆学.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59

学要旨》(1934年)一书之中(见图5-4)^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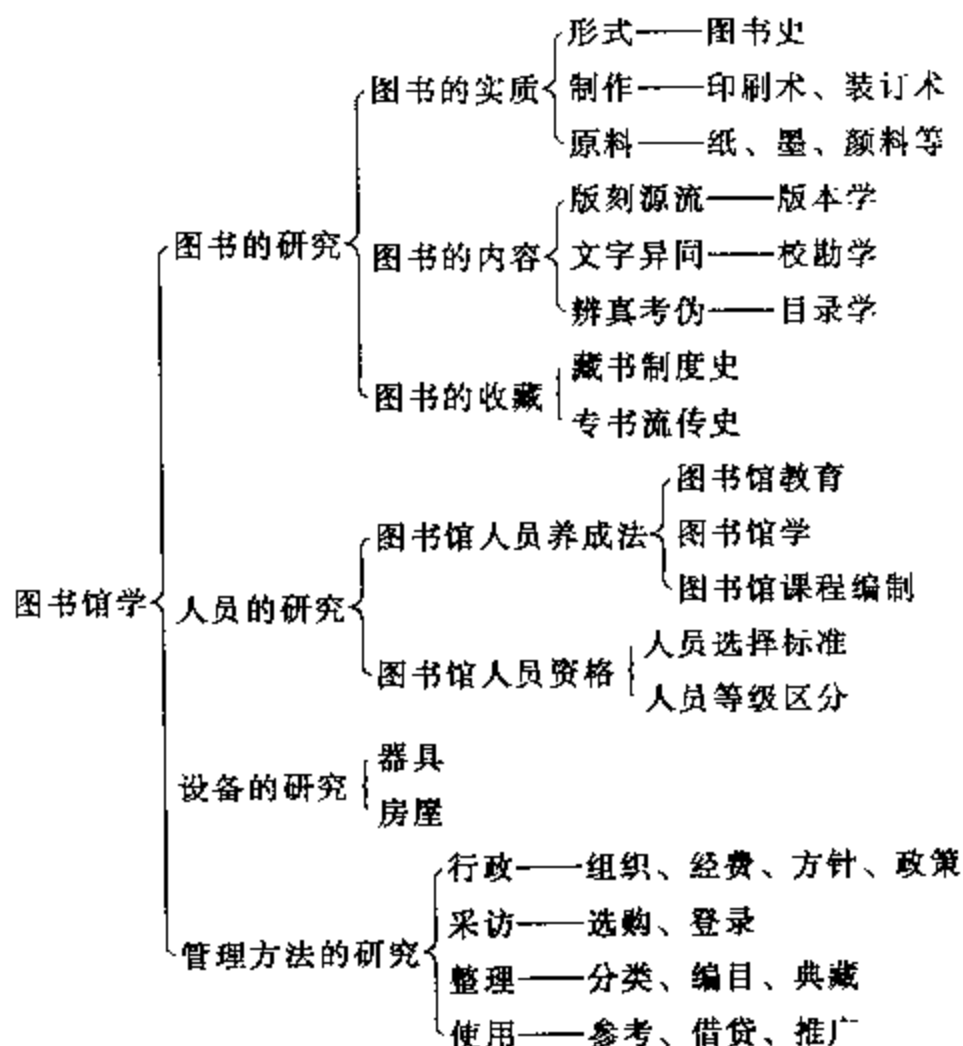


图 5-4 刘国钧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

李景新先生的内容体系刊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5年第2期)之上(见图5-5)^②。

刘氏体系着眼于“图书馆学的分科”，即试图通过对图书馆构成要素的解析、挖掘，建立起属于图书馆学的各种专门学问，从而拓深图书馆学的研究空间。该体系虽未突出“理论”的重要性，但

^① 刘国钧. 图书馆学要旨. 上海: 中华书局, 1934: 11~14

^② 李景新. 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1935 (2): 263~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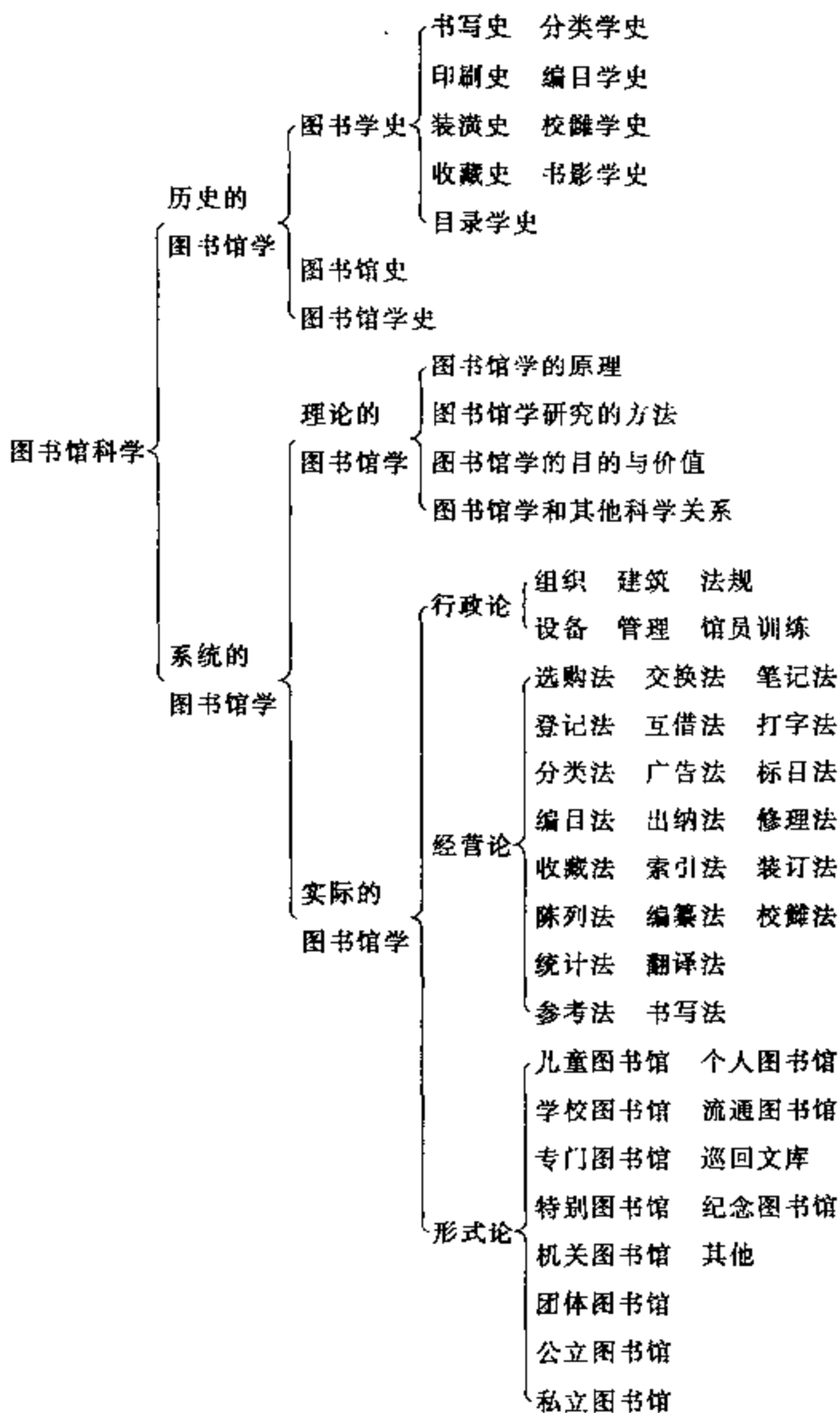


图 5-5 李景新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

也不失为当时独具慧眼以及逻辑缜密的一种内容体系。李氏体系的特点在于突出了“史”的地位，表现出中国思想文化中史的传统。此外，“形式论”的列出，将各类型图书馆研究的必要性也表达出来了。不足之处是，“史”本身是一种理论形态，它应与图书馆学理论合二为一。

二、20 世纪下半叶的内容体系

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科学文献的飞速增长、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导致图书馆学研究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迫使人们对图书馆学内容体系进行了重新审视。最先反映这些新变化的是图书馆学课程的安排。例如，1970 年时，美国的众多图书馆学专业本科课程，均已开设了有关计算机的教学内容。至 197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做出了一个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核心课程表，其中，图书馆学的核心课程为（见下页图 5-6）^①。

这一课程体系的安排在欧美国家都有广泛的影响。日本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委员会在 1977 年拟定新的《图书馆学教育标准》时，干脆将情报学这门依托计算机技术的新学科与图书馆学捆绑在一起，整合成一个新的学科“图书馆·情报学”并且借鉴了以往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将“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教育科目划分成四大部分（见第 104 页图 5-7）^②。

可以看出，从这一时期开始，图书馆学课程体系的安排、建设，不仅力求反映时代发展需求，同时其结构、体系也已开始借

① [英] P. 哈瓦德·威廉士著；周钰萍译。英国今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学习研究。见：全国高校图工委。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育参考资料。1983：144～158

② [日] 泽本孝久著；宋德生译。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委员会关于审议图书馆·情报学教育标准的报告。见：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日本图书馆研究文集。1985：182～189

鉴、参考各种学术著作中内容体系的逻辑划分方法。二者出现合流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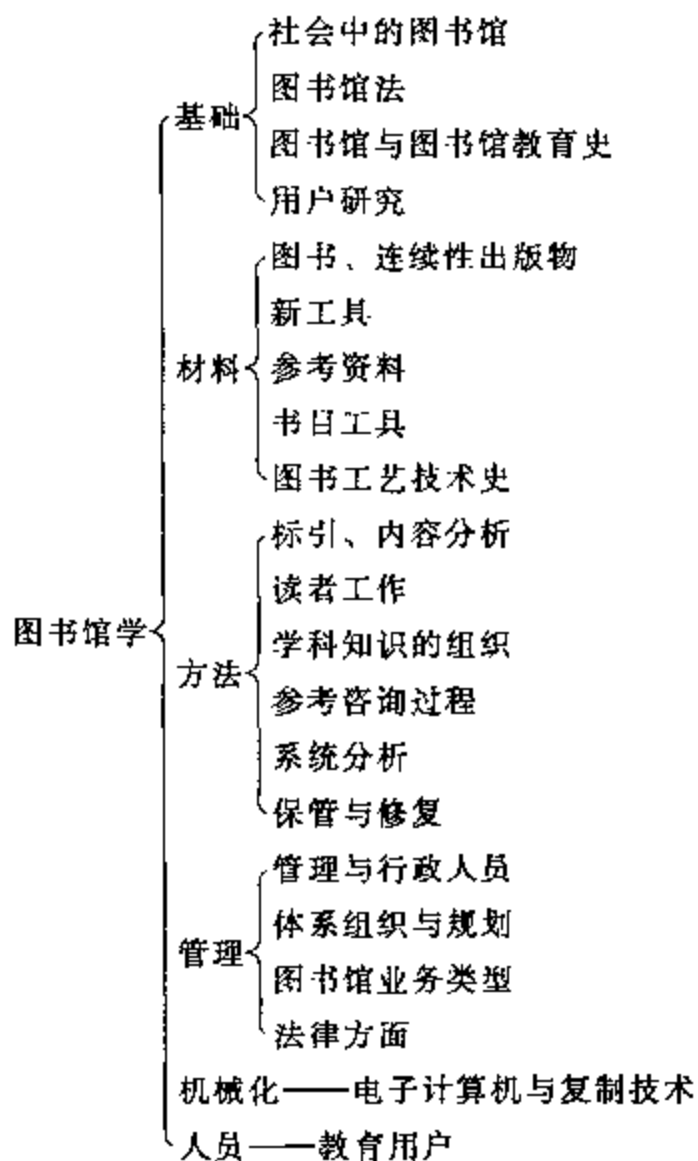


图 5-6 联合国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

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由于社会环境屡遭劫难，在 20 世纪 40~70 年代一直处于停顿或挣扎状况。70 年代末期才得到了全面复苏。1983 年周文骏发表《概论图书馆学》一文，根据当时国内外研究情况，提出了一个三分的内容体系（见下页图 5-8）^①。

^① 周文骏. 概论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研究, 1983 (3): 1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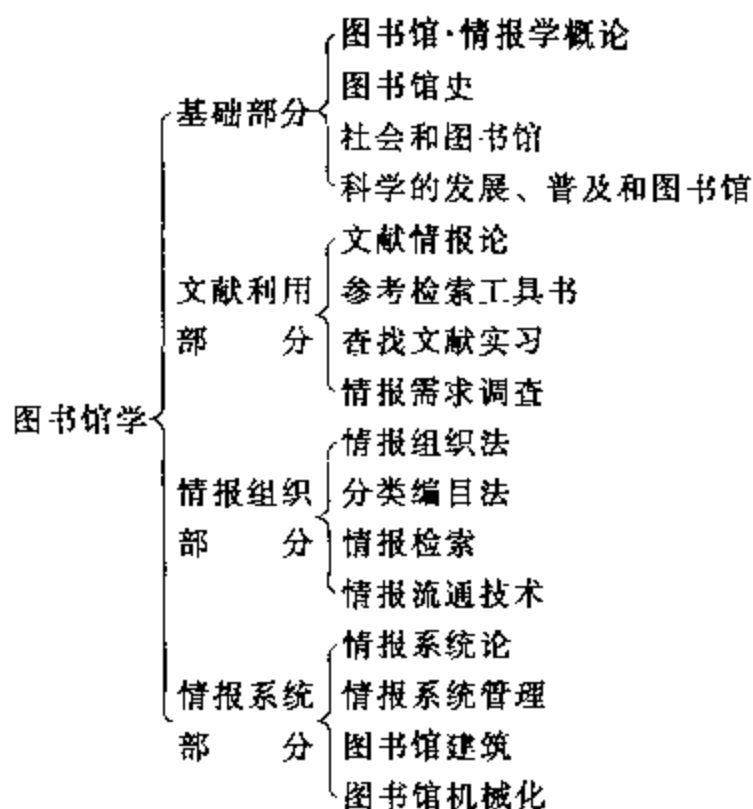


图 5-7 日本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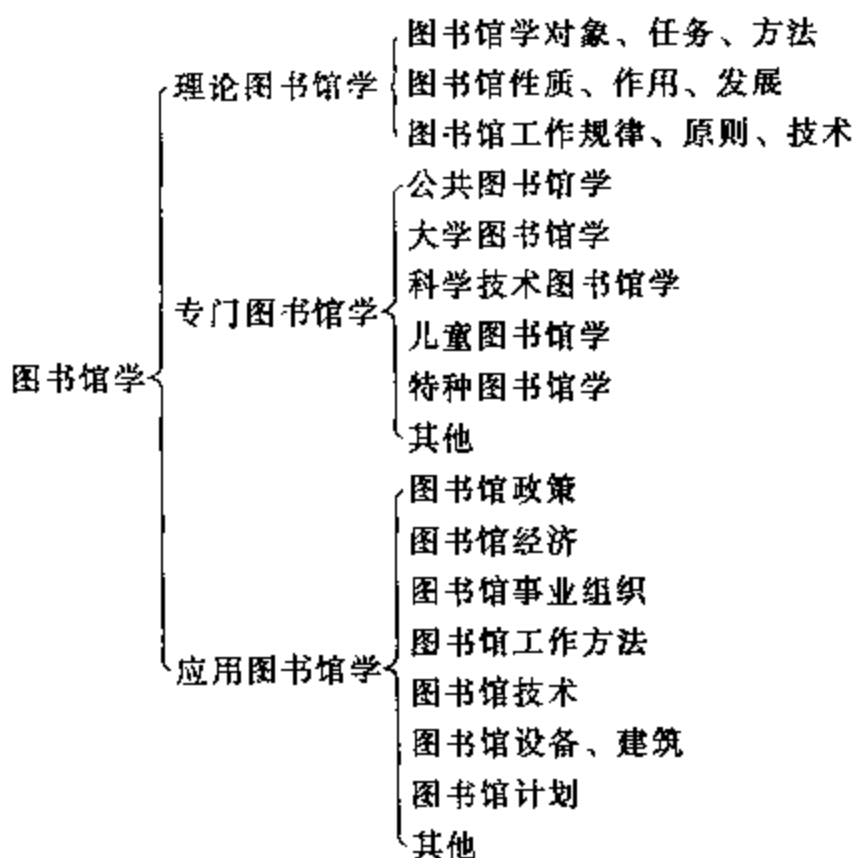


图 5-8 周文骏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

周氏所谓的“理论图书馆学”指的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他认为它不仅对图书馆学各分支提供基本理论的指导，还可向外与哲学等发生联系，起到联系图书馆学与其他科学的桥梁作用。因此，应该给予高扬与重视。但该体系对于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中应用将会带来的变化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同时“专门图书馆学”的设置有些牵强。因为任何一门“专门图书馆学”都属于图书馆学理论、应用两个范畴的适用领域，它与理论、应用两个子集的关系不是并集而是交集，故不宜以“同位类”地位单独列出。

周氏体系问世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对于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探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以后人们提出的一些新的体系结构，或多或少受到了该体系的影响。如1985年吴慰慈、邵巍编著的电大教材《图书馆学概论》，提出了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比较图书馆学四分体系，其“普通图书馆学”与周氏的“理论图书馆学”涵义相当，只不过又比周氏体系多了一个“比较图书馆学”^①。1986年，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主编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将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分为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两部分。理论图书馆学中包含了“比较图书馆学”与“专门图书馆学”^②。1988年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也提出了一个三分的体系结构：理论图书馆学、技术图书馆学（与周氏体系的“应用图书馆学”类似）、应用图书馆学（与周氏“专门图书馆学”相同）^③。1991年，由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两校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修订本）则直接延用了周氏体系^④。1992年，郭星寿《现代图书馆学教程》中的内容体系虽然也是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的二

① 吴慰慈，邵巍. 图书馆学概论.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15

②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主编. 理论图书馆学教程.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82

③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31~39

④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 图书馆学基础（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9~12

分,但应用图书馆学包含了“部门图书馆学”(与周氏体系的“应用图书馆学”类似)和“专门图书馆学”^①。从后来者纷纷“仿周”、“改周”的现象看,周文骏先生提出的三分体系,基本上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一般认识水平。

第三节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构建原则

通过对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形成、演变的探讨与分析,我们可看到人们对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学科体系的朦胧意识期、自觉认识期和深入研究期三个阶段。在深入研究期,许多学者不但认识到了内容体系科学构建的重要意义,而且还提出了诸多有益的学术观点。如黄宗忠先生认为图书馆学知识元素是形成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前提;内容体系是一种具有隶属、层次关系的纵向结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划分应遵循“门类→分支学科→低层次学科→知识元素”方式递进等^②。这些宝贵的思想对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科学构建很有指导意义。

总结以往人们的认识成果,我们认为: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科学构建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合理继承原则

任何一种新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产生,都是历史进化的结果。因此,我们构建新的内容体系时,不能割断以往历史演变的过程,也就是说,要对以往内容体系的合理内涵、因素给予继承与发扬。如以往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大多将图书馆学划分为“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两大门类,这种划分反映出图书馆学有

^① 郭星寿. 现代图书馆学教程. 太原: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2: 56~65

^②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31~39

“学”又有“术”的学科特征。这种学术规定性，强调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应有解释问题、现象的理论层次，还要有解决社会实践具体情况的知识应用层次。另外，我们讲继承性，就是要吸收中国古代藏书活动中形成的那些具有科学性、实用性的学术资源与成果。如形成于上千年历史中的校雠学，其理论与方法在今天图书馆实践中仍具有学术价值、实用价值，新的内容体系应给予充分的反映、体现。

二、科学分类原则

人们对科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一般都经过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模糊到精确、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所以，一门学科内容体系的划分，其分类标准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以图书馆学为例，我们既可使用“理论”与“应用”的两分法来划分门类，也可使用其他分类标准来划分门类，如从学科内容的所属层次出发，可将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分成三个大类：宏观范畴（图书馆学原理、图书馆学史、图书馆学方法论等）、中观范畴（知识采集、知识组织、知识检索等）、微观范畴（文献、读者、图书馆员等）。但是，无论选择怎样的分类标准，首先，所选用的分类标准应适合于本学科的实际情况，其次，在门类或分支的划分上每次划分只能使用一个分类标准。周文骏先生的“三分法”因使用了双重分类标准，导致“专门图书馆学”与“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发生交叉现象，因而出现了逻辑上的紊乱。

三、成熟发展原则

在确定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应包含哪些门类、哪些分支之时，我们既要考察它们是否发展成熟，也要考察它们是否具有未来的发展空间。这样才能使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在具有稳定性的同时也具有开拓性。判断进入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分支学科是否达到了成熟程度，至少可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该分支学科是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独立的概念、范畴、原理、知识体系等；第二，该分支学

科是否有较完善的学术专著、专门的研究者、研究活动（如学术团体）等；第三，该分支学科的思想、方法是否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特有的功能，或被应用、检验等。而判断一些分支学科是否具有未来发展潜力、发展空间，它们能否进入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相对来说，难度要大得多。这需要运用某些预测学的方法，如合理假设、非直线推断、系统分析等。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应具有开放性、开拓性，应对未来发展趋势有所涵盖、预见，但绝不能随意创造新名词来填充。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图书馆学界曾提出一堆图书馆学新学科的名词，但又有多少在20年后真正立住脚了呢？

第四节 当代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

20世纪末年，网络技术和知识经济的浪潮掀起，使每个人都感受到社会正面临着一场巨大变迁。互联网的普及扩大了人类生存需要的虚拟空间，逐步改变着人们生活、工作的方式；知识经济的到来进一步弱化了生产力中物质的要素，强化了知识、智力的要素。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将逐步上升为社会主导产业。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图书馆的发展受时代进步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在图书馆实际工作中，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已经开始大面积普及、渗透；另一方面，区别于传统“实物”形态的“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正在形成、出现。这些新现象正在迫使图书馆学理论开始发生重要转化。在图书馆学理论中，“知识”已经成长为一个核心概念迅速地附着着研究者的注意力，而以往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已经“容纳”不了新变化带来的各种新现象，也无力反映这些新现象。因此，我们只能构建新的内容体系来适应学科发展的需求。

根据上述合理继承、科学分类和成熟发展三个原则并以其为指导，笔者初步提出了一个由两个门类六个分支组成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见图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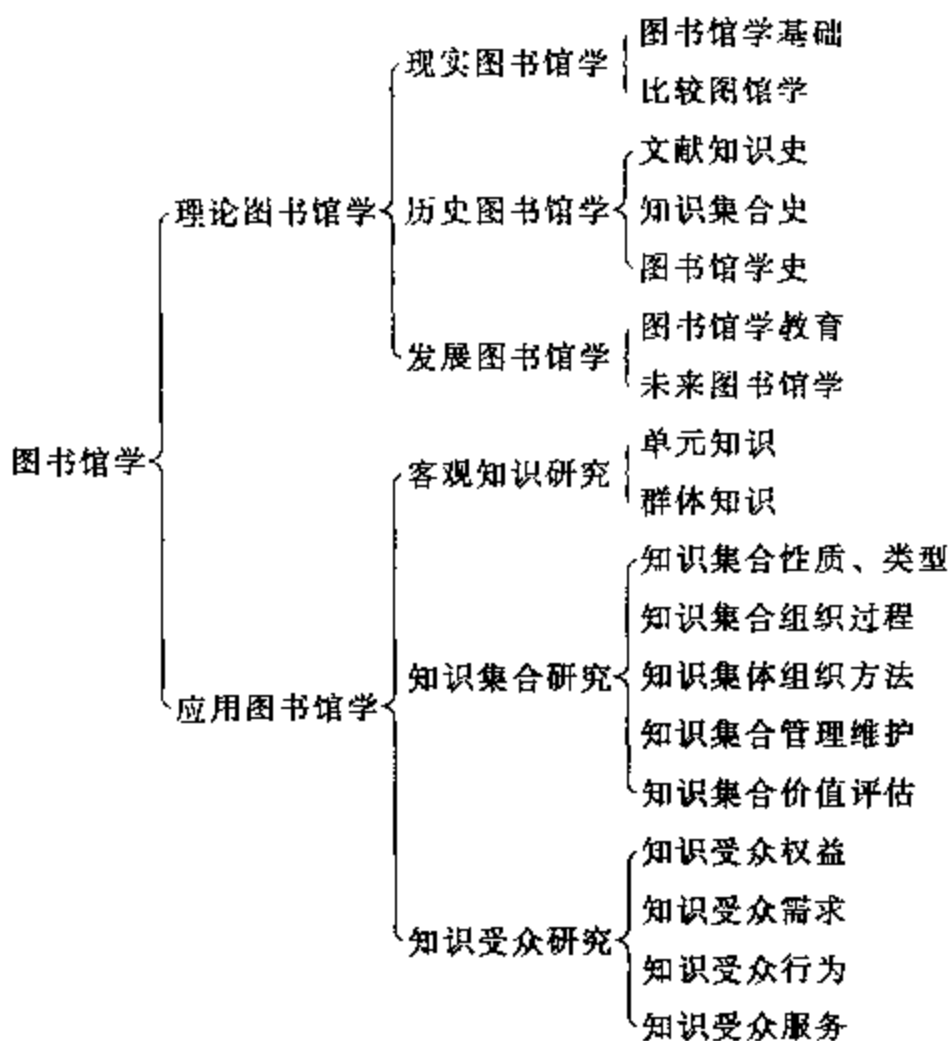


图 5-9 本书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

一、理论图书馆学

理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学一般原理的学科，它为整个图书馆学提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的“思想发动机”。正如 20 世纪初俄国学者阿累尼乌斯所说：“理论是科学知识领域中最最重要的推动力……理论研究可以指出应当把今后的工作引向什么方向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就。”^① 理论图书馆学由三个分支组成：①现

^① 田夫，王兴成. 科学学教程.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33～34

实图书馆学，主要包含图书馆学基础和比较图书馆学两个具体学科。②历史图书馆学，涵盖文献知识史、知识集合史、图书馆学史三部分。“文献知识史”研究文献知识的载体、内容的演化发展，文献知识的传播、交流历史等；“知识集合史”研究各类型藏书机构、数字图书馆及其他知识集合的形成与发展史；“图书馆学史”研究图书馆学的发展史。③发展图书馆学，将图书馆学教育、未来图书馆学作为其两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上述三个分支的划分，是在一个时间轴上截取“过去”、“现在”、“未来”而形成的，只是将“现在”置于了首位。

二、应用图书馆学

应用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学理论指导下，运用图书馆学方法、技术，研究和解决实践问题而形成的重要学科门类。它由三个分支组成：①客观知识研究，主要内容是研究单元知识（知识元素的切割、抽取以及文本知识的校雠、版本、文摘、辨伪、辑佚、评论等）和群体知识（知识的增长、老化、集中、离散、版权、引文分析等）。②知识集合研究，主要内容是研究知识集合的性质、类型（传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各种工具书、网络数据库、资源共享等），组织过程（搜集、整序、贮存、加工、检索），组织方法（采集、分类、主题、编目、索引、文献计量等），管理维护（补充、更新、安全、保护、优化等），价值评估（质量测定与评价）。③知识受众研究，涉及受众者权益、需求、行为、服务等方面。“知识受众”是从传统图书馆学“读者”概念迁移过来的。上述三个分支借鉴了信息科学“信源→信道→信宿”的原理，表达出“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这样一个系统过程，其分类方法也含有“时间轴”意义。

以上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安排力求表达如下思想认识：其一，继承以往内容体系的合理因素，仍将图书馆学划分为理论与实用两大门类，完善理论图书馆学的分支，肯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图书馆学的成绩，高扬理论图书馆学的旗帜。同时，解决好古

代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内容对接的问题，在内容体系中给古代优良学术精华以一席之地（如“单元知识”中含有大量古代文献研究方法），使其有机植入当代图书馆学之中。其二，让内容体系能够包容社会变革带来的一些新变化、新领域。如数字图书馆、网络数据库、网络参考咨询、电子书、知识产权、信息安全等。其三，提升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科学含量，削减原有分支学科中低学术含量的因素。如“专门图书馆学”的取消，因为图书馆学设若分公共、大学、科学、少儿、工会、军事等各类型图书馆学，那么就会不胜其繁。故其所有命题都应涵括在“应用图书馆学”中，不必另列。此外，图书馆统计学、图书馆工艺学、图书馆建筑学等不具备成熟度或本身就不属于图书馆学的所谓学科也不应列在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之中。

总之，图书馆学内容体系本身是一种复杂的逻辑结构。内容体系的建构是否合理，就其所包含的经验判断而言，它要受到有关实践或事实的验证；就其所包含的价值判断而言，它要受到哲学论点的辩难；就其所表达的逻辑判断而言，它要受到内部一致性的检验。假如经不起这几方面的检验，人们就不会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研究活动。

关 键 词

内容体系 课程体系 内容体系构建原则 理论图书馆学 应用图书馆学

小 结

1.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形成，来自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实施图书馆学教育时对课程的安排，一是人们开展图书馆学研究时对图书馆工作内容的解析。

2. 杜定友 1925 年提出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在我国首次明确

提出理论与实用两分。同时，将辅助学科（即相关学科）也列入内容体系，表明图书馆学是一个开放体系。杜定友、刘国钧等人的内容体系显现出中国图书馆学学者的创新意识。

3. 20世纪70年代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新技术因素和情报学内容开始融入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之中。80年代，周文骏先生提出的“三分”体系，代表了当时我国图书馆学界的一般认识水平。

4. 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也要发生变化。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合理继承、科学分类、成熟发展等原则。

5. 当代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应由以往以“图书馆”为中心，转移至以“知识”为中心。本书所述新体系包含两个门类、六个分支，新体系力求继承传统、放眼未来，同时削弱低学术成分，为图书馆学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思 考 题

1.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是怎样形成的？
2. 杨昭愬、杜定友、刘国钧、李景新等人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有何特点？
3.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为什么要发展变化？
4.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哪些原则？

第六章

图书馆学核心内容（一）：客观知识

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智力劳动成果。知识依其载体形态可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两种。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客体之一。既然在知识社会里，知识将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那么，我们就要对客观知识的性质、基本组分形态乃至知识组织的原理、方法等进一步深入认识与探讨。

第一节 客观知识的性质

客观知识一经产生，便具有独立存在的实在性。因此，可以说，“实在性”是客观知识存在的前提，也是客观知识的基本属性之一。但是，除了“实在性”以外，客观知识还具有以下几种基本特征。

一、客观知识的创新性

创新性是一切知识的基本性质之一。任何一种知识生产出来之后，它都会使人对世界认识的未知领域有了一定的缩减，而对世界认识的已知领域得到一定的扩延。人类知识系统大而分之有常识系统、科学系统和形而上学系统。形而上学知识反映的是人们对世界最根本的认识与态度，科学知识反映与揭示的是客观世界的性质、关系和规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能满足人们物质

和精神上的需要，对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①。可以说，形而上学知识、科学知识的创新性最集中地体现了知识的价值。此外，那些被大众所习知的常识，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它们也具有创新性。这些知识是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认识世界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它们是由无数创新知识沉淀而成的，其中许多常识就是由科学知识转变而来的。在知识产权理论中，凡称为知识产品的都应具有创新性，发明专利要具有“非显而易见性”，作品应具有“原创性”，商标应具有“可识别性”。虽然它们各自的创新性要求程度各不相同，但创新性都是知识产品构成的必要条件。

知识因其有创新性才能够不断增长。知识的增长性是以创新性为前提的。因为知识具有创新性，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某一时间内全社会所拥有的知识总量）才能不断增加，知识流量（某一时间内全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增减量）才能不断加大。

二、客观知识的中介性

客观知识具有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中介性质。从客观知识的内在本质看，它是人类思想观念的总和，它无疑具有精神世界的某些属性与特征；但从客观知识的存在形式看，它又以物质载体为依托，它又具有物质世界的某些属性与特征^②。另外，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即人改造世界的实践），往往又是通过客观知识世界作为“中介”才建立起来的，因此“中介性”是客观知识的基本特性之一。有了中介性，主观知识才能外化、物化、社会化，变成客观知识；有了中介性，知识才像插上翅膀一样飞快地传播；有了中介性，客观知识才有了自己产生、积累、发展的历史与过程。

主观知识经过外化、物化，可转变为客观知识，故而客观知识也可以视为被“盛载”到机器、建筑、书本、磁盘等物质之中固化

① 鲍宗豪. 知识与权利.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36

② 赵红洲. 从“中介世界”看图书情报. 情报学报, 1982 (1): 60~66

了的知识。机器、建筑等物品有其各自的专门作用，只有文献才是专门记载和传播知识的，因此可以说文献载体是人类客观知识的主要载体与基本存在形态。当我们获取文献知识时，甚至可以忽略文献载体的物理存在，直接将文献与客观知识等同起来，在它们中间画上一个等号。因为人们对知识产品的“占有”，本质上不是一种实物的具体控制，而是表现为对知识的认识和利用。

三、客观知识的可编码性

任何一种信息，其内容只有借助于符号（图像、语言、标志、象征等）才能表达出来。知识属于信息范畴，是信息的一个子集。知识内容也只有借助于符号才能传播与交流。世间人工创造的符号有很多，如信号、旗语、手语、徽章、礼节、仪式等，在这些符号系统之中，知识所用的符号系统主要是语言。知识是有系统的思想、观念，而语言是一种专门用来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它比之上述符号系统，不仅是其中最为重要的^①，同时也是表达知识的基本符号系统。

从知识的传播过程看，知识在传播时先要有传播内容，其次要选择适合的符号系统，然后再将符号按一定规划组织起来（即编码），最后才形成传播媒介（电视、书籍等）。所以，知识是可编码、可解码的。“编码过程是符号使用者们之间的一种约定”，约定越多，越明确，符号的编码就越周密^②。客观知识是一种已编码了的知识。编码性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客观知识的数字化，是以0和1作为“符号”进行的特殊形式的编码，这是计算机语言。计算机语言又可转换成人类自然语言或多媒体信息形式，这就使客观知识的表达变得更加丰富与多样。

① [瑞士] 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 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7~38

② [法] 皮埃尔·吉罗著；怀宇译. 符号学概论.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7~28

四、客观知识的可传递性

丹尼尔·贝尔在给知识下定义时，曾将可传递性视为知识的一个基本要素^①。因为知识只有经过传播与交流才能表现其存在，实现其价值。

知识的传递有两种方式：共时传递（在某一静态时间内传递）与历时传递（在不同历史时间内传递）。从历时传递角度看，知识的传递方式可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口耳相传时期、书写印刷时期、电子媒介时期。在口耳相传时期，知识的传递是面对面的在场交流，知识的发出者与接受者通过言语符号互动、互应，符号失真度较小，这有利于文化传统的维持。但是知识传递因受时空的苛刻局限，它对社会进步亦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如社会组织因之只能是松散的、小单元的（像部落、村庄等）。在书写印刷时期，知识传递是“意符”的再现，“意符”存在于可移动的媒介（书本）中，使知识的不在场交流成为可能。人们可以在不同时空里、不受外界干扰地理解知识文本，并且能够反复阅读，因此促进了人们批判性思考的发展，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而在电子媒介时期，知识传递的即时性、广泛性可以摧毁一切传统边界，打破知识封锁与垄断，增加人们学习知识的机会。同时，主体在持续的不稳定中也会变得不断边缘化、分散化和多元化^②。就像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因为知识的流动比资金更容易”，“知识几乎能即时传播，并使人人都能掌握”^③。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知识的传递方式总在演进，但新方式的出现并未完全取代原有的方式。至今“口耳相

① [美] 丹尼尔·贝尔著；高铨等译.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95

② [美] 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 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3~117

③ [美] 彼得·德鲁克著；顾信文译. 知识就是一切.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1）：4~5

传”仍是人类知识传递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明证。

五、客观知识的无损耗性

人们消费知识产品与消费物质产品具有不同之处。在物质产品消费中，物品要么被占用，要么被消耗掉。而知识产品经过人们的消费（阅读）后，其内在的知识内容并不会消失、损耗。这就是说，客观知识具有无损耗性。一个文本经过上百人的阅读，很有可能会散页、破残乃至丢失或全毁，但是文本内容已转移至众多人的头脑之中，某种程度上它依然没有损耗掉。尤其在古代社会，人们阅读文本的方式主要是背诵，文本的不存在有时影响不了文本内容存在的完整性。因此，虽有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烧秦宫室，《诗经》等重要文献依然能够传世。

由于客观知识具有无损耗性，客观知识也就具有了可重复使用性。而且，不仅是客观知识，甚至客观知识的生产能力也是具有无损耗性的。如科学家发表了有创见的学术论文，他所依凭的资料、数据、论据并未因论文的发表而“损耗”。正如尼科·斯特尔说，知识“如果被出售，它们就进入了其他的领域，不过仍然保留在其生产者的领域范围内”^①。这表明知识的转移并不包括产生这些知识的认识能力的转移。

六、客观知识的可共享性

由于客观知识在消费使用中无损耗，那么每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并不会减少或影响他人消费客观知识的内容，它可为无数消费者同时或连续地共同消费。而一般物质产品被某人占有、消费，就具有了绝对的消费排他性^②，别人不能再占有或消费这个物质产品。

^① [加] 尼科·斯特尔著；殷晓蓉译，知识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41

^② 夏先良，知识论，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40

知识的可共同消费使知识的共享性成为可能。科学论文一旦发表，它就进入了社会公共领域。主观知识一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客观知识，就很难排除他人的使用，从而使知识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有经济学家将多人可以共享而不干扰他人享用的物品称做共用品 (public goods)，如灯塔、电视、公路，当然也包括一个思想、一项发明，共用品多供应一人使用，其边际费用是零^①。因此，人们分享知识时，知识不会消耗殆尽，其存量不会因广泛被人使用而缩减，反而由于扩大了应用范围可能会进一步创造出新的知识，增加社会的知识存量。人们分享知识是为了获取知识、使用知识。在知识使用过程中，使用知识产品有时还涉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此处不赘述），但知识产权产生的条件是知识产品首先要公布与公开，能够被公众所利用。

七、客观知识的可加工性

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相比较，因其符号系统是客观、稳定的，因此，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具有静态性、凝固性。但是客观知识又是可以被加工的，既可以精炼压缩，又可以扩充膨胀，还可以改变编码系统。例如，百科全书可将各类客观知识内容经过提炼压缩，形成供人检索、学习的知识集合；一部远古文献为了能让后人充分理解，历史上会出现众多注解之作，以至于注释的内容量会超过这个古文本的原有内容量；一篇动人心弦的文学作品，人们阅读它的时候，其编码系统是由文字符号组成的，而一旦被改编成话剧或电影，它的编码系统随之也改变了。

随着信息技术与横断科学的发展，人工智能科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人工智能专家正是根据知识可加工性的性质，编辑知识、追加知识、修改知识，将知识装入计算机知识库（知识库也同样具有可加工性），才研制出了各种可以供人获取知识的专家系统。

^① 张五常. 经济解释：交易理论与市场需求.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1. 11. 19 (22)

好的专家系统具有从已知知识推导出新知识的能力，帮助普通人成为“专家”，从而扩大专家数量，促进社会群体知识素养与水平的提高。

八、客观知识的不确定性

客观知识的不确定性是指知识的陈述内容、知识的数量形式都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从知识的陈述内容看，在客观知识世界里，除了数学、逻辑学等纯演绎的知识有较明显的确定性外，多数科学知识、经验知识都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哲学家波普尔认为，无论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它们都是不确定的，因为它们或是猜想，或是假设，它们都要接受严格的批评、检验。可检验性与可反驳性是知识具有科学性的标准。凡是科学理论最终都会被证伪，不被证伪的那是宗教信仰。所谓正确的理论，无非是在各种不同竞争的理论中，哪一个更为接近真理罢了。如同确认当下的时间，我们可说“差三分十点”或“差五分十点”，前者可能较后者更接近事实，其模糊陈述中的真理的含量更大一些^①。此外，知识陈述的不确定性还与语言表达上的多样化和潜台词的使用有关。

从知识的数量形式上看，客观知识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司马迁写《史记》，参引之书多达百余种（这可不是现代），还使用了大量游访见闻、歌谣民谚、文物图像等，其中包含了多少知识资料是很难确定的。这仅是一个微观的例子，如果从宏观上看，如社会知识存量的增长，则更难以测量。尽管普赖斯通过观察科学论文的增长发现了知识指数增长规律，认为科学文献每隔10年或15年就会翻一倍，但这也并非对知识数量变化的精确说明。仅用统计学方法说明知识增长是有欠缺的。设若再从其他角度（如用社会学方法），将知识体系看成一棵大树，分析主干是如何变粗的，分支是怎样蔓延的，外界条件、时间因素起了什么作用，结果就会变成另外一种

^① [英] 卡尔·波普尔著；范景中等译.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407～429

样子。

知识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知识价值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高科技产业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知识经济、知识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①。

以上我们从八个方面对客观知识的基本性质作了简单分析。此种简述可能并未充分揭示客观知识所具有的某些特性。对此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因为，“人类知识现象无疑是我们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它构成一个并非很快能解决的问题”^②。只有对客观知识的性质更好地把握，我们才能认识知识、理解知识。

第二节 知识的基本组分

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组成离不开构成其成分的基本元素以及元素间的组织结构。元素与结构是事物形成的两个要素。事物的元素也可表述为事物的组分。客观知识世界是由众多人类显性知识系统构成的，这些知识系统同时也是由无数知识的基本组分组成的。知识的基本组分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具有“硬”性特点的、独立载体形态的知识组分（即文献单元），一是具有“软性”特点、无独立载体形态的知识组分（即知识单元）。

一、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的涵义

1. 文献单元

为了认识文献，人们对其下过种种定义。近几十年中，文献的定义已不下数百种。其中较有权威和具有广泛影响的是国家标准对文献的定义。如《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GB3469-83）与《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均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

^① 吴国林. 论知识的不确定性. 学习与探索, 2002 (1): 14~18

^② [英] 卡尔·波普尔著; 舒炜光等译. 客观知识: 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前言

一切载体”。这个定义简洁明了，对统一人们关于文献的认识起到了良好的规范作用。但它也有某些疏漏。首先，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并非均是文献，如人的大脑也记录有知识，但大脑并不是文献。文献只能是记录有知识的“人工载体”。尽管人类早期的图书曾使用过泥板、纸莎草、兽骨等自然物为其载体，可是这些自然物也经过了一些人的加工，而且文献载体在后来的发展中有着不断人工化、非自然化的演变趋势。正如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所说：“拼音字母表用在粘土和石头上是一回事，用在轻盈的莎草纸上就是迥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了。”^①其次，记录有知识的人工载体很多，除了图书以外，还有钱币、邮票，乃至有着某种艺术风格的建筑物，它们都记录了一定的知识但却不是文献，因为文献必须是专用于传播知识、交流知识的，它在用途、功能上具有知识传播的惟一性。以往我们讲，文献有其组成的三要素：知识内容、记录符号、载体形态。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文献三要素的结合必须满足文献传播、交流的要求与目的，否则就不能成其为文献。如过去我们将载有大段铭文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称做“青铜的书”，这是欠妥的。载有铭文的青铜器皿虽然具备构成文献的三要素要求，也有传播知识信息的某种倾向性，但毕竟与刻有文字的石碑不同，它们有着某种容器方面的特定用途，传播知识并非其惟一的主要的功能。所以，这些载有铭文的青铜器皿只能算做“准文献”。当人们将其铭文用纸张拓印下来时，拓片才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文献。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可将文献重新定义为“专门记录和传递有知识的人工载体”，而文献单元就是“专门记录和传递有知识的人工载体单元”。应该说，文献虽然是个抽象的概念，但我们所见到的文献却都是具有单元形态的，即文献的客观存在、现实呈现，是以各种各样的文献单元形式表现的，如一部著作、一篇论文、一盒磁带、一张光盘等，图书馆的文献组织通常就是把一个个独立的知

^① [加] 麦克卢汉，秦格龙编；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18

识出版单元视为文献单元的。

在古代图书整理活动中，文献单元的辨认与辨别主要是依据载体单元；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文献数量的激增、文献形态的多样，人们对文献单元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现代图书馆学中，文献单元依据其自身的三要素往往还可分解成若干具体的单元形式，如文献的知识内容单元、知识形式单元与载体形态单元等。所谓知识内容单元，是针对文献单元中所包含的知识内容体系而言的。任何一个知识单元中的知识内容都具有某些主题，文献单元中的知识内容涉及了多少主题，就可视为具有多少知识内容单元。例如王益、汪轶千主编的《图书商品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就具有图书学与商品学两个知识内容单元。所谓知识形式单元，是针对文献单元中的知识符号体系而言的。符号体系往往有题名（包括章节名）、责任者等形式特征，它们可使文献单元的表述系统进一步区分成若干组分。如一部学术论文集有几个题名与几个责任者，就有几个知识形式单元。所谓载体形态单元，是针对文献单元在“物理”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立状态而言的。如文献单元的封面、版权页、正文、附录、索引等，都可划分为不同的载体形态单元。正因为现代图书馆学对文献单元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图书馆的文献组织方法越来越周密复杂，图书馆学的应用知识体系也就越来越细化、丰富。

2. 知识单元

什么是知识单元？不同学科对知识单元的阐释不同。早在1980年，我国科学学专家赵红洲先生就曾经提出：知识单元是已经获得科学共同体认同的、堪称“粒子”形态的科学概念，它是科学的细胞，科学大厦的砖块。大量的知识单元经过重组，按一定思路可凝聚成知识纤维，知识纤维又可在更高层次上组成复杂的知识系统^①。此外，人才学研究者王通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所谓知识单元，系指知识系列的一些基本‘概念’。不同的知识系

^① 赵红洲. 初论“潜科学”. 潜科学, 1980 (1): 5~10

列之间，可能有相同的知识单元。但是一个知识系列的形成与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它具有一批与其他系列不同的知识单元。”“知识单元组成一个个的知识系列，一个个的知识系列又组成整个知识体系。”^①除了科学学、人才学，教育学界也经常提到“知识单元”，不过这一概念一般出现在教学研究领域，如一些研究者将知识单元表述为教材中某章节的基本组分、组元，或某堂课程教学内容的组成单元，它们可以用图表形式表达出来。

相对而言，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对知识单元的探讨则略显滞后。如1988年，张德芳先生撰文指出：知识单元是寓藏于出版单元（某一文献）之中的，一个出版单元可能贮含一个以上的知识单元。“科学知识单元是科学劳动的产品，是在对事物、实物、现象、过程等零散信息基础上，经过系统归纳、分析、整理，能够反映其本质规律的概念、定理或定律。”^②1989年，马费成先生发表文章称，数据单元也可称知识单元，它是由各种事实、概念和数值等组成的^③。90年代末期，“知识单元”在图书情报学界的使用频率逐渐多了起来，因为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图书馆如何从传统的文献组织转向文献信息（即客观知识）的组织，如何从文献单元服务深入到知识单元服务，已经是图书馆实践面临着的新的重大课题。

总结上述人们对“知识单元”概念的理解与认识，根据图书情报工作的实践传统，可以为知识单元下这样一个定义：知识单元是客观知识系统中有实际意义的基本单位。这个定义包含以下几层内容：

其一，所谓“有实际意义”，指知识单元或是一个明确的语词概念、一个具体观点，或是一个科学定理、一个数学公式，或是一首歌中的某种旋律、一幅画上的局部构图等。它们是人们对社会存

① 王通讯. 论知识结构.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6: 22~23

② 张德芳. 激发和活化凝固在文献中的知识: 论图书馆改革.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88 (6): 1~7

③ 马费成. 知识组织系统的演进与评价. 知识工程, 1989 (2): 39~43

在的感受、认识的反映。如“力”这个概念，当我们停留在“事功曰劳，治功曰力”（《周礼·夏官·司勋》）的认识阶段，只能说它还是生活常识中的一个知识单元；当我们把凡能使物体获得加速度或发生形变的作用称做力，并用某种势场梯度（ $F = \partial u / \partial r$ ）来表示时，它就变成了科学知识中的知识单元。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从“感性的具体”到“抽象的规定”，再到“思维中的具体”正是知识单元结晶形成的具体过程^①。

其二，我们所描述、表达出的任何一个知识单元，都是可以归入某个知识系统，成为该系统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换言之，知识单元正是以知识系统为参照系提取出来的一个概念；离开了知识系统，也就无所谓知识单元了。如我们说“力”的概念是一个科学的知识单元，就是以物理学或力学的知识系统作为参照体系而言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参照体系，“力”只能是一个普通的概念，而谈不上“科学的知识单元”了。

其三，知识单元一旦成为知识系统的一个组分，它就必须是该知识系统的基本单位。这些基本单位有可分解与不可分解两大类。如诊断学包括物理诊断、电诊断、影像诊断、实验室诊断等基本单位，它们都是诊断学的知识单元。其中物理诊断还可进一步细分成视诊、触诊、听诊、体温及血压测量、呼吸检查等若干知识单元，因此，“物理诊断”就是一个可分解的知识单元。从理论上说，视诊、触诊等知识单元还可再行切割与细分，一直分到不能分解的“知识细胞”为止，这些不能分解的“知识细胞”就构成了诊断学知识系统的不可分解的知识单元。

二、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的关系

1. 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的区别

(1) 从知识存在看，文献单元具有“硬性”特点，知识单元具有“软性”特点。一部科学著作可以在作者的大脑及其著作中同时

^① 赵红洲. 科学能力学引论.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4: 97

储存、呈现，但科学著作具有载体形态，它已经脱离了大脑思维，是一种知识的“凝固”，属于客观知识世界，是一种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硬性知识”。而知识单元既大量地存在于客观知识世界，同时也大量地存在于人的主观知识世界。人的大脑“不失真”地储存文献单元很困难，但“不失真”地储存知识单元却很容易。所谓知识创新，就是人们将储存在大脑中、呈现“游离状态”的知识单元进行有机重组的一种活动。存在于大脑中的知识单元是隐性的，而存在于客观知识系统中的知识单元也不具有独立的载体形态，而是隐藏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是一种“软知识”。

(2) 从知识形态上看，文献单元所包含、表现的，大多是完整的知识体系，而知识单元所包含、表现的，更多地是“知识点”。马克思积四十年之力撰成《资本论》，从形态上看它只是一个单元文献，但它在内容上却建构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思想体系。《资本论》中的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知识点，形成了这个伟大思想体系中关键性的知识单元。因此，如果说文献单元是知识生产者精心搭建起来的“知识建筑”，那么，知识单元就是那些具体的木石、砖瓦等“知识建材”。从两者的生产数量上来看，“知识建材”的数量显然要大大多于“知识建筑”。

(3) 从知识性质上看，文献单元是静止的，而知识单元是衍变的。文献单元的生成是一次成型的。新的知识内容取代旧的知识内容，如果通过文献单元形式来表现，必须经过生产新的文献单元来实现更替。知识单元则不同，它具有生命力，在人类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历程中，知识单元的“内禀智荷”是可以演变的。赵红洲先生曾提出，知识单元的智力（创造力）荷值是由静荷值和动荷值之和构成的。静荷是由知识单元内部因子个数及相互逻辑关系构成的，表现知识单元包含智慧多少的量度；动荷则是知识单元在历史进化中积累的智荷，表现知识运动中形成的智慧的积累^①。例如“工

^① 赵红洲等. 论知识单元的智荷及其表示方法. 知识工程, 1991 (3):

业”(industry)这个概念,在工业革命前,其“静荷”意义(即本义)原指一种特殊的人类属性,意译过来是“技术、刻苦、坚毅、勤奋”等,18世纪后期才有了“制造与生产机构”的涵义,变成了一个表示“集体”的语词^①。这个附着于“工业”静荷意义上的新的涵义,就是历史进化中积累的动荷意义。

(4)从组织方法上看,文献单元的组织方法较为单一,而知识单元的组织方法则复杂多样。当人们将客观知识组织成一个有序的集合时,如果以文献单元为集合的基本组分,那么组织方法则主要是依文献单元的内容属性(类别、主题)或形式属性(题名、责任者)来进行的;如果以知识单元为基本组分,情况就有所不同。知识单元的属性特征多种多样,远较文献单元丰富,故其组织方法也更为复杂多变。例如将化学元素“铁”作为一个知识单元,其属性特征至少有以下这11种^②:

事物名:铁
 类别:化学元素
 颜色:银白
 比重:7.86
 熔点:1 535°C
 沸点:2 750°C
 能否导电:能
 化学性质:活泼
 周期表位置:第4周期第8族
 地壳含量:5%
 原子量:55.847

以上冒号左边所列为铁的属性名,冒号右边所列为铁的相应属性值。可以想象,知识单元的属性特征有多少种,其组织方法(从

^① [英] 雷蒙德·威廉斯著;吴松江等译.文化与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5~16

^② 陆汝钫.人工智能(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84

属性特征角度)也会有多少种。

(5) 从获取方式上看,文献单元的获取相对容易,而知识单元的获取相对困难。从知识受众获取知识的经验来说,情形大多如此;就是从图书馆提供知识服务方面而言,提供知识单元的服务较提供文献单元的服务难度也更大。因为,知识单元与文献单元之间往往表现出“知识不对称性”。当我们要找到一个意义准确、完整的知识单元时,可能要阅读众多文献单元,尽管如此仍不能保证这大量的阅读是有效的。通常,在图书馆实践中,提供文献单元服务与提供知识单元服务有着很大差别:前者提供的是有形文献(有文献载体形态),后者提供的是知识信息(可无文献载体形态);前者属简单劳动(可以依借出文献量计算劳动量),后者属复杂劳动(不能依借出文献量计算出劳动量);前者的专指度有时较低(如读者欲借某类文献),后者的专指度一般均很高(如读者查一个名词、一个数据、一段引文);前者与读者不会“相互进入”(知识信息的切入、交流),后者则常会与读者发生“相互进入”;前者的服务方式是被动式的,后者的服务方式是主动式、互动式的^①。

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还有许多区别,以上仅从最主要的几个方面分析论之。

2. 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的联系

(1) 从知识存在角度看,在客观知识世界里,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均是客观知识的基本组分。虽然前者具有“硬性”特征,后者具有“软性”特征,但两者的产生都经过了主观知识的客观化这一过程,而且它们的存在也是互相依赖、互为前提的。知识单元大多存在于文献单元之中,文献单元则是众多知识单元有机组合的成果。

(2) 从知识形态来说,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既大量地表现为原生态知识,同时也表现为某些再生态知识。原生态知识是主观知识的原创成果社会化、公开化了的最初知识形态。图书馆学中所谓的

^① 王子舟. 文献信息服务与文献服务区别论.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96 (3): 18~19, 29

“一次文献”就是原生态知识。再生态知识是为解决人们有效获取知识而对客观知识进行加工、提炼所形成的知识形态。如百科全书中的词条，目录、索引中的款目等，它们也可以通过文献单元、知识单元表现出来。

(3) 从知识性质来看，客观知识所具备的基本性质，如创新性、中介性、可编码性、可传递性、无损耗性、可共享性、可加工性、不确定性等，文献单元、知识单元也都具有。客观知识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从理论上来说，构成这个系统的基本组分，也会不同程度地、或多或少地包含着系统所共有的属性与特征。

(4) 在知识组织中，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切割、划分均有其相对性。一篇科学论文的抽印本就是一个文献单元，但它发表在某本杂志上时，这本杂志通常会被视为一个文献单元。知识单元也如此，一句唐诗可以是一个知识单元（因此有各种各样的唐诗诗句索引供人们检索），但有时一首完整的唐诗也可作为一个知识单元。因此，文献单元、知识单元在不同的知识组织体系中，根据不同目的及需要，它们的基本单元层次是可分合的。

(5) 从知识获取来看，文献单元和知识单元都能向知识受众有效提供知识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图书情报学界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未来图书馆工作要由文献单元的组织转向知识单元的组织，图书馆服务也会由文献单元服务转向知识单元服务。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揭示出图书馆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体。但它也有偏激之处，因为文献的本质就是知识，传统的文献单元服务本身就是提供知识的服务（而我们做得并不好，经常受到各界读者的批评）。通过文献单元汲取知识、提高知识，这是古往今来人们获取知识的最基本方式之一。图书馆应该开发知识单元的服务，但却不能忽略文献单元的服务。况且新事物的出现有时并不排除旧事物的存在，如电子媒介提高了人们知识交流的质与量，但它并不能取代或排除纸介质媒体的存在，甚至也不能取代和排除“口耳相传”这种古老的知识交流方式的存在和价值。

第三节 基于知识组分的知识组织

一、知识组织的涵义

将无序的文献组织成一个有序的体系，这是图书馆最基本的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文献组织的实质就是一种知识组织。1985年，青年学者刘迅倡导图书馆学应向“知识工程”转变，提出应把知识组织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①。90年代以后，“知识组织”这一命题成了学术探讨的热点，人们对知识组织的概念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王知津先生指出，将知识组织等同于文献的分类、标引、编目、文摘、索引等一系列整序活动，这是狭义的知识组织；而将知识因子（知识结点）有序化和知识关联（结点间的联系）网络化，这是广义的知识组织。广义的知识组织包含了狭义的知识组织，因为个体文献也可视为是知识因子^②。蒋永福先生则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认为：“知识组织是指为促进或实现主观知识客观化和客观知识主观化而对知识客体所进行的诸如整理、加工、引导、揭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及其方法。”^③这一定义把知识组织划分成了两种类型：主观知识客观化的知识组织、客观知识主观化的知识组织。这些观点尽管表述不同，但其中存在着某种共识，它们推进了我国知识组织研究的深入发展。

随着知识社会的来临，“知识组织”渐成多种学科所使用的科学概念，如知识社会学、知识管理、人工智能、教育学等。甚至在

① 刘迅. 知识工程——未来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内容变化的学科归宿. 情报科学, 1985 (5): 1~6

② 王知津, 王乐. 文献演化及其级别划分: 从知识组织的角度进行探讨. 图书情报工作, 1998 (1): 4~7

③ 蒋永福. 图书馆与知识组织: 从知识组织的角度理解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9 (5): 19-23

日常语言中，“知识组织”一词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在广泛应用的层面上，知识组织是指人们对知识（无论是隐知识还是显知识）的整序、加工、控制、揭示等一系列的组织活动与过程。当然，知识组织（knowledge organ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图书馆学界。如1929年英国图书馆学家布利斯（H. E. Bliss）《知识的组织和科学的系统》一书就已经使用了这个概念。而就图书馆学来说，知识组织应该是基于显知识中的文献单元、知识单元而言的，其概念可表述为：知识组织是对客观知识组分进行整序的活动与过程。因这个概念具有专指范畴，故其涵义是狭义的。知识组织的目标是将知识组分整序成能够提供优质服务的知识集合（如图书馆、数据库）。由于知识的有序性、关联性、可检索性只有通过知识集合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整序、控制、提供是知识组织的核心点。

二、知识组织的原理

1. 知识组织的假设前提

当我们将知识组织定义为“是对客观知识组分进行整序的活动与过程”时，就隐含了一个前提、假设：客观知识世界是无序的。客观知识世界的无序状态是由知识组分的无序呈现的，它是由知识生产的无序、知识分布的无序、知识流通的无序造成的。以知识分布的无序为例，每一专业知识领域中，通常存在着核心知识、外围知识、虚假知识三个区域。核心知识增长缓慢，所占区域最小；外围知识增长相对较快，所占区域稍大；虚假知识增长最快，处于边缘地带，所占区域也最大。虚假知识高度无序，且有泛滥之势，就会造成“知识过剩”和“知识污染”，它是使客观知识世界“熵”值增大的活跃因子。知识存在的无序性与知识受众对知识需求的有序性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知识组织的理论与方法，就是在平衡、克服两者之间矛盾中生成的^①。

^① 蒋永福，付小红. 知识组织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 图书馆建设，2000（4）：14～17

2. 知识组织的内在机制

就本质而言,知识组织的内在机制是对人脑记忆机制的一种模拟。人脑的记忆有识记、保持、再现三个环节(即信息的编码、存储、提取),知识组织也如是。记忆的第一环节是“识记”,包括视觉识记、听觉识记、视听识记,知识组织也有这些方式。记忆的中间环节“保持”包括空间保持、系列保持、联想保持、网络保持、更替保持等方式,知识组织也在使用这些方式;记忆的保持会有“遗忘”,知识组织则会有“遗漏”。记忆的第三环节是“再现”,体现为再认与回忆,知识组织的“再现”体现在检索与输出。当然,在人工智能领域里,知识组织已经发展出专家系统这样高级的形式,但这种形式本质上仍是对人脑机制的一种模仿。未来的知识组织形式,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将呈现对人脑记忆机制、思维机制交互模仿的趋向。

3. 知识组织的需求基础

强调知识组织以知识的基本组分为基础,是因为人们获取知识的需求与行为常常诉求于知识组分。学习型的知识需求倾向于得到文献单元,而研究型知识需求倾向于获取知识单元。因为文献单元可以提供学习者所需求的系统性知识,而知识单元则可以提供研究者所需求的概念、公式、定理、数据、事实等。另外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有时从表面看来是系统的、整体的,但实际上是可分解成诸多单元的。就好比买房子,人们在作出是否购买的决定时,往往考虑的是房子的建筑质量、面积、楼层、朝向、位置、环境等各种商品房中隐含的特性,而不会只买一个叫“房子”的东西^①。相反,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有时从表面上看只是针对某一知识单元、知识结点,但实际上只有掌握了一个系统知识后,才能真正了解这一知识单元、知识结点。因此,人们知识需求的不同以及文献单元、知识单元承载功能的不同,决定了知识组织者对两者不能有所偏废。

^① 熊秉元. 灯塔的故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42

4. 知识组织的基本工具

知识必须通过符号系统将其记录下来，并附着于一定的物质载体上，才能进行传递、交流、共享。从符号学角度看，用之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的符号系统很多，如航海信号、军用信号、宗教仪式、礼节仪式、语言等，其中语言是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其他符号系统在一定时间内只与一定数量的人发生关系，而语言却是人们时刻都要使用的、参与其事的。人的感情交流可以用手势、表情、音乐、绘画来进行，而知识的传递，即人们思想观念的表达，一般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故而文献单元、知识单元主要地和大多数情况下是使用语言符号系统进行记录，以实现其外在化、客观化、社会化。由于语言是个人以外的、社会的东西，个人不能创造语言，只能使用语言，语言较之其他符号系统又具有最广泛的社会性，因此用语言记载的知识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实现共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语言是由“所指”（概念）和“能指”（音响-形象）构成的，二者结合才成为符号^①。而符号是有差别、有单位的，所以也是可编码的。至少能以其“联想关系”、“句段关系”编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是知识组织的最基本的工具。各种知识体系、知识集合基本上是用语言材料组织起来的。即使众多知识集合使用了大量人工语言，人工语言也只不过是自然语言的代替物。

三、知识组织的方法

1. 知识组分的标识

在一个产品密集存放的仓库里，如果每个产品没有标号登录，就不可能形成有序的存取与保管。同理，知识组分如不经过标识记录，也不可能形成有序的知识集合（如图书馆、数据库）。标识记录是对知识的某种描述，自身不显示任何智能行为，其惟一作用是

^① [瑞士] 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 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170~176

携带知识。传统的标识记录，主要通过对知识文本作人工著录与标引进而形成款目来实现。但是，由于网络信息资源的出现和激增，图书馆不得不越出自己的“围墙”来链接外部世界，与之进行知识资源的交换。而传统的记录方法面对具有很强的动态性、开放性、非线性、不规范性和多媒体性的网络资源，又显得无法适应，力不从心。因此，新的标识记录方法（如元数据）就应运而生了。

元数据（metadata）是应用于互联网环境的一种关于数据的结构化数据。其任务是对数字化的知识组分进行格式化描述，以便使计算机或人能对其进行识别和处理。目前元数据已有许多种类，在图书情报界最有影响的是 DC（都柏林核心元素集），它由 15 个元素组成（分属内容描述、知识产权描述、外形描述三个类型），现已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其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它是一种支持简单而含有足够信息量的元数据，并能提供一个共享的语义学标准，使那些以不同规则编目的元数据（如 MARC）可以直接交换^①。

2. 知识组分的简化

知识简化是根据知识受众最省力原则的要求，对内容量较大的知识组分（主要是文献单元）进行压缩、提炼的过程，其结果会形成文摘、提要等，它们可以附着在知识组分上，或单独为序形成二次文献。知识简化在我国起源很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刘向整理皇家藏书所作“书录”的汉代。当然，知识简化方法并不局限于图书馆领域，如宋代朱熹因司马光《资治通鉴》294 卷浩繁难读，就曾用提要加小注的方法将其压缩改编成 59 卷的《资治通鉴纲目》，实际上这已是一种知识的加工重组了。与知识简化相对应的是知识繁化。如左丘明为《春秋》作传，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这些传注文字要多出原文本的文字数倍。但这些现象出现在“知识稀薄”的年代，随着人类知识的指数增长，知识文本的繁化现象会越来越少，并作为一种特殊需要而局限于很小的领域。

^① 吴建中主编. DC 元数据.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0;

3. 知识组分的整序

知识组分经过标识记录拥有了自己的“身份”与“地址”之后，便开始进入了整序过程。知识组分的整序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知识分类。即按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分门别类地组织与揭示知识组分，使之成为一个树型的有序化结构。常用的基本工具是先组式的各种文献分类法。在知识组织的手工时代，文献分类法居知识组织方法的主导地位。在网络环境下，这种分类法因其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有较强的系统性、族性检索功能，故而在知识组织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网络资源的浏览、非文本信息的组织、超文本信息的管理等，都离不开文献分类法。近几年，自动分类技术也日趋成熟。自动分类不仅适用于文献单元，而且还能关注文本中“文字的重要性”^①，进而使知识单元的分类也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2) 知识聚合。即从具体事物、对象和问题的主题来组织和揭示知识组分内容，使之成为一个线性的有序化结构。这是一种后组式的方法，人们习惯称之为主题法。主题法常用的基本工具为标题法、单元词法、叙词法、关键词法等。由于用主题法组织与揭示知识组分较分类法更具有直接和直观的特点，目前网络资源相当一部分浏览器与搜索引擎都使用之，或者分类法、主题法混用。另外，知识聚合的方法能深入到文献的“果肉”中提取单元词、关键词、主题词，并用参照系统来表示知识关联，所以这种方法更适用于知识单元的组织。传统图书馆学领域编制的各种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各类型词典、字典，乃至众多数据库，大多使用这种方法。

(3) 语义网络。语义网络是模仿人类联想记忆的一种图式组织方法。它由节点 (node) 和链 (link) 组成一个网状结构。节点表示知识单元；链则表达知识关联，如单向链 (→)、双向链 (↔)

^① 陈树年. 网络信息的自动分类问题. 图书馆杂志, 2001 (10): 2~6,

等。目前超文本 (hypertext)、超媒体 (hypermedia) 信息组织方法就是一种典型的语义网络组织法。超文本中的“链”定义了超文本的非线性网络结构, 提供了以联想方式浏览、查询节点的功能。因此, “链”是超文本的灵魂^①。有了语义网络组织法, 文献单元、知识单元就可以组织成超文本、超媒体数据库; 知识单元就能按布鲁克斯所说的“知识地图”联结在一起, 供人们“按图索骥”。

总之, 知识组织的方法是不断发展的。一些新的知识组织方法, 如自动文摘 (automatic abstracting)、自动分类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机器翻译 (machine translation)、专家系统 (expert system)、数据挖掘 (data mining)、推送技术 (push technology) 等, 都是目前正在研究并有广泛探索空间的领域。知识组织向智能化发展, 是可以预见的、不容置疑的发展方向。同时, 知识组织研究也超出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界, 成为人工智能、脑科学、心理学、术语学、教育学、知识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共同关心的命题。有着悠久知识工作历史积淀的图书馆学, 应对未来知识组织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关 键 词

客观知识性质 知识存量 知识流量 知识共时传递 知识历时传递 知识共享 知识的基本组分 文献单元 知识单元 知识组织 知识组织原理 知识组织方法 元数据 知识简化 知识分类 知识聚合 语义网络

小 结

1. 客观知识具有创新性、中介性、可编码性、可传递性、无

^① 刘国明, 夏祖勋. 超文本和超媒体中的知识表示方法. 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 1994 (3): 74~79

损耗性、可共享性、可加工性、不确定性等重要基本特性。认识这些基本特性，有助于理解知识的本质，理解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工作。

2. 大量知识基本组分组成了客观知识世界，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是客观知识的两种基本组分。文献单元是专门记录和传递知识的人工载体单元，知识单元是客观知识系统中有实际意义的基本单位。

3. 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有许多区别，如前者具有“硬性”特点，后者具有“软性”特点；前者往往表现为知识体系，后者往往表现为知识点；前者是静止的，后者是衍变的；前者组织方法较单一，后者组织方法则复杂多样。但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又是相互联系的，在许多方面又有着共同的特性。

4. 知识组织是对客观知识组分进行整序的活动与过程。知识组织的原理体现在知识组织的假设前提、内在机制、需求基础、基本工具等方面。按程序划分，知识组织有标识、简化、整序等方法与步骤。知识分类、知识聚合、语义网络是知识整序的主要方法。

思 考 题

1. 客观知识具有哪些基本性质？
2. 客观知识的基本组分包含哪两部分？
3. 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的区别是什么？
4. 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有何联系？
5. 知识组织的原理有哪些？
6. 常见的知识组织方法有哪些？未来知识组织的发展方向会如何？

第七章

图书馆学核心内容（二）：知识集合

人们在获取知识的时候要通过某种媒介。由于客观知识世界是无序的，因此人们就会设法将其组织成一个有序的集合、有机的系统，以供人们查检、阅读。我们将这类有序的集合、有机的系统称为知识集合。知识集合既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又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客体之一。如前所述，图书馆、百科全书、书目索引、数据库、专家系统都属于知识集合，那么，知识集合具有哪些性质、特点，其结构、功能如何，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地了解 and 掌握。

第一节 知识集合的范畴

一、知识集合的概念

用科学方法把客观知识元素有序组织起来，形成专门提供知识服务的人工集合，我们称其为知识集合。也就是说，知识集合是由客观知识元素（如文献单元、知识单元）组织汇集而成的，它是完整的实体，它在客观知识世界（即波普尔的“世界3”）中具有独立的存在形态；知识集合元素的组织汇集依据了一定的科学方法；知识集合的存在意义是保存或传播知识，为人类提供知识服务；它对人们需求环境的变化具有良好的适应

力。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说图书馆就是知识集合。不过，具有知识集合实质的却又不仅仅是图书馆。当我们抽象出图书馆的本质为知识集合后，也会看到还有其他集合现象具有知识集合的同一实质，如百科全书、知识数据库等。因此，知识集合是一个“类现象”的本质描述。它不仅包含了图书馆，也包含了百科全书、字典辞书、书目索引、数据库、专家系统等。目前存储在计算机光盘或网络中的各种知识数据库，它们都是知识集合。但是需注意的是，网络本身尽管就是一个庞大的集合，可它基本上属于信息集合。图书馆学以知识集合为研究对象，就要对所有类型的知识集合进行分析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图书馆”这个客体之上。从形式上看，知识集合与知识组分不同，它在客观知识世界中是一个独特的家族，各种知识集合都是不同知识组分的一种有机“团聚”，也是一种多层次的知识集成体，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

二、知识集合的类型

我们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知识集合类型。例如，以形成集合的知识元素的状态为依据，可把知识集合划分为原生态知识集合与再生态知识集合两种。图书馆作为一种知识集合，它的知识元素是由文献单元构成的，而客观知识世界的原生态知识大量地表现为文献单元，因此，图书馆作为知识集合，可称为原生态知识集合，它是一种最基本的知识集合形式。除了原生态知识集合以外，知识集合家族中还有加工性的知识集合，即对原生态知识进行某种摘取或提炼，加工形成的知识集合。这种知识集合可称之为再生态知识集合。如各种书目索引就是将原生态知识抽取出其特征（题名、责任者、主题、分类号等）而形成的再生态知识集合；百科全书则是原生态知识内容经过浓缩提炼而形成的再生态知识集合。当然也有人会问，原生态、再生态知识既然都可以表现为文献单元，图书馆收藏的许多文献单元是工具书，工具书又属于再生态知识，怎么可以偏将图书馆划入原生态知识集合呢？不错，工具书是再生态知识形式，但图书馆的基藏是以普通文献（创作知识）为

主的,从“大数原理”上来说,它应该划入原生态知识集合类型中。另外,以知识集合形成的物理结构为依据,我们还可把知识集合划分为数字型与非数字型两种。非数字型即以印刷品为主的文本性知识集合,如图书馆、工具书等,而数字型则指计算机或网络中存储的各种知识数据库。当然,我们还可以根据知识元素的学科属性将知识集合划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内容不同的各种知识集合。

三、知识集合的边界

知识集合的外延是怎样划定的?它与非知识集合的区别是什么?比如,图书馆属于知识集合,而私人藏书、各类书店是否也属于知识集合?这里就有个划界的问题。私人藏书、各类书店也都是知识元素的汇集,而且知识元素之间也有相互联系的一些方法。以书店为例,书店的图书分类,其科学性虽比不上图书馆分类法严密、清晰,但也是一种有效的图书组织方法。因此,它也符合知识集合的某些基本特征。现实社会中,许多人阅读、查找知识就是在书店进行的。不过,书店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集合,仅可称为“准知识集合”。因为书店陈列的图书,准确地说不是供人使用的知识元素,而是供人购买的知识产品(商品)。它与其他商品集合具有相同的本质。如当今世界著名的网上书店亚马逊(amazon.com),除了销售书籍,还出售CD、玩具、药品、软件等。人们在书店这个“集合空间”中购买图书更主要的是商品消费行为,而不是知识消费行为,因为,在知识集合提供的知识消费中,消费者仅消费文献中的知识内容,消费行为结束后,保存知识内容的原有文献既不消失,也不减少。可是,读者从书店购走图书后,书店这个“集合”就消失或减少了它的知识产品。至于私人藏书,一般小型私人藏书架也不能称为知识集合,它仅是一些知识元素的简单堆积。只有藏书家的藏书室才能算得上知识集合,因为藏书家的藏书或经过分类编目,或有收藏宗旨,或能形成藏书特色。知识元素之间相互联结的方式体现出某种重要性或独特性。总之,知识集合是

一个实体，它内部的知识元素是相互紧密连接、组织起来的，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知识集合与非知识集合本身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尽管知识集合的边界肯定了自身质在其内部存在的同时，也否定了自身质在其外部的存在，亦即规定了自身质从存在到消失的界线，但知识集合的边界具有模糊性、交错性，具有像金属的断裂面或者两山分界那种分形特征。

第二节 知识集合的结构

一、知识集合的元素

知识集合的元素是指组成知识集合的最小文献单元或知识单元，又称知识元素。知识集合中的知识元素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 多元性

从理论上说，一个知识集合至少须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知识元素。而在现实中我们所见到的各种知识集合，大多是由为数众多的知识元素组成的。而且一个集合中的知识元素越多，结构越好，它的整体功能就越强。因此，一般情况下，历史悠久、藏书量丰富的图书馆，它的文献保障率也越高。同理，比较不同的汉语辞典，《汉语大辞典》（1997年版）要比《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本）具有更大的知识信息量。两者都是汉语词汇方面的知识集合，但前者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共收词语37.5万余条，后者共收字、词6万余条。它们的收录范围、释词深度、检索方法等方面的不同，表明了两者在功能上的差异，即《现代汉语词典》是满足人们一般学习、工作、交流上的需要，而《汉语大辞典》则是满足人们研究、治学方面的需要。

2. 同质性

同质性是指知识集合中的知识元素应该具有相同的性质。如一部《中国古典文学辞典》，它不能收录外国文学辞条或中国历史辞条。因为这些辞条超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合范围，与“中国

古典文学”性质相异。任何一个知识集合都是一个有限集，有限集中的元素应该具有同等性质方能保持集合的整体性质不变。目前，国外一些现代化的图书馆除收藏文献外，还收藏一定数量的艺术品，如绘画、陶器、电唱机、玻璃器皿等。一个地方公共图书馆适量收藏、展示甚至出借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艺术品及其复制品，这对弘扬乡邦文化无疑是有益的。同时，我们也强调公共图书馆能将知识服务、信息服务、文化娱乐等功能集于一身。但是图书馆质的规定性是知识集合，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知识服务，它不能将艺术品、文物等也作为基本收藏，否则就与美术馆、艺术馆、博物馆等相混淆了。这样做的结果，违反了知识集合中知识元素同质性的原则。

3. 有序性

知识元素有规则的相互联系即为知识元素的有序性。根据集合论的原理，任何一个集合如果其组分（元素或子集）之间的联系方式是有规则的、可确定的，它就是一个有序集，否则就是无序集。设若将每个自然数组成集合，那么可以得出以下两种形式：

$$A = \{1, 2, 3, 4, 5, 6, 7, 8, 9, \dots, n, \dots\}$$

$$B = \{8, 2, 5, 9, 3, 1, 4, 7, 6, \dots, n, \dots\}$$

其中 A 为有序集，B 为无序集。在 A 集中，自然数在空间排列上是有规则的，即依数的大小，位置不可置换；在 B 集中，自然数的空间排列是无规则的，它们的位置可以随意调换。在 A 集中，我们要找到一个自己所需的自然数非常容易，而在 B 集中则会十分困难。这时，有序集的检索功能就立刻显现出来了。如果我们把 A、B 两个集合的自然数转换为单元文献（即知识元素），那么 A 集就是一个有序的知识集合。在一个有序的知识集合中，存储知识与检索知识的功能是共生的。因此，知识元素的有序性是知识集合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知识集合的结构

知识集合的结构是指在一个知识集合中，知识元素之间联系方

式的总和。结构是不能脱离元素单独存在的，元素与结构是构成知识集合的两个基本要素，两者相合才能给定一个知识集合。因此结构是构成知识集合的必要条件。以知识元素的空间排列方式划分，知识集合的结构通常有如下几种^①：

1. 线性结构

即知识元素是依据前后顺序进行组合的一种结构，每个元素都有惟一的整数地址，它们可用连续编号表达出来，成为一个按顺序分配的线性集合。如李钟履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1959年商务版），每一条论文记录前冠有阿拉伯数字表示其顺序。该索引收录论文篇目5 000余条，除第一个顺序号与最后一个顺序号外，每个顺序号都有一个直接前趋与一个直接后继。此类线性结构的知识集合较常见。各种人名索引、语言类工具书，如果其知识元素是依汉字的笔画顺序、号码顺序、拼音顺序等方式排列贮存在一起的，一般都是线性结构的集合。可以说，线性结构是知识集合中最基本的一种结构形式。它的优点是元素的存储、检索都较简单方便，但缺点在于元素的插入或删除较为困难，因为元素的插入或删除会使原有集中的元素发生大量位移，加大劳动成本。

2. 树型结构

与线性结构不同，树型结构是以分支关系表示元素层次的一种结构。在树型结构中，元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层次关系，一个元素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直接后继（见图7-1）。传统的图书分类表就是典型的树型结构。树型结构的优点在于它能表现出元素之间的归属及等级关系，能够表示出树的“深度”，同时，去掉根结点（如图中Ⓐ）还可把树变成“森林”。其缺点是每一层上的元素只能和它上一层中的一个元素相联结。例如一本名为《自行车旅行》的书，内容涉及了“体育锻炼”与“旅游”两个主题，它在图书分类中只能归属在一个上位类中，而使另一主题被遮蔽。另外，在一些现实的知识集合实体中，逻辑结构用树型，物理结构却用了线性，

^① 黄干平等. 数据结构.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2: 1~92

这也会带来不可解决的深刻矛盾。如图书馆以分类法组织图书，采用的是树型结构，而书库排架却只能逐架逐册进行，用的又是线性方式，未来的树型“深度”空间只能用空架方法表示。空架多了就造成书架空间浪费；空架少了，又会使得书架空间拥挤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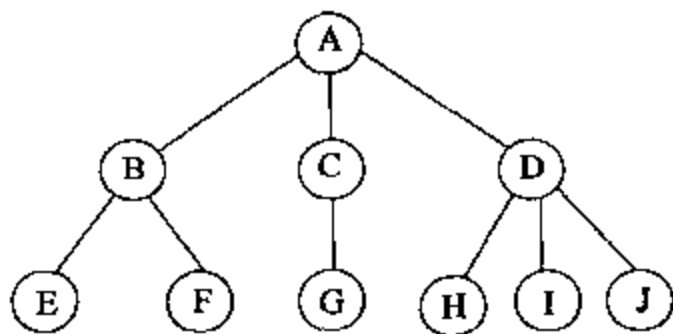


图 7-1 树型结构

3. 图型结构

图型结构（或称网状结构）也是一种非线性结构，即知识元素相互之间可发生任意联系的一种结构。它不是“一对多”，而是“多对多”（见图 7-2）。比如索引工具中，标目之间的参见、参照关系，就是图型结构。它将一个索引标目指向另一个索引标目。在知识数据库中，数据之间可以采用图型结构建立联系，每个数据由结点域、指针域两部分组成，结点域反映数据本体内容，指针域表示数据直接后继之关系。此时数据指针的功能与索引工具中的“见”、“参照”这类指示词的性质是相同的。采用图型结构组织起来的知识数据库，可以组成一个复杂的图网络，反映数据之间较线性、树型更为复杂的内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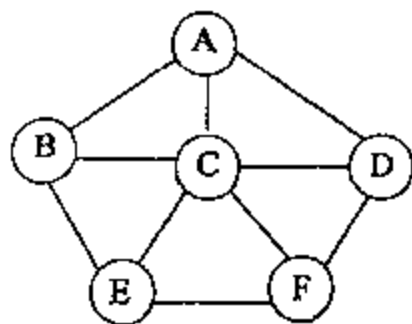


图 7-2 图型结构

除了知识元素的排序以外，在一个知识集合中，子集与层次也是集合结构的主要概念。一个元素众多、结构复杂的知识集合，其元素之间有成团现象，这类元素集团就构成了一个集合的子集。一

个集合可以包括众多子集，子集之间亦可有统属关系，这种统属关系构成了一定的层次。因此，子集与层次也是刻画集合结构的重要工具^①。美国图书馆协会藏书发展委员会曾经提出的图书馆五级藏书框架模式（完整级、研究级、学习级、基础级、最低级）就是从子集与层次意义上对图书馆进行合理结构调整的一种尝试。因此，子集与层次的多寡、有序化程度，对一个知识集合的质量与整体功能的发挥也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三、集合的组织过程

把知识集合的组织过程当做一个流程，也就是说从时间维度来看，它大致经历设计规划、元素采集、整序贮存、检索输出几个阶段。

1. 设计规划

这是明确知识集合的最终目标、要求事项并制定出实施计划的阶段。新建一座图书馆，编纂一部工具书，研制一个知识数据库，都必然经过这样的阶段，即便是一个已处于运行中的知识集合，其原始的设计规划能否实现，依然是贯穿于集合的产生与发展全过程的问题。

2. 元素采集

这是知识获取阶段。知识工作者要选择和划定进行采集的知识范围；对该范围内的知识资源进行真伪鉴别、优劣评价；从知识源中提取出可以组分的知识元素（或将其转换成可编码的知识元素）。知识集合的知识获取与人工智能知识库的知识获取是有区别的。知识库（如专家系统）不但要获取可编码知识，同时还要获取技能知识。可编码知识主要来自客观知识世界，包括文献或文献中的定义、事实和理论等，是一种公共知识；技能知识主要来自主观知识世界，由大量经验、规则组成，称为试探（heuristics），是一种私

^① 苗东升. 系统科学精要.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33~35

有知识^①。知识集合收集的知识元素属于客观知识世界范畴，因此它不是技能知识。

3. 整序贮存

这是对已经采集得到的知识元素按某种方式进行排序并依给定的地址进行存储的阶段。在图书馆工作、知识数据库工作中，这一阶段的科学、技术含量都很高，并且十分明显。从知识元素的整序方法来看，图书馆使用的知识分类（即图书分类法）与知识数据库使用的知识分类有同有异，图书馆中的知识分类，主要是一种科学内容体系的分类，而知识数据库使用的分类，除了科学内容分类外，还大量使用一种包括语法、语义的逻辑范畴分类（即依事实、规则、规律、方法、理论等进行分类）^②。

4. 检索输出

它指检索方法、检索工具以及集合与读者交互界面形成与完善的阶段。优质的知识集合应根据不同情况，向读者提供书目、事实、数据、全文乃至超文本方面的检索服务。假如读者在查询某一学者著作的同时，还想亲睹其讲座的风采，甚至获取他在最新刊物上不断发表的论文，而一个知识集合的检索系统能恰如其分地给予满足，实现“知识增殖服务”，那么，读者会因选择其他信息渠道在代价、收益方面逊于这种知识集合，而在今后倾向于经常来此咨询。

传统图书馆学内容主要生成于知识集合的组织过程之中。图书馆的图书采访、分类编目、藏书建设、读者服务等诸学科分支的形成，基本上是对图书馆工作流程的分段截取与刻画。这种“经验科学”的模式至今也未真正消融，仍对图书馆学研究具有某种程度的规定性。但是从知识集合的范畴来看，其组织过程固然是主要的研究领域，然而仅仅停留于此就显得过于狭促了。

① 姚玉川等. 知识系统.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8: 31, 109

② 何新贵. 知识处理与专家系统.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0: 24~

第三节 知识集合的功能

一、集合功能的特性

知识集合的功能是指其做功能力或其功用与效能。知识集合作为一种他组织系统，其功能特性有内在性、整体性和增殖性等几方面。

1. 内在性

知识集合的功能是由其内部元素与结构所决定的，因此，它是内在具有的，一经产生便具备了其功能量度的规定性。在一个知识集合中，如果知识元素质量低劣，如某化学系资料室收藏的皆是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前的文献，那么无论该结构多么优化，它的功能也是低劣的。这表明了知识元素对集合功能的决定作用。同理，知识元素按不同结构进行组织，集合的功能也有优劣高下之分，这说明了结构对集合的功能也具有决定性作用。

2. 整体性

知识集合一旦产生，它就具有了自我整体质。这种整体质是其内部组分即知识元素自身所没有的。因此，知识集合与一般零散分布的客观知识单元虽同属“世界3”范畴，但它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却有着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知识集合的整体质，规定了其功能的整体性。所以，美国诗人麦克施利问：一本书与图书馆其他书籍放在一起之后它们变成了超过一本书的某种东西了吗？图书馆学家谢拉回答：当然是这样，并举花环之美是由每个花朵组成的例子，予以了巧妙的说明^①。这件事例表明，当知识元素成为集合的一部分时，它就或多或少包含了集合整体的信息，与其此前有了质上的不同。尽管有时排入图书馆书架上的某一本书较长时期无人借阅，

^① [美] 杰西·H. 谢拉著；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77，101

但此书对图书馆整体功能的作用也不能因此而被抹杀。因为集合对个别元素除了“释放”，有时也会产生“屏蔽”，但我们知道，集合对元素的屏蔽有时恰是产生集合整体质与整体功能的必要代价。正所谓“有所不为方有所为”。

3. 增殖性

系统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对于知识集合也是适用的。而且依据贝塔兰菲的观点，知识集合的整体质、整体功能的出现，也可看成是新的、突发的、瞬间形成的^①，同时还含有全新的增殖部分。不仅理论上如此，从实践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知识集合的形成，其中都包含了大量知识与技术组合的劳动，这些智能劳动必然转化、凝结成知识集合的新能量，使其具有增殖性功能。如中国社会科学院 20 世纪 80 年代曾建立一个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录存了《全唐诗》、《十三经》、《诸子集成》、《明儒学集》等数以千万字的全文数据。该数据库不但可阅读，同时还具有原文核校、事实考据、词语研究、查重辑佚、分析统计、编制索引以及重新排印等功能。这些功能都具很高的增殖性。90 年代他们陆续推出的《全唐诗索引》就是在原有数据库基础上生成的^②。

二、知识集合的三大功能

人们论及图书馆，常能罗列出它有收集文献、保存文献、利用文献以及社会教育、情报交流、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图书馆仅是知识集合中的一种重要形态。知识集合的功能有许多，但基本功能有三个：知识存储、知识检索、知识优控。

1. 知识存储功能

知识集合通过知识元素的采集、整序、储存，使其具有了客观知识的存储功能。哲学家波普尔提出过两个思想实验：“实验（1）：

① [奥] L. 贝塔兰菲著；秋同等译. 一般系统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64

② 栾贵明等. 全唐诗索引·李白卷. 北京：现代出版社，1995：1~3

我们所有机器和工具，连同我们所有的主观知识，包括我们关于机器和工具以及怎样使用它们的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然而，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显然，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我们的世界会再次运转。实验（2）：像上面一样，机器和工具被毁坏了，并且我们的主观知识，包括我们关于机器和工具以及如何使用它们的主观知识也被毁坏了；但这一次是所有的图书馆也都被毁坏了，以至于我们从书籍中学习的能力也没有用了。……我们的文明在几千年内不会重新出现。”^① 这两个思想实验表明，人类客观知识主要是通过知识集合来保留与积累的。人类只有为零散分布的那些知识单元建设一个专门的“知识仓库”，才能克服客观知识因零散、随意而易失传亡佚的弱点。

2. 知识检索功能

知识集合的知识存储与知识检索功能是共生的。有序存储是有效检索的基础，有效检索又是有序存储的目的，两者不可分离。从检索方式看，人类现已由人工手检过渡到计算机机检。尤其是进入网络时代，社会信息资源出现了新的特征：数字化形式、网络传送、多媒体和多载体、内容覆盖社会多领域、分布无序、难于规范化与结构化、内容特征抽取复杂、用户界面要求高等，这一切迫使现代技术把信息检索作为焦点进行关注。现在网上信息检索系统多如牛毛，如 WWW (World Wide Web) 把各种形式的信息（文本、图像、声音等）无缝隙地集成在一起，用户仅提出查询要求，而具体到何地、如何取回信息都由 WWW 自动完成。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信息检索智能化越来越高，智能搜索引擎 (Intelligent Search Engine)、智能浏览器 (Intelligent Browser)、智能体 (Intelligent Agent) 等正不断更新发展^②。可以预见，计算机信息检索技术、

① [英] 卡尔·波普尔著；舒炜光等译. 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16

② 王娟琴. 现代信息检索方法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99：49~51

知识检索技术的突飞猛进，必将对知识集合检索水平的提高起到引领作用，促使知识集合的检索功能不断加强与完善。

3. 知识优控功能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日益加快，信息泛滥、信息污染逐步成为人所公认的公害。各种传媒每天包围着人们，无数出版物正如潮水般地涌现。对于仅仅需要其中一小部分的个人来说，他时刻有着被淹没的感觉。专业化促使大量新期刊每年面世，但受过教育的人多数只能了解本专业的知识，因学习成本较高，他们已无能力去知晓更多。而且，社会工作和生活的快节奏也压缩了人们获取有效知识的时间，就连人们集中注意力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如电视广告从过去的数十秒已缩短到10秒或者5秒。所以，一面是信息泛滥，一面却是知识贫乏^①。在知识贫乏的背景下，客观知识的无序化运行又使得失效知识、虚假知识扩张。此时，知识集合的优控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任何一个知识集合都会对知识的范围、深度进行选择和控制，对所收集的知识元素进行优化组合。因此，对于人们获取知识以及对于客观知识的适度增长，知识集合的优控功能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四节 知识集合的环境

一、环境与集合之关系

知识集合的环境是指对集合产生影响与作用的外部因素的总和。用数学语言表达，以S表示一个集合，以E表示环境，那么 $E = \bar{S}$ 。此处 \bar{S} 是S的补集，它由属于全集而不属于集合S的所有元素组成（见图7-3）。

知识集合的环境与知识集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进行着

^① [美] K. R. 塞得曼著；刘全根等编译. 情报过剩，知识贫乏：来自情报社会的挑战. 国外图书馆情报工作，1993（1）：1~2，12



图 7-3 知识集合的环境

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知识集合功能发挥得如何，往往受环境的制约。如把一个数字化图书馆建设在文盲充斥的地区，其作用因环境之差而会大打折扣。反之，知识集合也会对环境的变化产生影响。如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

人才的培养是关键。而解决西部人才培养问题，就要促进知识、信息要素向西部地区流动。办好西部的各类型图书馆（包括特色图书馆），培育适合西部开发需要的各种知识集合，无论对西部人才的培养，还是对外来客户、资金的吸引，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环境与集合共构的空间

知识集合的环境不是一种自然环境，而是一种社会环境、文化环境。集合与环境组合，构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立体空间。这一空间的主要方面是什么呢？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埃斯卡皮在论述文学时说：“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①如果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知识集合现象，可以说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集合使用者是知识集合现象的三个重要方面。这三个方面不但组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空间，给出了知识集合环境的关键要素，同时也表示出了这一空间的“支点”所在，反映出知识成果、集合形式与社会受众三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图书馆学以知识集合为研究对象，就要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不同向度的深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突破以往图书馆学仅关注图书馆（无论是“图书馆事业”，还是“抽象图书馆”）而忽略客观知识、知识集合使用者的传统研究范式。

以经济学的百科全书《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为例，其所

^① [法] 罗·埃斯卡皮著；于沛等选译. 文学社会学.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

以能成为世界公认最权威的经济学知识集合，是因为该辞典所收条目不仅在范围上很好地涵盖了经济学领域，反映出经济学中的最新知识成果，而且连经济学知识源方面的条目（经济学图书馆和专业杂志等）也一并收罗进去。如编者之一斯特奇斯就撰有这样一个条目——“经济学的图书馆和文献使用”。这表明，该辞典在选择、划分经济学知识单元时是独具匠心的。其次，我们从该辞典撰稿人（知识集合生产者）方面看，他们由34个国家近1000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皆厕身其间。他们将经济学知识浓缩、提炼，汇粹一书，不但保证了知识元素的真实可靠，同时其知识诠释的科学性也不容置疑^①。一般来说，一个学科的成熟程度与该学科的知识积累（表现为文献积累）程度成正比，甚至可进一步说，一个学科有无权威性大辞典，也是表示该学科成熟程度的一把标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已成为经济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它经常受到使用者们的啧啧称赞。因此，对于一个现实的知识集合来说，知识元素是如何采集的？知识集合生产者具备怎样的素质？集合自身的结构、形态是怎样的？集合的使用者能否获得最大效益？这都应是当今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三、环境发展对知识集合的需求

人类社会的进步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在“前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主要取决于该社会的劳动供给能力和资本供给能力；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直接决定着该社会产出知识与运用知识的能力。传统的“物质生产力”概念，将被“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概念所取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越来越取决于该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②。这是人类社会

① 张军. 在长期, 我们都死了.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 2000. 1. 18 (11)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小组. 国家创新体系与人文社会科学. 光明日报, 1999. 11. 5 (5)

一次静悄悄的变革。由于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主要靠社会化、市场化的知识供给机制来保障,如知识的创新、存储、流通、应用的机制及此机制的市场化,因此不可否认的是,一个社会拥有知识集合的数量多寡、质量优劣,对社会知识供给能力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知识集合的作用将在社会知识供给能力中逐步突显出来。而随着这种突显,图书馆学研究也会日趋重要,最终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肯定。

关 键 词

知识集合类型 准知识集合 知识元素 知识集合结构 五级藏书模式 知识集合组织 知识集合功能 知识集合环境

小 结

1. 知识集合是对图书馆、字典辞书、书目索引、数据库等“类现象”本质的揭示与描述。知识集合在客观知识世界具有独立的存在形态。依不同的分类标准,知识集合可划分出不同类型。如依知识元素的状态,可划分出原生态知识集合、再生态知识集合。各类型知识集合之间、知识集合与非知识集合之间的分界线,有时具有模糊性、交错性。

2. 知识集合的元素具有多元性、同质性、有序性三个重要特性。知识集合的结构是指知识集合之间联系方式的总和。从知识集合的排列方式看,知识集合的结构通常有线性、树型、图型三种形态。知识集合的形成,一般要经过设计规划、元素采集、整序存储、检索输出几个阶段。

3. 知识集合的功能特征是内在的、整体的、增殖的,其基本功能有三个方面:知识存储、知识检索、知识优控。

4. 知识集合的环境是指对知识集合产生影响与作用的外部因素的总和。集合与环境组合成图书馆学研究的立体空间。客观知

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这三方面组成了图书馆学的研究空间。

思 考 题

1. 为什么说知识集合是“类现象”本质的揭示与描述?
2. 为什么说书店不是知识集合?
3. 知识集合的元素有哪几种基本特性?
4. 知识集合的结构通常有哪几种形态?
5. 知识集合的三大功能是什么?
6. 图书馆学的研究空间由哪几方面构成?

第八章

图书馆学核心内容（三）：知识受众

知识受众是知识的接受者、获取者，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客观知识只有被知识受众吸收、利用，人类社会的知识传承、知识创新才能得以实现，知识集合的中介作用才能得以发挥。没有知识受众这一实体的存在，客观知识、知识集合就会失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因此，知识受众是图书馆学继客观知识、知识集合之后的一个重要研究客体。

第一节 知识受众及其本位观

知识受众是在以往图书馆学“读者”概念上借鉴大众传播学“受众”概念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图书馆学概念。在知识媒介不断发生变化的当代社会，知识受众较“读者”一词，在概念的内涵、外延上更具有现实上的适应性与内容上的专指性。

一、读者概念的演变

读者，是社会个体或群体一种身份上的称谓，指的是具有阅读能力与阅读行为这两个本质特征的人。图书情报学界、新闻出版界、文学社会学中都经常使用“读者”一词，虽然使用领域不同，但其内涵意义并无大的区别，然而在某些外延上，区别还是明显的。如图书馆

学中的读者，通常指称接受知识服务的到馆者；新闻出版界的读者，既是知识内容的阅读者，又是知识产品的消费者；文学社会学上的读者，却往往指的是那些能与作家创作对话并能解读文本的阐释者。

从语言演变的过程来看，“读者”一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很早。如汉代学者桓谭称司马相如写的《吊二世赋》，“其言恻怆，读者叹息”^①。梁朝刘勰《文心雕龙》载“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②。宋代欧阳修《新唐书·柳宗元传》言柳氏被贬为永州司马，“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③。从上述例句可看出，“读者”之涵义与今不同，它专指阅读某书或某诗文之人。“读者”一词与“购者”、“饮者”相似，是在一定语境中出现的具有限定意义的一个词组，尚不是一个阅读人的集合概念。

直到近代，印刷书籍和报刊的普及，使阅读和书写已不再是少数人掌握的“专利”，知识信息批量的复制与快速的传播渐渐培育、塑造出了阅读的大众，“读者”才有了泛指阅读书刊之人的涵义，变成了一个集合名词。不过，20世纪初年的中国图书馆界，仿日本语而多将图书馆的读者称为“阅览人”或“阅书人”。如1901年武昌《日知会阅书报处启》及1915~1919年京师图书馆五年的《年终工作报告》，均将入馆读者称为阅览人或阅书人^④。杨昭愬《图书馆学》也仿日译将英文 readers 译成“阅览人”。1929年5月，徐能庸编译《图书馆学九国名词对照表》，仍将英文 reader、德文 leser、法文 lecteur 等译为“阅览人”，释曰：“常至图书馆中

① [汉] 桓谭. 新论·补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69

② [梁] 刘勰著; 杨明照校注. 文心雕龙·练字. 上海: 中华书局, 1962: 254

③ [宋] 欧阳修. 新唐书·柳宗元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132

④ 李希泌, 张叔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78~179

翻阅图书或研究学问者。”^①30年代以后，我国图书馆界才渐渐放弃“阅览人”一词而以“读者”代之。1930年7月，出版家、图书馆学家王云五的《王云五大辞典》收录了“读者”，条目释义为“阅读书报文字的人”^②，而“阅览人”则未收录。后来李钟履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清末至1949年），从其收录的大量文章题目中可看到，30年代以后“读者”一词的使用才渐渐多了起来。进入40年代，“读者”在图书馆学界、新闻界、出版界以及文学界已广泛流行，成为文化学术界经常使用的通用名词。

20世纪80年代初，图书馆学研究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进程全面复兴。“一切为了读者”、“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等成为图书馆界共赞的口号。读者研究也从以往简单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进入到理性思维的研究阶段。如黄恩祝呼吁建立“读者学”，要对读者史、读者心理学、图书馆终身教育等命题进行深入研究^③。沈继武则撰文指出，读者是一个社会概念，“凡是具有利用图书馆资源条件的一切社会成员，包括个人、集体和单位，都可以成为图书馆的读者”，并阐释了“正式读者”、“临时读者”等不同概念，以及读者服务的四个原则^④。经统计，1979~1985年，研究读者及读者工作的图书馆学论文已达1500篇左右，其主题涉及读者服务、图书流通、图书宣传、读者行为、阅读心理、馆际互借、参考咨询、定题服务等。然而，正当读者研究不断深入之时，“用户”一词也在图书馆学界流行开来。“用户”在80年代初是情报学界高频出现的主题词，但很快就被图书馆学界吸收过来。一位敏感的图书馆学研究者曾写道：随着文献载体的多样化，如声像文

① 徐能庸编译. 图书馆学九国名词对照表.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0: 29~30

② 王云五主编. 王云五大辞典.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0: 64

③ 黄恩祝. 读者学浅说(上、下).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 1980(3): 49~54, 1980(4): 12~19

④ 沈继武. 试论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意义与原则. 图书情报知识, 1982(2): 1~7

献的涌现，“用户”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图书馆界一直享有盛名、使用频率极高的特定称谓——“读者”。“用户”与“读者”，现已在图书馆学界交替使用、频率不相上下，但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用户”可看做“读者”概念的某种延伸^①。这些变化表明，图书馆学中的“读者”概念是在变动中不断发展的。

二、知识受众的概念

有文献才有读者，有读者才实现了文献的价值。文献与读者二者皆备，才能完成知识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但是，文献作为知识媒介，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必然会对读者产生巨大的影响。知识媒介是记录有知识的载体。每一种新的知识媒介的出现都会产生使用新媒介的群体，如书籍的出现产生了读者，广播的诞生产生了听众，电影、电视的发明产生了观众，互联网的出现培养出大批网民。当知识媒介是纸质印刷书刊时，人们获取知识主要通过阅读理解。印刷型知识媒介创造了印刷文化，它与口传文化不同，因印刷文本的独立存在、可个人阅读，它使社会个体更有独立性、自主性；因印刷文本便于传递、保存，社会文化便更具超时空性，所以，幅员辽阔的中国，方言各异，但共同使用的汉字帮助我们维系成一体。但是，电子形式的知识媒介大量出现以后，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与途径等就发生了改变。广播、影视、卫星通信、计算机网络不仅空前提高了知识复制能力，而且使得知识存储加工能力、时空穿透力大大加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多样化、快捷化、全球化成为当今知识社会的显著特征。人们获取知识不再依靠“文字阅读”这个单一途径了。知识的获取正由视觉捕捉向听觉捕捉、触觉捕捉、味觉捕捉以及全感捕捉多元化方向发展。因此，建立在纸质印刷品基础上的“读者”概念，已经不能涵盖当代社会“知识获取者”的意义。这就像“图书”不能涵盖各种新型载体的文献一

^① 赵继范. 读者、读者学、读者心理学. 图书馆学研究, 1985 (4): 52~53

样。我们有必要用新的概念来指称知识社会中的知识获取者。

知识受众，指的是一切通过知识媒介接受知识、获取知识的人。换言之，知识受众是知识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的读者、听众和观众的总称。“受众”（audience）是大众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在1985年随美国传播学之父W. 宣伟伯的《传播信息与人——传学概论》（余也鲁译述）传入我国内地的。受众的涵义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的另一端的读者、听众与观众的总称”^①。此前，我国大陆学者将 audience 译为“受传人”，我国台湾学者则译为“阅听人”。台湾学者的译称在词义上较为恰切，因为 audience 最原始的词义是“倾听”，特指注意所听之言。但阅、听皆为个人接收信息的行为方式，并不反映信息接受者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故将 audience 译为“受众”，因其含有深刻的寓意，受到了我国大众传播学界的一致认可。然而，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泛指通过传播媒介接受一切信息的人，概念范畴十分宽广，图书馆学不宜简单移借使用。图书馆学研究的是知识的交流与传播，知识只是信息的一部分，并非信息的全部，因而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受众”只能是“知识受众”，这就与普通受众的概念有所区别。

从语言社会学角度来看，“知识受众”与读者、听众、观众、网民、用户等概念相比较还欠缺一定的简洁性，且不太符合汉语构词习惯与传统，为了使用的方便以及吻合汉语构词法，我们可将“知识受众”简称为“识众”。“识”，是“知识”、“认识”两个名词、动词的凝结；“众”者，社会公民之称谓也，其中隐含了知识接受者与获取者都是普通的群众之意，应平等对待。

知识受众概念的提出对图书馆学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知识受众在概念上具有明确的所指（signifié）。以往人们常用的读者、用户等概念，均未抓住求知者的本质特征，即它们只表达出了知识获取的行为方式，并未涉及求知者获取的内容特征

^① 陈崇山. 论受众本位. 见：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 解读受众：观点、方法与市场.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70

与求知者所处的地位特征。因此，“读者”相对“知识受众”，其内涵与外延均显得狭隘；“用户”相对“知识受众”，其内涵与外延又显得过于宽泛，如信息的使用者可以称为用户，图书资料的使用者也可称为用户，电冰箱的消费者也可称为用户。相比之下，“知识受众”却有着恰当的专指度。

其次，在以往图书馆学中，读者多指到馆接受图书馆服务的社会公民，那些未直接利用图书馆资源的社会公民，被排斥在图书馆学研究视域之外，通常被称为“潜在读者”而处于“现实读者”的边缘。这种思维显然已经陈旧落伍，应予以摒弃。图书馆学应该关注全社会的知识接受者与获取者——知识受众。图书馆学除了对利用图书馆资源的知识受众进行认真研究之外，还应对所有通过知识媒介获取知识的人们的知识现状、知识需求、求知心理、阅读兴趣，乃至知识使用效果诸命题进行认真研究，为提高全民族的知识获取能力及全面的知识素养作出贡献。因为，知识受众不是一个有着“围墙”限定的概念，图书馆学也应成为与社会公民息息相关的一门开放性的学问。

三、知识受众本位观

本位，是依事物的根源、主体提出的一种基本标准与参照系。它表明人们社会活动的某种价值取向。如货币制度中的“金本位”、社会学中的“官本位”、法学中的“权利本位”等概念，都是与其他事物相比较而提出的一种基本坐标与参照系。图书馆学研究中也曾经出现过“书本位”、“人本位”的概念，并有人提出，图书馆工作要从“书本位”转向“人本位”。所谓知识受众本位观，就是知识工作者（知识生产者、知识组织者、知识传播者）以知识受众为中心，努力满足知识受众需求的一种观念及意识。为什么要使知识工作者树立知识受众本位观呢？主要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在知识交流过程中，知识受众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是最终实现知识价值的承担者

根据信息科学“信源→信道→信宿”的公式，在知识交流过程

中,知识受众是知识交流与传递的目的地。知识价值的实现,是以识众的存在为前提的。知识价值包含了知识内容创造者和知识产品生产加工者两个方面合成所带来的价值,它们最终要通过识众的阅读、收听、收看等吸收与接受方式来得以实现。在知识传递与交流中,识众是不能“缺席”的。图书馆学研究的历史起点是客观知识,历史终点则是知识受众。知识受众是图书馆学人文关怀的终极目标。因此,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应树立识众本位意识,一切工作、研究都应服务于识众这个中心。

2. 知识受众不是知识媒介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的选择者

首先,知识受众对各种知识媒介的利用都是有选择的。据1997年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受众调查数据显示,人们获取信息知识时,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段里选择的传播媒介有所不同。如早上8点钟以前,广播的收听率最高;上午8:00~12:00点,人们的主要兴趣是读报,报纸形成了对广播的替代;中午时段,广播、报纸、电视的接受率差距不大;下午14:00~18:00点,报纸的阅读率又大为提高;晚上18:00~22:00点,各种媒体的接收率都相应提高,但电视的替代作用最强^①。这种传播媒介的联动、互替现象的发生其实就是由识众选择造成的。其次,知识受众对其所需的知识内容是有选择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过剩”、“知识超载”问题越来越严重。以阅读为例,识众如果不进行读物的选择,就会出现阅读浪费。因此,识众在吸收知识内容时,都会根据自身的具体要求去进行主动的选择。而且伴随着识众素养的不断提高,他们的选择意识也会越来越强。所以,当知识的选择性出现趋同倾向时,社会才会出现阅读“热点”、收视“热点”;而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为了引导识众的选择,就出现了大量的书评、推荐书目等。知识受众的选择性,表明其在知识传递与交流过程中具有主动地位、主体地位。

^① 宋友权主编. 中国广播受众学.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59~60

3. 知识受众的知识吸收也是一种知识阐释的参与过程, 知识受众通过知识媒介能与知识创造者实现双向互动与交流

阐释学的观点认为, 文本意义的解读, 取决于读者的介入程度。德国美学家格·格林的《接受美学》曾用几个公式介绍了读者介入对文本意义的重要作用。如公式 1:

$$S = A + R$$

S 表示作品文本的价值或意义结构, A 表示作者赋予的价值或意义, R 表示读者领会、赋予的价值或意义。这个公式表明, 作者与读者共同决定着作品的意义。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时代更迭发展因素, 那么就会得出公式 2:

$$S = (0 - A \text{ 恒}) + R \text{ 变}$$

“(0 - A 恒)”表示作品完成后作者赋予的价值或意义从无到有、恒定不变, “R 变”则表示读者是个变量, 不同时空、不同素养的读者对文本价值或意义的理解也会不同。假如这个变量随时空推移, 读者不断介入, 那么对文本价值或意义的理解也会随之变动, 无限增多。这样就又产生了公式 3:

$$S = (0 - A \text{ 恒}) + (R - \infty - R_{\infty}) \approx R - \infty - R_{\infty}$$

“R - ∞ - R_∞”代表读者理解从无到有, 从一到多, 价值或意义达到了无穷大。由于 R 变量无限增大, 达到极点, 这样作者赋予的意义 A 就会日益相对减少, 成为不必在意或并非必须计算的量, 几乎可以忽略。因而最后得出的公式 4 是:

$$S \approx R$$

这个公式表明, 文本的价值或意义取决于读者。换言之, 读者的理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观点无视文本的制约作用, 过分强调了读者的作用, 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但它揭示了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作用, 对这一点应该给予肯定^①。

4. 知识受众是知识交流过程的反馈源, 决定着知识媒介在传递与交流中是否需加强、减弱、转向或中断

^① 见蒋成瑀. 读解学引论.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200~202

知识受众在接受知识时一般会有积极接受、消极接受、拒绝接受等不同反应。由这些反应形成的反馈信息可以传输到信息源,帮助知识生产者、组织者、传递者了解知识的交流状况及最终效用,进而对知识传递与交流进行调整和改良。以广播媒介为例,通常一个节目播出后,平均300~500名听众中会有一个来信反馈对节目的看法。1997年我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收到听众来信近200万封,平均每天有5000余封,每530名听众就有一封来信。这些来信主要分四大类:参与类(如有奖征答)、服务类(点播、咨询、求助等)、社会类(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等)、听评类(批评、建议等)^①。这些反馈信件对检验广播效果、改进节目、提高广播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近几年来,一些大中型图书馆为了获得读者的反馈信息,在本馆的网站主页上设置了“留言板”、“馆长信箱”、“读者沙龙”、“图书馆论坛”等,这对促进图书馆与读者的信息双向交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总之,知识受众本位观是我们应当确立与倡导的观念意识。知识受众本位观是对以往图书馆学中“读者第一”、“一切为了读者”等理念的合理传承与延伸。知识受众本位观要求我们尊重识众的人格、保护识众的权益;要求我们重视对识众知识获取能力的培养;要求我们以识众需求为根据,合理配置知识资源,用一切方法去满足他们的现实需求。

第二节 知识受众的合法权益

保护知识受众的合法权益,是知识受众本位观在实践中的具体落实与重要体现,也是法律精神、法律效力在知识活动领域的正当切入。权益,在词义上讲是权利与利益的合成。在法学理论中,它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和应受到保护的合法利益。权利一

^① 宋友权主编. 中国广播受众学.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114~141

词比之权益，其概念外延较小，权利是利益的重要内容，且有比较具体的规定。权利是法律赋予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某种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通俗地说，它表示通过法律规则授予某人以好处或收益^①。

知识受众作为一般的权利主体（权利享有人）所享有的正常合法权利，如平等权、政治权利、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宗教信仰自由、社会经济权利、精神和文化活动自由等，通常会受到国家宪法和各种普通法的保护。同时，作为知识获取者这样一个特殊的权利主体，他们具有的合法权利也要受到现实法律的认可与保护。知识受众的合法权利具有鲜明的人身特点，是与其人身紧密相联的，知识受众权利是知识受众所享有的权利。一方面，人们只有在以识众身份获取知识时，才能享有这些权利，如果是从事知识生产、知识组织等活动，从事物质商品的消费等，那就不能享有这些权利。也就是说，知识受众的合法权利是以识众资格的存在为必要条件的。另一方面，凡识众在购买、使用知识产品或接受知识服务时，都享有这种权利，即识众合法权利又是以其身份的存在为充分条件的，一旦人们以识众身份出现时，他们就毫无例外地享有自己的合法权利。

一、知识受众的具体权利

知识受众在获取知识的活动中，具体享有以下几种权利：

1. 平等获取知识权

从知识产品、知识服务的性质方面来看，由于可共享性是客观知识的一个基本性质，知识产品通常又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它具有非分割性（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可由众多消费者共同享受）、非竞争性（每增加一个消费者，其边际费用是零）、非排他性（消费者在使用知识产品时不排除别人能同时消费使用的可能）。因此，人们获取知识、共享知识的机会、条件应该平等。此外，人们在获

^① [英] 戴维·M. 沃克著；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773~775

得知识服务时，提供知识服务的社会机构（学校、图书馆等）由于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它们往往也具有上述公共产品的性质，其消费上的社会效用大于私人效用。尽管学校、图书馆在现阶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消费上的拥挤性、局部排他性以及消费数量非均等性等特征，但它们至少也属于“准公共品”^①，因此人们也要求在接受知识服务时，基本上实现机会、条件上的平等。

再从法律的规范来看，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的平等权给予了明确的说明，并将其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如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政治权利平等，无论从形式到实质都肯定了公民的平等权利。宪法第46条第1款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②根据宪法精神，我国现行教育法（1995年）第9条第2款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③，这正是对公民平等接受知识权利的一种保障。因此可以认为，知识受众平等获取知识的权利，是由知识的性质和法律规范所赋予的。1994年11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在巴黎通过，该宣言宣称：“公共图书馆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提供服务，而不论人们在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必须向那些因任何原故不能获得正常服务和资料的用户提供特别服务，例如向讲少数民族语言的用户、残疾人、住院病人或狱中囚犯提供特别的服务和资料。”^④这种平等获取知识的伟大理念，应该植根于每个图书馆员的内心

① 任俊生. 中国公用产品价格管制.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5~23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书(第1卷).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4: 20-29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见: 江平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释(第3册).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0: 221

④ 肖东发主编. 中国图书馆年鉴(2001).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592-594

深处。

2. 自由选择知识权

自由是指人的价值能在社会中得到充分实现，它主要表现在人格独立、抉择自由、价值实现等方面。自由也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价值观。欧洲人认为：“没有自由的奴隶必须服从主人，而平等享有自由的自由人则为自己建立一个政府，政府借助法律，而不是靠主人不受约束的意志来保证秩序。”^①因而自由理想的实现程度便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衡量尺度，世界各国的法律也都致力于保护公民享有自由权。自由权是具有自由人身份的权利或自由实现自己意志的权利。它以自由为客体，是由法律确认的。我国宪法对公民的自由权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享有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以及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等。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③这些规定表明，知识受众有权自主选择知识产品、选择知识服务，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知识受众通过知识媒介自由选择知识、获取知识，可以形成个体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发展自己的人格，实现“自我实现”价值、“自我统治”价值。当然，识众自由选择知识权能够不受妨碍、制约而得以充分行使，还需要知识提供与传播机构具备良好的支持功能。如图书馆作为“百科知识”的总汇，应该对各种文献兼收并蓄，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恰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所要求的，图书馆所收资料“必须既反映当前

① [英] 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编；马加乐等译.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87~288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书（第1卷）.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4：20~29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11~12

社会的潮流和进步，又记载人类努力和想像力的往事”，图书馆“馆藏和图书馆服务不应屈从于任何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宗教审查制度的或商业的压力”^①。

3. 知识信息知情权

知情权又称知悉权。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②由于知识产品大多具有商品的特性（如图书、报刊、光盘、磁带），知识服务机构（如图书馆）作为公益事业又是依靠纳税人的税金经政府创办的，故而知识受众在购买、使用知识产品以及获得知识服务时，依据上述法律条款，他们也享有知识接受的知情权，如识众有权知道自己购买、借阅的书刊是否为盗版，有权了解自己所需文献单元、知识单元的内容梗概、详细出处等，有权了解图书馆服务的范围及各种规章制度。而且，知识产品与知识服务的提供者和识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识众往往处于“弱者”地位，那么法律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必须站在识众的立场上，对其合法权益给予坚决的法律保护。

4. 知识服务保障权

我国提供知识服务的社会机构很多，如教育、出版、广播、影视单位，以及图书馆、档案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1993年）及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发布的有关法规条例，上述知识提供与传递的服务实体，应该保证知识产品与知识

^① 肖东发主编. 中国图书馆年鉴（2001）.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592～594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11～12

服务具有良好的质量，如图书内容的文字差错率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电视节目中不能插播过多的广告等。

图书馆作为人们获取知识的门径，应当为识众的终身学习、独立决策、文化发展提供基本的保障条件。具体而言，识众在图书馆中的服务保障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获取最好服务的权利。即图书馆应向识众提供与国力、经济力、技术能力等相适应的图书馆服务；应该根据识众咨询的难度推荐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图书馆员为其解疑释难。②保障阅读时空的权利。即图书馆应达到规定的开放时间，并向识众提供建筑设计允许设置的座位数量等。③接受知识获取能力培训的权利。即图书馆应帮助识众学会检索、评价知识的技巧，提高识众的理解力、想像力和鉴赏力。④保守隐私、秘密的权利。即识众的个人资料、阅读记录、E-mail地址、知识获取的倾向等诸多获取知识存留下来的行为事实，均属个人秘密或隐私，图书馆应为其承担保密义务，保障知识受众的精神自由，实现“个人情报自我支配”^①。

5. 批评、建议和监督权

我国宪法第41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②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5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有权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提出批评、建议。”^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知识受众

① 李国新. 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298~302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书(第1卷).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4: 20~29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7: 11~12

在获取知识的消费活动中，有权对知识生产者的知识产品、知识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督；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保护知识受众权益工作中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申诉、控告或检举；有权对保护知识受众权益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有权为反映知识受众的意志或要求而参与知识服务单位的重要决策。

二、知识受众的义务

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又是密不可分的。权利主体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因为，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主体在承担义务时也就转换成了义务主体。义务主体通过作为（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为（不作出一定行为）来履行其应当承担的义务。知识受众的义务是基于其合法权利而产生的合法义务，这些义务大多具有“不作为”方面的规定性。也就是说，他们履行的义务大多为“消极义务”，即不得实施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并以此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具体而言，知识受众具有遵守知识服务机构专门法规的义务，如遵守图书馆法或图书馆规程的条款；具有爱护公共财产的义务，因为我国宪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①；具有遵守公共秩序的义务，如遵守图书馆为有效进行知识传递与交流而建立的各项合法行为准则等。

在实践中，知识受众个体经常有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发生。但从总体状况来看，知识受众合法权益被侵害的现象要远多于其不履行义务的现象。这些侵害现象的发生，原因十分复杂。有些侵害现象是由社会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如“数字鸿沟”造成的对知识受众平等获取知识权的侵害。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指信息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书（第1卷）。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4：20~29

时代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它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教育程度阶层之间和不同收入阶层之间也都存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2年7月22日发布的第十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截至该年6月，我国网络用户总数已达4 580万人，WWW站点约有293 213个。但网络用户与WWW站点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西北部地区数量明显偏低。北京、广东、上海三地的WWW站点就占了全国总数的51.3%，而赣、桂、黔、滇、晋、蒙、陕、甘、宁、青、新、藏12个省区的WWW站点加起来也只占到全国总数的5.9%，还不及江苏一省（占总数6.3%）^①。仅此一例可知，我国也存在着严重的数字鸿沟问题，它会使社会出现“信息落差”、“知识分隔”、“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此外，还有些侵害知识受众权益的现象是由知识提供者、知识服务者观念落后造成的。如图书馆工作中的“读者歧视”造成的对读者平等获取知识权、自由选择知识权的侵害。读者歧视，是图书馆工作中表现出的对读者不平等的待遇。以高校图书馆为例，某些图书馆本馆工作人员有着比其他师生读者多得多的特权；就是在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的借书时限较学生的时限也要长一些；而一些专业图书馆或资料室，仅对本院系读者开放，拒绝接待外院系的读者。凡此种种，都是读者歧视现象，违背了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学校图书馆宣言》中“平等服务”的基本精神。以往的图书馆工作将“区别服务”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恪守，这固然有利于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发展，但其“分清主次、保证重点、照顾一般”^②的理念，显然已有悖于时代发展的要求，有悖于现代图书馆人文精神。至于开放时间缩水、阅览空间挪用、乱收费和乱

^① <http://www.cnnic.net.cn>. (访问时间：2002.11.2)

^② 张树华，赵世良等编. 图书馆读者工作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6

罚款、清规戒律杂多等图书馆界的通病，更是对知识受众的侵权行为。这些现象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知识受众本位观长期停留在口号、标语层面，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图书馆领导法律意识的淡漠。图书馆是最难抹去计划经济印痕的社会部门之一，曾经屡屡遭到社会各界的批评与指责。然而，“春风难度玉门关”，广大图书馆从业者对此无不充满深深的忧虑。

第三节 知识受众的需求与服务

一、知识受众的成分与结构

1. 知识受众的成分

区分知识受众的成分有助于了解其个体与群体获取知识的活动规律。知识受众成分指的是识众本身具有的自然特征或社会特征表现出来的身份属性。人的自然特征、社会特征有很多，如身高、肤色、口音、地位等，而对于识众获取知识活动起着明显影响和制约作用的特征，主要有性别、年龄、生理功能、民族、文化、职业等几方面。

(1) 性别。性别是人的自然属性。知识受众依性别可划分出男性识众与女性识众两大类。性别的差异，使得识众具有不同的知识获取特点。据一些调查资料显示，从总体上看，男性识众对理性知识有所偏爱，女性识众对感性知识更为敏感；男性识众知识需求范围较广，女性识众知识需求范围相对较小；男性识众更乐于通过逛书店、去图书馆发现知识信息，女性识众更乐于接受他人传递的知识信息。

(2) 年龄。年龄也是人的自然属性。知识受众依年龄可区分为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年龄对识众的心理、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也很大。不同年龄的识众对知识的感悟力不同，需求范围也不同。比方在人文、社科类图书的阅读品好上，儿童喜爱故事书、科普作品，青年人则喜欢文学名著、经典著作，中老年人则好

读历史、哲学，且对古籍有较大兴趣。尽管少年儿童读书的注意力更体现在趣味性上，但儿童期喜好读书对成年后的读书习惯有着积极的影响。2001年法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报告《读书从家庭开始》指出：成年人读书习惯的“根”在童年时期已经扎下，有2/3爱读书的成年人，在其8岁至12岁就酷爱读书，不爱读书的成年人有一半在儿童时期也不爱读书^①。

(3) 生理。丧失部分生理机能的知识受众，与身体健全的知识受众在知识获取中也有较大差异。如盲人只能摸读盲文读物，聋哑人需要手语。还有些残疾人虽然能正常视听、阅读，但他们在接受知识服务时，要克服行为上比常人多得多的困难。通过学习、汲取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

(4) 民族。民族是人的自然、社会两方面交叉的一个属性。各民族知识受众因在血统、信仰、风俗、语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其知识接受的方式上也有一些不同特点。如有些少数民族对知识的口述传统非常珍视，喜欢阅读本民族文字的书籍，尤其青睐宗教经典、史诗、民歌、医学著作等。

(5) 文化程度。文化程度是人们的社会属性，它一般是由知识受众受教育的程度反映出来的。学历、职称等是区分识众文化程度的外在标志。据《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不同文化程度的识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也有所不同（见表8-1）^②。

表中数据表明，无论文化程度的高低，电视都是识众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此外，文化程度越高的人，通过报刊、图书、因特网等现代、复杂、理性的媒介和渠道获取科技信息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他们主动探索的因素高于文化程度较低者；而文化程度较低的识众，接受信息知识的渠道主要是与亲友同事交谈、广播、电

① 佚名. 读书习惯从小养成. 参考消息, 2001. 5. 21 (6)

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 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2: 74

视等较为感性、简单的手段与媒介。

表 8-1 不同文化程度识众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 (%)

知 识 渠 道 程 度	报 纸、 杂 志	图 书	广 播	电 视	与 亲 友、 同 事 交 谈	因 特 网	其 他 渠 道
小学以下	9.2	1.6	10.7	71.2	46.9	0.0	8.9
小学	21.1	2.9	12.1	83.7	37.4	0.1	4.8
初中	53.1	4.8	10.6	88.5	18.5	0.4	2.9
高中或中专	73.3	7.5	6.6	87.6	7.6	2.5	1.2
大专	84.3	11.2	6.2	80.6	2.0	9.3	1.0
大学及以上	81.2	19.1	5.3	72.4	0.0	15.9	1.5

(6) 职业。职业是人的社会属性，它既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也是个人谋生的基本方式。不同职业的知识受众知识需求的内容也不同，而且由于职业具有一定时期的稳定性，因此从职业出发形成的知识需求倾向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如大学生有围绕专业学习、兴趣爱好而选择知识的倾向；科技工作者更多地需要的是科技知识与专题资料；公务员则倾向于管理、哲学、社会学、人才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企业员工则偏重阅读技术、文化考核、证券、法律常识方面的书籍等。

此外，影响与制约知识受众的身份特征还有城乡差别、收入水平等，这都是我们在研究、分析识众组成成分时的重要依据。通常，研究知识受众的需求往往要先对其成分进行抽取与分类。在抽取成分类型时，要结合识众群体状态以及与研究课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成分特征。如要通过抽样调查了解大学生的阅读倾向，首先要抽取的大学生成分特征是性别、年级，其次才是专业。要先考虑共

性，再考虑个性；要先一般，后个别。还有，抽取识众成分类型要适度，过多则流于繁琐，过少又说明不了问题。

还需要指出的是，知识受众成分与知识受众类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识众身份的一种确认，不仅适用于识众个体，也适用于识众群体；后者则是依识众身份或身份以外的因素对识众群的一种划分与确认，一般只适于识众群体。如以往图书馆学可以依读者身份将读者群划分成男性读者、女性读者两大类型，也可以依非身份因素——读者有无借阅行为，将读者划分为现实读者和潜在读者两大类型。因此，在概念范畴上，知识受众类型比知识受众成分涵盖的范围要广泛。知识受众成分只是知识受众类型划分的基本依据之一。因为，人们对知识受众类型的划分，更多地是凭借其不同成分进行的。

2. 知识受众的结构

结构是事物构成的方式。只要一事物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素组成的，它就存在着结构问题。系统论将元素之间一切联系方式的总和叫做系统的结构。当我们将知识受众视为一个群体、一个集合、一个系统时，它也就有了结构的问题。图书馆学中曾有“读者群”这一概念，读者群是具有某种共同成分及共同需求的读者群体。前苏联是最早使用“读者群”概念的国家之一，19世纪就曾出现了具有集合意义的“读者公众”（Читающая публика）一词，当时指全部读者群众，或居民中大多数文盲和半文盲，与读书的“上流社会”对比使用。20世纪前期就产生了“读者群”（Читательство）一词，它强调了读者成分的群体性、稳定性。后来常用术语是“读者队伍”（Читательская аудитория），指从同一来源（图书馆）以获取各种图书为目标的读者体系，“读者队伍”在空间上是分散的，个人读者可随时加入或退出这个并非独立、完整的以及不稳定的构成体^①。当人们对读者群中的读者成分进行分

^① [苏] В. Ф. 萨哈罗夫等著；赵世良译. 图书馆读者工作.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0，200

层、分类研究和描述时，实际上也就是在对读者群的结构进行研究与描述。因此，读者群或知识受众的结构，指的就是读者或识众的个体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

例如，1997年4月北京图书馆曾做过一次读者调查，在读者相对集中的12个阅览室发放了1050份问卷，回收827份（回收率为78.7%）。如果将被调查者视为一个群体、一个集合，通过对该调查者的年龄成分、学历成分的统计分析，调查者便可得出该群体的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见表8-2、表8-3）^①：

表 8-2 被调查群体的年龄结构

年 龄	25岁 以下	25~35 岁	36~50 岁	51~60 岁	61岁 以上
数 量					
人 数	261	310	97	68	91
占总量百分比	31.5%	37.5%	11.7%	8.2%	11%

表 8-3 被调查群体的学历结构

学 历	无学历	大专以下	大专	大学	硕士以上
数 量					
人 数	123	17	70	355	262
占总量百分比	14.8%	2%	8.4%	42.9%	31.6%

在表8-2中，35岁以下的读者占69%，约为总数的2/3，其他年龄层的读者各占10%左右，说明北京图书馆的服务对象的主体是青年读者。在表8-3中，大学以上学历的读者占到3/4，大专及大专以下学历的读者仅为1/4，说明北京图书馆的读者文化层次较

^① 富平. 转变服务观念，改变服务格局：北京图书馆读者调查报告. 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2）：7~12

高。在这两个表格中，读者群在年龄之间、学历之间有分层关联，这种层次之间的关联就形成了知识受众的一种结构关系——空间排列分布。

任何一种知识媒介、知识服务机构都会有其知识受众群。知识受众群中的个体之间在现实中不会发生必然的联系，但知识受众的研究者，将其作为一个特定时空中的群体来观察，该群体中的个体之间就会存在某种联系。揭示这种联系，描述联系方式，是知识受众结构研究的主要任务，也是了解识众的必要手段。

二、知识受众的需求与服务

1. 知识受众的需求

需求是个体感到某种欠缺和不足而力求获得满足的一种内心状态。它往往通过愿望、意向等外显方式表现出来，被人间接地认识或理解。需求具有对象性，它总是表现为对一定事物的追求。1954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 1908~1970）曾把人的基本需求按“优先等级”分为五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尊严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除第一种需求为生理需求外，其余均属心理需求。马斯洛认为：尽管每个人的具体需求状况不同，这些目标的优先性大致符合这样的顺序。最优先的需求往往会垄断机体的意识和能力，直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那个目标。当这个欲望得到满足，处于优先等级中的下一个欲望就开始逐渐出现^①。识众的需求属于一种心理感受，它是识众因自身的知识缺乏而引起的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和欲求，如知识检索的需求、知识阅读的需求等。

（1）知识受众需求的类型。知识受众需求可从不同角度、依不同标准划分出不同类型，如依照知识受众需求的用途可将其划分为以下三种：①消遣需求。这是知识受众较低层次的一种知识需求。这种需求对识众有愉情娱志的作用，其特点是需求范围模糊，使用

^① 伊丽莎白·迪瓦恩等编；贺仁麟译. 20世纪思想家辞典：生平、著作、评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88~389

的知识媒介也容易更换，知识内容的获取有浏览性、随意性，而且知识获取行为在时间的保持上也长短不定。②学习需求。这是知识受众较高层次的一种知识需求。这种需求能够满足识众成才的愿望，其特点是需求范围明确，使用的知识媒介不容易更换，知识内容的获取具有专注性，而且知识获取行为在时间的保持上也较长，富有周期的规律性。③研究需求。这是知识受众最高层次的一种知识需求。这种需求是识众探索、创新意识的一种表现，其特点是，需求范围极为明确、具体，使用的知识媒介相对稳定，知识内容的获取具有专指性、惟一性，知识获取行为在时间的保持上具有阶段上的连续性。

依照知识受众需求的对象（客观知识的状态）来划分，知识受众的需求又可分为以下三种：①“知识面”的需求，如一些识众为了增长学识而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百科知识。通常这类识众是由青年读者群组成的，他们的求知欲旺盛，阅读能力极强。②“知识线”的需求。所谓“知识线”指的是专题知识或某类知识，这种知识类型的需求者大多数是教师、科研工作者。他们所需要的往往是与专业或研究课题相关的知识信息。③“知识点”的需求。即识众需求的是具体的文献单元或知识单元。如读者到图书馆“指名道姓”地查找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就属此类需求。

依据知识受众需求的显现程度，我们还可将其划分为潜在需求和现实需求两大类。①潜在需求是指识众需求处于内在需求心态层面，尚未表达、显露出来。这种需求状态一般不易察觉，尤其不易进行测量分析。②现实需求是已表露和外化在识众行为指向上的一种需求状态。这种需求较容易察觉并能够测量分析。

此外，根据知识受众的不同学科身份，我们还可以将识众需求区分为自然科学识众需求、社会科学识众需求、人文科学识众需求三大类。这三类识众通过不同的知识媒介获取知识信息时，其需求特征也有不同。如根据国外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这三类识众对因特网上的科学信息的需求，无论从用户数量上还是从利用频率上看，其程度都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顺序递减趋

势^①。说明不同学科门类的识众在合作研究程度、文献需求类型、文献布局状况、对知识信息时效性的需求以及计算机与外语能力上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总之，依不同的角度，选择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知识受众需求类型。知识受众需求是知识服务工作的基本依据。知识集合只有将识众需求与知识提供紧密结合起来，知识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而深入了解识众需求、掌握各类型各层次识众需求的特点，也就成了知识服务的基本内容之一。

(2) 知识受众需求的了解。了解知识受众需求是具有相当难度的知识服务工作内容。不同的知识服务部门因其服务手段与方式的不同，了解识众需求的难度也不同。如广播、电视部门，它所面对的知识受众有分布的广泛性、存在的隐蔽性、交流的单向性等特点，因而要了解识众的需求就非常困难，有时需借助大规模的识众调查方能奏效。而以往图书馆的知识服务，馆员与识众属于“在场”交流，加之识众能在服务过程中留下大量借阅、咨询方面的记录，因此相比之下，了解图书馆的识众需求难度相对小一些。

图书馆知识受众的了解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利用借阅、咨询、上机等记录资料对不同识众的需求类型、数量、学科内容进行统计分析，藉以了解文献的借阅率、借阅周期；了解识众需求倾向、主题范围、语种结构、时间跨度等具体问题。②通过交谈、主页留言板、BBS、E-mail等交流方式，了解识众个体的特殊需求。前苏联的图书馆不仅充分利用交谈法去了解读者需求，而且有的图书馆为了解读者喜好的知识领域与专题，还为读者建立“兴趣卡片”，以此来准确掌握读者的阅读兴趣^②。③采用社会调查方法了解识众需求，如通过普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个案调查、仪器

① 邓小昭. 因特网用户信息需求与满足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2002: 28~30

② [苏] B.Φ. 萨哈罗夫等著; 赵世良译. 图书馆读者工作.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209

监测、网络调查等不同调查方式去了解识众需求状况、存在问题、发展趋势等。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其庞大无序的海量信息库与知识受众专门化、垂直化、有序化的知识信息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被激化。一方面造成网络知识信息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知识受众寻找所需知识信息较以往更加困难，他们经常在网络中“乱串门”以至于“迷路”；同时，受网上知识信息的检准率低、语言障碍、信息冗余太大等因素的影响，知识受众需求的满足面临着许多新的难题。这些难题都需要我们去了解、研究、解决。

当然，网络技术现在已使图书馆的识众群体发生了巨变，任何一个拥有电脑的人不论在何地点，都可能成为图书馆数字资源的知识受众，图书馆的识众已经没有了馆内、馆外之分。公共图书馆员应走出图书馆，对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收入、不同职业的广大知识受众的需求进行了解与调查，尤其应该深入到偏远、贫穷落后地区去了解农民——这个当代中国知识受众的最大弱势群体，并给予关注，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阅读生活，保障他们应有的知识获取权益得以实现。

2. 知识受众的服务

服务是人们以活动形式提供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劳动。知识受众服务，是知识工作者运用各种资源满足识众知识需求的劳动过程。知识受众服务有以下几种特性：①知识受众服务作为一种劳动，与生产劳动有相同之处，即其劳动成果也能形成劳动产品——服务产品，含有价值与使用价值，但它一般不作为“物”而用，大多属于非实物形态，如同普通商品的售后服务一样，虽然也能进入市场，但却是原商品的无形部分，因此具有非物质性，并且服务水平、质量也不能用衡量物的“硬”方法来测定。②知识受众服务具有所有权不可转让性。即知识工作者利用知识服务机构资源提供服务劳动，当服务结束后知识服务机构的资源并未转让给知识受众，如图书馆员利用馆藏资源向读者提供完服务之后，图书馆资源所有权并未转让给读者，这就如同旅客旅行、住宿，交通工具、客房被

使用过后，所有权并未让渡出来。所以识众不能像买商品那样，事先货比三家来确定商品的质量，他只能通过接受服务的感受来判定服务的好坏。③知识受众服务的非盈利性。目前我国一些知识机构，尤其是图书馆属非盈利机构，不以获取经济利润为目的，而是以满足某种社会需求为目的，故而其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及价值不通过市场进行分配，其服务也就具有了非盈利性。一旦图书馆服务以获取利润为目的，那么低收入的识众就会被拒之门外，所购书刊也会尽量迎合普通低层次识众的口味，从而损害整体公民获取知识的利益。④服务与消费在时间上的同一性。由于知识受众的服务具有非物质性，因而服务成果往往属于无形的、不可贮存的，它只能与识众消费的介入相始终。服务的开始也是消费的开始；服务的结束，也是消费的结束。所以知识受众的服务还具有间接性、阶段性等特征。

从宏观视角来看，人们的社会活动其实都是一种服务活动，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因而服务在知识服务机构中常被奉为最高宗旨。然而，尽管图书馆从来都声称服务是目的、是宗旨，但从大量的图书馆专业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长期以来注重的是管理和技术等手段问题，而非目的；是如何建设馆藏，而非馆藏的作用；图书馆员每天与知识打交道，但他们更关心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知识的代表——文本和载体；在图书馆学论著之中，论证如何编制书目的著作远远多于论述如何使用书目的著作^①。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普遍应用，数字资源的大量涌现，使图书馆的服务手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场所束缚”、“时间限制”、“地理间隔”等问题逐渐消弥；受其影响，知识受众获取知识信息的方式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操作越来越复杂，渠道越来越多样，识众的身份也难以区分馆内与馆外（读者）。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是重大的，但是理性告诉我们：图书馆服

① [美] M. K. 巴克兰德著；黄育馥摘译. 重新设计图书馆服务. 国外社会科学, 2001 (2): 28~33

务的目的和使命却依然没有改变。程亚男先生指出：“图书馆服务发展的三个因素是：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是决定性的；社会与读者的需要，这是导向性的；图书馆自身服务的组织形式及管理水平的提高，这是保障性的。”^① 根据我国国情，21 世纪的图书馆服务（包括其他知识服务机构）应体现以下几种发展原则：

(1) 人文服务原则。所谓人文服务，就是以知识受众为本位、为中心的服务。以往图书馆服务不是以“人”为本去设计的，而是以“馆”为本去设计的。如图书馆的评估往往是以藏书量的增长、馆舍设备的扩充、馆员的培养、自动化与数字化等项目为主要指标，而读者的满意度则处于次要地位。然而知识受众是图书馆服务主体（从认识角度，知识受众与图书馆员可以互为“主体——客体”的关系，但在“服务”关系中，知识受众只能是主体，图书馆员是客体，两者关系不能颠倒。“馆员第一”不能提倡），知识受众的服务只有主体“进入”才能进行、实现，因此识众服务应吸引识众“大量进入”、“深入进入”，要以主体的需求为依据，尽量去满足主体的需求。如延长图书馆的开放时间、缩短新书上架的周期，强化“一站式”服务方式，提倡服务的多样化、个性化等。所有服务手段、方式的选择不应以是否先进、高技术化为标准，而应以是否能满足识众需要、使识众满意为标准。美国现在网上咨询服务（online reference service）很流行，如电子邮件咨询、经常性问题解答（FAQ）以及不久就要普及的即时视像咨询（red-time teleconference），但美国公民大多数更习惯于使用电话向图书馆咨询，俄勒冈州摩特诺玛县图书馆参考部的电话咨询站，每天接到的电话咨询超过了 1 000 个^②。相信他们并不会因为有了网上咨询服务就停止电话咨询。而且，俄勒冈州的图书馆 24 小时电话自动续借系统、电话自动催书系统也很完善。

① 程亚男. 再论图书馆服务.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 (4): 18~21

② 柯少宁, 郑智明. 以读者为本的服务理念,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服务手段: 访问俄勒冈州图书馆印象. 福建图书馆学刊, 2000 (1): 54~58

技术的更新是手段的更新而非目的的更新，每一种更新的技术无非是对原有知识传递方式的负载能力的增强或补充。而且技术手段的更新在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如信息超载、知识泛滥。美国图书馆学家克劳弗德（Crawford）与戈尔曼（Gorman）曾用“没顶”（drowning）、“冲浪”（surfing）和“游泳”（swimming）三种状态形容信息超载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没顶”是指人们虽然能从网络中发现前所未有的海量知识信息，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已被淹没其中，那些力图跟上所有信息的人，要么将研究范围缩小，要么花费大量时间去检索搜寻，但没时间去组织、分析、综合与创造；“冲浪”是指在信息海波上漂动，虽然可以获得短暂的快感，可无法沉潜，无法实现对信息的掌握及获取；只有“游泳”者，可以读完整篇文章，进而深入到读书层次。但网络使用者如果迷恋于新颖，而非针对特定的主题有所沉潜，那他必定会被淹没；设若网络使用者不愿费力读完整篇论文，那他便是在“冲浪”^①。因此，图书馆服务如何帮助知识受众成为“游泳者”，让他们便利地得到自己最需要、最有价值的知识信息，从而成长为理性的人，实现个人价值，就成了当代图书馆学关注的人文主题。著名作家巴金在上海图书馆落成时曾题词“散布知识，散布生命”，这真是图书馆服务应永远恪守的美好箴言。

（2）充分服务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充分服务”一直是读者服务理论所倡导的重要原则之一。所谓充分服务，就是全面开掘知识服务机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知识受众的一切需求。这一定义与1982年倡导这一原则的沈继武先生的表述并无区别^②。如果说人文服务原则是将服务导向识众及其生命价值上的话，那么充分服务原则解决的则是如何为识众服务并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的问

^① Walt Crawford and Michael Gorman. *Future libraries: dreams, madness, and reality*.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5: 80~84

^② 沈继武. 读者工作概论. 武汉: 湖北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1985: 16~23

题，它是知识服务人员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在图书馆手工服务的年代里，读者借书要抄写一张索书条。前苏联一位从事读者服务 40 年的杰出馆员 M. A. 萨多娃（1888~1968，她以善于解决复杂书目任务和“读者需求中各种字谜”的卓越技能而闻名）说，读者需求并不是“一张纸条，而是读者向图书馆员提出的实际愿望”^①。前苏联图书馆学界还较早地提出了读者需求满足程度的评价公式^②：

$$\text{读者需求满足程度} = \frac{\text{事实上满足了的需求}}{\text{需求总数量}}$$

当然，为了使这一公式更具有说服力与可操作性，前苏联图书馆学界还强调把借阅书刊的及时率（规定时间内所满足的读者要求数与所满足的读者要求总数之比）、拒借率（规定时间内未能借阅到的文献数与全部合理借阅需求总数之比）等公式与上一公式一并考虑。西方图书馆学者为了使“读者满意”原则落在实处，他们也提出应使这种具有感受特征的“读者满意”能够进行测量，并成为图书馆工作评价中的重要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巴特勒大学的图书馆学研究人员都曾做过读者满意程度的研究与调查。这些调查结果显示，读者的满意程度通常是与下列因素密切相联的：①资源状况（知识信息的质量、丰富程度、易获得性），②馆员能力与反应，③服务环境（美观、舒适、整洁、方便程度），④读者自身能力（使用计算机能力、检索技能等）^③。因此，知识服务机构要使知识受众充分地满意，就应该从这些方面设法进行工作改进。

充分服务原则，不仅是针对那些正在接受服务的现实知识受众，而且还应该包括暂时不能接受服务的潜在知识受众。即充分服务原则的实现程度不能仅以现实识众的满意度去衡量，还应该以其向潜在识众群扩展的程度来衡量。1992 年美国《图书馆杂志》

①② [苏] B. Φ. 萨哈罗夫等著；赵世良译. 图书馆读者工作.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212~213，299~300

③ 初景利. 用户满意论. 情报资料工作，1999（4）：10~12

(*Library Journal*) 和 Gale 集团 (前 Gale Research Inc.) 发起设立了全美的“年度图书馆”奖。该奖连续数年奖励的图书馆,大多在服务对象的延伸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并值得其他图书馆所效仿。如有的图书馆向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发放借阅证,向无法阅读的读者通过电话提供录音新闻;有的图书馆向当地监狱提供借阅服务;还有的图书馆将书籍带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孕妇家中^①。这样体现出来的充分服务,不仅将知识带给了更多需要它的人,同时还将平等、关爱等现代社会的理念植入了人心。

(3) 多样化服务原则。多样化服务是指知识服务机构或人员给知识受众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项目,供识众选择,以使其在获取知识时更觉便利及有效。多样化服务原则是对人文服务、充分服务原则的具体落实与体现。多样化服务的原则已经在社会的服务经济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因为多样化的服务能让服务企业赢得更多的顾客,带来丰厚的利润。如在我国近年的银行服务中,传统的个人储蓄已由单一的品种迅速向多元化、多功能化方向发展,个人小额抵押贷款、约定转息储蓄、大额可转让储蓄存单、个人理财等,不断使顾客产生新奇、陌生感;在旅馆业中,各种档次的星级酒店、普通经济旅馆、度假别墅、家庭式自助旅店(可自己买菜做饭)、汽车旅馆、帐篷旅馆等,在澳大利亚城乡也屡见不鲜,它们为不同的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游客则可享受不同的生活情调。

图书馆这样的知识服务机构也应该尝试向获取知识的人们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如网上借书预约、馆外还书筒、网上文献传输、电话续借、自动投币复印、智能卡(smartcard)服务、图书馆主页服务、联机公共检索目录(OPAC)服务、电子邮件咨询、虚拟展览、远程教育服务以及医院图书馆的“图书疗法”等,这些多样化的服务已经或正在许多图书馆实践着。知识服务机构的整体效益是

^① 马寒,单启成.从LJ年度图书馆奖看图书馆服务.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6):86~88

由具体、多样的服务项目体现出来的，这就像整个企业形象存在于每个产品、每种服务之中一样。以“图书疗法”为例，医院图书馆馆员发现，传统“生物”医学的模式正向“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转变，疾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也是精神上的痛苦。因此，除了医生的药物等治疗外，病人乃至其亲属也急需医学知识以解除心理压力。现代社会的病人较之以往更有主动学习医疗知识的愿望。医院图书馆适时适度地提供医学知识、消遣读物的服务，无疑十分有助于病人的康复^①。此外，开展多种形式的知识展览，也是当代图书馆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美国纽约长岛皇后区的公共图书馆，因该地区是全美多种族最集中（人口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100余种语言）的地区，因此他们经常举办各种知识展示活动。2000年元月中旬开展的8天的社区服务项目就达20多个，有项链制作工艺培训、剪贴工艺讲座、摇滚音乐会、非洲舞蹈联欢会、求职方法讲座、网上寻找西班牙语信息讲座、绘画欣赏讲座、初级电脑知识讲座、汉语信息检索培训、收发电子邮件培训等^②。这些活动对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准、知识素养，增进不同民族人群之间的感情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也密切了社区居民与图书馆的联系。

(4) 个性化服务原则。个性是个体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个性化服务，是指知识服务机构或人员依知识受众的需求倾向专门为其提供定制服务。个性化服务原则与多样化服务原则一样，都是人文服务原则、充分服务原则的细划与实现。但个性化服务与多样化服务又不同。多样化服务给知识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希望他们更方便地去接近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信息。但识众有时不想过多地选择（有时选择是复杂、费时的），他们只想得到确实所要的知识信息。个性化服务就是要了解识众的真正需要，然后准

① 王小燕. 重视和发挥医院图书馆“图书疗法”的功能作用. 医院信息管理, 2002 (11): 28~29

② 张炬. 访美归来话服务. 图书馆工作研究, 2000 (6): 51~53

确地进行定制提供。个性化服务是由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催生出来的。从社会经济领域看,以往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正在向大规模定制生产转换,而大规模定制生产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每一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为中心,提供定制产品和服务以满足这些需求^①。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对服务、知识表现出了热切的需要与推崇,它表征着工业社会正在被知识社会渐渐取代。而从科学文化领域来看,当代社会的知识创造与生产呈现出来的“个人知识”倾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任何知识的创造与生产都脱离不了个体的个性因素,如科学家独特的科学兴趣以及充满热情的参与。甚至科学家创造与生产知识所需要的知识原料——大量的事实、数据、素材,也都带有明显的个性因素。他们不是盲目地检索与搜寻,而是带着个人的偏好。而被社会发展激活起来的个性化需求正在计算机、互联网等高科技工具的支持下变得更容易满足,如出版业中的“按需印刷”(Print-on-Demand,简称POD,指将数字化图书文件按购买者的需要小批量印刷成书)、家电产业中的“定制冰箱”等。

在知识服务领域里,借助高新技术的支持,识众可根据自身的需求定制自己所需的知识信息;互联网知识库也可针对识众的个性特点,主动为其选择最需要的资源与服务,并根据识众的需求变化,动态地提供知识信息。换言之,识众一进入网络资源环境,网站就会自动记录与分析识众的日志(即识众日常行为及其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的记录),根据其需求自动、有选择地提供知识与服务。同样的一个网站,不同的人看到的也许是不同的页面与知识^②。如1999年美国康乃尔大学开发的“我的图书馆”(My Library)系统,由My Links和My Updates两部分组成,前者可以使识众按需要将不同网站、网页上的知识信息资源链接在一起,组织在自己的My

^① [美] B. 约瑟夫·派恩著; 操云甫等译. 大规模定制: 企业竞争的新前沿.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322

^② 申瑞民, 舒蓓等. 个性化数字服务模型, 微电子学与计算机, 2001(1): 14~18, 54

Links 中；后者是图书馆用来根据识众需求定制的一种服务，即将识众需求输入其中，它就会自动对本馆新到资源的联机目录进行检索，发现新资源，自动发送 E-mail 通知识众，“随用随增长”，而识众又会将这些资源组织到自己的 My Links 之中^①。

总之，个性化服务的特点是“n 对 1”或“1 对 1”，与以往图书馆服务“n 对 n”、“1 对 n”有了很大区别，识众可通过交流更容易地获取根据自身特点“定制”的知识信息，服务机构也可通过它了解到服务对象的需求与自己提供的知识信息是否冗余或不足，适时调整自己的服务。由于个性化服务需要复杂的程序和方法，在手工时代它会因劳动成本的过分巨大而难以实现，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它必将成为未来知识服务业中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关 键 词

读者 知识受众（识众） 知识受众本位观 知识受众权利
平等获取知识权 自由选择知识权 知识信息知情权 知识服务保障权
批评、建议和监督权 知识受众义务 数字鸿沟 读者歧视
知识受众需求 马斯洛需求论 知识受众服务原则 人文服务
信息超载 充分服务 需求满意程度 多样化服务 图书疗法 个性化服务
识众日志 “我的图书馆”系统

小 结

1. 知识受众是在以往读者概念上，借鉴大众传播学“受众”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概念。“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涵义也是不断演变的。知识受众指的是一切通过知识媒介接受知识、获取知识的人。知识受众在概念上具有明确的所指，同时其概念外延也较

^① 赵继海. 数字图书馆发展若干领域的评析. 图书情报工作, 2001 (3): 16~19

“读者”要广。

2. 知识受众本位观是指以知识受众为中心, 努力满足其需求的一种观念及意识。树立知识受众本位观的理由有四个方面: 知识受众是知识价值最终实现的承担者, 是知识媒介交流的选择者, 通过知识媒介与知识创造者双向互动, 是知识交流过程的反馈信源。

3. 知识受众权利, 是知识受众作为知识获取者这样一个特殊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合法权利。知识受众权利具体有平等获取知识权、自由选择知识权、知识信息知情权、知识服务保障权、批评建议和监督权等。知识受众义务大多属于不作为的“消极义务”。在实践中, 知识受众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数字鸿沟、读者歧视造成的侵权等。

4. 了解知识受众的需求, 要先了解其成分、类型、结构等, 不同成分、类型的识众, 其知识信息的需求差异也很大。知识受众的需求是一种心理感受, 是因自身知识缺乏而引起的精神上的需要和欲求。因此存在一定的了解难度。

5. 知识受众的服务具有非物质性、所有权不可转让性、非盈利性、服务与消费时间同一性等性质。以往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对知识受众服务的重视远远不如对图书馆管理与技术手段的重视。21 世纪的图书馆作为一种知识服务机构, 应该坚持与体现人文服务、充分服务、多样化服务、个性化服务等基本原则。

思 考 题

1. 读者、用户、识众三种概念有何不同特点?
2. 为何要提倡知识受众本位观?
3. 知识受众有哪些具体权利?
4. 侵害知识受众合法权益的现象有哪些? 为什么经常发生?
5. 什么是知识受众成分? 知识受众成分与类型有何区别?
6. 了解知识受众的需求有哪些方法?
7. 知识受众服务有哪些性质? 知识受众服务的四原则是什么?

第九章

图书馆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图书馆学的成长需要丰富的营养，它既需要继承以往优秀的学术传统，也应找到深刻的思想来指导本学科的研究，以期解释社会进步给图书馆学发展带来的种种疑难问题。指导本学科研究能够顺利向前开掘的思想观点，是图书馆学赖以发展的理论基础；而那些影响图书馆学发生变动、转移的现实社会因素，则是图书馆学赖以依存的实践基础。对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的研究与重视，是我国图书馆学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的新的学术意识。

第一节 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一、理论基础的涵义及作用

1. 理论基础的涵义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都必然得到某种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的支持，图书馆学也不例外。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概念，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此前叫做“指导思想”，一般指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80 年代以来，有关理论基础的文章逐渐增多，然而什么是理论基础，其内涵、外延至今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归纳众说之长，我认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图书

馆学理论建立的根基，它是由一些抽象、具体的理论观点组成的图书馆学先导思想。理论基础的涵义应包括以下内容：①理论基础是图书馆学理论创发的根本或起点，即发生学意义上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一旦给定，图书馆学的原理、体系等便可演绎而成。②理论基础是哲学与图书馆学沟通的桥梁，起着哲学与图书馆学相互连接与交通的作用。③理论基础是一些可辨析、可陈述的思想学说或理论观点，它们生成于哲学或具有抽象思维性质的某些学科（如数学、系统科学）之中。④这些思想学说或理论观点不仅对图书馆学具有启发、指导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2. 理论基础的作用

把理论基础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哲学与图书馆学沟通的桥梁，应该说既阐明了其地位，也论及了其作用。不过，理论基础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具体作用还未进一步明确。卿家康曾撰文涉及此问题，他说理论基础的具体作用有三方面：“第一，深刻地揭示研究对象类现象的本质，并正确地反映对象事物的客观规律；第二，正确地指引学科发展的基本途径与方向，为对象学科奠定认识论基础；第三，有效地指导科学研究全过程。”^①此观点的提出者最早是沈继武先生，他将这三方面内容表述为构成理论基础的条件^②。不过，卿家康将其视为“具体作用”似乎更为合理。

二、理论基础及其相关概念

1. 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

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两者的关系，以往图书馆学曾有一种流行的解释，认为一方而“理论基础大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因为它可以是多个学科的共同理论，“既可是某一

① 卿家康. 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及其研究的几点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3 (1): 42~47

② 沈继武. 关于图书馆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图书情报知识, 1985 (1): 21~26

种单一理论，也可能是多种理论的集合，是一个群体。如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就包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教育学、心理学等”。另一方面理论基础又“处于图书馆学体系之外，不是图书馆学的必然组成部分”，而“基础理论属于图书馆学体系之内，是图书馆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图书馆学的基石”，“在图书馆学体系中处于第一层次”^①。

此种观点的可贵之处是对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之关系作出了明确的判别，但这种区分观点尚可商榷。理由在于：①理论基础是图书馆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如果把理论基础排除在外，不属于图书馆学，也就等于说图书馆学没了逻辑起点。没有逻辑起点，怎么可能演绎出其基础理论来呢？所以，理论基础应属于图书馆学范畴，是基础理论的第一层次，它是图书馆学的根基。②如果把哲学、信息论、教育学等学科或学科群视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理所当然它们是处于图书馆学之外，且又大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但我们认为理论基础是由一些具体理论观点、思想学说乃至某学科中的个别原理、概念构成的，它们只是自身所属学科的组分，而非其整体。它们被吸收、化约、融合至图书馆学中，已经成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一部分，对图书馆学肩负着启发、阐释、指导的作用，不应再看成图书馆学以外的东西。

2. 理论基础与图书馆哲学

什么是图书馆哲学？目前说法有异。1996年周文骏先生倡议建立“图书馆哲学”时说：“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概括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一般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此外，他对图书馆哲学的地位归属也作了阐释：“多年来关于‘理论基础’的探索，假如其目的是追求把握图书馆的本质规律，那么也可以认其为图书馆哲学的近义词或同义语。”图书馆哲学

^① 黄宗忠. 20世纪10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及其评介(上、下). 晋图学刊, 1998(2): 1~10; 1998(3): 1~7

“既是应用哲学的一个分支，又是图书馆学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①。

图书馆哲学是哲学对图书馆、图书馆学的观照，它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有某种等义关系，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语义互换。这些认识是应当首肯的。然而，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内容不仅仅是哲学的，它目前得到发展、扩大，能够吸收、借鉴其他具有抽象思维性质学科（如系统科学、数学）的理论观点，并用其阐释图书馆学的一些元问题。因此，从内容范畴来说，理论基础较之图书馆哲学更为宽泛。

此外，我们提倡图书馆学要加强哲学研究，但是否把图书馆哲学建成一门学科，我们应持谨慎态度。因为图书馆哲学是生动的、鲜活的、深邃的、灵敏的抽象思维活动，它通过深刻的分析与见解为图书馆实践、图书馆学理论提供启示与感悟，只要它有效达到此目的就可以了，不必一定具备什么体系，成为一门学科。理论基础就不是以独立学科面貌出现的。事物总有两面性，图书馆哲学一旦成为一种体系、一门学科，它就具有了模式、规则、框架、结构，这对哲学思维的活力无疑会形成一种限定。而且，哲学对图书馆、图书馆学探索的成果，最终也要分归于图书馆学理论各自组成部分之中，那么图书馆哲学想建立自己哪些新东西呢？

3. 理论基础与图书馆学方法论

图书馆学方法体系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及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组成的。从内容角度看，图书馆学方法论与理论基础都具有其他学科“渗入”图书馆学，被图书馆学借鉴、吸收的共同特征。但是两者还是有区别的：①理论基础的内容是一些对图书馆学可解释、可陈述的概念、观点、道理，而方法论讲的都是一些思维方法、分析方法，它不提供具体的、可陈述的概念、观点、道理等。②理论基础的宗旨是使图书馆学更具有价值和意义，而方法论的目

^① 周文骏. 图书馆学研究论文集·编后.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365~370

的却是使图书馆学更为科学和具有效率。

当然，此处讲两者的区别，仅就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涵括的内容及功能而言，并非关涉科学与方法有何区别。科学与方法从来都是共生共长的，没有科学方法就没有科学成就。例如，数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 R. Ranganathan, 1892~1972）曾是一位数学博士，正因其具有深厚的数学素养，他才经过苦思冥想，利用数学的公理法演绎出了“图书馆学五定律”，并以此而享誉全世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是数学方法应用于图书馆学的一个杰出范例。

三、理论基础的几种重要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基础的研究一度成为热门。一方面国外图书馆学界探讨理论基础的观点被先后引入国内，如美国谢拉的“社会认识论”，英国布鲁克斯的“知识基础论”等；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先后提出的一些理论见解，如赵红洲的“中介世界论”，周文骏的“情报交流论”，宓浩的“知识交流论”，以及90年代以后的“信息资源论”、“知识组织论”等，其中也包含了对理论基础的寻求与探索。人们力图寻找到一个有效的思想理论，使其能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石，并对图书馆学起到统摄、定向的作用。下面介绍80年代以来可以作为理论基础的几种重要思想。

1. 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 R. Popper, 1902~1994）把客观物质世界称为“世界1”，主观精神世界称为“世界2”，客观知识世界称为“世界3”，其意义不仅在于突破了哲学上的一元论、二元论，关键还在于阐释出了“世界3”的独立存在，强调“世界3”的实在性、自主性与永恒性，努力赋予“世界3”以充分本体论地位。“世界3”所以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理由至少有两方面：

首先，“世界3”理论揭示出了客观知识世界独立存在的意义，从而为图书馆学划定了研究对象的从属领域。波普尔认为人类主观

知识一旦社会化、公开化、客观化，即“世界3”一经产生，就具有客观自主性，成了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主世界。例如那些自然数、乘法法则等，虽是人为产生的，而且每代人都要学习它，但它并不因是否有人在学习或运用而决定其存在还是消失^①。波普尔还数次提及了图书馆，认为人类创造图书馆就是为了保存、积累“世界3”，使客观知识得以继承与扩展。而且人类的进化恰恰也是建立在客观知识的不断继承与拓展之上的。可以说，“世界3”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它启示建立在数千年图书馆发展史上的图书馆学，应该把其研究对象定位于客观知识世界这个层面上。“知识”包括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两大部分。主观知识的产生、发展、变化，有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对之研究，而图书馆学研究的是客观知识及其存在状态。

其次，“世界3”理论明确了文献的终极归属，它为图书馆学提供了合理的逻辑起点。波普尔说：“我认为，书籍、杂志和书信都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客体……书籍的物理形状是无关紧要的，甚至物理的不存在也并不损害第三世界的存在；只要想一想所有‘佚失’的书籍、它们的影响及寻找它们的努力。”^②波普尔认为，世界上所有图书馆、资料系统保存的客观知识，它们只有极少部分被“世界2”所掌握，从个人与私有意义上说，大部分不是人们都“知道”的，亦即“谁也不能掌握这个世界的哪怕小小的一角”^③。事实上，就是一个著作等身的人，他也无法一一详述其著作中所写的内容。这一观点提示我们图书馆学，必须把那些文献记载的多如恒河沙数的知识内容，看成是人类拥有的大部分知识。这一部分客

① [英] 卡尔·波普尔著；舒炜光等译. 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6~172

② [英] 卡尔·波普尔著；赵月瑟译. 波普尔思想自述.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57

③ [英] 卡尔·波普尔著；舒炜光等译. 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6~172

观知识是散乱的、无序的，如何将它们汇集、整序，从而供人们检索、利用，就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个体文献表现的是客观知识的“单元”，它是组成图书馆的最小元素，也是初始起点，而对文献（客观知识单元）的研究，无疑就会成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

波普尔“世界3”理论从1982年由青年学者刘迅率先引入图书情报学界之后^①，曾引起图书情报学界的一场争论。这场理论基础的大讨论留给我们有待深思的东西很多。我们选取某种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时，应该看这种哲学思想能否转换成图书馆学理论的一部分。换言之，这种哲学思想在“内容”上与图书馆学之间应该具有可以化约、借用、融渗的逻辑对接关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图书馆学的指导思想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应看到它更多的是为图书馆学提供方法（如唯物辩证法）指导，具有方法论意义，本身并未给图书馆学提供可化约、借用、融渗的“内容”。再说，任何一种理论思想如果是真正科学的，它不应该排斥其他的科学思想。

2. 信息科学中“信息”的观点

信息科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的，仅数年时间，它就从学术界蔓延至社会各领域。80年代前期，“信息科学”、“信息技术”、“经济信息”、“市场信息”、“信息社会”、“信息时代”等概念纷至沓来，“信息热”席卷全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从80年代初就对信息科学给予了极大关注，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信息科学的两大部分内容，即信息理论与信息技术，必将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推动作用。而且事实发展证明，信息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横断学科，它的许多理论观点对图书馆学都发生了重要启示与引导作用，被图书馆学界引入本学科充当自己的理论基础。

首先，信息科学对信息的阐释动摇了图书馆学的某些传统理论

^① 刘迅. 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
的思考. 情报科学, 1982 (1): 13~20

范式，图书馆学不得不用信息理论来重新审视自己原有的理论体系。信息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信息理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把信息看做用来消除随机事件形式的不定性的东西，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Wiener)称“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①。我国学者则认为，“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②，材料、能量、信息是物质的三个基本方面，三位一体，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三大资源。材料提供物质基础，是形体；能量提供做功潜力，是活力；信息提供知识智慧，是灵魂^③。可以说，从本体论高度对信息进行如此深刻的探究与揭示，这在信息科学之前是绝无可能的。这些观点给予图书馆学极大震动。1979年，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说：“我经常提出这样的反诘：‘人可以理解的书籍是什么？可以理解书籍的人又是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涵义非常深刻。这就是信息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图书馆学家的研究任务。”^④因而，当我国图书馆学者开始将以往停留在书籍、图书馆表面上的目光穿透至书籍内容中去的时候，一种新的理论就开始出现了。

1984年况能富发表文章建议图书馆学界关注并使用“文献信息”这一概念，他说：“文献信息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精华，它是人类认识世界所获全部信息中的核心部分。只要抓住了文献信息，我们就抓住了人类认识的结晶，抓住了人类的思维果实。”^⑤此后，“文献信息”成为图书馆学论文中高频使用的词汇。1992

① [美] N. 维纳著；郝季仁译. 控制论.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133

② 钟义信. 信息的科学.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64

③ 钟义信. 信息的科学.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92~98

④ J. h. Shera. *Of Peacocks, Elephant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ibrarianship*. See: *March of Library Science*.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1979: 23

⑤ 况能富. 应当探索文献信息理论：《文献信息论》导言. 图书馆工作，1984（4）：41~44

年，黄宗忠、朱建亮分别出版了自己的学术专著《文献信息学》与《文献信息学引论》，两书都认为应该建立一门能够覆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图书发行学的综合性学科“文献信息学”，“文献信息学”属于信息科学的一个分支。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图书、情报、档案等，本质是“文献信息”^{①~②}。如果说，波普尔“世界3”理论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从“图书馆”拉移至“客观知识”，其力量尚且不足的话，信息科学有关“信息”的理论，则大大助其一臂之力。

其次，不仅信息科学关于“信息”的概念对图书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信息科学关于信息过程的学说，如1948年申农在《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中提出的信源、编码、信道、噪声、解码、信宿的理论，也对图书馆学有启示作用。图书馆工作与信息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信息过程的学说对图书馆学自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早在1983年，美国图书馆学者斯·J·高尔文就曾说过，信息科学这一新兴学科对加强和扩大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所作的贡献，“使人们相信图书馆学像其他所有专业一样也需要广泛、坚实的理论基础用以指导专业实践”^③。1985年，吴慰慈先生也认为，建立在信息科学基础之上的文献信息理论，应该成为图书馆学、目录学、情报学共同的理论基础^④。

3. 系统科学有关“系统”的学说

系统科学几乎是与信息科学同时传入中国的，当时与信息论、控制论合称“三论”，也曾广为人知。何为系统，系统科学创始人贝塔兰菲(L. V. Bertalanffy)认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关联

① 黄宗忠. 文献信息学.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2: 51

② 朱建亮. 文献信息学引论.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15~21

③ [美]斯·J·高尔文. 信息科学对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见: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48届至50届大会论文选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159~162

④ 吴慰慈, 邵巍. 图书馆学概论.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27

的元素的集”，它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无论在物理世界还是精神世界，“处处有系统”。因此，系统科学的原理是具有普适性的，贝氏本人就称系统科学为“一般系统论”^①。系统科学的这一论断，受到图书馆学者们的热烈认同。他们借用“系统”的观点，把图书馆看成是一个系统。如1981年郭星寿就提出，图书馆是一种人造的、开放的和可适应的系统。理由是：①任何系统都具有本身功能，图书馆有储存与传播知识的功能，也有系统功能这一普遍特征；②任何系统都具有本身的层次结构，图书馆由文献收集、整理、保藏、服务等子系统构成，它们是并列关系，也具有系统的层次结构特征；③图书馆具有开放系统必然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这一普遍特征。因此，系统科学可以成为“图书馆管理的理论基础”^②。

此后，某些学者不满足于把图书馆仅视为一个系统的见解，他们结合信息科学关于信息过程的理论，将图书馆看成一端有“信源”输入，另一端有“信宿”接收的一个开放的信息系统，提出了图书馆是“文献信息系统”的观点。如1987年陈源蒸提出图书馆“属于文献信息系统”，他认为作出这样的认定，图书馆的属性就明确了，“图书馆学的属性也就得到了揭示，图书馆学是文献信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并且进一步陈述道：“信息论揭示了图书馆学属性，系统论为图书馆学找到了应有的位置。”^③1992年黄宗忠先生把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机构等归属于文献信息系统。他认为，文献信息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动态系统^④。至此，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本质的认识

① [奥] L. 贝塔兰非著；秋同等译. 一般系统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46，1~31

② 郭星寿. 图书馆管理的系统论. 见：湖北省图书馆学会1981年年会论文集，16~34

③ 陈源蒸. 图书馆学和文献信息学. 见：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笔会文集. 杭州：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研究组，1987：96~109

④ 黄宗忠. 文献信息学.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18

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系统科学观点的加盟，有力充实、强化了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于理论基础层面的广有影响的一些观点，都与之有密切关系。如1982年赵红洲的“中介世界论”，他借助“世界3”理论把图书、情报厘定为既有别于物质世界，又有别于精神世界的“中介世界”，在分析论证中，就使用了“系统”观点，认为图书是特殊的科学结构、知识系统，它们与精神世界有着重要的区别^①。1984年宓浩提出“知识交流论”，其中对图书馆结构的分析与知识交流三层次的论述，都借助了“系统”观点，正如他本人所言：“无疑，用系统论、信息论以及耗散结构理论等原理和方法来解释和揭示图书馆工作机理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如何使图书馆系统成为一个动态稳定的有序结构是图书馆生机勃勃，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的核心问题。”^②进入90年代，“信息资源论”、“知识组织论”的提出，更是对“系统”观点进行了纯熟的运用，如果说80年代“信息”、“系统”的观点与图书馆学对接时，“拼合”痕迹还较明显的话，90年代它们则融通圆化，浑然一体，“拼合”痕迹已经消失。

当然，上面所列举的“世界3”、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的理论观点，还不能代替理论基础的全部与整体。之所以在这里将其重点提出，是因为它们至今还对图书馆学研究起着重要、有效的指导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20多年来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充分显示出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另外，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基础层面的观点，我们很难说某个观点是以单一理论为基础的，它们往往综合了哲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数学等理论，其中甚至对国外学说也有直接继承关系。它们呈现出的多样性、整体

^① 赵红洲. 从“中介世界”看图书情报. 情报学报, 1982 (1): 60~66

^② 宓浩, 黄纯元. 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 关于图书馆学基础. 见: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论文集. 杭州: 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教研组, 1985: 23~39

性、综合性，正是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一大特点。

四、理论基础的开拓建设

1. 强化对哲学等抽象思维科学的研究

一种新的哲学思想或横断学科理论的出现，立刻受到图书馆学界的关注与研究，这既反映出图书馆学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学术敏感度，也反映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匮乏。1980年，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 C. Brookes）曾说，理论基础最初是由一些不言而喻的基本假说集合而成的。新的理论核心一旦形成，一是可以在初始基础上发展上部结构，扩大理论体系，一是可以深化、强化其自身所在的基础。当上部结构的生长失去了初期的坚定步伐时，人们才开始对处于隐含状态的基本假说产生疑问。他认为情报学无论外显的、内隐的基本假说均不存在，“情报学还处于被哲学遗忘的角落里，没有什么理论基础”^①。时间与事实表明，当我们努力建设理论基础之时，也正是理论基础薄弱、匮乏之际。近年来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哲学的呼唤，也恰恰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建立能够指导图书馆学健康发展的理论基础，必须抓紧对哲学及其他抽象思维科学的研究。过去那些有效的，可以称之为理论基础的思想观点，大多由西方舶来，大多是应社会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新学说，虽然我们不可以对之忽视，应积极引人、借鉴、消化，但这是一种被动的学术创获方式，即“人家有了我们才有”。它使理论基础的建设受到外力、时间等因素的强力限定，从而丧失自创性与自主性。因此，我们强调对哲学的研究，对一切科学思想的研究，最终是想主动地从中寻找到适合图书馆学实际的指导思想，摆脱外力、时间的制约。例如，经过认真研究，我们发现数学集合论对图书馆学就很有说服力。集合论是德国数学家康托尔（G. Cantor, 1845~1916）提出的，他把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事物的全体

^① [英] B. C. 布鲁克斯著；王崇德等译. 情报学的基础（一）. 情报科学, 1983（4）: 84~94

称为“集合”，组成集合的个体事物称为该集合的元素。集合有集、全集、子集，有限集、无限集，有序集、无序集，交集、并集等各种概念。他还提出了无限集的势、序型，建立了超限数理论。集合论不仅对数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其他科学（如哲学）的影响也是深刻的。系统论事实上也受到了集合论的启发，如前述贝塔兰菲给系统下的定义，就是借用了集合的概念。用“集合”的观点来分析图书馆，我们能深刻地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实际就是“知识集合”。如果将“知识集合”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以集合论、系统论原理阐释其元素、结构、组织、功能、环境等问题，也许图书馆学中的一些元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答。

2. 理论基础的评价标准

20世纪80年代关于波普尔“世界3”的一场大讨论，说明当时图书馆学界对什么是理论基础、什么是理论基础的评价标准还缺乏明确的共识。缺乏这样的共识，就会使讨论陷入混乱或者出现僵局。因此，我们不仅要對理论基础作出定义性解释，还应建立起一个评价标准，以便于对某种思想学说能否成为有效的理论基础作出恰当的评价。什么是理论基础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它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评价标准，一是实践评价标准。

理论评价标准是指从合理性上对一种思想学说进行的理论评价。1986年郑奋曾提出，一种理论能否成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应该考虑是否具有如下条件：“①这种理论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②这种理论本身是否比较成熟；③这种理论能否给指定的学科以理论与方法上的指导。”^①这是国内较早阐述理论基础标准的一种见解。笔者认为，理论基础的理论评价标准实际上只有一条，即看其能否对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中的元问题作出合理的、深刻的预设与解释。因为，凡能给予合理、深刻预设与解释的思想学说，必定是科学的、成熟的理论。

实践评价标准是指从实用上对一种思想学说进行的实践评价。

^① 郑奋. 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基础问题的哲学思考.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1986 (1): 5~9

某一思想学说对图书馆学能否起到指导作用，最后不是靠理论证明，而是要靠图书馆学研究实践来验证。当我们想否定某种思想学说时，最终要看它是否背离了客观实际，是否背离了社会实践。所以，凡是被实践证实是行之有效的，那它就是科学的、合理的、实用的理论基础。在实践面前，任何争论、辩白都是乏力的。虽然实践受时空因素局限，总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有些理论问题在某一具体时代还不能用实践给予检验，但从历史延长的角度看，最终实践将给予回答。

总之，理论基础的评价标准虽然有两个方面，但它们之间不是割离的，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评价标准结构。其中实践标准是最根本的标准。因为有些思想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出现问题时，如果不能在思维范围内解决，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那么最后只能靠实践来解决。这不仅仅是图书馆学应遵循的学术原则，也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所应遵循的学术原则。

第二节 图书馆学的实践基础

一、实践基础的涵义及其相关概念

1. 研究实践基础的必要性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或称为理念图书馆学）获得长足进展的过程中，理论基础的概念也逐步形成并得到研究者的深入研究。相比之下，图书馆学实践基础问题却迟迟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尽管图书馆学研究者对新的图书馆实践活动不断寄予了兴趣，力图从丰富、多变的实践活动中汲取学术营养，然而至今对实践基础这一命题仍缺乏学理上的探讨。9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加速了社会信息化的进程，电子文献及数字化图书馆的出现，使传统图书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新的社会实践为图书馆学提出了诸多亟待回答

的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什么是图书馆学的实践基础，当代图书馆学实践基础有哪些内容及变化进行探讨、研究。

2. 实践基础的涵义

实践是哲学上的概念，通俗地说是指人类有目的地进行能动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物质活动^①。实践是人认识世界的源泉与动力，图书馆学就是人类历经千百年的图书馆实践活动而总结形成的。因此，图书馆学的实践基础，是指能对图书馆学发生作用力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概念有两层涵义：首先，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多样化的，那些对图书馆学产生不了影响力的实践活动，如商品生产、艺术创作等，就不属于图书馆学的实践基础。只有那些与知识集合有关的实践活动，如客观知识的组织，文献信息的提供，大众阅读的变化等行为活动，才能构成图书馆学的实践基础。其次，在现实实践活动中人通常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即实践活动的主导者、能动者，所以，对图书馆学能够发生作用力的实践活动，往往是由个体主体、集体主体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无论从微观还是从宏观，那些个人或群体对图书馆学产生效力的实践活动，都可构成图书馆学实践基础的组成部分。

3. 实践基础及其相关概念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图书馆实际工作”、“图书馆经验”、“图书馆实践活动”等概念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图书馆学实践基础与这些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上述概念都有“图书馆”作定语修饰辞，将被修饰辞限定于“图书馆的”范围之内。固然，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图书馆学的实践基础主要来源于图书馆的实践活动，但是，在当代的社会发展中，图书馆学的实践基础却不能仅仅局限于“图书馆实践活动”，例如，现代传媒技术拓宽了人类信息交流的渠道，计算机技术改变了人类客观知识的存储、检索方式，以至于人们主动获取信息知识的方式、范围都相应发生了重大改

^① 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517

变。这些社会实践的演变对当代图书馆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理所当然地成为图书馆学发展的实践基础。其次，实践要素是由实践主体、客体、目的、手段和结果组成的，这些要素的组合运行使得实践成为人的具有创造性的深刻活动。我们强调那些对于图书馆学发生作用力的活动才能形成实践基础，是因为实践在本质上是人体现自身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图书馆实际工作中的精华部分属于实践范畴，而其余部分低于实践层次，不属实践范畴。换言之，图书馆实际工作如果不是一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活动，那么它就上升不到实践层面。至于图书馆经验，它是图书馆实践活动初级阶段形成的、主体内在的、感性而局部的认识成果，它也不能与实践画等号，经验必须上升到理论层面，变成实践理念来指导主体进行创造性活动，才能成为实践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说，图书馆学的实践基础决不是图书馆实际工作、图书馆经验的简单组合。

二、实践基础对图书馆学所起的作用

1. 实践基础是图书馆学产生的母体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从人类需要与实践产生的，比如数学就是从丈量土地、计算时间、制造器皿的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数学中的某些词汇生动地说明了它们是起源于早期的人类实践活动。如“角”就是在观察人的大小腿（股）或上下臂之间形成的角度面产生的，英文中，直角三角形的两边叫两臂，在中文中，其中一条直角边叫做股；一个具有三度的数学图形在英文中叫做体，在拉丁文中是 *corpus solidum*，指可触摸到的物体；几何学在希腊文中是指测地术^①。图书馆学也是如此，1807年德国图书馆学专家施雷廷格感到，图书馆实践经验已经积累到不得不形成专门知识体系，即将其系统化、科学化后方能恰当表现出来的时候了，于是开始编写关于图书馆知识的教科书《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并首次提出了“图书馆学”的概念。可见，图书馆学的产生是人类千百年图

^① 张家龙. 公理学、元数学与哲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3~4

书馆实践活动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且初期图书馆学仅是图书整理实践内容的一种直观、简单的反映，基本上是描述性的。

2. 实践基础是图书馆学发展的动力

科学知识起源于问题，问题又往往来源于实践。实践经常制造问题、提出问题，这是哲学家波普尔的一个见解。波普尔认为，实践不断制造问题的典型例子是医学。医学为避免痛苦而斗争，这个斗争极为成功，但它导致了一个无意却又严重的后果：人口爆炸。这就意味着另一个老问题即节育问题又迫在眉睫。于是医学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关于社会科学，他说：“我们在社会科学中或成功或不成功，或有趣或无趣，或富有成效或徒劳无益，恰与我们所涉及的问题的意义或趣味成比例；当然，也恰与我们处理这些问题时的诚实性、直接性、简单性成比例。这一切都不仅限于理论问题。严重的实际问题，例如贫困问题、文盲问题、政治镇压问题或者合法权利的不确定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出发点。然而这些实践问题导致思索，导致建立理论，因而导致理论问题。”^①

实践产生问题，迫使理论面对、介入、解释，这在图书馆学中也不乏实例。197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参照国外经验提出“图书情报一体化”的概念，之后即在本系统进行改革实践。这一事件曾引发图书情报学界对一体化问题的大讨论。最终达成的共识是，一体化是合理的。原因在于：（1）二者工作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一体化有利于将文献的加工服务与文献信息的加工服务统一起来；（2）日益增强的情报需求要求二者实现一体化，更好地发挥二者的情报职能；（3）新技术的发展使二者在工作方法上的差异越来越小，更加靠近乃至可以融成一体；（4）一体化节省资源、成本，便于领导、统一规划等^②。由此可见，实践基础不断给图书馆学理论

^① [英] 卡尔·波普尔著；范景中等译.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2，97

^② 辛希孟，孟广均著. 图书情报工作概论. 北京：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90：95～97

制造问题，图书馆学理论只有在不断解答问题中才能获得发展。

3. 实践基础为图书馆学提供物质条件

实践基础在给图书馆学理论不断制造问题的同时，还为图书馆学理论不断提供解决问题的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包括经验技术、素材资料、试验工具等。图书馆学只有在这些物质条件的支撑、满足下，才能永不枯竭。18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提出，观察、思考和实验是认识自然的三种主要方法，他特别强调实验在检验推理与猜测上的作用，称“观察搜集事实；思考把它们组合起来；实验则来证实组合的结果”，精确的实验可以查问自然、挑动自然，从而获得新知^①。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受学科自身特点的限制，一般来说，素材、数据对图书馆学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形成某种理论或见解的基本根据。如图书馆文献利用率、拒借率是说明馆藏文献质量与使用状况的基本分析工具；文献的引文分析、作者分析、分类分析等是对一组文献科学价值进行揭示的有效方法；读者结构及其特点的统计调查是研究读者问题的基本手段。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大至宏观的问题，如信息知识传媒的增多是否会影响到大众阅读的减少？小至微观的问题，如某一专业期刊的核心作者是谁？这些都可通过社会调查或文献计量取得素材、数据，给以恰当的说明。社会调查、文献计量作为有效的实践活动是图书馆学的重要实践基础之一。

三、当代社会实践基础的主要特征

1. 互联网对传统图书馆的巨大冲击

20世纪末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人类的活动世界在普通物理空间之外又开辟出了一个虚拟空间。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传统图书馆是最先受到互联网浪潮冲击的社会领域之一。信息知识的数字化，

^① [法]狄德罗著；江天骥等译. 狄德罗哲学选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8-68

交流方式的即时性，是互联网的两大特征。建立在 Internet 上的数字化图书馆，作为网络上的一个结点，既有信息知识的拥有权，也有其使用权，其馆藏突破了以往传统图书馆物理意义的空间范围，延伸至全国乃至全球逻辑意义上的宽广领域。事实正逐步显现：在数字化的虚拟图书馆中，人们获取信息知识会越来越便捷、准确、全面。此外，电子出版物的大量涌现，也促使图书馆资源结构发生变化，只有采取新的措施与方法，图书馆才能很好地从事知识组织、知识资源的建设。这些新生事物仿佛在人们还未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而至，加上任何新事物从产生到为人们的心理所接受总是有一定的时间差，因而，建立在心理层面上的图书馆学理论还不能对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前景作出明确的预测与规定。但是，科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上每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作为人类的重大实践活动，都会对社会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同时也必将反映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之中。

2. 知识经济对人们知识观念的更新

人类经济形态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知识（智能）经济三个时代。不同时代，在经济生活中起关键作用的事物也不同，农业时代是劳动工具，工业时代是资源开发，信息时代是知识增长。尤其在信息时代，知识作为一种生产投入正逐步替代物质的投入，知识资源的可再生性、知识增长的无限性，一方面使得知识稀缺带给人的压力可以缓解，另一方面它所带来的高新技术使得能源、材料消耗减少，促使商品因成本降低而价格下降。随着知识作用的发挥，智能生产方式将取代工业生产方式，人们对财富的看法也会相应改变。如人们在过去重视有形资产、硬件，而今后会看重无形资产、软件。美国微软公司有形企业规模小、库存量小，但资产值高达 2 000 亿美元。而通用汽车公司有形企业规模大，在全球的设施与库存资产值却只有 400 亿美元。在一些知识强国中，工人一小时的劳动所得报酬要高于知识弱国工人的几十小时所得^①。因此，

^① 金兑. 社会哲学视野下的知识经济. 哲学动态, 1998 (7): 2~6

“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也会衍生出“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尊严”，“知识就是权威”等系列格言。而随着人们知识观念的更新，无论被动吸收知识（接受教育），还是主动获取知识（选择阅读），它们在人的生存与成长过程中都将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利用图书馆，怎样从浩如烟海的各种知识中获取有益知识，必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3. 素质教育与职业化分工对专门知识的需求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拥有知识的多少似乎日显重要。同时人们也会发现，掌握或拥有获取知识、处理知识的能力，甚至比拥有知识更为重要。美国一所大学图书馆的大门上方就镌刻着这样一句话：“知识的一半就是知道在哪里去寻求它。”^①因此，素质教育因旨在开发受教育者的创造性、主动性、自主性，作为一种教育模式自然要比呆板性、被动性、他主性的应试教育更具优越性。图书馆是人们主动获取知识的重要场所，图书馆学是人们求知治学的辅助之学。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人心，图书馆乃至一切知识集合实体都将发挥它们应有的效用。同样，社会分工的职业化倾向，也使得人们对知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说：“知识的变换已给知识以力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社会，但这种社会必须建立在专业化知识和具有专业知识人才的基础上。”^②当代社会专业知识的学习与以往传统社会的知识传授不同。早期知识传授形式，如神职人员、医师巫师、精神领袖等知识的形成，有专门或秘密的仪式；而现在专业知识的提升，依赖于原则上任何人都可获取的知识，无须专门的、秘密的仪式^③。而且随着社会分工制度的完善与

① [英]丹尼斯·格罗根著；张帆等译. 图书馆咨询.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8

② [澳]李瑞智，黎华伦著；范道丰译. 儒学的复兴.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40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1

深化,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知识与技能的训练,才能有资格从事某种职业。每个人只有最大限度地拥有专业知识与技能,才能从事创造性的工作。社会实践发展的这一要求,会迫使人们去努力学习并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由于知识生产与传播趋于服从商业诱导,再加上客观知识存在的无序性,人们获取知识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这时他们就会寻求知识集合与知识工作者的帮助,其中包括图书馆和图书馆员。

关 键 词

理论基础 图书馆哲学 “世界3”理论 文献信息学 图书馆系统 理论基础评价标准 实践基础

小 结

1.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图书馆学理论赖以建立的根基,它是由一些抽象、具体的理论观点组成的图书馆学先导思想。理论基础的作用是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及正确反映对象事物的客观规律,正确引导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有效引导科学研究的过程。

2. 理论基础是基础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基础理论的第一层次。它与图书馆哲学在一定语义条件下可以互换,但在内容范畴上较图书馆哲学更为宽泛。它与方法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理论基础提供具体的、可陈述的概念、方法,而方法论提供的是思维方法、分析方法;理论基础使图书馆学更有价值和意义,方法论使图书馆学更为科学和更有效率。

3. 以往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主要有波普尔“世界3”理论、信息科学理论、系统科学理论等。理论基础的评价标准,一是理论评价标准,一是实践评价标准。实践评价标准是最根本的评价标准。

4. 图书馆学实践基础是指对图书馆学能够发生作用力的实践活动。实践基础与“图书馆实际工作”、“图书馆经验”、“图书馆实

践活动”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实践基础的内容范畴不仅仅局限于“图书馆”内部，可以说凡对图书馆学发生作用力的实践活动都能形成实践基础。

5. 实践基础对图书馆学所起的作用有三个方面：它是图书馆学产生的母体和发展动力，它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物质条件。当代社会互联网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形成，以及素质教育、专业化分工，使得图书馆学实践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实践基础的变化不断向图书馆学提出新的问题。

思 考 题

1. 什么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2.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的关系如何？
3. 为什么说波普尔“世界3”理论可以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4. 什么是图书馆学的实践基础？
5. 实践基础对图书馆学能发生哪些作用？
6. 当代图书馆学实践基础有哪些特征？

第十章

图书馆学学科性质与地位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在人类科学体系中的性质和地位是由其学科归属及自身成熟程度来决定的。图书馆学学科性质，是指它属于哪种科学门类，具有哪门科学的基本特性；图书馆学学科地位，是指它是否属于一门规范的科学，它的公认程度和生长程度如何。明确了图书馆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学科性质与学科地位，有利于本学科研究方向的开拓，有利于本学科学科制度的建设，也有利于本学科发展策略的制定。

第一节 图书馆学学科性质

一、以往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认识

图书馆学学科性质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被图书馆学界广泛关注的命题之一。一方面，图书馆学经过了一百余年的发展，其知识体系已趋于稳定与明晰；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已经迅速发展成了“公众最注意和最寄予希望的科学”^①，正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并与其分庭抗礼。图书馆学研究者自然意识到：“图书

^① [美] 丹尼尔·贝尔著；范岱年等译.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14

馆学必须考虑自己所属的领域，并能为之辩解。事实上，一门学科假若不能相当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范围的话，对这门学科的学术性质和科学性质就总会存在理所当然的怀疑。”^①

在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判别问题上，国外图书馆学界流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另一是认为图书馆学属于人文科学。如前苏联图书馆学家丘巴梁在六七十年代强调：“苏联图书馆学是一门把图书馆过程作为群众性地交流社会思想的一种形式的社会科学。”^② 20世纪上半期，美国图书馆学界多数人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后来的“芝加哥学派”转而倾向承认图书馆学主要是一门人文科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谢拉在1976年指出：“尽管图书馆学在逐渐利用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同社会科学有紧密联系，但其实质依然是人文主义的。说它是人文主义的，是因为从基本上讲，它研究的是人类思想和伟大探索的文字记录之间的那种微妙的、难以捉摸的关系。把图书馆学划分到社会科学，是因为图书馆作为一个部门是社会的产物，它的目的是通过帮助个人了解他自己和他所处的环境来改良社会。但图书馆所关心的也是具有理性的人，因此它主要还是一个人文主义性质的事业。”^③ 这个观点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以至于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的《世界图书馆和情报服务百科全书》（*ALA Worl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1986年第2版）也表示：由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员更着重于思想知识及其交流，因此，图书馆学更接近人文科学，而不是“硬”科学^④。

① [美] J. 珀利阿姆·丹顿著；龚厚泽译. 比较图书馆学概论.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34

② [苏] O. C. 丘巴梁著；徐克敏等译. 普通图书馆学.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1

③ [美] 杰西·H. 谢拉著；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1~2

④ 孙光成主编. 世界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百科全书.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286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但与西方图书馆学研究者不同的是,我国图书馆学界除了从学科属性上来分析图书馆学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外,还从当时意识形态的需要指出图书馆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甚至认为阶级性是图书馆学的本质属性。其主要理由是:①图书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不同社会为不同的统治阶级服务。既然图书馆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研究图书馆的图书馆学也必然带有阶级性。②社会主义的图书馆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本身就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因此自然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战斗性①。80 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理性的恢复,这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认识开始逐步淡化。1981 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谈及图书馆的性质时,指出图书馆具有社会性、科学性、教育性和服务性,回避了阶级性;并说图书馆学“是以图书馆事业为研究对象,而图书馆事业是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所以它是一门社会科学”②。这种在图书馆性质、图书馆学性质上摒弃“阶级性”的观点,表现出编者一定的胆识和勇气,标志着科学精神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返青。此后,关于图书馆学性质的讨论不断深入,观点纷呈。

至目前为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如下五种:

1. 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持此观点者包括了《图书馆学基础》的编者及大多数研究者。由于《图书馆学基础》在 80 年代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这种观点颇具主流意味。他们的主要理由是:①划分一门学科性质的主要依据是该门学科研究对象的属性。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无论表述为图书馆、图书

① 此三性的提出,见: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第一期学员集体编写.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 北京:文化学院,1960:12

②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 图书馆学基础.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8

馆活动、图书馆事业或文献信息活动，它们均是社会现象，而以此为研究对象就应属于社会科学。^②尽管图书馆学研究受当代科学综合化发展趋势的影响，渗入了许多自然科学、交叉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但只要研究对象未有本质改变，学科性质也不会变^①。

2. 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科学

此种观点在国内也有较大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关懿娴、黄宗忠等。关懿娴先生早在1957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科学讨论会上就提出了这一观点^②，1982年她又著文坚持这一观点^③。而黄宗忠先生则在《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对此观点的理由作出了详细论述。他认为：^①当代科学呈综合发展趋势，交叉学科、横断学科不断出现；哲学与数学方法正向其他学科渗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相互融合，图书馆学不可能不受其影响。^②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存在着内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如图书馆构成的复杂性、图书馆性质与功能的多样性、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群体性、图书馆学方法的整体性等。^③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不断发展、扩张，已融进了大量横断科学、交叉科学、技术科学，并形成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因此，“今天的图书馆学正在走向多学科结合的综合化道路，成为一门既具有应用科学、社会科学性质，又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综合性学科”^④。1996年，谭祥金、石呈祥二人虽然在各自的论著中承认图书馆学目前尚为社会科学，但他们都预测未来可能会发展成综合性科学^{⑤~⑥}。

① 吴慰慈.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概述. 见: 周文骏, 吴慰慈编. 图书馆学情报学基本理论论文选.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1~21

② 见: 朱天俊. 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学”.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 1957 (8): 1~5

③ 关懿娴. 改进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管见. 图书馆学通讯, 1982 (4): 82~86

④ 黄宗忠编著. 图书馆学导论.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44~50

⑤ 谭祥金. 文献信息学导论.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6: 368~369

⑥ 石呈祥. 图书馆学概论.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 271~273

3. 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

此说又大体分为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图书馆学为应用技术科学。如图书资料分类法就是一门技术工具，而新技术手段在图书馆中的广泛应用更加强了图书馆学的应用技术性^①。二是认为图书馆学为综合性应用科学，因为图书馆是一个综合体，图书馆学涉及了一切知识，运用了多种技术手段，故从学科基本属性上，“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或综合性的社会工程科学”^②。三是认为图书馆学为应用社会科学。持此观点者多为研究有素的资深学者，其论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又多刊布于基础理论的教材中，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有沈继武^③、倪波和荀昌荣^④、宓浩和刘迅^⑤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①图书馆学虽然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但社会科学包含许多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分支，如法律科学、新闻科学、财经科学等，因此一门隶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还应根据自身特点进行细划。②图书馆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应用性等特征，其方法与技术的含量较大，所以应属于应用社会科学。

4. 图书馆学是一门管理科学

持此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为桑健。他在 1985 年提出，“客观知识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中介体系，对它的搜集、整理、分析、传播和利用，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管理系统”，因此，以这一管理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应是一门管理科

① 李一. 试论图书馆学.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81 (1): 7~14

② 周旭洲. 论现代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与地位. 图书馆学研究, 1984 (6): 1~7

③ 沈继武. 关于图书馆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图书情报知识, 1985 (1): 21~26

④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等编. 理论图书馆学教程.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52

⑤ 宓浩主编. 图书馆学原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227~229

学^①。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划归到“管理学”门类下，渐渐地，后来支持图书馆学为管理科学的观点多了起来。如2001年，吴慰慈、罗志勇二人撰文提出，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是知识组织、控制和选择传递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管理过程，所以图书馆学、情报学应属于管理科学^②。

5. 图书馆学是一门信息科学

此观点产生于信息科学思潮风靡学术界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如吕斌在1983年著文指出：知识是信息的一个子域，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知识通讯现象，这就决定了它们属于信息科学这一门类。在高新技术的介入下，图书馆学、情报学最终会发展成一门科学——知识通讯学^③。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改名为信息管理系，该系新的学科规划认为，信息科学是一级学科，信息管理是二级学科，将图书馆学、情报学、编辑学等关系密切的学科集中在“信息管理”名下进行整合，既能保持它们的独立性，又可把它们通用的原理与方法提升出来^④。这实际上是把图书馆学作为信息科学的一个三级分支来看待的。

以上各种观点由于形成的基点与角度不同而各异。但值得肯定的是，它们都看到了当代图书馆学实践基础的变化，并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图书馆学所具有的某些属性与特征。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无疑极具启迪作用。

① 桑健. 图书馆学概论. 大连: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548

② 吴慰慈, 罗志勇. 新技术革命对图书馆学情报学体系的影响. 河北大学学报, 2001 (3): 102~111

③ 吕斌. 从信息和信息科学看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性质. 图书与情报, 1983 (3): 17~22

④ 王万宗. 从图书馆学系到信息管理系. 北京大学学报 (信息管理专刊), 1997: 35~38

二、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1. 研究对象是学科分类的“元标准”

近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知识的分类采用了许多不同的原则与标准。如英国哲学家培根依据人类自身理性能力，把知识分为三大类：历史（记忆能力）、诗歌（想象能力）、哲学（理解能力），这一分类标准因其是以研究主体的认识特点为依据的，故可称之为主观性标准。19世纪以后，独立学科大量涌现，科学分化进程加快，法国实证主义奠基人孔德遂采用客观性标准将科学知识分为六个学科：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社会学。它们的排列顺序基本符合了物质运动的演化过程。当代社会对学科的分类，基本上采用的是客观性标准，即通过划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来确定其在科学知识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并阐明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对象是科学主体所认识的特定现象，它的存在是科学认识的前提。

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认识内容的不同、认识的方法不同，以及认识成果、社会功用的不同，因此，人们划分不同的学科门类，首先就是由研究对象入手的。如把研究自然现象的学科称做自然科学，把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叫做社会科学，把研究精神现象的学科叫做人文科学。当然，也有根据不同科学的其他特征来划分学科的，如依据一门科学与生产实践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将自然科学划分为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等。但这种分类标准不是普适的，不见得适合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依研究对象来划分学科类别是具有普适性的，因而，以研究对象的区分来划分科学类别，应该说是学科分类的“元标准”。

当然，科学在发展，学科分类标准也会变化。但就目前来说，以研究对象来作为学科分类的基本标准，还是世界上主要通行的做法。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4年版）曾主要依研究对象的不同将科学门类划分为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医药科学、农

业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人类。而我国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2 年公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92), 其学科分类所遵循的“科学性原则”, 就是要求学科分类应根据学科研究对象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的运动形式来进行客观性的划分^①。

通常, 依照研究对象的不同, 我们可将现有庞大的人类知识体系划分为三大门类, 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三大学科门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①从研究对象与目的来看, 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客观物质世界, 其目的是探寻物质世界的运动和演化规律, 主要学科有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医学、农学、环境科学和生物学等;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目的是通过对社会的运行、组织、调控、管理、规范的研究, 使社会更有效地运行、发展, 创造出符合人性的社会体系, 主要学科有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 人文科学(又称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自身的本质、精神、价值, 其目的是解答人的生存意义、感情与信仰、自由和幸福等问题, 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 使心灵有所安顿, 主要学科有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美学等。②从学科特征与研究方法来看, 自然科学具有客观性、刚性、精确性等特征, 研究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等实证的、可量化的科学方法; 人文科学则具有主观性、柔性、模糊性等特征, 研究方法主要是解读和感悟、情感思维、价值分析、自由联想等质化的科学方法; 而社会科学的学科特征、研究方法则介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之间, 目前有偏倾于自然科学的趋势。

2. 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

在以上三大科学门类中, 图书馆学应该归属哪一门类呢? 我们从表 10-1 中, 可以看到图书馆学更多具备的是社会科学的特征, 显然, 图书馆学应归属于社会科学。

^① 丁雅娴主编. 学科分类研究与应用.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1994: 26

表 10-1 图书馆学与三大科学门类特征的比较

学科特征	1. 自然科学	2. 社会科学	3. 人文科学	4. 图书馆学
研究对象	自然现象、天然物质、自然过程	社会现象、社会事物、社会活动	精神现象、思想观念、文化传统	同 2, 含 1、3 中小部分
研究目的	揭示物质世界运动、演化规律	创造合理的社会秩序与结构	寻找精神家园	同 2, 含 3 中部分
学科特点	客观性、刚性、精确性	中性偏 1	主观性、柔性、模糊性	同 2, 含 1、3 中部分
研究方法	观察、实验, 实证的、量化的	中性偏 1	解读与感悟、情感思维、自由联想	同 2, 含 1、3 中部分
研究成果	半衰期短、老化快	半衰期长、老化慢	半衰期极长、老化不明显	同 2

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图书馆学研究的是如何组织客观知识,使其形成有序的知识集合,以便向人们提供便捷的利用。客观知识、知识集合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人们组织知识和获取知识的行为又是一种社会活动、社会行为。因此,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尽管图书馆学也要观照客观知识的内容,同时对客观知识的载体(物的特性)也加以研究,但从主要方面来看,这并不能改变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属性。

其次,图书馆学的研究宗旨是为人们获取知识提供最佳方法与工具,这也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相同。至于在学科特点、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存在状态等方面,图书馆学更是与社会科学相同或

接近。如在学科特点上，图书馆学也具有某些客观性、刚性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既大量使用实证的、可量化的方法，也使用解读的方法，具有社会科学“中性”的特点。

而且，除了上述理由外，我们还能找到其他的参照，表明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应属于社会科学。如从图书馆学的一些同族学科来看，它们也基本上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图书馆学的同族学科有情报学、档案学等。前苏联著名的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说过：“情报学属于社会学科范畴，因为它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才具有的现象和规律性。”^①我国著名的档案学家吴宝康先生也曾指出：档案产生于社会实践又作用于社会实践，档案工作是一种社会活动，档案工作者与档案利用者的关系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档案馆又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因此，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②。近些年来，情报学界、档案学界关于本学科的学科属性又有新的观点流行，如认为情报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科学，档案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等，但是这些观点并没有否定情报学、档案学自身具有社会科学的某些性质。事实上，1993年7月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和1999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均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归入社会科学门类之中。

3. 以往学科性质认识的不足之处

诚如台湾学者顾敏所言：“图书馆学是一项激荡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近年来自然科学被广泛地应用发展，使得传统以人文科学为主要基础的图书馆学亦受到冲击，而而临了求通的关键性的时刻。”^③可以说，当代图书馆学已融进了大量其他学科的

① [苏] A. И. 米哈依洛夫等著；徐新民等译. 科学交流与情报学.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422

② 吴宝康，丁永奎. 档案学.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21~28

③ 顾敏. 图书馆学探讨. 新竹：枫城出版社，1981：2版序言

理论与方法，人们判别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人们试图从不同角度来审视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但以往的诸多认识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把图书馆学看做综合科学的观点，虽然合理地揭示出了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多学科交叉的发展趋势，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至少目前图书馆学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科学。所谓综合性科学，是指通过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同一客体进行研究所形成的科学，如仿生学、环境科学、旅游学、管理学等。能够称为综合性科学的学科，一般都有利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较为成熟的一群具体分支，如环境科学有环境物理学、环境化学、环境地理学、环境生物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美学、环境工程学等，而图书馆学目前尚不具备这样一群成熟的分支学科，因此还不能说它是一门综合性科学。现在在国内学术界流行一种“泛综合科学病”，一些学科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动辄称本学科是综合性科学，这种倾向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其二，将图书馆学视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观点，揭示出了图书馆学具有实践性、应用性、技术性的特征，这是很有道理的。但图书馆学既不是一门技术科学（或社会工程学），也不能称为应用社会科学。因为，技术是物质、能量、信息的人工化转换，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加工、制作活动，是由实体性因素（工具、设备等）、智能性因素（知识、经验等）和协调性因素（工艺、流程）等组成的^①。图书馆学具有技术的特点（如文献分类与标引），但它也有自己相对丰富的理论体系（如基础理论），因此它还应当是一门科学，而不仅仅是工作方法的经验体系。另外，把图书馆学看做是应用社会科学也有不妥。因为社会科学除了具有“科学性”这一基本特征外，另外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具有“实用性”，

^① 陈红兵，陈吕曙. 关于“技术是什么”的对话.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 (4): 16~19

它能产生经科学确证的知识并能应用于实际^①。如果在社会科学中还要划分出“应用社会科学”这一层次，那么“基础社会科学”又指的是什么呢？

其三，把图书馆学归属于管理学的观点，深刻地描述出了图书馆工作的本质属性，这对图书馆工作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但这一观点的前提是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当做了“图书馆”。而事实上，图书馆学不仅要研究图书馆，还要研究客观知识与知识受众。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知识受众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逻辑终点。研究图书馆的管理理所当然地属于管理学，但图书馆管理仅是图书馆学的一个分支，并非图书馆学的整体，图书馆学研究的是“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我们不能因图书馆学中有管理学的因素，就将整个学科纳入管理学范畴，这就好像中医学，它无疑属于自然科学，但它也包含了古代哲学中“精气、阴阳、五行”等概念与理论，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它属于人文科学或边缘科学。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这个自然物的生命、健康与疾病防治等，它仍应归属自然科学。另外，管理学是依托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发展起来的，后又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加盟与推动，才得以形成一门综合性的交叉科学，从其历史特征上看，管理学更靠近自然科学。因此管理学在《学科分类与代码》中，以综合性学科的名义归入了自然科学的最后，紧邻人文社会科学。在我国政府的科研管理中，管理学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受理范围，而不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受理范围，这也有一定道理。

其四，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信息科学的观点，准确刻画出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在其活动过程中具有信息知识交流的属性与特征，但我们应知道，信息知识的交流是社会各领域、各学科研究中都广泛存在的现象。如教育学，其“传道、授业、解惑”就是信息知识

^① 阿甲·卡赞西吉尔，大卫·马金森主编；黄长著等译．世界社会科学报告（199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序言

的交流；传播学则更不用说了，传播本身就是信息知识交流的过程。然而教育学、传播学均属于社会科学而未列入信息科学。因此，图书馆学还是应该以自身研究对象的“事物”属性，而不是“过程”属性来判别自己的学科性质。信息科学是对各门学科中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的问题（即信息方式）进行研究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横断学科。众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的学科都存在着信息的问题，如果依各自研究对象的过程特征（信息方式）将其划入信息科学，那么信息科学就会无限膨胀，最终也动摇了学科分类“元标准”的地位。

在现实学术制度、学术活动的某些领域里，图书馆学的归属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如在图书馆学教育的培养目录中，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一直摇摆不定。早在1964年制定的国家学位条例的学科分类表中，图书馆学被含在文学门类里。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图书馆学被列于文学门类下“中国语言文学”类里的“第十九”小类。1988年10月该专业目录修订后，“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被合为一个学科，置于“理学”门类，并成为二级学科。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新增了“管理学”门类，“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作为一级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成为三个并列的二级学科归属其下。这一演变过程表明，图书馆学一直在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第二节 图书馆学学科地位

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图书馆学的社会公认程度不是很高。1973年，美国比较图书馆学家丹顿（J. P. Danton）谈及图书馆学学科地位时说：“十九世纪，当生物学和语言学采用科学方法所产生的效果正鼓励着许多其他学科的时候，图书馆学还是一项完全只重实用的专业，到处都不承认它是一个学术领域，甚至不承认它是

认真的学问。”直至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图书馆学仍然是高度实用主义性质的，作为一种‘科学’，它仍然处于胚胎状态，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莫过于整个图书馆学理论、尤其是比较图书馆学理论之贫乏。”^①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刘国钧先生，先后于 20 世纪 30 年代、50 年代撰文，对图书馆学一直没有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尊重表示了不满，并呼吁社会重视图书馆学的研究^{②~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何判断图书馆学在当今科学知识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质”的方法（定性分析）和“量”的方法（定量分析）进行研究探讨，从而得到较为合理的答案。

一、从学科规范程度看图书馆学地位

图书馆学学科地位不高，这一直是困扰图书馆学研究共同体的一个现实难题。1985 年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力图从学理上探讨、阐释这一难题，他们提出了诸多观点，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认为图书馆学目前还处于一种“前科学”（即不成熟科学）状态的观点。1985 年，吴慰慈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依据库恩（T. S. Kuhn）科学革命理论指出：“库恩认为，现代的社会科学也还处于前科学时期。库恩的理论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图书馆学发展到今天，也仍然处于前科学状态。整个学科尚未进入常态科学的阶段，没有形成一套模式——为图书馆学家们普遍接受的一种理论。”^④这一观点因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而一度流行于我国图书馆学界，直至 20 世纪末，才有一些质疑和声音表达出来。

什么是“前科学”、“常态科学”呢？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

① [美] J. 珀利阿姆·丹顿著；龚厚泽译. 比较图书馆学概论.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67，87

② 杜定友. 我与图书馆. 见：杜氏丛著书目. 上海：自刊，1936：21~22

③ 刘国钧. 什么是图书馆学.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1）：1~5

④ 吴慰慈. 图书馆学概论.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21

构》(1962年)中提出,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这样一个循环上升过程。他认为,一门学科处于前科学阶段的时候,范式(paradigm,又有“规范”、“范型”之译称)尚未形成,只有常规科学(又译称“常态科学”)才具有范式。常规科学在一段稳定发展时期之后,会出现反常与危机,最终会导致旧的范式被新的范式摧破和取代,即发生科学革命,科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常规科学发展阶段。科学发展就这样循环往复,不断向前演进。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涉及了科学结构与科学发展两个命题,其中范式的理论是其基本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约定俗成的科学准则或范例,是一种大家遵循的观念上的模式或习惯。如在科学领域里,某些业已完成的科学成就就会形成范式。科学成就一般以学术名著或教科书的方式,使一门科学从其他领域中分化出来,发展成为成熟的学科。这些著作、教科书所显示出的科学成就具备了这样两个特点就可称为范式:(1)“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2)“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①。

所谓前科学,就是指科学尚未正式建立起范式的幼稚阶段。在此阶段里,科学研究中材料的搜集近乎随机活动,人们对材料的解释也处于差异之中,甚至经常引起争论。他们各有各的信念,几乎每个人都不得从头开始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当某种科学成果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并取得了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如牛顿的《原理》、富兰克林的《电学》、拉瓦锡的《化学》等,这些学术著作或教科书在一定时期中为以后几代的科学工作者暗暗规定了某一领域中应当研究些什么问题、采用什么方法,此时,范式就已建立,前科学就发展成为常规科学。科学工作者在前科学时期的重大

^① [美] T. S. 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8~9

分歧不见了，搜集材料与理论表述都成了高度有目的的活动，而且研究的效率也提高了。有了范式，常规科学就可以开展更深奥的科学研究，促使科学知识不断扩大与精细。

反常是指在常规科学中按照范式解疑释难产生困难时所发生的一种超乎常理的新的发现。反常是偶然出现的，它需要两个条件：科学家个人的创造性智慧和科研仪器与方法上的准备。反常是由发觉、扩展与作用、调整适应与同化三个阶段组成的。反常与新事物相联结。常规科学起初倾向于压制新事物，但同样可以在后来有效地引发新事物的产生。当反常数量增多，既不能排除，又不能同化，加上社会的某种需要，这些反常就会打击原有范式的基本原则，使原有范式受到巨大压力，这时反常就导致了危机。危机使科学家对原有范式失去信念，它最终允许一种新的范式涌现出来而使正常的范式逐步松弛、瓦解，让反常的研究成果进入科学知识核心，从而引起科学传统的变革。旧的范式向新的范式过渡，就是科学革命^①。科学家在新的范式指引下采用新工具观察新领域，看到了新的东西，并对新的世界重新作出回答。科学权威们会通过教科书、普及读物、哲学著作构建出一套特殊的范式，然后交给科学共同体，使科学重又进入常规发展之中^②。

用以上库恩的理论反观我们图书馆学，那种认为图书馆学处于前科学状态的观点显然失之偏颇。尽管图书馆学早期因其过度迷恋实用与技术，而使人对其科学性发生怀疑，但不能否认的是，图书馆学发展至今，无论在应用方面、理论方面，它是有范式的，它具有常规科学的基本特征。至少我们可以举出下面两个理由：^①图书馆学是由多分支科目组成的学科，其各个分支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有的分支已比较成熟。如图书馆学的核心知识——文献分类学，它

^① [美] T. S. 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 科学革命的结构.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14~15，75

^② [美] T. S. 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 科学革命的结构.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90~118

的范式形成较早，也很突显。文献分类法的编制原理（以科学分类为基础，以实用为目的）、分类的规则（同类相聚，异类相斥），以及分类惯例（适度细分，详今略古，依人列类等），都是经过长期文献分类实践总结出来的，早已成为分类工作恪守的准则与习惯。库恩曾说，一门科学的范式可由不同的规则表现出来，并且范式往往要比规则还要优先、完整地存在，即规则来自于范式。因此，不能说图书馆学不存在范式。②从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看，现代图书馆学曾以图书馆（或图书馆事业）为研究对象，因此国内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众多教科书，在篇章安排上几乎都有“图书馆性质”、“图书馆职能”、“图书馆类型”、“图书馆管理”、“图书馆网络”、“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未来”等内容，它们暗示出一种思维定式，即“有关图书馆的”就是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这种一致性就是一种范式。因此，图书馆学已是一门具有范式约定的常规学科。

“前科学说”观点持有者曾有一个重要理由，认为图书馆学目前在某些原理问题（如研究对象）上存在着众说纷纭的现象，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以及被大家接受的理论规范，这正符合前科学阶段信念不一的特征，因而图书馆学尚不足称为常规科学。这种观点亦可商榷。数学应该算一门常规科学，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对“何为数学的研究对象”进行论争。因此我们不能仅因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有诸多争议与辩难而否认图书馆学范式的存在。尤其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所存在的范式与自然科学的范式有所不同。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理论确已流传开来，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等当代著作中，频频出现范式、不可通约论、学术共同体、常态、危机等库恩式术语，然而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却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范式”这一概念。如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就曾经说过：“假设对管理这样的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实际上远远超过范式对一门自然科学学科的重要性。”因为自然科学中的范式对自然界不产生影响，而管理科学处理的是人和人的机构的行为。人与社会的变量太多、太活跃，管理科学的假设以往可能是符合现实的，而现在却可能相反。一旦假设变成错误的，

那么根据假设而得出的一切东西也都是错误的。所以，德鲁克说：“有关现实的基本假设是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模式。这些有关现实的假设决定这门学科的重心是什么。”^①

即便是在自然科学界，库恩的新范式取代旧范式从而导致科学革命的观点也不是一成不变地被人信奉。理论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Dyson)在其著作《想象的未来》(Imagined World)中曾指出：科学革命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库恩所主张的由观念的变革而驱动的，另一种却是工具进步而驱动的，如生物学里双螺旋革命与天文学里的大爆炸革命，都是新工具驱动的^②。可惜，库恩未能见及后人的这些意见，但是他却较早地针对社会科学领域是否适用他的前科学命题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某些社会科学家以为从我这里能得到一种可以改进他们领域的观点和方法，先要在基本原则取得一致，然后再转入解疑释难活动，那他们就十分糟糕地曲解了我的意思。”^③正如剑桥语言研究室的玛斯特曼女士所发挥的：有些社会科学有可能是多范式的，经常会有范式之间的竞争，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是常规科学^④。

二、从文献频率统计看图书馆学地位

1. 图书馆学的公认度

图书馆学的公认度，是指“图书馆学”作为一个类目(或主题词)，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学科分类表(或主题词表)一级类目/词目中出现频率的高低程度。

目前，从国外科学文献组织、检索工具发展趋势看，除了一些

① [美]彼得·德鲁克著；顾信文译. 管理的新范式(上).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9(2): 2~9

② 见：刘钝. 另一种科学革命?. 中华读书报, 2002. 6. 12(24)

③ [美]T. S. 库恩著；周寄中译. 对批评的答复. 见：批判与知识的增长.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11~375

④ [英]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著；周寄中译. 范式的本质. 见：批判与知识的增长.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73~115

图书分类法还保留有分类表外,大量的新型检索工具,多使用主题法。无论在大型分类法还是在一些网络检索工具中,“图书馆学”很少出现在一级大类或一级主题词目表中。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1995年版)在一级类目“Z 目录学、图书馆学”中出现了图书馆学^①;被国外学术界认为最重要、收录词目较多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有54个一级学科类目/词目,其中收录了“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②;Proquest公司的人文社会科学全文数据库(PCI Full Text)下列37个一级主题词中也出现了“图书馆与信息科学”^③,但这毕竟是少数现象。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文献组织、检索工具的一级学科类目/词目中并不出现“图书馆学”。例如,在《杜威十进分类法》(1996年第21版)中,“000 总论”下面的二级类目才是“020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国际社会科学书目》(IBSS)一级学科共收39个类目/词目,其中无图书馆学^④;美国信息存取公司的《学术索引(扩充版)》(*Expanded Academic Index*)一级学科类目/词目共有10个,其中无图书馆学^⑤;美国威尔逊公司(H. W. Wilson)的《社会科学索引》(*Social Sciences Index*)共有28个一级学科类目/词目,其中无图书馆学^⑥;

① 俞君立,陈树年主编.文献分类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61

② <http://www.isinet.com/cgi-bin/jrnlst/jlsubcatg.cgi?pc=J> (访问日期:2002年10月29日)

③ <http://pcift.global.chadwyck.co.uk> (访问日期:2002年10月7日)

④ <http://www.lse.ac.uk/IBSS/subject.htm/> (访问日期:2002年10月28日)

⑤ <http://library.wustl.edu/databases/about/eai.htm/> (访问日期:2002年10月27日)

⑥ <http://www.hwwilson.com/databases/socsci.cfm> (访问日期:2002年10月27日)

法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 FRANCIS 数据库收录 21 个一级学科类目/词目, 其中无图书馆学^①; 美国公共事物信息服务公司的 PAIS 数据库 (Public Affair Information Service) 收录 24 个一级学科类目/词目, 其中也无图书馆学^②。上述五个数据库被西方社会科学界认为是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数据库^③。此外, 在 Ingenta CALIS Gateway 数据库 (国际网) 里, 一级主题词表由“农业/食品科学、艺术与人文科学、生物/生命科学、化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地球/环境科学。经济学与商业、工程/技术、数学与统计、药学、护理学、哲学/语言学、物理学/天文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科学”15 个主题词组成, “图书馆学”仅作为二级主题词出现在“计算机与信息科学”之下^④。这表明, 图书馆学在国外显然不是一个大学科, 社会公认程度尚不很高。国外大型文献组织工具、检索工具以主题法居多, 一级主题词的出现带有一定的任意性、随机性, 这就为从主题词表的排序上观察“图书馆学”出现频率的高低程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虽然国内许多文献工具有逐步采用主题法的趋势, 至少目前分类法还在大行其道。国内反映人文、社会科学一级学科类目的文献工具较多, 我们选择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使用较广泛或参考价值较大的下列 10 种, 以比较“图书馆学”目前的出现频率:

A.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2 年 11 月 1 日公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

B. 国家教委社科司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① <http://www.rlg.org/cit-fra.html> (访问日期: 2002 年 10 月 23 日)

② <http://www.pais.org/broadtopics/index.stm> (访问日期: 2002 年 10 月 23 日)

③ 阿里·卡赞西吉尔, 大卫·马金森主编; 黄长著等译. 世界社会科学报告 (1999).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83~284

④ <http://www.gateway.ingenta.com/calispku> (访问日期: 2002 年 10 月 2 日)

管理系统》(1997年公布的学科门类);

C. 国家教委社科司编《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博士点代码》(1997年);

D.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图书馆分类法》(1999年第4版);

E. 社会科学检索词表编委会编《社会科学检索词表》(1996年);

F.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编辑部编《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年总目录);

G. 李铁映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9年);

H. 戴龙基等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

I. 陈端、梅小璈编《〈中国社会科学〉总目提要》(第2辑, 1990~1999);

J. 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截至2002年9月)。

上述文献或数据库均有自己的一级学科类目, 这些一级学科类目的排列及频率分布状况如表 10-2:

表 10-2 国内 10 种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一级类目频率

	学科名称	一级类目序列	频率
高频学科	哲学	A B C D E F G H I J	10次
	语言学	A B C D E F G H I J	10次
	文学	A B C D E F G H I I	10次
	历史学	A B C D E F G H I J	10次
	经济学	A B C D E F G H I J	10次
	政治学	A B C D E F G H I J	10次
	法学	A B C D E F G H I J	10次
	教育学	A B C D E F H I J	9次
	艺术学	A B C D F H I J	8次
	社会学	A B C E G H I J	8次

续表

	学科名称	一级类目序列	频率
中频学科	宗教学	A B D E G H J	7次
	民族学	A B C E G H I	7次
	马克思主义	A B D E G H	6次
	图书馆学	A B C E H J	6次
	情报学	A B E H J	5次
	体育科学	A B D H J	5次
	新闻与传播学	A B E G J	5次
	统计学	A B H I J	5次
	文化学	D F H I J	5次
低频学科	管理学	B C E J	4次
	考古学	A B E G	4次
	军事学	A D E J	4次
	心理学	B C F J	4次
	科学学	D F H	3次
	档案学	E H J	3次
	人口学	H I J	3次
	文献学	A B	2次
	美学	F J	2次
	人才学	H J	2次

表 10-2 所列 29 个一级学科出现频率皆为 2 次以上, 2 次以下未列入。其中出现频率在 8 次以上的有 10 门学科, 即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社会学。由于其出现频率高, 我们可以称之为“高频学科”。显然, 它们的社会公认程度与成熟程度均较高。出现频率在 7~5 次的有宗教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学、情报学、体育科学、新闻与传播学、统计学、文化学等 9 门学科, 属于“中频学科”, 它们的社会公认程度及成熟程度较“高频学科”要低。出现频率在 4~2 次的有管理学、考古学、军事学、心理学、科学学、档案学、

人口学、文献学、美学、人才学等 10 门学科，属于“低频学科”，它们的社会公认程度及成熟程度较低，学科地位也不稳定。但需要说明的是，管理学、军事学皆不应列入低频学科，原因是有些类表将其或收进自然科学门类，或因有保密性不列出，故降低了它们的出现频率。至于心理学、美学，许多分类表已将它们分入哲学。个别分类表将其单列成一级类目，就会使其频率降低。根据上表所列，图书馆学应该属于“中频学科”。事实显示，经过我国数代图书馆学研究者辛勤的努力，图书馆学的社会公认程度及其成熟程度正在不断地提高。当然，我们对“低频学科”也应有正确的看法，“低频学科”往往具有先导性和前瞻性，尽管它们目前不具备较高的社会公认程度。

2. 图书馆学的生长度

图书馆学的生长度，是指与其他学科相比，图书馆学文献单元（或知识单元）数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程度。

我国图书馆学者范并思曾在 1996~1998 年主持过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交流机制与情报服务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统计分析》。该项目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的《报刊资料索引》（光盘版）定量分析了 1978~1995 年的社会科学文献增长过程，对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文献增长率（即生长度）进行了客观的描述与揭示，开拓了文献计量学应用的新领域^①。由于统计所依的信息源不同，为了说明图书馆学 20 世纪后 20 年的发展状况，现以国内主要检索工具之一《全国报刊索引》为依据进行图书馆学生长度的数据分析。

由上海图书馆等单位编研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哲社版）收录人文、社会科学刊物 6 000 多种，报纸 200 余种，是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最大的文献题录库，仅 1993 年 1 月至 1999 年 12 月，该数据库就收有题录 140 万条。我们将各学科 1980~1999

^① 范并思.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报刊文献分析：1978~1995.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

年不同年度的发文量及 20 年总发文量列表 10-3 如下^①：

表 10-3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哲社版) 20 年文献量

学科名称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1980--1999 年 总量合计	所占总量 比例 (%)
经济	15 590	24 886	20 965	18 220	436 736	25.30
政治	13 861	9 413	12 003	11 760	230 536	13.36
教育	5 080	11 652	10 127	10 838	211 950	12.28
文学	12 446	11 738	10 451	10 313	203 373	11.78
历史	7 910	12 092	10 376	6 323	173 591	10.06
法律	1 281	2 750	3 608	6 687	85 087	4.93
体育	1 155	3 361	2 062	2 105	48 520	2.81
哲学	1 618	2 280	2 811	1 995	43 014	2.49
艺术	3 218	2 268	1 980	1 241	36 436	2.11
语言文字	1 943	2 072	2 118	1 418	35 734	2.07
图书馆学	527	1 379	1 469	2 004	29 504	1.71
军事	1 684	1 741	1 575	1 145	24 366	1.41
新闻与传播	289	1 185	724	2 241	23 592	1.37
文化	780	1 029	1 067	1 122	20 772	1.20
科学、科研	2 148	1 123	958	760	18 784	1.09
文物考古	1 124	930	1 376	389	17 025	0.99
出版	217	573	651	1 059	15 227	0.88

^① 本表内数据统计及计算是由笔者与姚学斌同志共同完成的，如有不确之处，由笔者承担责任。

续表

学科名称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1980~1999年 总量合计	所占总量 比例 (%)
情报学	327	1 145	805	300	13 111	0.76
马克思主义	220	159	193	706	12 402	0.72
档案学	84	337	751	743	10 760	0.62
宗教	203	368	652	738	10 386	0.60
管理学	30	210	333	509	5 541	0.32
人才学	80	287	255	271	4 098	0.24
统计学	15	177	175	248	3 757	0.22
博物馆学	36	250	264	166	3 589	0.21
社会学	82	254	122	122	3 477	0.20
人口学	185	142	214	140	3 124	0.18
地理	171	92	57	37	1 622	0.09

表 10-3 中年度文献量仅指某学科该年的文献发表量；1980~1999 年的总量合计，是指某学科 20 年来累积发表文献量；上述 28 个学科 20 年的文献总量合计为 1 726 114 篇；总量百分比，仅指某门学科在 28 个学科文献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列学科名称，有许多未能像表 10 2 一样称“××学”，如“经济”不称“经济学”，“政治”不称“政治学”等。原因是：其一，《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所列科目原本如此，故一如其例；其二，《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所收题录除了学术文章，还有大量的报道、介绍、讲话等非学术文章。此外，特别是“文学”类中，除了文学理论文章，该类还包括了所有文学创作作品的篇目，如小说、诗歌、散文等。从表 10-3 所列数据可看出，1980 年至 1999 年期间，经济、政治、教育、文学、历史、法律、体育、哲学、艺术、语言文字等 10 个类目的文献量均超过了 3 万篇，它们都是这

段历史时期的“显学”，与前文所述“高频学科”有较多的等同。而图书馆学、军事、新闻与传播、文化、科学与科学研究、文物考古、出版、情报学、马克思主义、档案学、宗教等 11 个类目的文献量均在 1 万至 2 万余篇，它们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中等规模的学科，与前文所述“中频学科”有部分等同。管理学及其以下 7 个类目的文献量均不足 1 万篇，它们是这段历史时期发展规模较小的学科，与前文所述“低频学科”也有部分等同。

上述 28 个类目反映的仅仅是不同学科在一定历史时期文献积累的多少，而判断不同学科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不同生长度，还需对其学科文献的年均增长量进行分析（见表 10-4）：

表 10-4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哲社版）年均文献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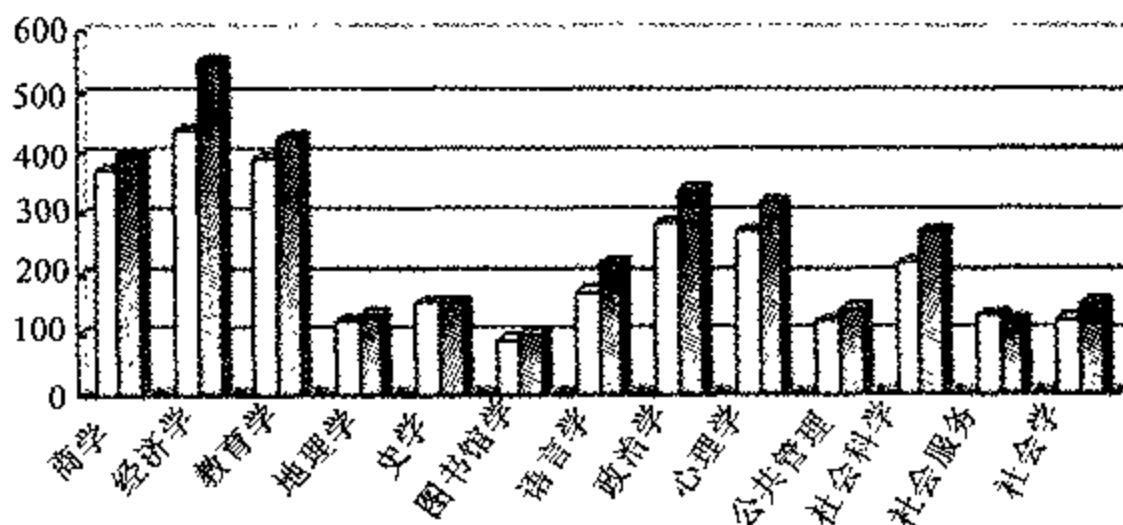
学科名称	1980~1995 年	学科名称	1980~1995 年
管理学	32.7%	文化	3.7%
统计学	32.4%	哲学	2.1%
档案学	24.4%	经济	1.6%
新闻与传播	22.7%	情报学	-0.9%
法律	18.0%	政治	-1.6%
出版	17.2%	文学	-1.9%
博物馆学	16.5%	历史	-2.2%
图书馆学	14.3%	人口学	-2.7%
宗教	13.8%	语言文字	-3.1%
人才学	13.0%	军事	-3.8%
马克思主义	12.4%	艺术	-9.1%
教育	7.9%	科学、科研	-9.9%
体育	6.2%	文物考古	-10.1%
社会学	4.1%	地理	-14.0%

在表 10-4 中, 管理学、统计学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成为年均文献增长率最高的学科。档案学、新闻与传播学、法律、出版、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也因其属于改革开放以后重又兴起的学科, 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些学科的年均文献增长率皆超过了 10%, 它们属发展较快的学科, 换言之, 其较快的文献增长表现出本学科具有较高的生长度。因为, 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 必然要外现于理论产品的增长上。至于情报学、政治、文学、历史、人口学、地理等学科的年均文献增长率出现了负数,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学科的发展停滞了或后退了, 它只是从一个重要侧面说明它们的生长度较以往在下降或后退。

从文献单元的增长状况来了解一门学科的生长度, 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当然, 要使得分析结果完全客观、全面、公正, 我们除了最大范围地采集每学科一定时期内的论文发表量, 还应最大范围地采集每学科一定时期内的图书出版量。尤其是我们不仅要通过每学科文献单元的增长来看学科生长度, 还应从每学科知识单元(如基本概念、主题词等)的增长来看学科的生长度, 例如美国盖尔研究所出版的《盖尔专业图书馆和信息中心指南》(1997 年第 20 版), 收录了世界各地 22 000 多个专业化的信息资料机构, 并根据这些机构的藏书、数据库等编制了一个详细的检索指南。该指南社会科学学科主题索引中所列出的词目数如图 10-1^① 所示。

从图 10-1 的数据可看出, 图书馆学相对于其他大型社会科学或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文学科来说, 它的知识单元(主题词)相对数量最少(未超过 100), 它还不是一个基本概念十分丰富的学科。不过, 从这些学科主题词的增长率上看, 图书馆学的知识单元生长度并不低。我们将图 10-1 的数据转换计算, 可以得到这些学科在 1994~1997 年三年间各自主题词的增长率(见表 10-5)。

^① 阿里·卡赞西吉尔, 大卫·马金森主编; 黄长著等译. 世界社会科学报告(1999).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80



□为《盖尔专业图书馆和信息中心指南》1994年第17版所列出的数量

■为《盖尔专业图书馆和信息中心指南》1997年第20版所列出的数量

图 10-1 世界各地专业信息资料机构和社会科学
学科主题索引中的词目数

表 10-5 世界各地专业信息资料机构的社会科学学科
主题索引中的主题词增长率

学科名称	四年增长率	学科名称	四年增长率
语言学	23%	图书馆学	9%
经济学	20%	商学	8%
社会学	19%	地理学	8%
政治学	16%	社会科学	8%
心理学	16%	史学	0%
公共管理	15%	社会服务	-7%
教育学	9%		

在表 10-5 中，图书馆学的主题词四年增长率是 9%，居于“中游”地位，说明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较，图书馆学知识单元的增长速度处于中间程度。图书馆学的生长度既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而是居中，它保持着良好的发展状态。

关 键 词

图书馆学性质 图书馆学地位 学科分类元标准 范式 前科学 常规科学 图书馆学公认度 图书馆学生长度

小 结

1. 明确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地位对图书馆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图书馆学学科性质指的是, 图书馆学在科学知识体系中属于哪种科学门类, 具有哪门科学的基本属性; 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指的是与其他学科相比较, 图书馆学具有的规范程度以及它的公认度、生长度如何。

2. 以往关于图书馆学学科性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五种。由于研究对象是判别一门学科的“元标准”, 依据研究对象划分, 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有着重要的区别。

3.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理论对社会科学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范式”理论是库恩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从学科规范程度看图书馆学, 它目前处于常规科学状态。

4. 图书馆学的公认度、生长度是描述图书馆学学科地位的重要指标。从公认度来看, 图书馆学是一门“中频学科”, 它的社会公认程度正在不断提高; 从生长度来看, 图书馆学的发展速度也较快,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状态。

思 考 题

1. 明确图书馆学学科性质与地位有何意义?
2.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有何区别?
3. 为什么说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4. 什么是范式？社会科学的范式有何特点？
5. 为什么说图书馆学是一门常规科学？
6. 图书馆学的公认度、生长度是什么？
7. 从公认度、生长度来分析图书馆学，它的学科地位有何特点？

第十一章

图书馆学相关学科

图书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与其他科学学科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指的是与图书馆学发生较为密切的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科学学科。考察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及其与图书馆学之间的联系，会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图书馆学的学科特征、学科领域、学科功用及学科价值。依据图书馆学与其相关学科联系的紧密程度，通常可将图书馆学相关学科分为三个范围，即同族学科、相邻学科和远缘学科。

第一节 图书馆学同族学科

同族学科是指相互之间有着“血缘关系”的学科。它们在产生过程中有着同源关联，并且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宗旨等方面也有着部分相同或相似性。图书馆学的同族学科主要有文献学、档案学、情报学等。

一、图书馆学与文献学

文献学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近年来发展较快。从目前不断面世的文献学成果看，它们大多分属于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这两种知识体系。古典文献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知识体系，它研究的是古代遗存

文献，涉及古文献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注释、编纂等内容，颇重于客观知识的微观研究，并以文史哲等人文科学为主要应用领域；现代文献学则是在西方科学思想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学术体系，它研究的是文献及文献工作，涉及文献的性质、载体、类型、生产、分布、计量、交流、利用、发展等内容，更偏重于客观知识的宏观把握，应用领域遍及各学科。

文献学与图书馆学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其一，从二者的学科产生过程看，文献学与图书馆学都来源于传统的文献工作。如我国古典文献学和图书馆学的知识体系皆形成于两千多年前刘向、刘歆父子等校书石渠阁、天禄阁的西汉时期。而现代文献学的形成与发展更是与文献工作密不可分。英语 documentation（有“文献学”涵义）指的就是文献的收集、分类、传播，汉语将其译为“文献工作”。由于图书馆是文献工作的基本场所，documentation 也就成了图书馆学辞典中的一个常用语词。其二，从学科的研究对象看，文献学与图书馆学也有大量重叠、交叉之处。如图书馆学与文献学都研究文献，只不过文献学的研究重心在客观知识范畴，而图书馆学不仅研究客观知识、知识集合，还要研究知识受众，其研究范畴较文献学有较大的外延。其三，在研究方法上，文献学与图书馆学也有某些相同之处。如古文献的版本、目录、校勘的方法，现代文献的采集、分析、计量、传播的方法，就不仅是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也是文献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所不同的是，二者各自的科学方法群，除了大部分有交集现象外，尚存在一些互不相属的特定研究方法，如文献学中的传注、训诂、考证与翻译的方法，图书馆学中的典藏、检索、咨询与导读的方法等，这些属于二者各自独具的研究方法。其四，从二者的学科宗旨或功能来看，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力图起到客观知识向主观知识转化的桥梁作用，借以向主动获取知识的人们提供方法与工具。

由于文献学与图书馆学存在着紧密的血缘关系，所以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制度中，二者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如 1992 年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将“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等同对待，将

二者作为同位类，排在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之下，均属各自独立的二级学科。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1993年）就将“文献学”隶属于“图书馆学”之下，视之为“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

近年来，随着现代文献学的快速发展，一些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如文献计量学、文献经济学）和大量专科（或专题）文献学（如经济文献学、化学文献学、医学文献学、金融文献学、红学文献学）不断涌现。为了促进文献学尽快地独立于科学之林，有学者呼吁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进行整合，建立“大文献学”^{①~③}。还有学者针对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中的三种二级文献学专业（中文学科所属的古典文献学、历史学科所属的历史文献学、图书情报与文献学所属的文献学）互不相涉、各自发展的状况，提出将这三种文献学专业“归拢”一处的建议，即成立一个新的学科门类“文献学”，然后将这些二级文献学专业归属其下^④。这些趋向表明，现时的文献学正在改变以往的体系零乱状态，进入有序整合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一些体现“大文献学”的研究成果面世，如陈界、张玉刚主编的《新编文献学》（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1999年），潘树广主编的《文献学纲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倪波、张志强主编的《文献学导论》（贵州科技出版社，2000年）等，它们不仅对“大文献学”的成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也对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的研究有着深入的开拓，并有涵盖图书馆学的意向。文献学是否可以取代图书馆学，这是值得人们认真讨论的一个关涉它们今后发展方向的重要命题。

① 潘树广. 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 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0(4): 29~34

② 潘树广. 大文献学散论.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0(3): 14~16

③ 于鸣镝. 再论大文献学.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0(6): 9~11

④ 冯浩菲. 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 文史哲, 2002(1): 107~111

二、图书馆学与档案学

档案学是研究档案的形成规律、性质、特点以及档案工作方法与发展规律的科学^①。它与图书馆学一样，形成于19世纪初。1804年，德国档案学者约瑟夫·奥格在其所著的《一种档案学理论思想》一书中，首次使用了“档案学”一词。从此，档案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档案学与图书馆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既紧密相关又互相独立。其一，从二者的学科产生过程看，早期的图书馆与档案馆在历史形成之初是同源合一的。如我国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刻辞甲骨，它们既是商代的典籍，也是当时的档案；而集中储存这些刻辞甲骨的窖穴，既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图书馆雏形，也是最早的档案馆雏形。又如唐朝的史馆，是宫廷之中的重要藏书机构之一，但其中也收藏了各种不同部门及地方送递中央皇室的大量档案资料，这种图书、档案收藏合一现象正是早期图书与档案不分的一种历史余绪。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知识体系来源于图书整理、档案整理实践。早期图书、档案的合一同源，说明这两门学科也有着某种血缘关联。其二，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也有某些相同性，即图书馆学研究的图书与档案馆学研究的档案，其实质都是一种信息知识，一种人类社会的共同记忆。但图书与档案又有着明显的区别：^①图书记载的是人类知识，而档案记载的主要是人类活动留下来的社会信息，其内容范畴较图书要宽泛；^②图书的知识内容一般较为系统、完整，而档案则包括许多零星的信息，如测试记录、发票、账单、登记表、签名等^③；^③档案作为人类活动信息的原始记录，具有凭证作用，因而往往是“孤件”，而图书旨在传播知识，往往

^① 档案工作基本术语 (DA/T1—2000)。见：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法规标准化处编。档案工作标准汇编。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1：45~46

^② 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0~12

有大量复本；④档案体现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一旦形成原生性的固化信息就不可更改、更新，而图书是人类系统知识的产品，它可以修订、再版；⑤图书在形成知识集合前是商品，可以买卖，而档案在形成信息集合前大多属于文件，不是商品，不能进入流通领域；⑥图书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希望有广泛的知识受众成为其“信宿”，而档案的利用则经常要受使用者用途的影响而不具有“信宿”的广泛性。当然，尽管图书与档案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二者又可以互相转化，如图书的手稿可以是档案，档案文献的汇编又可成为图书。总之，正是由于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种种差异，二者才逐步形成了两门各自独立发展的学科。其三，图书馆学的文献整理方法与档案学的档案整理方法也都有着相似性，如文献的整理有采集、编目、分类、典藏、流通、检索、利用等，档案的整理有收集、编目、分类、保管、鉴定、检索、利用等。其四，从二者的学科功用来看，图书馆学与档案学都有努力保存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为社会实践提供知识信息服务的共同目标。

图书、档案都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载体，它们共同承担记录和传播人类文明的重任。由于图书馆学与档案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可以相互借鉴和参考，相互从对方汲取学术营养，在未来的学术发展道路上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三、图书馆学与情报学

情报学是研究情报以及情报交流与利用的一门科学。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解决科学技术的“情报爆炸”^①与情报利用之间的突出矛盾而逐步形成的。虽然情报学产生的历史不长，但发展很快。1958年，英国成立了情报科学家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tists, IIS），开始使用“情报科学”这一术语。而情报

^① “情报爆炸”来源于英文 information explosion，如美国情报学家J. 贝克《情报学浅说》（*The First Book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973）一书就使用了这一词汇，意指情报数量、品种在短时间内的迅速激增。

科学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形成，美国情报学家萨拉塞维克 (Tefko Saracevic) 则认为是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事^①。

情报学是与图书馆学有着亲密血缘关系的同族学科。首先，从产生过程来看，情报学的形成固然与以往的军事谍报（情报）活动有着渊源关联，但大量事实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图书馆文献工作才是情报学真正生长、形成的温床。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情报学初创阶段关于机器检索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研究者，很多都是从图书馆学或图书馆分离出来的，故而，情报学界有“情报学脱胎于图书馆学”、“图书馆学是情报学母体”^②的说法。其次，从研究对象来看，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研究对象都是信息知识，二者在很大范围内是重叠的。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即图书馆学研究的文献属于知识范畴，而情报学研究的情报，既有可能是信息，也有可能是知识。情报是对特定的人在特定时间内有特定价值的信息知识。在这个“三特”定义中，正是由于有了“特定价值”，才使得普通信息知识的一部分具有了情报的属性，使其从信息知识母体中剥离出来，成为了一种“激活了”的信息知识；“特定时间”则表明情报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必须快速传递，所以时效性也是其本质属性之一；“特定的人”是说情报与知识不同，它不具有强烈的共享性，其“信宿”往往只是有特定需求的 1 个或 1 组，而不是 n 个或 n 组，换言之，情报的对象是明确的、现实的，而知识的对象则可以是模糊的、潜在的。由于情报学与图书馆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导致图书馆工作往往以图书、图书馆为重心，不大顾及文献内容的深度发掘与报道，而情报工作则较重视知识的发现，深入分析、报道文献的具体内容。

但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学科宗旨与任务是相同的，科学方

① 孟广均，徐引篪主编. 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4

② [美] A. 德邦著；董光荣编译. 图书馆和情报科学的关系. 国外图书馆情报工作，1988 (3)：8~10

法也存在着相似性、同一性，如二者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有效地利用信息知识的需求而提供最佳方法与工具，二者都有对情报的搜集、加工、整理、分析、报道、检索等科学方法的运用等，因此，它们一直以“姊妹学科”的形式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在美国，尽管情报学一度发展较快，但一直未能脱离图书馆学而独立存在，成为两种名称对应的学科。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许多高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院（系），大多称“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或“Library & Information Research”、“Library & Information Management”等，没有一个学院（系）是单独以“Information Science”命名的^①。在我国，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交叉、兼容的现象也很明显，如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在同一个院（系），图书馆、情报机构也出现合一趋势，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合一的“两栖”专业杂志也较多等。由于图书情报工作都十分重视高新技术的应用，均强调知识和情报的发现、捕捉与快速地交流、传递，二者在未来发展中可能会走向融合。当然，目前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仅处于趋同化发展的状态之中，真正地融为一体，还有待时日。

第二节 图书馆学相邻学科

科学体系中，某些学科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特点、学科宗旨等方面有着相邻、相近的关系，这些学科就构成了相邻学科。图书馆学的相邻学科主要有教育学、知识社会学等。

一、图书馆学与教育学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的本质、经验、方法和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从其研究对象与学科宗旨上看，它与图书馆学有着某种相近之处，即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教、学现象，观照的是以知识为主的

^① 徐引麓主编. 图书情报事业的未来：2010年发展预测.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8：138～139

人类文化遗产如何被人们吸收与传承的问题，这与图书馆学观照人们对知识的吸收与获取是基本相同的；教育学的宗旨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图书馆学亦如是，甚至图书馆本身就是社会的教育机构，它也承担着教育的职能。

但是作为两门不同的学科，二者起源不同，学科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二者都关涉教育，教育学讲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学校传道授业，图书馆学讲的教育是通过知识集合自我学习。早在1923年，我国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就指出了学校教育 with 图书馆教育的不同：“盖学校之教育止于在校之人数，图书馆之教育则偏于社会；学校之教育迄于毕业之年，图书馆之教育则无年数之限制；学校之教育有规定课程为之限制，而图书馆之教育则可涉及一切人类所应有之知识；学校教育常易趋于专门，而图书馆教育则为常识之源泉。夫一社会之人，在学校者少；人之一生，在学校之时少。然则图书馆教育，苟善用之，其影响于社会于人生者，且甚于学校。”^①刘国钧先生的论述不但辨别出图书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同特点，而且还隐含了“终身教育”的基本思想。终身教育是当代教育的重要理念之一，因为人在每个年龄段都应得到充分发展，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在每一具体年龄段中设法获取与其发展相适应的知识体系，而且任何人都可通过终身教育来保障自己对知识的获取。图书馆就是人们获取知识的“终身学校”，图书馆学实际上也就是有关终身教育的一门学问。

由于教育学与图书馆学都致力于人类文明的传递、发展和创造，致力于提高社会公民的科学、文化、道德素养，因此二者在许多理论方法上可以互相借鉴。如教育学中的学习理论，涉及了学习表象、知识信息的模块以及心理结构等众多复杂问题，虽然目前仍局限于认知科学之内，但它正在波及整个社会科学。英国的巴赞兄弟（托尼·巴赞与巴利·巴赞）正是在“联想理论”（两个观念彼此

^① 刘国钧. 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 见：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11~13

接近就会在大脑中形成联想)的支持下,发现了一种记忆与学习的新方法——“思维导图”^①。而近年传入我国的“建构主义学习论”认为,学习不仅是知识由外到内的转移和传递,更是学习者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因此,方法教育更重于内容教育,教师的“教”应培养学生学会生成知识的能力和技巧。这些教育学的思想观点,对图书馆学都很有启迪。如知识集合的形成如何能符合人类联想原理,知识服务如何提高知识受众的“知识生成”能力,都可通过借鉴教育学的学习理论而取得研究上的进一步拓宽与深化。

二、图书馆学与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社会学分支科学,它研究的是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包括知识的社会存在条件及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相作用等。早在19世纪中叶,当知识的作用不断加强、知识越来越体系化时,人们便对知识有了专门研究的兴趣。如马克思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先驱,他提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就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意味着人类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所有的知识都有其社会根源(尤其是经济基础)。

不过,知识社会学的真正形成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舍勒(M. Scheler, 1874~1928)与曼海姆(K. Mannheim, 1893~1947)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建人。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1924年)一书首先使用“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这一语词;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29年)一书首次提出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使知识社会学以一门学科的姿态建立起来。曼海姆与舍勒一样,认为决定意识形态(集体思维)的现实因素要远大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而且还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如古代社会里,首要的因素是血缘关系(诸如种族),其次是心理成分(政治权力等),再次

^① [英] 托尼·巴赞著;李斯译. 思维导图:放射性思维.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 12

才是经济基础^①。但是，初期的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是认识现象而非知识现象，还未从哲学中摆脱出来，思辨色彩浓厚。加上它所涉及的知识主要是“思想信仰”（德文 Wissen 较英文 Knowledge 的涵义要宽泛，后者仅指科学知识，而前者还涵盖其他各种知识），故其因有艰深之特点而发展缓慢。后来逐步兴起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显示出了新的面貌。科学社会学更多关注的是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制度（如默顿讲的“科学精神气质”，它包括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此外还有科学的奖励系统和社会分层。但其不足在于不研究科学知识本身）。科学知识社会学重点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本质关系，主张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无本质区别，认为科学知识也是社会建构物，必然受文化因素的影响等，这才使知识社会学在现代社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当代西方的知识社会学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如丹尼尔·贝尔的“知识中轴”理论，托夫勒对知识与权利的探讨等，已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知识社会学风格。一些知识研究者更加关心知识是如何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相关联的。而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社会知识化、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整合、知识学习等命题，也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②。这一向知识本身转移的学术趋向，使得知识社会学与图书馆学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能够沟通的渠道。图书馆学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有重合之势：它们研究的都是知识（系统的事实或观念体系），而不是信息（零散的、供大众接受的缤纷信息）。图书馆学应该吸收知识社会学的营养，对知识在学术共同体中的交流、利用及其后果进行深入的发掘与研究。此外，在研究方法上，知识社会学的某些研究方法也应引起图书馆学

① [法]让·卡泽纳弗著；杨捷译. 知识社会学. 国外社会学, 1992 (2~3): 67~75

② 马立. 知识研究的意义: 简评《现代知识社会学》.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职教版), 2002 (1): 91~92

的重视。如知识社会学更偏重于对文献的确证，它讲求知识的“此时此地性”（具有相对主义特点），属于并出自对同一数据作出不同解释的那种历史传统，具有人文科学方法的特点。大多数的研究者是孤立的而不是一个小组的合作。它们的研究成果主要用来服务“文化”（软性的），而非大众传播学那样服务于“文明”（硬性的）^①。知识社会学的这些特点都值得图书馆学加以借鉴与参考。

第三节 图书馆学远缘学科

远缘学科与边缘学科的概念不同。边缘学科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进而在已有学科边缘地带形成的新学科，又称为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形成有两种基本途径：其一，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独立发展到一定程度，在某些共同性课题上汇集在一起，开辟出新道路而形成了边缘学科（frontiers），如海洋学与地质学之间形成的海洋地质学，植物学与地理学之间形成的植物地理学等。其二，主动把一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移用到另一门学科领域，从而导致新的边缘学科的产生，如将物理学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天体运动领域就形成了天文物理学，把射电的方法和手段应用于天体现象就产生了射电天文学等^②。远缘学科与边缘学科的区别在于：A学科与B学科交叉渗透形成新学科C时，C就可以称为边缘学科。但我们知道A学科一定与B学科存在着“缘联”，故对于A学科来说，B学科就是它的远缘学科。因此，远缘学科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它还不是个独立的概念，只能在相对关系中存在。此外，当A学科与B学科交叉渗透形成了新学科C时，B可称A的远缘学科（反之亦然）；当A学科与B学科发生交叉渗透尚未生成成熟的新

① [美] K. H. 沃尔夫著；王少军译. 知识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 国外社会学, 1992 (2~3): 76~88, 128

② 杨永福著. “交叉科学”与“科学交叉”特征探析. 科学学研究, 1997 (4): 5~10

学科 C 时, B 仍可称为 A 的远缘学科 (反之亦然)。图书馆学的远缘学科目前主要有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传播学、法学、知识管理、计算机科学等。

一、图书馆学与心理学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研究人的个体心理,也研究人的群体心理。个体心理涉及心理动力(动机、需要、兴趣等)、心理过程(认知、情绪、意志等过程);群体心理涉及群体需要、价值、舆论、目标等。由于心理学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有着广泛的应用。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知识受众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客体,为了能够深入了解知识受众,图书馆学就应借助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究知识受众的各种需求及其他心理活动规律。通常,由于人的心理属于内隐的精神活动,无法对其进行直接观察,故只能通过人的行为来间接推断。以往图书馆学对读者检索知识、阅读文献的行为十分关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读者心理学、阅读心理学等研究领域。但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对读者心理动力、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心理特征的研究,还未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大多为粗略描述。而知识服务人员(如馆员)的心理研究还几乎是空白。随着图书馆学的向前发展,知识受众的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化。而且,在未来的知识社会里,伴随着“学习组织”、“学习企业”、“学习城市”、“学习社会”等观念的普及,知识受众的学习心理(影响或决定知识受众由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相对持久变化的心理)也会逐步得到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重视,形成新的研究前沿课题。

二、图书馆学与语言学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不但有如何组成,也有如何建立“人口”的问题。知识受众只有顺利进入知识集合的人口,才能获取到自己需要的知识。对于知识组织、知识接受两方人来说,“沟通”的主要工具是知识集合的检索语言(通称情报检索

语言)。检索语言目前主要使用的是人工语言。它也有“词汇”和“语法”两部分：词汇指在分类表、词表、代码表中的全部标识，一个标识（分类号、检索词、代码等）就是一个语词；而语法又分为词法（标识表的编制规则）和句法（标引与检索规则）。检索语言的建立与完善，需要在语言学知识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如在词法中，主题词的确定，如何排除自然语言中的多词一义、一词多义和词义含糊现象，就需要语言学的帮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自然语言在知识检索中的应用已成为可能。而词汇的复杂特征集表示、书面汉语的自动切词、词性的自动标注等^①，都是自然语言检索中的关键问题，它们的解决也要靠语言学的深入研究。现在，语言学与图书情报学的交叉，已经形成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情报检索语言学。情报检索语言学通过对检索过程的控制而追求检索效率的提高，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它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

三、图书馆学与历史学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 (K. Jaspers, 1883~1969) 曾说：历史不是一堆可有可无的事实，而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历史处在起源与目的之间^②。可以说，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对本学科历史的梳理与研究。对学术史讨津溯源，不仅仅是要恢复学科的记忆。图书馆学要充满思想活力，必须回到图书馆学思想史、学术史中寻找资源和营养，磨炼自己的分析武器。而且，许多重大问题只有在学术史的梳理中才能求解，如传统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是否为图书馆学的早期发展形态？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在学术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当代图书馆学高扬理性的方式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效果？等等，这些只有通过学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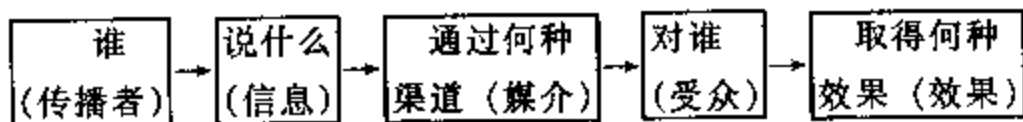
^① 李竹. 中文信息处理与现代汉语词类研究. 见：陈章太等编. 世纪之交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 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56~72

^② [德] K. T. 雅斯贝斯著；赵鑫珊摘译. 论历史的起源与目的. 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39~74

的研究才能得到回答。把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图书馆学，已形成了图书史、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等诸多图书馆学分支学科领域。在图书史和图书馆史研究领域，已有大量著作出版，如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文物出版社，1985年），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杨威理《西方图书馆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来新夏等《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年），任继愈《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可谓硕果累累。而图书馆学史研究则十分薄弱，除了吴仲强的《中国图书馆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一书外，乏善可陈。此外，知识受众的阅读史，如古代阅读生活史、当代社会阅读变迁史等，至今仍是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四、图书馆学与传播学

传播（communication）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与交流。传播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于美国。1982年5月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W. Schramm）来华讲学之后，国内传播学研究开始兴起。由于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的一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内容与图书馆学也有许多重叠、交叉之处。如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H. D. Lasswell）在《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1948年）一书中提出的“五W模式”^①：



^① 袁军等. 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6，222

并据此引申出传播研究的五项内容，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等，就与图书馆学研究的文献交流与传播过程相同。文献就是媒介（信息渠道），是知识得以在空间上移动、在时间上保存的载体。知识的要素之一、本质属性之一就是它能传播与交流。因此，将传播学理论与方法引入图书馆学，可以建立文献传播学、知识传播学等新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界已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周庆山博士的《文献传播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就是一部涉及文献传播的产生、功能、原理、类型、结构模式、传播政策、传播产业化、国际传播等重要方面的力作。在各种传播媒介纷争天下的今天，虽然文献“早已失去了信息渠道的垄断地位，然而，作为捕捉思想和语言让人们学习的手段，它永远不会失去用途。”^①

五、图书馆学与法学

法学是专门以法律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它与图书馆学在研究内容上也存在着相互交叉与重叠的现象，如知识产权、知识受众的合法权益等问题，既属于法学研究内容，也属于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亦称“智力成果权”，是人们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②。它属于民事权利，主要包含著作权（保护对象是创作作品）和工商业标记权（保护对象是商标等）。其中著作权问题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如我国著作权法（2001年10月修正）对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范围与具体方式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图书馆实践中，图书馆收藏的未公开出版物（如博士论文）能否通过复制方式向他人提供远程文献传输服务？图书馆员自建的书目数据库、文摘数据库是否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尤其是在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

^① [加]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50

^② 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5

馆藏资源的数字化、馆外数字资源的链接、全文数据库的开发建设、数字化文献网上传输（是发行还是公共传播）等，都涉及了知识产权的问题。换言之，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问题涉及了两大部分：一是数字图书馆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得与保护，二是数字图书馆运作中所涉来源作品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其中，如何掌握“合理使用”（他人在法定范围内不经著作权人的同意也无须支付报酬而自由使用著作权人作品）的“度”，这些都是目前图书馆学与法学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当然，知识受众在接受知识服务机构（如图书馆）提供的知识服务过程中，他们应享有哪些基本权利及义务？如何避免对知识受众的侵权？也是图书馆学与法学交叉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六、图书馆学与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是管理学新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研究领域，它最早形成于企业、组织管理理论中，但发展很快，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998年以来图书情报学界也将知识管理理论吸收过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发展的新阶段，正如1999年美国波士顿大学商学院信息管理教授托马斯·H. 达文波特等指出的那样：“知识管理的从前做法得益于信息技术和经过改善的信息管理方法。一些公司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们大力开发这样一些能力：搜集和整理关于知识的信息，提供广泛的获取机会以及对其进行远程传输。但是，知识管理还有一些方面使之不同于信息管理，而且它们根本不依靠电脑或电信网络（顶多是略微触及）。不幸的是，这些方面难度最大，其在使组织出类拔萃过程中的作用也最大。知识管理真正的显著方面分为两个重要类别：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利用。”^① 对于图书馆这样的知识服务机构来说，知识管理就是

^① [美] 托马斯·H. 达文波特，[瑞士] 唐纳德·A. 马钱德. 知识管理仅仅是出色的信息管理吗？. 金融时报（英），1999. 3. 8. 见：参考消息，1999. 4. 17（4）

对知识资产进行组织、开发、传播,以达到知识扩散、知识创新与知识增值的目的。知识管理理论与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运用主要有两个领域:一是图书馆人力资源的管理,即运用知识使组织充满学习力、创新力;二是知识提供过程中的增值服务,即通过知识的加工、控制、建构,使知识受众服务从“满意服务”过渡到“成功服务”。

七、图书馆学与计算机科学

严格地说,计算机科学是一门技术科学。图书馆学是由“理论”与“应用”两大板块构成的,其“应用”部分的发展,目前主要是靠技术(近年来尤其是计算机技术)推进的。也就是说,如果将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划分为基础研究(纯科学)与应用研究(技术)两部分的话,传统认识以为基础研究(纯科学)决定并推动应用研究(技术)发展的观点仅是部分合理的,因为,为满足现实需要而开发的新技术,有时本身就能推动应用研究的发展,乃至对基础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斯托克斯(D. E. Stokes)所说:科学认识与技术知识是一种双轨道关系,“每个轨道都时常会受到另一轨道的强烈影响”^①。20世纪末年,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波。而新技术在图书馆界带来的巨大变革,就是数字图书馆的出现。计算机科学早期在图书馆学中的交叉应用,开辟了图书馆自动化研究的新领域,现在正在开辟出知识资源数字化、条形码应用、网络知识组织与检索、多媒体文本、人工智能服务等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果以往的自动化研究是“一枝独秀”,现在则是“满树繁花”,让人有应接不暇之感。有人说20世纪有两大令世人瞩目的新技术,一是原子弹(物质能量的大释放),一是计算机(人类智慧的大解放)^②。计算机科学对各种知识集合产生的影响还在不

① [美] D. E. 斯托克斯著;周春彦等译. 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74~75

② 刘克武编著. 计算机基本原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

断地加剧，人脑与电脑协同的知识工作方式对知识的组织、开发、传播都会带来新的变革，这些新变革也必将导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变革与创新。

关 键 词

相关学科 同族学科 相邻学科 远缘学科 边缘学科 古典文献学 现代文献学 档案学 情报学 情报定义 终身教育 建构主义学习论 知识社会学 学习心理 检索语言 知识媒介 知识产权 合理使用 知识管理

小 结

1. 图书馆学相关学科指的是与图书馆学发生较为密切的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科学学科。图书馆学相关学科通常有三类：同族学科、相邻学科和远缘学科。

2. 图书馆学同族学科是指与其有着“血缘关系”的学科，主要有文献学、档案学、情报学等。文献学、档案学、情报学与图书馆学在产生过程中都有“同源”关系，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学科宗旨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关联。

3. 图书馆学相邻学科是指与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特点、学科宗旨等方面有相邻、相近关系的学科，主要有教育学、知识社会学等。教育学与图书馆学的学科宗旨是一致的。学校教育 with 图书馆教育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知识社会学研究重心向知识的转移，使其与图书馆学更为密切相关。

4. 远缘学科与边缘学科概念不同，它指相互之间能够形成交叉关系的“缘联”学科。图书馆学的远缘学科目前主要有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传播学、法学、知识管理、计算机科学等。这些远缘学科进入图书馆学后生成了大量新的研究领域，如读者心理学、阅读心理学、情报检索语言学、图书史、图书馆史、图书馆学

史、阅读史、文献传播学、知识传播学、图书馆知识产权研究、知识受众合法权益保护、图书馆知识管理、网络知识组织与检索、人工智能服务等。

思 考 题

1. 图书馆学相关学科主要有哪些？
2. 在未来发展中，图书馆学与文献学、档案学、情报学是否会融为一体？
3. 图书与档案有哪些区别与联系？
4. 情报的“三特”定义具体内容是什么？
5. 学校教育与图书馆教育有何关系？
6. 远缘学科与边缘学科在概念上有何区别？
7. 为什么说要加强图书馆学史的研究？
8. 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问题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第十二章

图书馆学方法论

方法 (method) 一词源于希腊文 $\mu\epsilon\theta\omicron\delta\omicron\varsigma$, 本义即按照某种途径前行。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方法”, 是指人们研究和认识各种事物而采用的思路、途径、手段和程序。科学史表明, 科学成果与科学方法是同生共长的, 没有科学方法就不会产生科学成就。因此, 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一门科学的发展, 不仅表现出理论上的意义, 也表现出方法上的意义, 这就刺激了科学方法论的兴起。方法论 (methodology) 就是关于方法的科学, 它对方法进行分析、比较、评价、综合, 是专门研究方法的一种知识系统。各门学科都有科学方法问题, 只不过当一门学科不成熟时, 这一点表现得不甚明显; 而当一门学科日趋成熟之际, 它对方法论的依赖就会变得十分强烈, 以至于方法论本身也成为该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学方法论就是研究图书馆学方法的有关理论。

一般来说, 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论都应对其所使用不同层次的科学方法有所揭示, 而每门科学使用的科学方法通常又被划分为三个层次: (1) 最低一层的本学科专门方法, 它们是独特的、具体的,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有效性、可操作性; (2) 处于中间层次各门学科所通用的一般科学方法, 它们对各门具体科学大多通用, 是对第一层次的概括与总结; (3) 处于最高层次的

哲学方法，是适用于一切科学最普遍的科学方法，是对第一、第二层次的再抽象。

第一节 图书馆学专门科学方法

专门科学方法是本学科必须独自具有的，因此不同的学科才有不同的科学方法。有无专门科学方法亦成为衡量该学科发展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以考古学为例，层位学、类型学就是考古学所具有的独特的专门方法。层位学是研究古代遗址不同时代地层叠积的一种科学方法；类型学是研究古代遗存形态变化过程（如古器物谱系）的一种科学方法。起初，层位学源于地质学，考古类型学与生物学中的类型学有某些渊源关系。但经长期考古实践的运用，层位学、类型学就逐渐形成了考古学的两种专门研究方法，被我国考古学界誉为考古学中的“两把尺子”^①。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的形成也与长期的图书整理实践有着密切关系。我国古代藏书活动就曾孕育出某些文献整理的科学方法，它们和现代图书馆实践所催生出来的一些科学方法共同组成了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的完整体系。当代图书馆学专门方法主要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1）单元知识研究法，即针对文献单元或知识单元的研究方法，如校雠、版本、文摘的方法；（2）知识集合研究法，如采集、分类、主题、目录、索引、文献计量的方法；（3）知识受众研究法，如咨询、导读的方法等。

一、单元知识研究法

1. 校雠的方法

《说文解字》释“校”为“木囚也”，即犯人之木枷。枷由对称的两块木板组成，两板相对方能上锁。故“校”做动词用，含有比勘、对正的意思。“雠”也是动词，本义是以言相对。“校雠”联

^① 张忠培. 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214

用，最早见于西汉刘向《别录》之中，也称为“讎校”。东汉应劭《风俗通》曰：“刘向《别录》‘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讎也。”^①是知“校讎”的本义就是对一书的文字内容进行核对校正。校讎的具体方法是：校正某书时，选一个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然后参校该书的不同藏本。

在写本时代，图书的传抄常会发生文字的讹、脱、衍、倒等错误，因此就要备众本、辨异同、订脱误、删重复、增佚文、存别义等。这些工作不仅繁重，而且还需饱学之士来担纲主持。古代大的藏书机构中往往要设专职人员从事校讎工作，如六朝隋唐时期官府藏书机构中专有校书郎（唐代还有“正字”）一职。有些校书人员“终身守官，父子传业，故能讨论精详，有功坟典，而其校讎之法，则心领神会，无可传也”^②。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版刻书籍的流行，图书抄写工作开始减少，宋明以后，校书郎制度渐衰。清人章学诚说：“近代校书，不论专官，众手为之，限以程课，画以部次，盖亦势之不得已也。校书者即非专门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则校讎之法不可不立也。”^③此时私人藏书家乃至读书治学之士也十分讲究校讎之术。校讎之术一变而为专门学问。校讎的基本方法、一般原则也有人加以总结归纳，传布于世。如近人陈垣先生在校勘《元典章》中总结出的校勘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曾备受学人的推崇。

校讎之宗旨在于求文献内容的真实性。它在当代文献整理、知识组织工作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凡馆藏珍善本、手稿的整理出版，利用古文献资料从事专题服务，确定入藏文献不同版本的优劣，以

① 见《文选》卷六《魏都赋》唐李善注引及《太平御览》卷六一八

②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讎通义通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

③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 校讎通义通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

及把纸质文献的知识内容数字化等，均需要使用校雠的方法。也就是说，只要人们获取文献知识时十分看重知识记录的真实性，校雠的方法就会大有用场，图书馆学不可不使之发扬光大。

2. 版本的方法

无论古、今，无论抄本、印本，一书众本的现象极为普遍。刘向校书“一人持本，一人读书”，此处“本”，是底本、原本的意思。“本”原是会意字，《说文解字》释为“木下曰本”，即树根叫做“本”。刘向校书，选择一个较好的版本作为依据、根本，然后用其他同书异本对校，所用之底本就叫做“本”。因此，讲究图书的版本，在我国起源也很早。版本的方法与校雠的方法是同时产生于古代图书整理工作中的，只不过在后世逐渐有了分离。“版”字在先秦时指写了字的木片，而“版本”（板本）一词迟至宋代版刻图书流行之后才产生。宋代沈括云：“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①是知版本指称的是雕版印刷的书籍，是与“写本”相对的一个称谓。

宋代以后，版刻书籍骤增，藏书成为易事，私人藏书家从此蜂起。藏书家搜集既富，对图书之源流、传衍遂特加注意，由是版本之学得以兴起：祖本的确定，善本的甄别，乃至一书的纸张、墨色、行款、装帧的优劣，也一一顾及。宋代藏书家多有家藏书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皆对图书版本情况进行介绍。如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在每一书下不记卷数、撰者，却广记版本，成为专门著录版本的一个书目。近人汪辟疆称其“一书兼载数本，则又开后世版本学之先河”^②。

学者们研究版本之目的，在于求文献内容的原本性。通过探本溯源，序其先后，审其异同，判其完缺，辨其真伪，定其优劣，从

^① 沈括著；胡道静校证. 梦溪笔谈校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97

^② 汪辟疆. 目录学研究.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45

而找出文献传衍的线索与规律。读书治学不求善本，往往事倍功半；添购馆藏不鉴版本，不免鱼龙混杂。不仅古籍存在版本鉴别问题，即若今天的图书（纸本的甚或电子的），也依然如是。遗憾的是通晓此理之人今已越来越少。

3. 文摘的方法

古之解题、提要，即今之文摘、摘要。它们都是对某一单元文献内容进行浓缩、精炼而述其梗概的简短记录。但是古代的解题、提要与现代的文摘、摘要又有所区别。古代解题和提要有三体：叙录、传录与辑录。《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从现存数篇叙录原文看，他为每一书所作的叙录基本上含有三个内容：①厘定篇目，②记述校讎情况，③撮述全书旨意。这是现存最早的叙录体提要。西晋挚虞的《文章志》，作为较早一部文学书目，每一书列出作者姓名、里贯、生平事迹，开传录体提要之先河。南北朝刘宋时期，秘书丞王俭编《七志》，“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①，亦为典型传录体提要。古人读书，十分重视对作者的了解，如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其《诸子》、《诗赋》、《兵书》诸略，遇所录书之作者史有列传，必在书名下以小字注“有列传”三字。其意在于让读者可与史传参照而阅，以便了解该作者的生平时代。由此而知，传录体提要也有渊源可溯。辑录体是由抄辑序跋、史传、笔记等有关资料形成的一种提要体例。梁僧佑编佛教经目《出三藏记集》时已露端倪，后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朱彝尊的《经义考》使辑录体提要得以发扬。

从明代开始，书籍提要的方法渐渐扩延至图书以外的领域。如明代公文奏章冗长枝蔓，崇祯皇帝为省览之便，特令内阁凡奏章皆实行“贴黄”之式。顾炎武释“贴黄”说：“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粘附腴尾，以便省览。此贴黄之所由起也。”^②可见从明末

① 魏徵等. 隋书·经籍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907

② 顾炎武著; 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647

开始，公文也有了解题、摘要之制度。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图书馆学传入我国，文摘方法也开始逐步流行。文摘不附加解释或评议，只对原始文献内容作准确、扼要的简略表述。由于现代社会文献激增，给人们的文献选择、阅读增加了困难，因而文摘的方法开始大行其道。目前不仅有了关于“文摘”的国际标准，产生了文摘学，而且计算机自动编制文摘的技术也已经出现。提要、文摘的宗旨在于揭示文献、报道文献。西方的文摘方法在揭示、报道自然科学文献时固然有其优越之处，但在揭示、报道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方面就略显不足，反不如中国传统的提要方法实用和精到。中国传统的提要法讲求“知人论世”，故多有作者之介绍及文献旨意之评述。这是今天图书馆学应继承下来的优良传统。

二、知识集合研究法

1. 采集的方法

现代图书馆都有文献采访部门，如果说文献采访还有科学方法，恐怕会引起许多人的怀疑。然而事实上，文献的采集是必须讲究科学方法的。中国古代国家藏书散聚无常，每一朝代开国之初，均大事书籍购求。如隋代秘书监牛弘给隋文帝上表，请开献书之路。于是隋文帝下诏，献书一卷，赏绢一匹。国家藏书不出一两年就充盈起来。这种图书采集是一种完全采集法，它适用于古代写本时代。因为当时图书抄写不易，且图书市场又不似今天这样发达。宋代郑樵曾提出“求书八法”，说“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当不一于所求也。”^①这是完全采集法最有代表性的理论阐述。近代以来，因学术研究的需要，顾颉刚先生也曾提出过完全采集法观点。他说无论好坏，“要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齐收来”，因此他在为中山大学图书

^① 郑樵著；王树民点校. 通志二十略·校雠略. 北京：中华书局，1995：1813

馆拟定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中，曾把经、史、子、集、丛书、档案、方志、族谱、账簿、稿本、少数民族典籍、基督教之书籍课本等，悉列应收集之范围^①。

然而由于文献激增的趋势，完全采集法已不适用于图书馆，于是选择采集法也就应运而生了。19世纪末欧美图书馆界流行的图书采访两种思想，即价值论（value theory）与需要论（demand theory），均属于选择采集法理论。价值论主张采访图书应选取内容优秀的图书，而需要论则认为应选取读者需要的图书。1925年英国图书馆学家麦考文发表《公共图书馆选书理论》一文，提出了一种调和价值论与需要论的“选书评分法”。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在1966年出版的《图书馆书刊选择》一书中还提出了图书采集的“读者使用概率法”（即注重读者使用图书的概率）等，也是一种选择采集法^②。总之，任何一种知识集合（包括图书馆）的形成，其质量的高低首先取决于知识元素（如文献单元）的采集水平。当代文献浩如烟海，信息泛滥、知识污染已为常见，因此，选择采集法的通行是一种历史必然。但如何选择，却大有文章可作，并非说说那么简单。如我国现有某些图书馆试行读者选书，这种读者“点菜”的做法就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当然，传统的完全采集法也应加以重视，对于文献的专藏、某类知识的专门集合来说，使用完全采集法仍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2. 分类的方法

分类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但在图书馆学中，人们经过漫长的实践将这种认识方法转化成了研究文献的一种科学方法——图书分类法。图书分类法通过区分和类聚，把众多文献组织成有序的体系，它的功能是组织文献、揭示文献。文献与其他事物不同，故用于文献的分类方法也与其他事物的分类方法有异。而且，由于时代不同，古今图书分类法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如图书分类法一般

① 顾颉刚. 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 文献, 1981 (8): 19-25

② 黄宗忠. 论图书采访学. 图书馆, 1997 (4): 1-8, 11

是以文献内容所属知识体系来类分文献的，而我国古代使用的四分法（经、史、子、集），虽然主要是依图书内容知识体系不同来分类的，但也有按图书形式（如集部的划分）来分类的。这与现代图书分类法依文献所属科学知识体系分类的方法有着一定差别。这说明古代分类法主要是从实用性出发，而现代分类法既强调实用性，也强调科学性。再如，古今分类法尽管都有类目名称，古代分类法却仅有类名而无与类名相对应的标记符号；现代分类法除了类名还有由数字或字母组成的标记符号。标记符号的作用是固定类目位置以及助记。还有，古代分类法一般根据现有藏书来编排制定，分类法往往体现于具体的藏书分类目录之中；而现代分类法往往事先设定，然后作为一种分类工具去类分图书，每种分类法都有脱离书目而独立存在的形态。当然，无论怎样，古今藏书都讲究要有一定的秩序，这样才方便检索与阅读，而依分类法建立的藏书秩序，符合人们检阅图书的基本习性，因此，就成为人们组织藏书的基本方式。图书分类法也就深化为处理群体知识的图书馆学最基本的一种科学方法。

分类法是用于类分图书、组织藏书、检索图书的，图书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又会不断发生许多变化（如新内容图书不断增加），所以分类法也会不断发展以适应这种变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分类法理论与知识，已使分类法成为图书馆学中最有成熟度的一门科学知识和一种科学方法。当代的图书分类法（也叫文献分类法）已超出图书馆界线，广泛地应用于非图书馆领域，如各种工具书的编纂、网络数据库的组织等都在使用图书分类法。未来的数字图书馆建设更离不开图书分类法的应用，因为分类法任何一种知识集合的基本组织方法之一。

3. 主题的方法

主题法是以文献的主题词（文献论述的中心概念或概念组合）作检索标识，以字顺等为检索途径，通过参照系统揭示词间关系的一种标引、检索文献的科学方法。主题法与分类法都是从内容来揭示文献的科学方法，但二者又有一些差别。从方法特征上看，主题

法可不受学科分类体系的限制，可把某一主题在分类法中分散异处的文献集中在一起予以揭示；主题词可以直接作检索标识，无需逐层分类寻找适用的分类号才能确定检索标识；主题法的参照系统很完善，有用、代、属、分、参等多种参照项，并有轮排索引等多种辅助索引体系。从使用功能上看，分类法既是组织文献并使之形成一个知识集合的组织工具，也是检索文献的工具；而主题法仅是一种检索工具^①。由于各国的文献检索习惯不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图书馆馆藏目录多使用主题标引，而我国、俄罗斯、英国则主要使用分类标引。

主题法是现代图书馆文献工作中产生的揭示文献的一种科学方法。目前其主要方法类型有叙词法、关键词法等。叙词法是用人工规范过的主题词来作标识（一般从主题词表中抽词），既能适用于手工检索系统，也可用于计算机检索系统。关键词法是用自然语言或少量被规范的语词来作标识，它能更方便地应用于计算机检索系统。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在文献检索领域的应用，加速了主题词表向机编化、机读化方向发展，使文献的主题标引和索引编制快速走向自动化，使自然语言检索得以实现，突破了人工语言的局限。现在文献检索语言的应用范围已经逐步扩大到情报研究与文献计量领域^②。可以预计，随着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飞快发展，主题法将会得到深化，人们的检索效率也将提高。尽管分类-主题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前景宽广，但主题法仍将是极具潜力的一门专业知识和科学方法。

4. 目录的方法

《说文解字》曰：“目，人眼，象形。”《玉篇·录部》曰：“录，刻木也。”“目录”一词在汉代已流行，如《七略》言“《尚书》有

^① 马张华，侯汉清编著. 文献分类法主题法导论.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13~178

^② 张琪玉. 情报检索语言的发展趋势：与吴建中的对话. 见：索引技术和索引标准.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6

素丝编目录”^①。可知目录最早指称一书之篇目。后国家藏书有目录，目录又可指称群书之目。中国古代藏书目录往往记篇目、载叙录、列小序。篇目可考一书之来历，叙录可查一人之事迹，小序可明一家之源渊。故通过目录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不仅能部次甲乙、检索图书，而且还起到了学术史的作用。这与西方目录重视“图书描述”的传统有明显区别。古代史志中多有《艺文志》、《经籍志》，正是试图凭借群书目录以示一代藏书之盛，传衍学术文化而不使其中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是我国古代目录的优良传统，而且还成为中国目录特有的学术功能，传统目录之学也因之而在明清时期兴盛一时。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②

当然，现代图书馆藏书目录与昔日相比已有巨大差异，目录款目虽保留了提要，但与古之解题相去甚远。至于一书之篇目、一类之小序，则早已消失。相反，目录的种类却大大丰富起来，一般馆藏目录有分类、书名、作者、主题等数种。显然现代图书馆目录更重视的是检索功能的发挥。此种演变实为历史的必然。其一，现代文献浩如烟海，数量远非古代能比，因而文献的组织、控制、检索等命题逐步突出；其二，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现代学科专业都有大量学术史著作行世，读者不必再通过目录去辨学考源。那么是否可以说辨学考源的目录学传统在当代就衰落无用了呢？其实也未必，在许多文史书目中，这种优良传统仍在延续、发展。如日本汉学界所编部分敦煌文献分类目录，每条文献款目的著录，不仅有古写本文献的内容提要，而且提要之下还有该文献收藏、整理乃至研究现状之介绍。其精细、实用令人折服。这种目录方法无疑是东邻学人对我国目录学辨学考源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① 见《文选》卷三十八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七略》

②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卷一. 丛书集成初编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

5. 索引的方法

索引法是将文献内容中的知识单元（如人名、地名、事物、字词等）抽取出来，依一定排序方法予以提示、指引的科学方法。“索引”是英文 index 的日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1932 年索引专家洪业《引得说》一书曾主张用“引得”一词代之。他认为“引得”在音、义两方面均较“索引”译得更为贴切。可惜因某些原故，终未能取而代之。其实，无论中西方，索引方法都有悠久的历史。《汉书》卷二十《古今人物表》、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等，都体现了中国早期索引方法的萌芽与发展。只是古人吸取知识的基本方法为诵读记忆，因而在中古时期，索引工具书还不发达。明清及至近代，名为针线、通检、串珠、索隐、引得等名的诸多索引工具书纷呈于世，索引之学逐渐兴盛起来。

索引的方法与目录的方法不同，索引方法注重揭示文献的“果肉”，而目录的方法偏重于揭示文献的“外壳”。索引方法揭示文献“果肉”的基本元素，如字词、数据、公式、符号等，而目录方法揭示文献“外壳”的基本特征，如篇名、作者、出版地、出版年、版本等^①。当然索引方法与目录方法也有交叉互借，这也体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趋势。近些年来，如何从文献单元的提供过渡到知识内容的提供，已成为当代图书馆学关注的一个新课题；而作为提供文献“果肉”服务的索引方法，恰恰是解决这一新课题的重要理论方法。以往学术界一直存在一种偏见，即认为索引只是一种工具，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书量大增而人寿未增，以有涯逐无涯已不可能；书卷浩如烟海，博雅之人犹不可能悉究无遗，况乎普通之人。因此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认为校书者如果有了丰富的文献索引可供参考，“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面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材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②。读书治学，有为己之

① 黄恩祝. 应用索引学.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 214~215

② 章学诚著; 王重民通解. 校雠通义通解.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8

学，有为人之学，索引等工具书，“学者资之为治学之利器，编者不能藉之以获名，此为人之学也”^①。既然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图书馆作为学术文化机构，如能不事喧哗热闹、不逐虚誉浮名而多作“为人之学”，不正是图书馆对本民族学术文化的重大贡献吗？

6. 文献计量的方法

凡单元文献、群体文献都存在着量的规定性。文献计量法是从数量角度出发，利用数学、统计学工具揭示文献信息的数量关系、分布结构、变化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又称为文献计量学。文献计量法是在20世纪文献工作中产生的科学方法。一些出色的文献工作者，通过对某些文献的统计、分析研究，探寻出了能够说明文献信息特征的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结论（或称定律）。如揭示科学论文作者分布规律的洛特卡定律（1926年），它证明某领域科学论文的作者频率与该领域论文总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描述某一学科的论文在期刊中分布规律的布拉德福定律（1934年），它研究出某一学科的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有核心区及其相关区之别，这些区域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表征文献中词频分布的齐普夫定律（1948年），它论证出文章中单词的频次与其排列的序号之间存在一种定量关系。这三大文献计量定律共同说明了这样一种规律：我们所考察的具体对象的绝大多数，往往集中于少数主体来源；而具体对象的少数部分，却分散在大多数主体来源之中^②。此外，格罗斯等人使用的引文分析方法（1927年），以及贝尔纳等人提出的衡量文献老化速度的“半衰期”方法（1958~1960年），均是使用数学工具创造出来的科学文献计量方法。这些分析、揭示文献的科学计量方法成为了人们研究文献增长、分布规律，乃至进行科学评价的方法利器。情报学界曾较早地将其吸收进自己的学科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情报学所具有的专门科学方法。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这些文献计量法中，有的发明者就曾是图书馆学家。因此，图书馆学界也一直

① 齐思和. 荀子引得序. 见: 荀子引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② 邱均平. 文献计量学.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8: 209

十分重视文献计量方法的运用与拓展。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有些图书馆学研究者以科学文献为基本材料,使用文献计量方法,借助计算机的帮助,或筛选与厘定核心期刊,或对科学发展进行分析与评价,目前已经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果。他们不但为我国科学评价机制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图书馆学地位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从今后发展趋势看,文献计量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有着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知识受众研究法

1. 咨询的方法

当代咨询业已遍涉心理、医疗、会计、市场、工程、股票、贸易、外交等各领域,但是从咨询业的发端来看,图书馆的咨询历史最为悠久。如在我国唐代,皇家图书馆——弘文馆就经常为皇帝提供咨询服务。弘文馆在唐太宗时有书 20 余万卷,由饱学之士虞世南、褚亮、欧阳询等一批学者出任馆职。据《唐六典》卷八记载,他们“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现代图书馆开展的参考咨询工作是图书馆业务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它是图书馆员对读者利用文献和寻求知识进行解疑答难的一种活动。信息源(各种文本知识)、媒介(咨询人员)和信宿(读者),是参考咨询的三要素;而咨询方法则是将此三要素有效组合起来的基本手段与方式。参考咨询的方法形成于长期的咨询实践之中,它根据读者需要帮助的程度,以咨询问题的提出与解答这两个轴心展开,形成了咨询问题的分析方法和咨询问题的解决方法两个系列。在咨询问题分析方法方面颇具特色的是英国格罗根提出的七大判别方法:①管理或指导性咨询,主要指普通或日常事实的问题,如“星期六你们开馆吗?”②作者、题名咨询,主要指具体文献的提问;③事实咨询,如“人的头发直径是多少?”④查找资料的咨询,主要指主题咨询或检索咨询,如“有哪些围棋史方面的资料?”⑤研究咨询,需要被咨询者通过涉猎新知识才能解答;⑥其他咨询,即不能归属上述

几类的问题；⑦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如涉及机密、隐私或无法回答的问题①。在咨询问题的解决方法方面，武汉大学主编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法》提出的八大方法很有代表性：①顺检法，即据咨询问题依某种顺序排查有关工具书；②排除法，即缩小查找范围的方法；③限定法，确定咨询问题的特定领域；④扩展法，扩大查找范围的方法；⑤跟踪法，从一个线索到另一个线索；⑥参引法，辗转参引，开拓新途径；⑦联想法，运用联想与假设的方法求解；⑧合取法，即综合多种手段及文献解答疑难②。近年随着因特网技术的发展，美国一些图书馆建立了虚拟咨询台（virtual reference desk），把网上的信息源以网页链接，给读者提供统一的界面，以 E-mail、Telnet、WWW（如 request form）等多种形式回答读者咨询，使咨询方法又发生了新的变化③。但不管怎样说，咨询最终是一种知识工作者的高度技艺，它所凭借的主要还是丰富的知识与经验。许多咨询方法都是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2. 导读的方法

导读法就是指导读者阅读的方法。古今中外贤哲关于读书方法有过无数精辟论断，都是指导人们阅读的有益方法。然而图书馆学中的导读法与这些读书方法有异，它是图书馆员辅导读者阅读的一种科学方法。图书馆是各科知识的总汇之所，馆藏文献汗牛充栋，读者如何于其中找到适用的文献，以免陷入知识迷宫而手足无措——这是图书馆学导读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因此，图书馆学的导读法从其特点上看，主要还是一种文献选读的方法。此种导读法以科学性、主动性和针对性为其基本原则，通常有两个层次：首

① [英] 丹尼斯·格罗根著；张帆等译. 图书馆咨询.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2～40

② 詹德优等编著. 中文工具书使用法.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21～628

③ 韩丽凤，卢振波. 高校图书馆虚拟咨询台建设方案. 大学图书馆学报，2000（3）：30～32

先,对读者阅读活动进行分类与辨析,将读者的阅读分为学习型阅读(吸取知识)、消遣型阅读(陶冶性情)、检视型阅读(获取情报)、研究型阅读(解决问题)等数种。其次,根据这些不同阅读类型及阅读需求进行阅读指导。在这一阶段图书馆学导读法主要有推荐阅读法、比较阅读法、相关阅读法、辐射阅读法等。①推荐阅读法,即向读者提供推荐书目或适合读物;②比较阅读法,即向读者提供某一著者不同时期的作品、同一类别不同著者不同时期的作品、同一类别不同著者的作品,或同一主题不同国别的作品,以供读者比较阅读;③相关阅读法,即向读者提供与他所需读物内容上有关联的文献;④辐射阅读法,即以某一著作为中心,然后向四面八方辐射,大量阅读,扩大知识面。应该说,导读的方法很多,这仅是常见的几种。有人依馆员与读者联系的紧密程度将导读法分为直接导读法、间接导读法;依导读的内容将导读法分为专业性、专题性、学术性、娱乐性、社会性等方法;依导读功能将导读法分为劝导性、指令性、影响性等方法①。现在还有一些导读法研究者已不单从馆员与读者的角度来研究阅读的指导,其研究范畴已拓展到了读者在自我读书、治学中的读书方法领域,如“阅读疗法”的提出与研究,这是极有发展前景的一种研究开拓。导读法的深入研究必将使图书馆导读工作发生深刻的变化。假设我们在图书馆的大厅门口设立导读台,建立导读制度,专由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高级馆员轮值导读,这样会为读者提供一种个性化服务,使读者更加亲近图书馆。

以上讨论了三大类十一种图书馆学专门科学方法,需要说明的是:①这些专门方法的分类是大略的,它们之间有时是相互交叉、跨越的。如索引的方法,在应用一部著作编制出书后专有名词索引时,它就属于单元知识的科学研究方法,而非知识集合的科学研究方法。但从索引法的总体应用情况来看,它更多的是以群体知识为

① 黄木华.近几年关于图书馆读者导读工作研究概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6(3):31~34

主，属知识集合研究法。②十余种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的划分也是暂时的，例如有人就认为文献计量法与引文分析法应是两种专门方法，本书将它们统一归纳在文献计量法之中。此外，图书馆学专门方法是发展变化的，任何一种固定的划分也只能是具有时段性的。③图书馆学具有自己的专门方法这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图书馆学就不成其为一门科学，关键问题是我们应在理论上搞清：什么是专门方法？专门方法应是体现一门科学特殊性质并为其所独用的一种科学方法。如图书分类法、生物分类法，虽然都是分类法，但它们是分类思想在不同学科里长期具体运用而逐渐形成的专门方法。它们已经有别于一般事物的分类法。过去有人把图书馆统计法、读者调查法也归入图书馆学专门方法，这是欠妥当的。因为它们仅是作为一般科学方法的统计法、调查法在图书馆领域里的应用，它们尚未经过复杂、长久的实践演变成一种新的、仅为图书馆学所特有的方法。④以往对图书馆学专门科学方法的研究成果，往往忽略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文献收藏中形成的优良方法，这是有所不足的。我们不但应客观地总结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形成的图书馆学有哪些有效的专门方法，还应认真总结历史、梳理传统，以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献整理方法能够发扬光大，并在新时代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⑤有人认为，当代科学之间，科学方法的渗透、移植、综合等现象愈来愈多，图书馆也正与情报学、档案学、计算机科学等整合而走向一体化，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也将逐步淡化。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如果图书馆学在今后发展中积极借鉴与吸收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只能使图书馆学科学方法变得更丰富、更有效，其专门方法也将更具活力、更能发挥作用，怎么会因此而趋于淡化或消失呢？

第二节 一般科学及哲学的方法

一般科学方法是对大多数科学都适用的科学方法。有些学科中的专门科学方法甚至就发源于一般科学方法，后经反复应用与矫

正，逐步演化成为了具有特殊性的专门科学方法。如考古学中的层位法、类型法，就分别来源于地质学、生物学；图书馆学中的分类法、文献计量法，则分别来源于分类学、数学等。图书馆学中目前最常使用的一般科学方法主要有：观察实验法、调查分析法、数学方法以及一些横断科学方法。

一、一般科学方法

1. 观察实验法

观察法是指通过感官或仪器对自然状态下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认识的方法。观察法是最古老的一种科学方法，有些学科，如天文学、气象学、考古学、临床学、心理学等，都是以观察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观察法分直接观察（观察者与观察对象间不存在中介物）和间接观察（观察者与观察对象间存在中介物，如观测仪器等）两种。现代科学发展中，观察法因借助于各种高科技手段，依然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基本科学方法。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观察法的运用也是十分常见的。如现代图书馆参考咨询部门经常接受到馆读者的各种咨询，图书馆员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观察到：大量的读者咨询常常发生在图书馆的一线工作中（即流通部门及阅览部门）；而来馆咨询的读者，其咨询问题的专指度也有某种规律可循。恰如美国图书馆学家巴克兰德所说：“我们发现在图书馆中，人们的正规教育水准越高，质询（咨询）具体文献的倾向越强，因而，对‘主题质询’的倾向越弱。”^①也就是说，知识素养越高的读者，他向图书馆员提出咨询问题的专指度越高，反之则越弱。这种读者咨询问题专指度的强弱效应，就是在长期实践观察中总结出来的。总之，观察法的优点是：观察对象在自然状态下的情况能真实表现，较少受环境的干扰，因而观察者能收集到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其不足之处是：观察资料的质量容

^① [美] 迈克尔·K. 巴克兰德著；严吉森译. 图书馆信息科学的理论与实践.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35

易受观察者能力、心理因素的影响，并且观察到的资料也有限，往往不易作出概括性的总结。

实验法是在可控制的条件下，主动使某种变量发生变化进而对其他变量施以影响、再考察其受影响的结果的一种科学方法。研究者操纵、控制的变量为自变量，受影响而发生反应的变量为因变量。

实验法与观察法的区别是：①观察是一种被动行为，实验是一种主动行为；②观察搜集的是自然状态提供的东西，实验提供的是自然状态应给的东西；③实验比观察更具严密性、非局限性、简化性、可重复性。自从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1564~1642）做了自由落体的实验后，他所开创的实验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也积极使用实验的方法去获取可靠的研究结论，因为从根本上说，实验方法是一种实证的方法，对任何学科都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就发现，图书馆库藏图书经常乱架，而小薄册的书籍贴上书标后使得索书号难以看清。于是他开始研究使用“颜色书标”。他用日光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加上赭灰黑为十种颜色，代表当时十进分类法中的十大类，制成颜色书标贴在书上——此举不但改善了藏书容易乱架的状况，还收到了美观效果，深受同行赞许。50年代时，欧美图书馆学界一度对书本式目录与卡片式目录、字顺排列与分类排列孰优孰劣，进行了无休无止的争论。在此后的10年里，英国克兰菲尔德航空学院图书馆曾做过两次评价标引语言与标引系统的著名实验。第一次（1957~1962），他们让不同组别的标引人员对不同的标引语言（十进分类、标题字顺、单元词系统）进行航空专业100篇文献的定量、定题、定时的标引，结果表明，在文献标引上，单元词索引较其他任何索引语言都更优越^①。这说明，图书馆学研究

① 王崇德. 图书情报学方法论.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8: 149~155

在某些“讲道理”式的论辩无法达到统一时，运用实验方法、以实证数据来说明问题可能更为有效。

2. 调查分析法

调查分析法是在自然条件下通过询问被调查对象（个人、群体）、获取事实材料并加以统计分析、得出某种结论的科学方法。调查分析法从其方式上可分为口头调查法（谈话法）和书面调查法（问卷法）两种；从其调查范围上可分为全面调查法、抽样调查法、典型调查法等。在欧美国家，无论采用哪种调查分析法，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都应严格地具备以下结构要素：①选题背景与位次，②假说的提出，③概念的测定，④定量分析的测定，⑤研究方法，⑥分析结论，⑦结论，⑧各种论据与引证的检测。调查分析法能获得大量原始资料，因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是被长期、普遍并有效使用的方法。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使用调查分析法也较为常见，但大多局限于馆藏文献的利用率、拒借率统计，以及本馆读者的阅读需求、阅读方式、阅读心理、阅读能力调查等方面，而面对社会所进行的开放式的，以获取某类读者、某地读者状况的社会调查活动却相对很少。

1980年，某单位曾就我国科研人员利用情报资料的时间问题作过一次调查，调查方式是对每一科研项目寄发一张调查问卷，对象为1978~1980年国内1651项（次）重大科研项目小组。这次调查共回收问卷890份，占寄出量的53.9%。经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①科研人员用于情报资料查找与消化的时间，平均占他们整个科研时间的15%；②情报资料利用时间比越大，科研成果水平越高、科研周期越短，因此在情报资料上加大投入是有利的；③与国外科研人员相比，我国科研人员用在情报资料上的时间充其量仅为人家的1/2^①。1998年，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委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对1978年以

^① 梁前文. 关于我国科研人员情报利用时间的调查与分析. 情报科学, 1981 (2): 36~42

来公众读书生活及历史变迁进行社会调查。调查共发放 1 000 份问卷，回收 960 份。统计分析表明，北京地区的读者不同时期获得书籍的方式发生了以下变化（见表 12-1）^①：

表 12-1 北京地区读者不同时期获得书籍的方式

时 间	自己购买	向他人借阅	向图书馆借阅	其他
1978 年以前	39.5%	28.6%	16.4%	15.5%
1993~1998 年	70.5%	11.2%	10.0%	8.3%

这个调查结果表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图书出版数量的增多，北京地区读者满足知识需求的方式更倾向于自己购买书籍，而图书馆的作用却呈相对下降趋势。这两例调查个案对了解我国知识受众的具体情况、图书馆作用的情况很有价值，遗憾的是这类社会调查在我国图书馆界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开发。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快发展以及网络的出现，社会调查方法也出现了新的方式——网络调查。网络调查亦称在线调查，有别于面访、邮寄问卷等离线调查方式。网络调查有如下优点：①调查成本低，可避免邮寄和回收问卷的费用支出；②调查速度快，可迅速得到被调查者的反馈；③隐匿性能好，可使被调查者的心理防御降到最低程度；④具有互动性的特点。当然，网络调查也有某些缺点：首先，样本的代表性会受到质疑；其次，被调查者身份的客观性也存在疑问。目前，因网络的普及率和上网费用、速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仍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和网络调查机制的完善，网络调查一定会获得较快的发展^②。

① 康晓光等. 中国人读书透视：1978~1998 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22~35

② 丁汉青，王灿发. 网络调查的优势及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见：解读者：观点、方法与市场.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355~360

3. 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是运用数学理论和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描述、推导和计算，依据量的关系认识事物的一种科学方法。数学是一门高度抽象的科学，表面上看它已远离了物质运动的实际形式，但它却以深刻的内涵揭示出客观事物的规律。数学方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充分的精确性、广泛的应用性等特征，因此在多种科学领域中被十分普遍地应用。它不仅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定量分析与精确计算的工具，提高其他学科的精密度，还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简洁的形式化语言。因此，马克思曾有过这样一句名言：“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①

数学方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得也较早。如1931年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提出了“图书馆学五定律”：①书是为了用的 (Books are for use)；②每个读者有其书 (Books are for all)；③每本书有其读者 (Every book its reader)；④节省读者的时间 (Save the time of the reader)；⑤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 (A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这个“五定律”不仅较早地表达出了“读者第一”的观点，而且具有系统、发展的眼光。阮氏早年是一位数学教师，他正是用数学“定律”的方法表达出了他卓越的图书馆学思想。此外，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及数学模型，也是科学研究设定合理假设并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如用公理化方法可以假设表达知识的任何符号编码系统都会有“冗余”现象。一种编码（如文字）的信息量总要比它所表示的对象的实际信息量更多些。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公理，科研人员才推算出英文、德文的冗余度为70%左右（字母组成单词时的冗余度加单词形成文章时的冗余度），汉语的冗余度为60%^②。冗余在编码中是一种“合理浪费”，因为一定的冗

① [法] 转引自保尔·拉法格. 忆马克思. 见：胡尧之等译.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73

② 竺迺刚等. 汉字输入与人机对话. 计算机学报，1978（1）：35~54

余有利于人们对文献的阅读和理解；但过度冗余，则会形成“无理浪费”。

数学方法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毋庸置疑的，但将数学方法有效运用于具体学科之中也非易事。一方面，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产生定量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还应有与这门学科相适应的数学工具，二者结合才会实现数学方法的有效运用。在图书馆学中，文献计量、引文分析、知识受众的调查统计等都是数学应用较多的研究领域，但是，在大量应用数学方法从事图书馆学研究中，我们还要注意不可使数学“泛化”。第一，要认识到使用数学手段的领域是图书馆学的部分而非全部；第二，数学工具可代你作许多思考、推理，但并不能增减图书馆学原有的“物理内涵”；第三，在进行数学分析时，图书馆学的许多变量不具备数学的清晰度，因此还必须使用其他科学方法辅助研究。尽管数学方法可以提高图书馆学的精确度，但不能导致它成为精密科学。

4. 横断科学方法

横断科学又称横向科学，它是以不同层次物质运动或不同学科中某些共同点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类科学。横断科学能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各个领域横向地贯通，并在各个领域验证和发展自身的理论。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紊乱学等，都是横断科学。由于横断科学覆盖面广，对多门学科进行综合与概括，因此具有很强的方法论特征。它的一些概念、理论、方法，很容易被其他学科（包括哲学）所吸收。

信息论的方法与传统自然科学方法不同。传统自然科学的注意力只局限于物质和能量两方面，其科学方法在于引导人们如何观察事物的物质结构、能量形式及其转换关系。而信息论认为，越是复杂和高级的事物，信息过程就越是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物质过程和能量过程往往是为了支持信息过程而服务的。信息论的方法强调用信息的观点而不是物质或能量的观点来考察各种复杂系统和高级事物，信息分析方法、信息综合方法、信息引导方法也就成了具

有普遍性的科学方法。于是，人们可以利用信息分析法了解蝙蝠活动的信息原理，再利用信息综合方法、引导方法研制成能像蝙蝠一样（甚至较之更佳）的快速测距雷达系统^①。

信息论的方法对图书馆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数字图书馆的产生，传统图书馆的知识集合状态正走向“实物馆藏+虚拟馆藏”，原有的知识集合方式正走向“图书秩序+数字秩序”。这种变化表面上看是技术层面的，实质上却是信息层面的。它是知识信息编码、传输、存储、解码、处理等环节发生本质改变的结果。由于这样一个改变，传统图书馆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惑。如以往的图书馆目录只是实际馆藏知识信息的反映，而现在，图书馆网页目录不仅可提供馆藏书目，还可存取文摘、索引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存取分散于异地不同机构的知识信息目录，提供下载、打印、电子邮件发送等服务。于是，书目工具在性质与功能上“异变”的同时，用户使用这些工具所需掌握的规范也大大增加，并在二者之间逐步形成了突出的矛盾^②。这就需要我们使用信息分析法、综合法、引导法等，对其进行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系统论的方法也与传统科学方法有所不同。传统科学方法常把研究对象分成若干部分，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以简单分解和简单相加的观点来说明整体的性能，认为局部性能好整体性能自然也会好，反之亦然。而系统论认为，系统的总体功能不等同于它的各组成部分功能的总和，它具有各组成部分功能所没有的功能；系统的总体功能是由其各组成部分及系统结构共同决定的。因此，系统论的方法强调把研究对象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分析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及其结构是怎样影响整体功能的。在思维方式上，系统方法将综合作为出发点及归宿点，并把分析和综合贯穿于过程的始

① 钟义信. 信息与信息化：知识·方法·应用.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122~128

② 孟广均，徐引篪主编. 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237~240

终。系统论方法的整体性原则、结构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有序性原则、综合性原则、最优化原则等，成为了人们使用系统论方法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①。图书馆学将自己的研究内容表述成“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这本身就体现了系统论的方法。它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客观知识运动与交流的复杂巨系统，在这样一个动态的复杂巨系统中，如何认识客观知识，如何将其有序组织起来，如何形成高效的知识集合，如何向知识受众提供优质服务，知识受众是怎样获取和利用知识的……这一系列问题，都可利用系统论方法加以说明和揭示。

控制论起初是关于动物与机器中的控制和通讯的科学，现已发展成一门对动物、机器和社会不同系统进行控制的、具有普适性的科学。它主要由信息过程、反馈机制、控制技术三个主要内容组成。控制论方法不是单一的方法，而是由功能模拟方法、黑箱方法和反馈控制方法等具体方法组成的。^①功能模拟法。功能模拟法是在不清楚事物原型内部结构的情况下，以模型来模拟原型功能的一种科学方法。如“电脑”就是对人脑的模拟，电脑的功能就是对人脑的记忆、判断、推理、选择、计算等思维功能的一种模拟。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知识集合也与人脑机制有相似之处，具有“记”与“忆”的功能，因此也可深入开发这方面的功能模拟研究。^②黑箱方法。黑箱方法认为，能打开并可直接观测其内部结构的系统为白箱（white box），打不开的为黑箱（black box），对黑箱输入一定的信息值，然后分析输出值，从输出值的变化推导黑箱内部结构及机理状态，达到对黑箱的认识，这就是黑箱方法。中医中的“望闻问切”使用的就是黑箱方法。图书馆学可以运用黑箱方法研究知识受众的阅读心理等。^③反馈控制法。反馈控制法认为，反馈是系统或过程输出端的信息部分反送回输入端，其所表现出来的控制效果，可以成为调节、修改下一步控制作用的依据。因此，反馈控制方法

^① 吴岱明. 科学研究方法学.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441~446

的特点,就是根据过去操作的情况来调整未来的行为,即解决系统不确定因素与控制作用之间的矛盾。图书馆学可以利用反馈控制法从知识受众获取信息来判别一个知识集合的使用效率,进而对之不断进行优化改进。

此外,耗散结构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认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能量耗散、与外界发生交换才能保持结构稳定的观点,协同论(Synergetics)关于系统无序与有序可以转化的观点,突变论(Morphogenesis)关于事物发展从渐变到突变的观点,超循环论(Hypercycle Theory)关于复杂多级循环系统相互作用的观点,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关于简单的非线性叠加可构成复杂的观点,都对图书馆学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如获得美国情报学会(ASIST)2000年度优秀奖的斯旺森(Don R. Swanson)教授提出的“未被发觉的公开知识”的概念,就是受超循环论方法的启发而产生的。斯旺森提出:公开知识有可能不被发觉,是因为组成这种知识的、具有逻辑联系的各部分从没有被任意同一人所知。譬如医学条件A与病症B有关,而另一领域的研究表明饮食中C的缺乏会导致同一病症B,那么一些文献中将蕴含着A和C的联系。他对25篇食用鱼油可引起血液变化和34篇讲述相似的血流变化可导致雷诺氏症的生物医学文献进行了比较,然后在两组之间建立起联系,与合作者设计出一个用于发现Medline数据库中医学文献之间联系的软件Arrowsmith。斯旺森的观点用简洁的公式表达则为:若 $A \rightarrow B$ 和 $B \rightarrow C$ 存在,则 $A \rightarrow C$ 存在^①。

还需提及的是,以上述科学方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复杂性科学方法,更应引起图书馆学界的重视。复杂性科学(Science of Complexity)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横断科学。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系统及其复杂性,关注的是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复杂动力学行为(如涌现现象),旨在揭

^① 荣毅虹,梁战平. 基于文献的发现. 情报学报, 2002(4): 386~

示复杂现象的内在本质。1990年钱学森教授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认为复杂性问题实际上是开放复杂巨系统(如自然界)的动力学问题;并提出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thesis),后来又发展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hall for workshop of 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及“大成智慧工程”^①。这一方法的实质是集专家群体、数据与信息、计算机和网络三者为一体,形成以人为主体的人一机智能系统,通过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科学推理与科学思辨相结合,去认识复杂系统^②。

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方法分析图书馆学的现象,我们会看到,图书馆事业本身就是个复杂巨系统,它是由各级各类型图书馆广泛组成的一个网络,具有多层次、多功能的结构,是开放的、与环境有密切联系并相互作用的,它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除此之外,“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也是个复杂巨系统,“知识生产→知识流通→知识消费”也是个复杂巨系统。图书馆学只有对这些宏观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才会显示出一门科学的力度及应有的现实价值。

以上列举的几种一般科学方法,是目前图书馆学中应用较为显见或有待深入借鉴的。需要注意的是:①一般科学方法的数量不仅仅局限于此,其他诸如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分类与比较的方法、个案研究的方法、历史的方法、预测的方法等,都具有普适性,也适合于图书馆学研究。但各种一般科学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的适用度是有差别的。②图书馆学关注的是人们如何获取知识,而获取知识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现象,它具有复杂性、多变性、模糊性等特

① 戴汝为. 钱学森论大成智慧工程. 中国工程科学, 2001 (12): 14~20

② 成思危主编. 复杂性科学探索.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9: 48, 6

征，仅用一种科学方法难以探其堂奥，需要多多借鉴各种不同的科学方法来从事研究。③广泛采用不同科学方法，不能仅仅停留在肤浅借用的层次。如果简单地将其他学科的名词、概念嫁接到图书馆学中，那就不是以它们来丰富我们的学科体系，而是以我们的陈旧体系来同化它们。有些科学方法只有经过深入透彻的理解和应用，方能显示其巨大威力。如个案研究的开展，是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力形式，只有将观察、实验、调查等方法深入地应用于个案研究中，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哲学方法

哲学是一门关于人类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它不是一般的思维科学，既不同于实证性的经验科学思维，也与数学等纯逻辑形式科学思维有较大区别，它是最高层次的理论思维，是对人类思维成果多层次及高层次的抽象，具有思辨性、超越性特征。哲学方法是哲学原理在社会实践、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如实事求是的方法、对立统一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总之，哲学方法总是以社会实践中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与归宿点的。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哲学方法是用来发现、解决科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或基本问题（即元问题）的。数学家希尔伯特在1900年巴黎第二届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的演说中曾指出：“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着生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或中止。”①爱因斯坦也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

① [美] 转引自康斯坦丝·瑞德著；袁向东等译. 希尔伯特：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10~111

科学的真正进步。”^① 哲学家波普尔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科学始于问题，又终于问题。”他在1937年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 P_1 （问题） \rightarrow TT（猜想） \rightarrow EE（证伪） \rightarrow P_2 （新问题）。”他解释道：“一切科学讨论都始于一个问题（ P_1 ），我们为它提出某种尝试性解决即一个尝试性的理论（TT）；然后在尝试清除错误（EE）中对这个理论加以批判；而就辩证法来说，这个过程是自我更新：该理论和对它的批判修正引起了新的问题（ P_2 ）。”^②

哲学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主要强调的是对问题的反思、批判、追问，尤其是对本学科中元问题的深究与解释。科学的原创思想，一般是建立在元问题上而不是建立在原理上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元问题是思想活力的源泉，思想建立在元问题上才具有意义。另一方面，元问题是原理的母体，以为思想的出发点是由原理和规范组成的，这无疑是错误的。如果不从问题出发，而从原理出发，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就会成为可推论、可演绎的机械活动，也就无所谓思想和智慧^③。所以，图书馆学研究应该从“面向理论”（theory-oriented，即以理论为研究客体指向），转向“面对问题”（problem-oriented），用哲学方法去探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范式特征、学科理论及其终极目的等元问题。只有元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图书馆学的发展才能更趋健康。

关 键 词

方法论 图书馆学专门方法 单元知识研究法 校雠法 版本法 文摘法 知识集合研究法 采集法 分类法 主题法 目录法

① [美] A. 爱因斯坦，L. 英费尔德著；周肇威译。物理学的进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66

② [美] 卡尔·波普尔著；赵月瑟译。波普尔思想自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84

③ 赵汀阳。一个或所有问题。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202

索引法 文献计量法 知识受众研究法 咨询法 导读法 一般科学方法 哲学方法

小 结

1. 科学方法是指人们研究和认识各种事物而采用的思路、途径、手段和程序。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科学。图书馆学方法论就是研究图书馆学方法的有关理论。图书馆学方法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专门科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哲学方法。

2. 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由三个内容组成：①单元知识研究法，如校讎的方法、版本的方法、文摘的方法；②知识集合研究法，如采集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主题的方法、目录的方法、索引的方法、文献计量的方法；③知识受众研究法，如咨询的方法、导读的方法等。

3. 一般科学方法主要有观察实验法、社会调查法、数学方法、横断科学方法等。横断科学方法是个方法群，它包含信息论方法、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耗散结构论方法、协同论方法、突变论方法、超循环论方法、分形理论方法及复杂性科学方法等。

4. 哲学方法是哲学原理、思想在社会实践、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它以社会实践、问题的提出与解答为其出发点与归宿点。哲学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主要是对本学科中的元问题进行反思、批判和追问。

思 考 题

1. 什么是方法及方法论？
2. 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分哪几个层次？
3. 为何说古代校讎、版本、提要的方法在现代图书馆学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4. 古代采集法与近代采集法有何不同？

5. 文献计量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6. 网络调查法主要有何特点?
7. 为什么说数学方法不能泛化?
8. 何为横断科学及横断科学方法?
9. 为什么说“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

第十三章

图书馆学未来发展

20世纪以来,图书馆学在理论与方法的建设、专业制度化以及学科资料的形成方面,已经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同时也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对人们获取知识能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进入21世纪,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图书馆学在社会发展与自身逻辑理性的推动与作用下,仍将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 影响图书馆学的社会发展因素

21世纪,社会发展表现出全球化、网络化、知识化等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会对社会科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推动(或制约)社会科学乃至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

一、社会发展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的活动、影响、合作日益加强,使得具有某种共性的经济、文化模式逐渐普及,并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历史状态或过程。

社会发展的全球化最初兴起于经济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国际物流(如集装箱远距离运输)、国际金融(资金、证券等不分昼夜在

全球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国际投资、世界经济组织纷纷涌现。各种经济因素,如能源、资本、技术、劳务、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配置,致使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上无不对外部世界形成了某种依赖。尤其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交通、通讯手段的革命性飞跃(高速、高效、大容量),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的交往打破时空障碍提供了积极的支持条件。全球化发展趋势也开始从经济领域逐步向科技、文化、政治、思想等各领域渗透、扩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相互沟通、影响加剧,共同决策、共同行动的现象增多,社会呈现出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对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从研究对象上看,世界问题的出现,拓宽、拓深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环境保护、世界金融一体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类共同遗产的确定、国际流行病、恐怖主义、国际贩毒等。社会科学有可能在这些全球性“问题域”建立起新的学科生长点。对于图书馆学来说,未来全球图书馆的形成,也将为图书馆学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目前,这一趋势已初露端倪,如国际间的图书馆合作项目“追赶太阳”(Follow the Sun)、“联合数字参考服务”(CDRS),已经形成了国际性的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平台^①。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了整体化思维、复杂性理论的出现。随着人类相互依赖感的加强、盘根错节的整体化结构(经合组织、军事集团等)的不断出现,全球意识、世界历史也正在形成。因此社会科学必须从全球广度去思考各种问题,强调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承认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差异性、互补性,为探索世界各国可通融的方法与理论作出努力。以全球图书馆为例,网络技术与虚拟空间可以消除地理界线,但各国人文界线(制度上的差异与不同观念的敏感性)却始终存在,这是各国图书馆学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① [加]刘静.虚拟参考咨询.国外社会科学,2003(1):76~78

二、社会发展的网络化

网络化是指由于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现代通讯技术为支撑的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数字化、网络化变化的状态或过程。

社会发展的网络化，是20世纪末由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虽然技术本身不能决定社会进程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但信息知识的交流传播是重要的人类活动，因而网络化这种信息处理与传播新方式的广泛普及应用，必将对社会状态、社会运行带来全方位、综合性的改变。一个以数字化网络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工具的新型社会正在出现并将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互联网带来了极为浩繁的信息资源，人们能更加全面、及时地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知识；其二，互联网使人的交流与交往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人类知识世界的方式也由主客对立式变成了主体际式^①；其三，网络空间（cyberspace）创造出来的虚拟现实，扩大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范畴；其四，网络技术使社会生活呈现出数字化、虚拟化趋势，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改变，如工作环境变小、电子商务普及、产品与服务更倾向于个性化、家庭生活智能化等。当然，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社会结构越来越脆弱，信息知识越来越无序和难以控制，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正逐渐加大等。

这一网络化趋势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从研究条件上看，互联网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知识，如国内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提供了更多更完整的研究资料，而为了有效利用这些大量涌现出来的资料，研究人员必须学会新技巧，建立使用信息的新策略，他们对数字图书馆乃至图书馆员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强。其次，从研究手段上看，网络不仅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写作方式（电脑写作）、协作方式（网上讨

^① 崔唯航. 社会科学：面向网络时代. 哲学动态, 2001 (1): 23~25

论),使得“无形学院”内部的新观点、新发现、新材料能即时获取,而且也为学术批评提供了新的途径。再次,从价值认同上看,技术力量在短期内的聚合与裂变,在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的同时,也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崇拜,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被某些人忽略。如图书馆学研究者近年对技术表现出的巨大热情,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然而他们却很少顾及和讨论技术的后果。

三、社会发展的知识化

知识化是指社会形态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在这种状态或过程中,知识成为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力,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重要地位将被知识所取代,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将成为社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及社会的主体力量。

“知识社会”这一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但对其作出系统阐述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他认为工业社会之后的一个新型社会形态就是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一个变化过程,是渐进的、非革命性的。这就好像科学在18世纪以前是用于启蒙的,仅具生产意义,是对世界观的评判;到了19世纪,科学除了“纯”科学以外,一部分被凝固成了机器而形成了生产力;而在20世纪,科学日益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或直接“述行的”(performative)力量^①。知识社会是一个全面运用知识和全民拥有知识的社会。体力劳动减少,脑力劳动增加;知识经济取代物质经济、货币经济,资本形态知识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束,知识产业迅速崛起,商品知识化,知识商品化;社会运行智能化、网络化,知识管理的应用将大大提高社会组织的效率^②。在知识社会中,人

① [加]尼科·斯特尔著;殷晓蓉译.知识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50

② 林建成.知识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知识化.见:新华文摘,2001(2):32~33

类会面临许多新变化与问题，如知识可以不分贫富地被人们共享，必将导致政治权力的弱化；产业时代是以机械为变化动因的官僚体制，社会变化速度慢，而知识社会是以知识信息为变化动因，社会变化速度加快；知识信息的发展本身是有不确定性的，因此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也会具有不确定性。

社会发展的知识化趋势对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在研究重点上有关“知识”的命题凸现出来。即随着知识价值得到充分认识与利用，学习知识、传递知识、利用知识、创造知识、共享知识的社会取向和运行机制将逐步建立。终身学习、按需学习会在社会个体之间广泛普及。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将对知识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知识化投入大量的研究资源。其次，由于知识生产不是线性的，而是跳跃性的或是无序的，因此多学科合作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方法会得到进一步加强。这将有利于知识创新及各学科研究潜能的开发，有利于知识生产方式的革新，最终有利于社会综合问题的解决^①。以图书馆学来说，因其宗旨是为人们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和方法，因此，面临着未来因“知识获取机会非均等性”造成的“非知识群体”的出现，图书馆学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共同携手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寻找解决方案。

第二节 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趋向

一、研究重心向知识领域转移

图书馆学研究重心向知识领域转移，这是由其自身学科“知识基因”的遗传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推动的。

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是产生于文献整理、文献积累活动中的，而文献的本质就是知识。因此，可以说图书馆学最初是以人类知识

^① 姜大源. 德国 500 名科学家和教育家论未来知识社会里的知识与教育. 德国研究, 2000 (1): 37-40

活动为基础而逐步形成的，其原始基因来源于“知识域”（对知识进行存储、排序、加工、整理、提炼、传递等活动范畴）。只不过早期社会的知识生产、知识使用的范围太小，仅局限于社会上层（巫师、史官、精神领袖等），因而，由皇室建立起来的藏书楼也仅仅为一小部分人使用，在图书整理基础上形成的图书馆知识体系也不可能扩大并渗人民间。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知识积累与传承的效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物化，知识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推进器，并且开始向日常生活、向社会大众靠近。到了后现代社会，知识将全面、直接地干预人类生活，与社会个体的生存相关联。而且受知识规划的作用，人必须与知识权力交往，并被知识本身所统治，不能生产知识就意味着权力与价值的丢失。所以，随着知识价值、知识作用的不断扩大、提高，图书馆学的原有“知识域”也在不断地变化。图书馆学的研究主题虽然一度从图书整理时代的“图书”转向了图书馆经营管理时代的“图书馆”，又从经营管理时代的“图书馆”转向了信息技术时代的“信息”，但在未来知识社会中，它必将向“知识”进行转移，而且这种转移本身正是由其固有“基因”所决定的，是对其自身学科出发点的更高层次的回归。

我国自1993年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来，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知识资源的开发利用仍是我国信息化目前的薄弱环节。未来图书馆学的“知识域”将包含哪些研究范畴呢？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知识形式研究。如知识的载体，知识的类型，知识的组分，知识的表达手段和方式等。②知识集合研究。如知识的组织，知识资源的配置，知识的检索，知识的优控，知识集合的管理，知识集合的社会作用等。③知识受众研究。如知识受众需求与服务，知识交流与学习机制，知识建构，知识测度等。

二、学科发展从细化走向整合

图书馆学在形成之初有两个显著的特点：①它内部知识体系的细化不明显。如中国古代的校讎学融校勘、版本、目录为一体。西

方图书馆学则是以书志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如德国齐亚茨科在格丁根大学开设的图书馆学课程就是以书志学为中心展开的。^②早期图书馆教育倾向培养学识渊博者。由于古代图书馆知识中夹杂着大量的“意会知识”（即隐知识），因此“师徒相授”的知识传授方式和“学富五车”的人才养成目标成为当时的主流。如中国古代图书馆中的校雠家因“终身守官，父子传业，故能讨论精详，有功坟典”^①。而在近代，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公共图书馆员在189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第21次大会上发言说：一个伟大的图书馆管理员，他必须有行政的、博学的天赋。他可能既是图书馆员又是学者、批评家（如莱辛），或是历史学家、哲学家（如戴维·休姆），只有这样才不会降低图书馆职业的尊严^②。

上述两个特点，使图书馆学在发展之初就与其他学科表现出某些不同。但这些特点在日后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消蚀。因为社会科学发展的表现之一就是其自身不断分化成一门门独立的学科体系，每个学科又包含若干分支领域。后来经过大学教育分科建系的制度化支持，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变成了拥有众多系列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据1972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表的资料显示，当时美国图书馆学校所开设的必修课程（即分支领域）已多达11门，选修课程更多达64门^③。学科内部的细化增强了图书馆学的精确性、操作性和体系的完整性，图书馆学研究也获得了较快的纵深发展。早期图书馆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者渐渐被一些在分支领域内学有所长的专家所取代。

然而，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整体性。不仅客

① 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校雠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1813

② [美]詹姆斯·肯德尔·霍斯默。《图书馆管理员的作用》。见：[美]詹姆斯·科塔达主编；王国瑞译。《知识工作者的兴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45~51

③ 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科教处编。《世界图书馆事业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290~309

观世界是一个整体，图书馆学所面对的人类知识也是一个整体。学科内部的细化在提高分支领域的研究效率的同时，也弱化了学科整体研究的效率。图书馆学内部结构的协调与平衡、分支之间的联系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甚至图书馆学中的那些讲授不同课程的教师，其知识素养也出现了偏颇，就好像长年工作在流水线上的熟练工人，一组肌肉变得异常发达（手指灵活了），而另一组肌肉却萎缩了（腿脚麻木了）。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的全球化、网络化、知识化的进程加快，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整体化研究的重要性。众多研究专题也越来越由影响社会的问题所决定，而不是由某一具体学科来决定。学者们的共同合作也逐渐普及增多。跨学科研究、多学科解决问题的情况增多，混沌科学、复杂性科学兴起，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的潮流。

可以预测，图书馆学经过一定阶段的细化发展之后，也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以下特点：①一些重大前沿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这些课题主要有数字图书馆、网络资源导航、数字化参考咨询、知识的人工智能服务、知识学习与知识建构等。②图书馆学与其同族学科（如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的融合进一步加强。因为文献、情报、档案都是知识或能提炼为知识的重要资源，这些同族学科会在知识资源配置、管理、组织、加工、传播等领域形成整合，促使知识资源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③图书馆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如“知识组织”将把传统的文献分类学、目录学、主题法、索引学、检索语言、工具书研究等众多分支整合在一起（同时也保持它们的相对独立性），而“知识发现”将会把情报分析与预测、文献计量学、知识测度与评价等联系在一起。

三、学术理性由技术倾向人文

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就已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技术力量正日益快速地改变着

图书馆组织与工作的方式，智能搜索引擎、数字图书馆、网络咨询、电子文献等一系列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让人应接不暇。人们已切身感受到图书馆面临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与此相关，讨论技术的论著大量出现。图书馆学界对技术的青睐与热情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20世纪80年代初，曾有图书馆学家预言：随着信息技术的飞快发展，无纸时代即将来临，在21世纪传统图书馆会完全消失^①。当然，也有人冷静地指出这种看法有些过分。

应该承认，技术进步的确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是生产关系改善和社会变革的先导动力，但它并非惟一的动力。而且技术本身确实有双刃剑效应。核能可以提供无限的商业能源，但核废料处理和老化反应炉的退役却构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基因工程能造出抗病毒且富含蛋白的植物以及改良动物，但它也可以制造出生物武器和病原体微生物，打乱大自然生物多样性的平衡；信息技术可以使地球变小，使人们的交流更快捷，但网络也可能成为信息战、强势文化、色情与犯罪的新媒介^②。人类发明了技术，技术又使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威胁与危险。而解决威胁、危险的方案只能在技术以外的因素中寻找。恰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言：技术就像一张地图，它可以告诉你到某一个地方怎么走，但是它并不能告诉你应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是价值观的任务。只有价值观给出这个目标和方向之后，技术才能指出如何或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地^③。因而，社会的进化既要靠硬的动力（技术），也要靠软的动力（价值观），人类的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最终要协调发展。

① [美] F. W. 兰卡斯特著；郑登理等译. 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136~150

② [美] 欧文·拉兹洛著；杜默译. 巨变.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3~4

③ 赵建军. 技术“走向”悲观的文化审视.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1）：2~37

图书馆从其产生之初就是一项人文主义的事业，因为它的工作对象是人类知识及获取知识的社会个体，终极目标是使知识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使人与社会的发展更合乎理性。所以，以图书馆活动为基础成长起来的图书馆学，无疑也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对此，美国图书馆学家杰西·谢拉早在1976年就指出：“说它是人文主义的，是因为从根本上讲，它研究的是人类思想和伟大探索的文字记录之间的那种微妙的、难以捉摸的关系。把图书馆学划分到社会科学，是因为图书馆作为一个部门是社会的产物，它的目的是通过帮助个人了解他自己和他所处的环境来改良社会。……图书馆学在其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靠得更近了。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否则，过分热心于科学技术和行为学派的社会活动，我们就会看不到个人及其需要和包含在这些需要中的人文主义价值。”^①

由于我国图书馆实践与图书馆学研究在以往主要以“书”或“馆”为中心，因此社会个体常处于被忽略、受限制的地位。技术进步虽然提高了图书馆的工作水平，但这一局面至今仍未得到明显改观，而且经常有激烈的批评见诸新闻媒介。近些年图书馆学界有识之士不断呼吁重建“图书馆精神”和“人文图书馆学”，表明图书馆学的学术理性正从“技术”转向“人文”。那么，未来这种转向将会出现哪些特点呢？①从研究范畴上看，图书馆学不仅研究知识，也会加强研究知识受众。学科价值将构建于知识世界与知识受众之间的关联之上。②从研究方法上看，图书馆学在努力从经验化向科学化提升的过程中，更会注意从科学化向人文化提升，如不仅强调本学科要有“刚性”特征（实证、量化），也要有“柔性”特征（解读、感悟）。③从学术检验标准上看，社会人群的知识和信念能否得到协调发展、公平发展，将会成为未来学术研究成果的基本衡量尺度。

① [美] 杰西·H. 谢拉著；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1~2

四、研究特点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

传统图书馆学将自身的学科内容分为理论与应用两个部分是有其深刻社会历史原因的。从古希腊开始，学术研究就是纯哲学探索与实用技术相分离的，并且前者地位至高无上。19世纪初，德国新建了一批现代化的大学，在这些大学的支持下，德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重镇。大学虽然强调通过科研来生产新知识，教学与科研也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但德国学术界仍弥漫着一种观念：纯科学与应用技术是相分离的。近代图书馆学产生于德国，在图书馆学建立之初，施雷廷格、艾伯特等早期图书馆学家一般将有关图书的知识和技术的总和视为图书馆学。其中“知识”和“技术”在他们眼里显然是可分离的两部分。19世纪后期，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赴德留学，德国的图书馆学思想与教学模式也以这场留学热为媒介传播到了美国。从此，图书馆学理论与应用的两分模式，二者之间后来产生的冲突，以及平衡二者关系的努力，一直贯穿于美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始终。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主要舶自于美国，如早期接受过美式图书馆学教育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在宣传图书馆学时就力倡图书馆学应包含原理与应用两个部分。他在1925年说过：凡是成为专门科学的学问，有两个最主要的条件，第一是原理，第二是应用。而应用是根据原理而来的^①。此后，中国图书馆学内容就有了理论与应用两分架构形式。

从理论上讲，自然科学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甚至还有“开发研究”），但是在社会科学中，这种划分颇有难度。因为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除了具有“科学性”之外，还具有“实用性”特征，许多社会科学把重点放在了解决超越社会科学学科范畴的具体问题上，试图应付那些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过，在一门具体的社会科学中，却存在着基础知识与实用目的之间的差异，换言之，就是

^① 杜定友. 图书馆学之研究. 见: 杜定友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1~6

存在着理论与应用的差异。并且，许多研究者认为，理论是应用的基础，它对应用有着指导作用。20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科学的技术化（科学研究更加依靠技术的支持）、技术的科学化（越是新技术所含科学知识越密集）的趋势愈加明显。基础研究的发展促进了应用研究的繁荣；应用研究的拓深，又推进了基础研究的创新。甚至某种科学研究既是基础的也是应用的。如凯恩斯的经济学，一方面“想在基本理论层次上认识经济动力学，但同时也想消除经济萧条所造成的伤痛”^①。

这种现象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如近年对元数据的研究，对网络知识导航的研究，以及对人工智能数据库的研究，它们既是人类获取知识的新工具的一种新创造，也是图书馆学原理与方法在更高层面的一种提升。未来图书馆学的理论与实用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条朝前涌流的河水，它们之间有交叉、纵横的水道，有时看似是分离的，有时又会因汇流一处而彼此不分。

在今后的图书馆学研究中，理论研究的价值还是应该肯定的。理论主要促使认识及观念上的变革，应用则面向实践，解决现实问题。未来图书馆学将呈现理论、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①图书馆学不仅是促进图书馆发展的“馆内”科学，它也会从“馆内”走向“馆外”，变成社会人群主动获取知识的方法论。为此，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②理论研究将通过真实问题的切入，逐步纠正自身长期以来形成的肤浅化倾向，实用研究也将注重为理论创新提供原料和动力。^③理论与应用研究将通过国家重大创新工程或前沿课题（如数字图书馆工程、网络资源共建共享、知识要素向不发达地区的流入等）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① [美] D. E. 司托克斯著；周春彦等译. 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4

五、学科建设更加注重本土化

所谓本土化，是指学科发展走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当然，本土化问题现已不仅仅存在于科学研究中。在经济领域里，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地区投资建厂，其产品最初几年的研制中，要在该国该地区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以便被当地消费者所接受、欢迎，如中国海尔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冰箱的过程就是如此。在社会制度领域中，每个国家的体制改革因各自国情不同，采取的方式也不同，如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累积性的边际演进之路，即用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以体制外改革促进体制内改革，改革理论随改革实践的丰富而完善，执政党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变而在改革中寻求创新等，这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迥然不同。在科学研究中以科学形式最为精密的数学来说，中国数学与西方数学在“ $1+1=2$ ”上别无二致，但在价值功能、研究方法上，各自却有不同特点。古代中国的数学是一种筹算、技艺，而古希腊的数学则是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中国数学讲究解决具体问题，强调快速运算，走的是机械化的道路（发明了算盘等），而希腊数学则强调演绎，走的是公理化的路子^①。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它本身即具有“此时此地”性。可见，严格地说来，任何一种理论与学说都是“地方产品”，无社会差异、时空差异的普遍性的理论与学说是存在的。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存在着如何本土化的问题。由于社会土壤不同、学术传统不同，各国的图书馆学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如德国图书馆学学术色彩浓厚，英国图书馆学具有管理特点，美国图书馆学侧重实用与技术，俄罗斯图书馆学有着悠久的读者、阅读研究传统，印度图书馆学更注重人文关怀等。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是在西方图书馆学影响下于20世纪初期建立起来的。中国图书

^① 王子舟，廖祖煌. 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初探. 图书情报工作, 2002(1): 22~28

馆学在发展之初，就有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要走本土化的道路，如1925年梁启超呼吁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1926年刘国钧先生则称应“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①。然而数十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由于长期受西方话语权的支配（先是美国图书馆学，后是苏联图书馆学），不仅割断了古代图书馆知识重视文献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也使自身长期处于国外图书馆“注脚”的地位。时至今日，仍未养成一种鲜明的特色而在国际图书馆学界独树一帜。进入21世纪，中国图书馆学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发展趋势。只有一方面积极借鉴、吸收外国图书馆学的新思想、新方法，一方面又重拾传统，加强本土化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才能走出一条“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

本土化是未来图书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在本土化的建设中，图书馆学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寻求突破。①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如中国地广人多，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知识获取机会非均等性也会逐步突显。近知识群体和远知识群体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加大，造成新的“知识盲”（识字但无知识专长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图书馆学将从法律、技术等方面寻找可操作的解决办法并为克服这一问题作努力。②加强传统学术资源的挖掘和继承。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如古代多次编纂大型类书，用目录学引导读书治学等，如何在当代社会条件下重新发扬这些优良传统，以求为公民提供学习知识的工具与方法，这将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③学习、吸收国外图书馆学的优良传统。如学习美国图书馆学的先进技术与管理，以提高我国图书馆的技术、管理水平；学习俄罗斯图书馆学对读者、阅读的重视，以提升我国公民的知识素养；学习印度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传播知识过程中引导和鼓励群众对生命持有

^① 王子舟，廖祖煌. 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初探. 图书情报工作，2002(1): 22~28

心身融合的观念。

总之，中国的图书馆学应与社会人群发生紧密的关联，并为他们提供有效的知识援助，同时也应为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 键 词

社会发展全球化 社会发展网络化 社会发展知识化 知识社会
图书馆学知识域 整体化研究 图书馆人文性 理论与应用关系
图书馆学本土化

小 结

1. 社会发展的全球化拓宽了科学研究领域，导致整体性、复杂性思维的出现。社会发展的网络化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新的研究手段。社会发展的知识化将使大量科学研究资源向知识命题转移，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式也会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学在这种背景下，将发生许多明显的变化。

2. 在未来发展中，受自身学科逻辑理性与社会发展的推动，图书馆学研究重心将转向知识领域，其“知识域”将包括知识形式、知识集合、知识受众的研究等。

3. 在未来发展中，图书馆学的学科研究将从细化走向整合，研究专题也越来越由影响社会的问题所决定。跨学科研究、多学科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增多。图书馆学一些重大前沿课题将成为多学科中交叉点，图书馆学的同族学科也会在知识资源建设上再次整合，图书馆学原有内部分支也将出现综合发展趋势。

4. 在未来发展中，图书馆学的学术理性会由技术倾向人文，二者之间将进一步协调与平衡。图书馆是人文主义的事业，图书馆学也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其圭臬。图书馆学学科价值将建筑于知识世界与知识受众之间的关联之上，科学方法也应注意从科学化向人文

化提升，学术评价也要以是否促进社会个体知识和信念协调发展为尺度。

5. 在未来发展中，图书馆学研究特点将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趋向。理论偏重解决认识与观念的变革，应用则侧重解决现实发展问题。二者结合，会使图书馆学成为社会人群获取知识的方法与工具；理论研究将促进应用发展，应用研究将为理论创新提供动力。

6. 在未来发展中，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将更加注重本土化。即一面重拾传统，一面借鉴、吸收国外图书馆学新思想、新方法，通过与本国国情的密切联系、对传统学术资源的挖掘和继承、学习外来图书馆学的优良传统，建设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中国图书馆学。

思 考 题

1. 社会发展的全球化为图书馆学研究带来哪些影响？
2. 网络社会具有哪些特点？
3. 未来图书馆学研究重心为何要向“知识”转移？
4. 为什么图书馆学会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发展？
5. 为什么说图书馆是人文主义的事业？
6.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7. 提倡图书馆学研究本土化有何意义？

附 录

阅读推荐目录

一、著作

1. 李希泌, 张椒华编.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3. 袁咏秋, 李家乔主编.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4.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上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5. 孙光成主编. 世界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百科全书.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1
6. [美] 杰西·H. 谢拉著; 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6
7. [印度] 阮冈纳赞著; 夏云等译. 图书馆学五定律.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8. [苏] 丘巴梁著; 徐克敏等译. 普通图书馆学.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9. [英] 哈里森著; 佟富译. 图书馆学基础.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10. 孟广均, 徐引篋主编. 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

究进展.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二、论文

1. 杜定友. 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 教育杂志, 1926 (9): 1~15; 1926 (10): 1~13. 又见: 杜定友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2. 刘国钧. 什么是图书馆学.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 1957 (1): 1~5. 又见: 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3. 黄宗忠等. 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1963 (1): 104~120

4. 周文骏. 概论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研究, 1983 (3): 10~18

5. 刘迅. 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 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 情报科学, 1982 (1): 13~20

6. 宓浩, 黄纯元. 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 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 见: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论文集. 杭州: 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研究组, 1985: 23~39

7. 张晓林. 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 图书馆学通讯, 1985 (2): 57~64

8. 吴慰慈.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概述. 见: 图书馆学情报学基本理论论文选.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1~21

9. 卢泰宏. 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与情报科学的技术传统.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2 (3): 4~10, 17

10. 黄纯元. 论芝加哥学派 (上、中、下). 图书馆, 1997 (6): 1~3, 14; 1998 (1): 7~10; 1998 (2): 6~9